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基金丛书
学术著作系列

迈向强权国家

1830年—1914年德国工业
化与政治发展研究

Deutschlands Weg zum Machtstaat
Studien zur Industrialisierung und politischen
Entwicklung in Deutschland 1830—1914

邢来顺

著

C B J J

出版社

华中师范大学



fusi-69/1

迈向强权国家

1830年-1914年德国工业化与政治发展研究

邢来顺 著

C B J J

2002 · 武汉



出版社

华中师范大学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648865

SBP11/05

(鄂) 新登字 11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迈向强权国家——1830 年—1914 年德国工业化与政治发展研究 / 邢来顺 著 .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6

ISBN 7-5622-2565-6/D·134

I. 迈…

II. 邢…

III. ①工业化 - 研究 - 德国 - 1830~1914 ②政治制度 - 研究 - 德国 - 1830~1914 IV. F451.69 D751.6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31495 号

迈向强权国家

——1830 年—1914 年德国工业化与政治发展研究

© 邢来顺 著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武昌桂子山 邮编：430079)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经销

湖北恒吉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责任编辑：黄利红

封面设计：新视点

责任校对：王 炜

督 印：姜勇华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0.75 字数：270 千字

版次：2002 年 6 月第 1 版

200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 000

定价：16.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引言	(1)
一 建立于“煤和铁”之上的帝国	(7)
(一) 姗姗来迟者——德国第一次工业革命	(10)
(二)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德意志经济一体化 进程的启动	(21)
(三) 发展是硬道理——普鲁士经济强权的崛起	(39)
(四) 识时务者为俊杰——普鲁士成为统一德国的 先锋	(47)
(五) 强权即公理——俾斯麦“铁血”浇铸统一的 德国	(55)
二 德意志帝国前期的政治状况	(68)
(一) 畸形怪胎——1871 年德意志帝国宪法	(68)
(二) 斑驳陆离——德意志帝国初期的政党状况	(77)
(三) 宗教世俗化——“文化斗争”掩盖下的教俗 势力交锋	(88)
(四)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社会主义 工人运动和非常法	(101)
(五) 量力而行——谋求欧洲大陆霸主地位的大陆 政策	(110)
三 第二次工业革命与德意志帝国成为工业先锋国家	(131)
(一) 新的机遇——世界第二次工业革命	(131)
(二) 后来居上——德国工业的跳跃性发展	(134)

(三) 从农业国到工业国——德国经济结构的根本性转变·····	(152)
(四) 走向现代社会——德国社会结构的变化·····	(162)
四 工业化进程中的德意志帝国政治状况·····	(179)
(一) 现实的即是合理的——行政结构上的中央集权主义发展趋势·····	(179)
(二) 春潮带雨晚来急——政治体制上向议会政治和民主化的迈进·····	(188)
(三) 暗涛汹涌——各种利益集团的出现和主要政党力量的消长·····	(204)
(四) 兄弟阋墙——工人运动的继续发展和社会民主党内部的思想裂变·····	(227)
(五) 抱残守缺——贵族占据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国家·····	(238)
(六) 继承与发展——工业化背景下的文化繁荣和思想意识多元化·····	(246)
五 工业化冲击下德意志帝国内外政策的调整·····	(261)
(一) 务实求真——德国政府对外贸易政策的变化·····	(261)
(二) 勇开先河——国家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和其他社会政策的进步·····	(276)
(三) “暴发户”心态——以夺取世界霸权为目标的“世界政策”·····	(294)
结语·····	(322)
参考文献·····	(324)
后记·····	(339)

引 言

本书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九五”规划项目“工业化进程中的德意志帝国政治发展研究”的最终成果。

该课题的研究主要是本着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想法来进行的，用句时髦的话说，就是想发挥历史学的借鉴功能，使历史研究为当代中国的经济和政治服务。众所周知，当今我国正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国家正经历着从农业社会形态向工业社会形态的迅速转变。在这一过程中，怎样少走弯路，怎样处理好经济发展与政治改革之间的关系，当代一些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德国是当今欧洲乃至世界上最重要的国家之一，也是对近现代世界历史进程产生过巨大影响的国家。人们每每提到德国，就会情不自禁地将它与两次世界大战联系起来，想到它那令人生畏的军事力量。然而，当我们对德国的历史作一种有机的、联系的思考时，就会发现，从19世纪下半期以来，德国之所以能在世人面前展示出如此巨大的活力，决非仅靠军事力量就能做到的。在这种强大的军事力量背后，其实隐藏着一些更原始的、根本性的支撑力，这就是德国的经济和政治因素以及相互间的作用。就经济而言，19世纪30年代开始的第一次工业革命，特别是70年代开始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使德国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了国家的全面工业化，成为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资本主义工业强国；而工业化又极大地促进了德国的国家统一和政治民主化进程。就政治而言，一方面，德国在通过改革步入资本主义社会的过程中保留了大量的封建残余，使得国家政治生活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滞

后性；另一方面，稳中求进的政治发展进程却在一定程度上为德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提供了稳定的社会保证，使得德国工业化能够在相对和谐的环境下进行。

正是基于以上看法，笔者以为，对德意志帝国时期的工业化与政治发展问题进行研究，既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又有一定的实践意义。从理论上讲，通过对德意志帝国时期工业发展与政治发展之间的关系的认识，可以更清楚地了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对政治发展的巨大影响力，认识资本主义政治发展规律。从实践上说，研究这一时期德国工业化与政治发展之间的关系，对于把握当前中国的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之间的关系，使中国稳步过渡到现代化工业社会，能起到借鉴作用。

本书把研究和阐释 19 世纪 30 年代以来，特别是 19 世纪下半期到 20 世纪初工业化过程中德国的政治发展状况，尤其是德意志帝国时期的政治发展状况，作为主要的立足点。换言之，本书主要从工业发展及其对政治影响的角度来认识这一时期的德国社会。

首先，本书探讨了经济一体化以及第一次工业革命与 1871 年德国实现国家政治统一的关系，实际上阐述了经济发展对于德国统一的极端重要性，从而将德国历史发展进程中最重要政治问题——国家的统一，从一开始就与经济发展，特别是工业化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

众所周知，德国从中世纪以来一直处于皇权衰微，各邦诸侯势力坐大的分裂割据状态。这种分裂割据的局面，使得德国有如一盘散沙，在内部不断争斗的同时，长期遭受着欧洲强邻的欺凌和侵扰。然而，从 19 世纪 40 年代末开始，曾经在德国地方各邦分裂主义势力与皇权对抗中扛大旗的普鲁士，一改以往的做法，承担起了德意志民族统一大业的使命。从 1864 年开始，它通过三次所向无敌的王朝战争，摧毁了阻碍实现德意志民族统一的国

内外政治势力，完成了国家的统一，并于1871年1月建立起强大的德意志帝国。此后，德国逐渐地改变了它在人们心目中那种“衣衫褴褛的骑士”形象，以“暴发户”的姿态出现在欧洲和世界舞台上。

德国的统一完全改变了当时的欧洲政治格局。德国在统一中表现出的强大军事力量和潜在的经济力量，使它取代法国成了欧洲大陆的霸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当时著名的国际政治家、英国保守党领袖迪斯雷利称德国的统一为影响大于法国大革命的又一次震撼欧洲的“革命”。

人们或许会问，为何德意志自中世纪以来延续了数百年的分裂割据状态在短短的数年之中就成了历史呢？当我们考察其中原因的时候，首先看到的往往是普鲁士强大的军事力量，还有俾斯麦那纵横捭阖的外交手腕。不错，这些都是普鲁士能够顺利地统一德意志的不可缺少的重要条件。然而，对这一问题，还要进行更深层次的思考。我们认为，普鲁士在这时之所以能顺利地完成了德国的统一大业，除了以上的条件外，根本的原因在于从19世纪30年代开始的德国经济一体化进程以及第一次工业革命。它们不仅使德国的政治统一有了统一的经济基础，而且为德国的统一准备了经济强权——普鲁士。到普鲁士统一德国前夕，它实际上已经通过关税同盟在经济上操纵了绝大部分的德意志邦国。而第一次工业革命则使普鲁士成了当时德意志各邦中经济实力最强大的邦国，并使德意志的经济到1870年时超过了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法国，成为欧洲大陆头号资本主义强国。强大的经济实力使普鲁士有可能供养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并利用其提供政治服务。正是从以上意义上，著名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凯恩斯称德国的统一实际上是建立在“煤和铁之上”的。

本书主要从国家工业化和政治发展两个方面进行论述，重点则着力于剖析德意志帝国时期的迅速工业化对德国政治状况的

影响。

德意志帝国时期是德国历史发展中一个极为重要的阶段。可以说，德意志帝国的建立是近代以来德国在世界政治舞台上发挥其巨大影响力的开端。正是在德意志帝国时期，德国开始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大国。通常情况下，作为一个世界性的大国，要在三个方面具备令人折服或敬畏的实力，亦即经济、政治以及军事方面应在世界格局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德意志帝国已经具备了这三个条件。在经济方面，到20世纪初，它已经发展成为世界第二、欧洲第一的资本主义工业强国。与此同时，它在国际政治中也成了呼风唤雨的角色，原先的欧洲僻壤柏林成了世人瞩目的国际政治的焦点。它的强大军事力量更是令它的敌人谈之色变。而德意志帝国之所以能取得以上成就，可以说，根本性的前提就是它在短期内迅速工业化所取得的巨大经济成就。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在短时间内迅速崛起的强大国家，却由于在一种“暴发户”的心态驱使下推行对外扩张和争夺世界霸权的政策而走上了战争之路，并很快毁于炮火之中。其教训，与它的崛起一样，同样值得人们深思。我们认为，德意志帝国之所以走上对外扩张和战争之路，有其深刻的经济和政治背景，是工业化过程中德意志帝国政治畸形发展的产物。

德意志帝国时期的经济发展是引人注目的，也是成功的。在短短的数十年间，它利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机遇，驶进了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的快车道，奇迹般地完成了工业化进程，迅速实现了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基于这一点，从发掘史学的借鉴功能着眼，我们有必要深入研究和探讨德意志帝国经济飞速发展的原因和特点，了解它在迅速工业化方面的成功经验，找到内在的规律性，以便为当今中国的经济建设提供借鉴。与此同时，我们还对德意志帝国工业化进程中出现的社会转型问题作了一些探讨和分析，以便就工业化进程对社会发展的影响作一个较为全

面、科学的历史总结，为制定有关的对策提供历史的依据，尽可能少走弯路。

研究工业化对德意志帝国时期的政治发展所产生的影响，是本书的重点。因此，本书在阐释德意志帝国初期政治状况的基础上，对由于工业化的冲击而造成的德意志帝国政治（包括文化和思想）状况的变化进行了一系列力所能及的探讨和研究。

德意志帝国建立初期，受各邦分离主义势力和普鲁士传统政治特点的影响，帝国在政治上表现为两大特点，即行政结构上的联邦主义和政治体制上以立宪君主制为装饰的专制主义。然而，伴随着国家工业化的进程，帝国的这两大基本政治结构因受到冲击而开始变形。在行政上，由于综合国力的增强、军事力量的发展、国家干预经济事务的增多以及社会立法的实施等，帝国初期的联邦政府体制渐渐失去了活力，中央集权趋势明显加强，帝国政府的职能和掌权部门都有所增加。在政治体制上，由于工业化使德国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力量得到增强，他们利用议会展开了争取政治权力的斗争，并使帝国出现了由专制主义向议会和民主政治发展的趋势。

随着德意志帝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德国各个社会集团的利益结构和阶级力量的对比也发生了变化，出现了各种利益集团，而代表各阶级和集团利益的政党之间也相应地出现了新的分化组合和力量消长，民族自由党、中央党和社会民主党等先后成为帝国议会的第一大党。

在看到以上政治变化的同时，我们还要注意到，尽管在工业化浪潮的冲击下，德国已经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之一，德意志帝国在政治上却始终是一个抱着封建特权的、贵族阶级占统治地位的国家，而在经济上支配这个社会的资产阶级仅仅在参与意义上加入了统治阶级的行列。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政治落后于经济的表现，也是德意志帝国政治上的畸形所在。

德意志帝国时期的文化和思想动态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迅速工业化进程中德国的政治状况。就德意志帝国时期的文化而言，虽然没有了古典时期的那种辉煌，但仍不失其繁荣，且带有工业社会的特征。与工业化社会多种集团力量的形成相适应，思想领域里则表现出一种多元化的发展趋势。从整体上看，德意志帝国时期文化和思想领域的特点可归纳为文化的繁荣和思想意识的多元化。

工业化过程中出现的各种新问题和新要求，也使得德意志帝国政府的内外政策受到冲击并处于不断的变化和调整之中。例如，在经济上出现了自由贸易政策转向贸易保护主义，进行摆动性调整；在统治策略上则由于工人阶级的壮大而从锋芒毕露的镇压政策逐步转变为所谓的和解政策，以期稳定政局；在对外政策上则由称霸欧洲大陆的“大陆政策”转为争雄世界的“世界政策”，并最终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

总之，通过研究和了解德国的工业化与政治发展之间的关系，我们或许可以得到这样一些历史的启示：经济发展是一个国家政治发展的基本前提。德国长期分裂割据局面的结束，德意志帝国时期民主化的进步和议会化的发展，德国社会各种政治力量的消长，德国政府各种应对政策的出台等，都或多或少地、直接或间接地与这一时期的经济迅速工业化存在着联系。德意志帝国时期发达的工业化经济与相对滞后的政治体制之间的非协调作用，也在很大程度上是德意志帝国走上军国主义和扩张主义道路的潜在根源，给德国历史的发展和德意志民族带来了巨大的不幸。对此，我们应当有清醒的认识。

一 建立于“煤和铁”之上的帝国

在西欧和中南欧地区，自 14、15 世纪起，法国、西班牙和英国等都先后建立起自己独立的民族国家，只有德意志和意大利这两个国家一直经历着分裂割据的磨难。其中，德意志的分裂割据尤其引人注目。公元 10 世纪奥托一世在位时期，德国王权一度非常强大，国势强盛。奥托一世不仅大举向外扩张，而且于公元 962 年加冕成为“罗马人的皇帝”，俨然以罗马帝国继承者自居。然而，由于王权选举制和封建领主的巨大独立性等传统因素的影响，在 14 世纪卢森堡王朝的查理四世颁布确认选帝侯选举皇帝的“黄金诏书”以后，德国王权趋于衰微，国家陷入了长期分裂状态。虽然自马丁·路德以来，许多德国人一直在为建立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而奔走和呼吁，但是，德国各邦统治者为了维持自己的独立地位而进行的分裂活动以及外部势力的干涉，使这些努力都一一化为泡影。18 世纪末 19 世纪初，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中法兰西民族释放出的巨大能量以及德国在战争中的溃败唤醒了德国人的民族意识，使德国人民认识到了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的必要性，民族情绪颇为高涨。这本是德意志民族实现统一的大好时机。然而，1815 年的维也纳会议却对德国人民的民族统一愿望熟视无睹，在德意志产下了一个不伦不类的怪胎——

德意志联盟^①。这一联盟由 38 个行使主权的独立邦和自由市组成。联盟的惟一机构是设在法兰克福的联盟议会，它负责处理联盟事务。联盟的每一项决议必须经全体大会至少 2/3 的多数同意方能通过。此外，联盟议会中还有三位非德意志君主成员，即身兼汉诺威国王的英国国王、作为荷尔斯泰因和劳恩堡公爵的丹麦国王、作为卢森堡大公的尼德兰国王。这样一个由主权邦国组成的联盟显然不是一个什么统一的民族国家，而只能算作一个松散的国家联合。

德意志民族为何会长期处于这种分裂状态呢？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②。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也是最关键的，那就是：在德意志诸邦国中，缺少一种强大的力量能够迫使其他各邦屈服，并

① Deutscher Bund 一词旧译为德意志邦联或德意志联邦。笔者以为，有关历史资料表明，该词翻译为德意志联盟更为合适。理由有二：第一，该词中并没有涉及“邦”（Staat），而且德语中的邦联（Staatenbund）和联邦（Bundesstaat）都有自己相对应的词；第二，从其组织形式看也应该是联盟，在这一组织中，各邦的权力甚至大于邦联的权力，因为它们在外交、军事方面也都各行其是，所以译成邦联和联邦都名不副实。1815 年 6 月签署的《德意志联盟文件》中曾明确规定，德意志联盟的“目的在于维护德意志外部和内部的安全以及各德意志邦国的独立和不可伤害性”。见 Rudolf Huber, *Dokumente zur Deutschen Verfassungsgeschichte. Band 1. Deutsche Verfassungsdokumente 1803—1850*, Stuttgart, Berlin, Köln, Mainz 1978, S.85. 1820 年的维也纳议定案中则更明确地重申“德意志联盟是德意志各主权诸侯和自由市的国际法的联合会”（原文为 Der deutsche Bund ist ein völkerrechtlicher Verein der deutschen Souveränen Fürsten und Freien Städten）。见 Dieter Grimm, *Deutsche Verfassungsgeschichte 1776—1866*, Frankfurt am Main 1988, S.65.

② 笔者曾对此有过专门的论述。参见肖汉森、黄正柏主编《分裂、统一的德国与国际关系》（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第一部分“德意志统一运动与欧洲”。

能应付来自外部势力的干涉威胁。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普鲁士的历史发展中得到一些启示^①。

普鲁士是从一个小邦发展而来的，可以说，普鲁士的发展壮大的历史本身就是德意志国家分裂的历史。正是普鲁士，为加强自己的独立地位，敢于屡次向头上戴着德意志皇冠的哈布斯堡君主提出挑战，并抢走其领地。然而，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普鲁士的发展壮大的历史又是德国从分裂逐步走向统一的历史。正是它在扩张的过程中，慢慢地蚕食着德意志境内的分裂小邦，自觉或不自觉地清除着分离主义因素，同时壮大着自己的力量，为日后统一德国奠定了基础。而普鲁士之所以能在德意志的分裂割据中不断发展壮大自己，一个众所周知的原因，就是普鲁士历代君王们所奉行的实力政策。这种实力政策主要体现在它的历代君主将发展经济和保持一支强大的军队当作国家发展的根本。道理说起来很简单，只有经济发展了，国家才能养活一支庞大的军队，只有有了一支强大的军队，才能在战争频仍的德国和欧洲守住自己的地盘并发展壮大自己。正是出于以上考虑，弗里德里希大帝等普鲁士君主虽代表封建阶级的利益，却能在经济上推行发展资本主义的政策，以求富国强兵。

不过，直到19世纪上半期以前，德意志尚缺乏一个在经济上和军事上足够强大的邦国来压服其他邦国和抵御外部势力的干涉。维也纳会议以后建立起来的德意志联盟实际上是一个由奥地利、普鲁士两大邦国以及其他小邦组成的“第三德意志”构成的三足鼎立的均势格局。而这种“德意志内部的均势使得德国可能

^① 舍普斯在其著作中对有关普鲁士国家的扩张史作了清晰的描述。参见 Schoeps, *Preussen: Geschichte eines Staates*, Berlin 1967.

的势力野心化为乌有”^①，因为这意味着德意志将在均势之下依旧保持一盘散沙的状态。所以，德国要统一，必须在其内部出现一个超于其他邦国之上的经济和军事强权，而第一次工业革命在德国的展开为铸造这样一个强权提供了机遇。

（一）姗姗来迟者——德国第一次工业革命

作为工业革命母国的英国，早在19世纪三四十年代就已经完成了第一次工业革命，法国和美国等国也随英国之后相继展开了工业革命。相比之下，由于深受分裂割据的困扰，德国直到19世纪30年代才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浪潮的冲击下，迟缓地迈开了工业革命的步伐^②。

19世纪初，是德国为工业革命创造条件的时期。首先，18世纪末19世纪初，德意志诸邦国受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的洗涤，封建因素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击。各邦统治者为了稳定自己的统治，纷纷进行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旧的封建制度逐步瓦解。因此，进入19世纪以后，德国的社会和政治环境较之以往更加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其次，以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普鲁士式道路”为特点的农奴制改革为德国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在农奴制改革的过程中，容克地主们通过收敛农民为获得人身自由和份地而交付的赎金，积累了一定的资本。许多农民则在获得人身自由的同时，成了不得不靠出卖自己劳动力为生的一无所有的无产者。这不仅为即将到来的德国工业革命提供了

^① Thomas Nipperdey, *Deutsche Geschichte 1800—1866: Bürger Welt und starker Staat*, München 1983, S.362.

^② 也有观点认为，德国工业革命开始于19世纪40年代。参见 A.G.Kenwood & A.L.Lougheed, *Technological Diffusion and Industrialisation before 1914*, New York 1982, p.19.

雄厚的资金，而且准备了充足和廉价的劳动力。

此时，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浪潮也已开始拍打德意志的大门。源于英国的工业革命浪潮首先波及的是西德意志地区，而且来此创办工业的起初也是英国人。例如，著名英国企业家科克利尔兄弟在比利时建立起炼铁厂、煤矿和锻压厂的同时，在普鲁士也建立起了示范性企业。英国人因此成了包括德意志地区在内的“欧洲大陆的老师”^①。在德意志地区，较早涉及工业革命的是一些著名的私人企业家。在威斯特发伦，弗里德里希·哈尔科特就建立起了炼铁厂和炼铜厂，并投资于运河和铁路建设，推动蒸汽船只的使用等。几乎与此同时，弗里德里希·克虏伯在鲁尔地区的埃森建立了德国第一家钢铁厂^②。由于当时的埃森尚未展示出有什么发展前途，克虏伯此举实有先见之明。德国的纺织行业中也已开始利用英国的机器和技术。早在1783年，德国就安装了第一台水力纺纱机。到1814年，仅萨克森就已有机械纺锭28万枚。1831年，德国已经拥有1000台以上的机械棉织机。遗憾的是，尽管德国在引进第一台纺纱机、蒸汽机等方面紧随着英国工业革命的步伐，它却没有像英国那样，把这些新机器和新工艺迅速加以推广应用并发展为广泛性的运动，而是以一种极其缓慢的速度向前移动，结果使得德国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准备阶段与第一次工业革命的真正实质性开始之间存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距离^③，即从18世纪80年代中期到19世纪30年代中期，约半个

① Robert-Hermann Tenbrock, *Geschichte Deutschlands*, München 1977, S.179.

② Robert-Hermann Tenbrock, *Geschichte Deutschlands*, München 1977, S.180.

③ Mottek, Blumberg, Wutzmer, Becker, *Studien zur Geschichte der industriellen Revolution in Deutschland*, Berlin 1960, S.19.

世纪。而在这一时段，英国第一次工业革命已接近尾声，法国、比利时等国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也已经迅速展开。

大致看来，德国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可划分为两个阶段。

19世纪三四十年代是德国工业革命的起步时期。与工业革命早期的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一样，德国的工业革命也是从纺织工业开始的。以普鲁士为例，1831年时，它已拥有25.2万台麻布织机、2.2万台毛织机、2.5万台棉织机和9000架丝织机。萨克森的纺织业也很发达，开姆尼茨被称为德国的曼彻斯特。然而，这一时期的德国纺织业与英国等发达国家相比较，显得很落后。例如，到1846年时，其织布行业还几乎闻不到机器的隆隆声。即便是纺织业最发达的普鲁士，其动力棉织机的使用比例还不到4%。在柏林的4个棉纺厂中，所用的机器主要是手摇珍妮机^①。由此可见，在这一时期的德国纺织业中，手工生产仍占据着统治地位。

需要强调的是，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中，铁路建设对德国的工业扩张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从以纺织业为中心的轻工业迅速转向以铁路建设为重点的重工业，通过铁路建设来带动其他工业部门的发展，可以说是德国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中后来居上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

德国一些实业家和政治家早在19世纪20年代就已经提出了铁路建设问题。前文提及的实业家弗里德里希·哈尔科特从1825年起就在宣传他的铁路计划。作为关税同盟创办者的普鲁士财政大臣冯·莫茨也曾经考虑过修建一条从莱因河到威悉河之间的铁路，以便将运输物品转运到威悉河，避免荷兰人在莱因河上征收通行税。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则为修筑铁路之事专门派人到

^① 以上数据参见 J.H.Clapham,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France and Germany 1815—1914*, Cambridge 1936, pp.93—95.

英、法、比利时等国进行考察。

早在1827年—1832年，德国人已修建了一条从林茨到布德威斯之间长达79英里的用马作牵引的铁路。1835年，德国第一条真正的用蒸汽动力作牵引的铁路，即从纽伦堡到菲尔特之间长达6公里的铁路开通^①，从此开始了德国的铁路建设事业。

然而，作为一项新兴的交通运输业，铁路建设在德国的发展起初并非一帆风顺。出于政治利益和观念上的考虑，德国各邦政府开始时对这一新的交通运输方式持观望甚至反对态度。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取得政府对铁路建设的支持，人们曾迫使一位在法兰克福联盟议会的奥地利代表乘坐蒸汽船沿莱茵河到杜塞尔多夫，然后从那里坐火车去柏林，最后从柏林回家。此举目的在于让他体会一下现代交通工具的好处。当时的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也对建设铁路表示不解：为什么人们都想在半小时内从柏林抢赶到波茨坦去？他甚至抱怨，现在最普通的臣民也可以和他以同样快的速度旅行了^②。人们或许觉得这位国王的想法有些可笑。然而，如果我们对此作一点深层的思考，就不难看出，这实际上是一位封建特权人物对工业化带来的社会民主进步所产生的一种发自内心的不满和抗拒。在这位普鲁士国王看来，只有他才能拥有享受快捷交通工具的权利。

正是由于以上原因，德国铁路建设初期的一个重要特点是，

① 关于纽伦堡至菲尔特之间铁路开通的时间有不同说法。多数学者认为1835年为这段铁路开通的时间。参见Dieter Raff, *Deutsche Geschichte vom Alten Reich zur zweiten Republik*, München 1985; J.H. Clapham,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France and Germany 1815—1914*. 另有观点认为，这一铁路直到1837年才开通。根据笔者涉猎的有关资料，这种观点可能基于该铁路的正式客运开通时间。参见Martin Kitchen, *Cambridge Illustrated History: Germany*, Cambridge 1996, p.166.

② Martin Kitchen, *Cambridge Illustrated History: Germany*, p.167.

到1840年为止，私营企业一直在唱主角。在此以前修建的纽伦堡至菲尔特、柏林到波茨坦、莱比锡到德累斯顿等各段铁路，几乎都是私人投资。此后，由于铁路运输可以降低运费以及具有更大的灵活性等诸多好处，社会各界对铁路建设的热情才表现出来。到1850年前夕，出于经济利益和自身安全因素的考虑，各邦政府的资助终于渐渐增多起来^①。

在19世纪以前，德国的煤炭资源很少得到利用，冶铁业一直采用木炭熔冶炼矿石和手工操作的古老方式经营着。1815年以后，受西欧各国工业革命的影响，作为莱茵工业区核心的鲁尔煤田开始得到有效开采。到40年代，德国的一些矿井已开始运用机械采煤。此后，随着工业革命的展开，焦煤逐渐取代木炭成为冶金业的燃料。到1847年，在普鲁士的227个熔铁炉中已有32个使用煤炭进行冶铁。对煤炭的需求大大促进了煤炭开采业的发展，煤产量扶摇直上。1820年，德国的煤产量仅120万吨，1830年仅140万吨，而1840年则猛增至260万吨，1850年更增至670万吨。

机器制造工业也有一定的发展。以机车制造业为例，1837年，柏林工艺研究所的一位名叫波尔锡希的学生开办了一个有50名工人的机器制造厂。10年后，他手下的工人达到1200人。此外，在莱茵地区也有一些拥有大规模机器制造工场的大型企业，其中奥贝尔豪森的工人超过千人。到19世纪40年代，德国已经有了几家制造纺纱机、蒸汽机和轧制铁轨的工厂。

当然，无论从深度上还是广度上看，19世纪上半期的德国工业革命尚处于起步阶段。作为工业革命开展程度标志的机器制造工业在德国仍然很薄弱。以蒸汽机车为例，在19世纪40年代

^① [德] 卡尔·艾利希·博恩：《德意志史：从法国革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下册，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645页。

初德国使用的 245 辆蒸汽机车中，只有 38 辆产自国内。工业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工场手工业和分散的小手工业，直到 1846 年—1847 年，在德意志关税同盟内的劳动人口中，工厂工人还不到劳动人口的 3%^①。从使用蒸汽动力，炼铁和纺织等工业产品产量以及对外贸易周转额来看，德国都远远低于英国和法国。

19 世纪五六十年代，德国第一次工业革命进入大规模展开阶段。与工业革命的大规模展开相对应，这一时期的德国工业发展也出现了高涨的局面。

在这一时期，工业革命之所以能在德国迅速展开并导致工业的高涨，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经过 1848 年革命，封建因素在德国进一步遭到削弱。在作为经济基础的农业中，资本主义关系进一步得到加强。这一切在普鲁士可以看得很清楚。众所周知，在 19 世纪初，普鲁士通过施泰因—哈登贝格改革已经走上了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普鲁士式道路”。然而，普鲁士统治当局为了维护容克地主的利益却一再拖延改革进程。直到 1848 年，在普鲁士仅有 6/7 的富农、1/5 的中农和贫农获得赎免封建义务的机会，从农奴地位中解放出来。1848 年革命后，尚未从惊恐中恢复过来的普鲁士统治阶级才加速了解放农民的进程。1850 年 3 月，普鲁士政府颁布“赎免法”，无偿废除了 20 种基于人身的封建义务，并将赎免封建义务的范围由富裕农民扩大到一般农民。1857 年 3 月，普鲁士政府为加速农民的赎免进程，颁布“宣告丧失权利法令”，将 1858 年 12 月 31 日作为解放农民的停止实施期限。但到这时，绝大部分农民实际上已经取得了自由。于是，许多解放了的农民从德国东部的农业区“来到西部的柏林地区、工业城市和新兴的鲁尔工业区”，以满足铁路建设、重工

^① Martin Kitchen, *Cambridge Illustrated History: Germany*, p.166.

业的扩建以及稍晚发展起来的机械工业对劳动力的需求^①。第二，德意志关税同盟进一步得到扩大，从而大大缩小了因国家分裂给经济发展带来的不利影响。

从这一时期德国工业革命的进展情况看，纺织工业作为德国最先开始工业革命的部门，这时有了新的发展，现代的工厂制度已经占据了统治地位。以棉纺织工业为例，由于大规模地使用水力和蒸汽动力，德国棉纺织业的棉纱产量和纱锭数量大增。1835年，德国棉纱产量不足4 000吨，纱锭580 000个。到1865年时，德国的棉纱产量已超过37 000吨，纱锭数达到2 350 000个^②。丝织业、麻纺织业和毛纺织业也有很大发展。以丝织业为例，到1861年时，215个大工厂已经基本上集中了所有的缫丝生产。在毛纺织业中，羊毛在19世纪40年代末还是德国主要的输出商品，到50年代末已经无法满足自己工厂的需要了。

德国第一次工业革命中一个极其显著的特点是，“铁路建设和重工业是发展的首要支柱”^③。在第一次工业革命的第二阶段，由于在德国出现了政府规划下的私营股份公司投资以及各邦政府直接投资的双管齐下的局面，铁路建设在德国呈现出一种爆炸性的扩张趋势，投入铁路建设的人力和资本急速增长。据统计，1840年德国铁路企业的劳动力人数仅为1 648人，1850年为26 084人，1860年为85 608人，1870年增加到了161 014人。

① Deutscher Bundestag, *Fragen an die deutsche Geschichte: Ideen, Kräfte, Entscheidungen von 1800 bis zur Gegenwart*, Bonn 1993, S.160.

② Hubert Kiesewetter, *Industrielle Revolution in Deutschland 1815—1914*, Frankfurt am Main 1989, S.180; Wolfram Fischer, Jochen Krenzel, Jutta wietog, *Sozialgeschichtliches Arbeitsbuch. Band 1. Materialien zur Statistik des Deutschen Bundes 1815—1870*, München 1982, S.79.

③ Deutscher Bundestag, *Fragen an die deutsche Geschichte: Ideen, Kräfte, Entscheidungen von 1800 bis zur Gegenwart*, S.160.

德国的铁路年净投资额则由 1841 年的 2 250 万马克增加到了 1875 年的 81 670 万马克。铁路资本在全部资本中所占比重则由 1850 年的 2.8% 上升到了 1875 年的 10.4%^①。德国的铁路建设因此出现了一种跳跃性发展。

表 1-1 1835 年—1875 年德国铁路营运里程增长状况^②

年份	1835	1845	1855	1865	1875
里程 (公里)	6	2 300	8 290	14 690	27 960

德国铁路建设的迅猛发展主要基于以下原因：第一，在德国，铁路投资的回报率相当高，19 世纪 60 年代，各铁路公司的分红达到 10%~20%。因此，资本家竞相投资于铁路建设。第二，各邦政府为了军事目的积极从国库中拨巨款修筑铁路，从而使修筑铁路的资金有了进一步的保证。在 19 世纪 50 年代，德国较大城市之间的铁路线还彼此不连接，到 19 世纪 60 年代，德国境内各主要铁路线已经开始相连，并且形成了较为密集的路网。

铁路建设的迅猛发展，大大改善了德国的交通运输状况。19 世纪初，人们乘快邮从汉堡到柏林需要 36 小时，到 19 世纪末则只需 5 小时。柏林到科隆的时间也由 82 小时缩短到 10 小时，运输费用也相应下降。铁路建设带来的运输时间的缩短、货运能力的提高和运价的下降等，都有利于煤、铁等生产资料的流通，使生产力发展有可能打破地区界限而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得到提高，物产资源丰富的内陆边远地区不再与世隔绝，因而有利于工业革

① Rainer Fremdling, *Eisenbahnen und deutsches Wirtschaftswachstum 1840—1879*, Dortmund 1975, S.24, 31, 30.

② Gustav Stolper, *Deutsche Wirtschaft seit 1870*, Tübingen 1966, S.46.

命在更普遍的范围开展。

表 1-2 1840 年—1870 年德国
铁路每人、每吨/公里平均运价 (单位: 芬尼)^①

年份	1840	1850	1860	1870
每人/公里	4.4	4.2	4.4	3.4
每吨/公里	16.9	10.1	7.9	5.6

铁路建设的最大功绩在于直接或间接地促进了第一次工业革命中作为主导工业产业的钢铁、煤炭等重工业的发展^②，因为“在铁路建设的过程中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工业。人们必须制造轨道、机车、车皮，选定线路，开挖隧道和修建桥梁”，而这种建设需求大大拉动了钢铁、煤炭、机器制造等工业部门的强劲增长^③。

以钢铁工业为例，据统计，19世纪40年代以后，德国各现代型铁厂中50%以上的产品用来供应铁路建设，但是仍不能满足需求^④，以致德国钢铁工业在19世纪50年代以后出现了迅猛的发展。以下数据清楚地反映了这一时期德国钢铁工业的加速发展态势。

① Rainer Fremdling, *Eisenbahnen und deutsches Wirtschaftswachstum 1840—1879*, S.57.

② Hans-Werner Hahn, *Die industrielle Revolution in Deutschland*, München 1998, S.109.

③ Diether Raff, *Deutsche Geschichte vom alten Reich zur Zweiten Republik*, München 1985, S.99.

④ Richard H.Tilly, *Vom Zollverein zum Industriestaat: Die wirtschaftlich-soziale Entwicklung Deutschlands 1834 bis 1914*, München 1990, S.52—53.

表 1-3 1840 年—1870 年关税同盟及德意志帝国内生铁产量^①

年份	1840	1850	1860	1870
产量 (千吨)	190.70	217.00	529.10	1 391.10

表 1-4 1840 年—1870 年德意志联盟钢产量^②

年份	1840	1850	1860	1870
产量 (千吨)	122.0	196.9	426.3	1 044.7

在这一时期，德国人也已经建立起自己的机器制造业，出现了一些规模巨大的企业。例如，1837年由波尔锡希建立的机器制造厂，到1866年时已有工人1600人。1841年，波尔锡希机器厂制造出第一台机车，到19世纪70年代，该企业已经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机车制造厂。而以生产铸钢起家的克虏伯企业，在1846年时仅雇佣了122人，1850年增加到237人，1870年竟然突增到了7000人。到19世纪60年代初，德国的机器制造业工人已达98000人。机器制造业的建立，意味着德国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已经接近尾声。

进行大规模的工业革命必须有充足的资金保证。对此，虽然由于没有参加海外殖民掠夺等原因，德国在原始资本积累方面有些先天不足，不如英、法等国，但仍然通过股份公司和股份银行等渠道筹集到了大批资本。在这方面，我们可以从股份公司和股

^① Reinhard Spree, *Die Wachstumszyklender deutschen Wirtschaft von 1840 bis 1880*, Berlin 1977, S.473.

^② Wolfram Fischer, Jochen Kregel, Jutta wietog, *Sozialgeschichtliches Arbeitsbuch. Band 1. Materialien zur Statistik des Deutschen Bundes 1815—1870*, S.70—71.

份银行在德国的发展状况中有一个大致的把握。据统计，1818年—1849年的30多年间，德国仅建立了18家股份公司，而1850年—1859年的10年间，成立的股份公司竟达到251家^①。这一时期的股份银行也很活跃，1850年—1870年，仅普鲁士就有20家股份银行，资本近1亿马克。德国的一些大银行，如贴现公司（1851年）、达姆斯塔特工商银行（1853年）、德意志信贷银行（1856年）等都创办于这一时期。“股份公司和股份银行出现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从财力上支持工业企业。”

由于德国工业在19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高速发展，到德意志帝国建立前夕，在德国的一些发达地区，如普鲁士、萨克森、巴伐利亚、巴登等地，工业革命已经基本完成。这一点不仅从上述工业发展状况中可以看出，而且从德国进出口商品的结构改变上可以得出结论。在19世纪前半期，德国向外输出的主要是谷物、羊毛等农产品以及木材，只有极少量的麻布、金属制品等工业品，进口的主要是棉纱、铁块、生铁等；而到1870年时，德国输出的主要是机器、金属制品、煤炭、棉布、化学产品等工业品，进口商品主要是棉花、羊毛、矿石等工业原料以及谷物等农产品。1870年，德国在世界工业生产中所占的比重已经达到13%，超过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法国（10%）^②，进入了世界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行列。

应该说，德国第一次工业革命的速度是很快的，特别在19世纪五六十年代，其工业发展速度远远高于英、法等国。1850年—1870年蒸汽动力的增长基本上可以说明这一问题。在这20

^① Deutscher Bundestag, *Fragen an die deutsche Geschichte: Ideen, Kräfte, Entscheidungen von 1800 bis zur Gegenwart*, S.160—161.

^② 同期英国和美国在世界工业生产中所占的比重分别为32%和23%。

年间，德国的蒸汽动力由 26 万马力增加到 248 万马力，增加 8 倍以上；法国从 37 万马力增至 185 万马力，增加了 4 倍多；英国从 129 万马力增至 404 万马力，增加不到 3.5 倍。由此可见，德国不仅将法国远远地甩在后面，而且与英国的距离也大大地缩短了。这种发展为日后德意志帝国时期的全面工业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德国人对于这一时期的工业发展充满了自豪感。1867 年，一位德国人在评价巴黎世界博览会时曾这样自信地写道：“我们的铸钢是无可匹敌的，我们的玻璃、我们的纸张出类拔萃，在化学产品方面我们击败了英国人和法国人的竞争，我们的织布机、工具机和蒸汽机车已经或至少已经与英国的和美国的相上下——相比较而言，这一目标是在极短的时间内实现的。”^①德国正以迅猛的势头向工业国挺进。

（二）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德意志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启动

德意志的经济一体化进程是与它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同步的，它们之间有着一种互动关系。一方面，经济一体化在一定程度上为德国工业革命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促进了工业革命在德国的迅速展开；另一方面，工业革命作为一种不可阻挡的世界性趋势，迫使德意志各种社会力量为了迎接它的到来而自觉地或不自觉地接受德国经济一体化这样一个进程，而工业革命在其发展过程中所释放出的巨大能量则反过来进一步密切了德国各地区、各行业之间的联系，从而加强了德意志的经济一体化进程。因此，我们在研究和考虑 19 世纪德国经济一体化问题时，不应只强调以关税同盟为核心的经济一体化对德国工业革命进程的促进作用，同

^① Deutscher Bundestag, *Fragen an die deutsche Geschichte: Ideen, Kräfte, Entscheidungen von 1800 bis zur Gegenwart*, S.161.

时也应该看到工业革命对促进德国经济一体化所起的作用。有鉴于此，我们在谈及德国统一前的德意志经济一体化进程时，可以从以下两个主要方面来加以考察：德意志关税同盟的创立与发展；以铁路建设为代表的工业发展对整合分裂的德意志的经济状况所起的作用。

如前所述，1815年建立起来的德意志联盟实际上只是一个由分裂的各主权邦国组成的松散国家联合。在德意志联盟统一的外表下，各邦拥有绝对的独立性，它们在内政外交上各行其是。虽然联盟条例第19条规定了各邦将来在贸易和交通方面要“采取一致行动”，但各邦由于考虑到自己的“主权”独立性，都不愿意放弃自己独立的税收和商业政策。结果是德意志境内各邦之间依旧与往常一样，关卡林立，关税繁多。据记载，在当时的德意志境内，从马格德堡到德累斯顿沿途有16道关卡，货物从易北河下游的汉堡到德累斯顿竟要缴纳35次过境税。在普鲁士这样一个邦中，甚至每一个省或地区也都有自己的关税。1818年，普鲁士境内仍然存在60个内部关卡^①。众多的关税如一座座森严的壁垒，严重妨碍了商品的自由流通，阻碍着刚刚起步的德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对于德国资产阶级而言，这种情况显然是不能容忍的。道理很简单：第一，他们需要有一个统一的国内市场来自由地买卖他们的商品；第二，他们需要有一个统一的关税政策来保护他们刚刚起步的工业免受工业革命先驱英国的竞争；第三，林立的关卡本身就是阻碍德国国家统一的一种最明显的标志，这显然为追求民族统一的德国资产阶级所不容。

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德国出现了一些要求发展德国资本主义

^① [苏]波梁斯基：《外国经济史》（资本主义时代），三联书店1963年，第163页。

经济、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其中以国民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最为著名。李斯特在他的学说中首先提出了建立统一的德意志经济区的主张，并且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展开了一系列的活动。

弗里德里希·李斯特 1789 年出身于符滕堡的罗伊特林根城，未受过正规教育。1817 年应聘为蒂宾根大学教授。1819 年，他发起创立“德意志商业和手工业联合会”。同年，他代表德意志商业和手工业联合会向法兰克福联盟议会提出了在德国境内取消全部关税的请求。在提交的请愿书中，李斯特痛心疾首地描述了当时德意志关卡林立的危害：“德国境内的 38 种关税和过境税使内陆交通陷于瘫痪，这有如人体的各个部位被捆扎，血液无法流到其他部位一样。人们若要从汉堡去奥地利或从柏林去瑞士做生意，就必须经过 10 个国家，研究 10 种关税和过境税制度，缴纳 10 次过关税。如果谁不幸地住在三四个邦的交界处，那他就得终生生活在相互敌对的海关官员和过境税官员中，他没有祖国。这种状况对于那些想开展活动和生意的人来说是令人沮丧的。他们用妒嫉的目光注视着莱茵河对岸，在那里，一个伟大的民族从英吉利海峡到地中海，从莱茵河到比利牛斯山脉，从荷兰边境到意大利，正在自由的河流和开放的道路上进行着商业活动而碰不到一个关税官员。”^①1820 年，李斯特又多次来往于南德各邦政府之间，为建立南德商业同盟而活动，促成南德各邦在达姆施塔特召开了关于成立南德商业同盟的协商会议。尽管数年之后南德商业同盟才有了结果，但李斯特在其中起的“直接性作用”是毋庸置疑的。然而，李斯特的活动不但没有得到赞许，他反而因主张统一关税和改革市政管理等“蛊惑性的阴谋活动”而遭到符滕堡

^① Friedrich List, *Schriften/Reden/Briefe, Band 1*, Berlin 1932, S. 492—493.

政府 10 个月的监禁^①，后被迫流亡美国。

1832 年，李斯特以美国领事的身份回到德国。他继续鼓吹建立统一的德意志关税同盟，并宣传在德意志境内建设广泛的铁路网。1840 年，他出版了他的代表作《政治经济学的民族体系》^②。在该书中，他明确提出了要建立统一的关税和统一的经济区的主张，认为一个国家的工业在建立之初必须实行保护关税，以对付外国的竞争^③。李斯特的上述思想对于推动统一的德意志关税同盟的建立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他因此而被推崇为“德国关税同盟的思想鼻祖”^④。

李斯特关于建立关税同盟的主张虽然遭到坚持实行保护关税政策的奥地利的反对，却被德意志的另一大邦普鲁士所接受。在通往德意志关税同盟的进程中，普鲁士扮演起了先行者和领导者的角色。

普鲁士之所以能在建立德意志关税同盟的问题上较之其他德意志邦国先行一步，起初主要是考虑到普鲁士的领土构成的特殊性及其特殊历史状况。首先，在 1815 年的维也纳会议上，列强对欧洲领土进行了重新划分，德意志各邦的领土也进行了新的调整。根据“补偿原则”和“遏制原则”，普鲁士在失去它从瓜分

① Helmut M. Müller, *Schlaglichter der deutschen Geschichte*, Mannheim, Wien, Zürich 1986, S.153.

② 该书原文为 *Nationales System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旧译为《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然而，通观该书，其强调的是反映德意志民族利益的民族经济学，而且 *National* 一词只有“国家的”、“民族的”而无“国民的”含义，故笔者认为，该书译为《政治经济学的民族体系》较为确切。

③ Robert-Hermann Tenbrock, *Geschichte Deutschlands*, S.180.

④ 也有观点认为，由于民族政治的原因，当时和此后的人们对李斯特的估价过高。参见 [德] 卡尔·艾利希·博恩：《德意志史：从法国革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下册，商务印书馆 1991 年，第 528 页。

波兰中得到的大片土地的同时，却获得了萨克森的大部分和图林根的大片土地，以此作为所受损失的补偿，并以德意志大门的守护者的角色遏制革命的法国。然而，普鲁士的领土构成有一个极为不利的特点，即领土并非一个整体，而是被分为东西两大块。汉诺威、黑森以及图林根就像两块楔子从南北两方插入普鲁士的领土之间，将普鲁士一分为二。而且，普鲁士没有通往北海的直接通道，流经普鲁士领土的莱茵河和威悉河两大河流的入海口都控制在他人手中。所有这些，对普鲁士的经济交流显然是极为不利的。因此，必须建立一种全德范围内的统一关税体系来克服因领土状况给普鲁士带来的不利因素。其次，由于普鲁士的领土是在各个历史时期的不断扩张中形成的，诸如西部工商业发达的莱茵—威斯特法伦和东部各农业省份之间的历史以及经济发展都不尽相同，有着各自的财政和关税史。如前所述，直到1818年时，普鲁士的内部依然存在60个关卡。所有这一切，都严重地妨碍着普鲁士内部资本主义经济的交流和发展，使普鲁士政府深感有必要进行关税体制的改革，以便使各省份在管理上和政治上统一起来，实现政治一体化^①。再次，从打击走私、增加政府财政收入的角度出发，普鲁士政府也愿意进行关税体制改革。在当时邦国林立、各邦杂处的情况下，走私显然是很容易的事，而领土被分成数块的普鲁士更是对走私防不胜防^②，结果是，大量的关税

^① Richard H. Tilly, *Vom Zollverein zum Industriestaat: Die wirtschaftlich-soziale Entwicklung Deutschlands 1834 bis 1914*, S.39.

^② 当时的普鲁士除了领土被分成东西两大块外，还有飞地方面的烦恼。在它的领土内有数块安哈尔特的飞地，而它也有飞地在图林根邦内以及荷尔斯泰因、梅克伦堡和汉诺威之间。参见 *Deutscher Bundestag, Fragen an die deutsche Geschichte: Ideen, Kräfte, Entscheidungen von 1800 bis zur Gegenwart*, S.57.

财源流失。与此相对应的是，当时的普鲁士正“面临着国家破产而不得不向罗思柴尔德银行贷款”^①。因此，必须在全德范围内建立起一种合理的、适度的关税，只有在这种关税体制下，才能使走私成为一种没有诱惑力的举动，同时却又可以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

正是出于以上考虑，普鲁士政府从1818年起开始实行新的税则。这年5月26日，普鲁士政府颁布了由税务总署署长卡尔·格奥尔格·冯·马森起草的关税法。根据这一法令，在普鲁士邦内实行统一税制，取消其境内的一切关卡，普鲁士遵循自由贸易原则，这一原则将根据其他国家的商业政策进行调整。这一关税税则的颁布，意味着一个拥有1050万人口的统一市场形成了。在这一税则下，普鲁士对进口的工业品仅征收10%的从价税，同时允许原料的免税输入^②。1818年的普鲁士关税法则成了日后德意志关税同盟的核心。

应该说，普鲁士政府起初在实行这一关税法则时，并没有过多地考虑到日后它将利用建立关税同盟的方式来取得自己在德意志的领导地位，也没有想到这一税则会成为一个统一的德国的税则。只是在这一税则颁布10年以后，普鲁士政府才意识到，建立关税同盟不仅具有巨大的经济意义，而且对于提高它在德意志的政治地位也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众所周知，在1815年建立的德意志联盟中奥地利担任着领导角色，普鲁士处于一种防守地位。然而，一个普鲁士领导下的关税同盟将意味着它会形成一种对奥地利的商业政策优势，进而夺取政治领导权。于是普鲁士开

^① [德] 卡尔·艾利希·博恩：《德意志史：从法国革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下册，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529页。

^② [苏] 波梁斯基：《外国经济史》（资本主义时代），三联书店1963年，第173页。

始利用关税同盟为自己的政治目的服务^①。

尽管如此，在德意志其他诸侯们的眼里，普鲁士新关税法则的实行，不仅仅是一项经济措施，而且可能具有其政治目的。普鲁士具有优越的地理位置，它正好处于德国的主要商路上。除了汉诺威和卡塞尔之间的瓶颈地带外，它控制了南北向的所有通道；流经德意志境内的莱茵河是一条重要的运输通道，而它的下游两岸都在普鲁士的手中；作为德国两大贸易商品博览会城市之一的莱比锡通往波兰和俄国的道路也都必须穿过普鲁士的西里西亚。正是由于以上情况，德意志的许多邦国都对普鲁士有所顾忌，惧怕普鲁士对它们进行贸易上的“讹诈”，进而在政治上进行要挟，削弱它们的独立地位。在这方面，萨克森对普鲁士的戒心最大。因此，在普鲁士的新关税法则出台后，德意志各邦之间曾围绕关税问题而进行了一系列的斗争。这些斗争可归结为两大类：各邦为维护本邦私利而进行的抗争；普鲁士和奥地利两大邦国之间为争夺德意志的领导权而进行的斗争。这两大类斗争在关税同盟的建立及发展过程中往往交织在一起。

普鲁士统一关税的行动首先遭到已成为普鲁士领土内的飞地的安哈尔特等小邦的反对，它们担心因此而遭到普鲁士的封杀。尽管这些小邦得到奥地利的支持，但胳膊毕竟拧不过大腿。1828年以后，这些小邦终于在普鲁士的强大压力下屈服。

来自中等邦国的对抗是普鲁士需要克服的最大阻力之一。以巴伐利亚、符滕堡、巴登、汉诺威等为代表的德意志中等邦国试

^① 这一观点已经为许多德国史学家所接受。参见 Hans-Ulrich Wehler, *Deutsche Gesellschaftsgeschichte*. Band 2. *Von der Reformära bis zur industriellen und politischen "Deutschen Doppelrevolution" 1815—1845/49*, München 1987, S.125; Hahns-Werner Hahn, *Geschichte des Deutschen Zollvereins*, Göttingen 1984, S.20—21.

图通过联合的方式来实行一种能够维护自身利益的关税政策。

1820年9月，南德各邦曾在李斯特的斡旋下在达姆施塔特召开了成立“南德商业同盟”的协商会议。然而，在1823年以后，由于黑森—达姆施塔特转而靠近普鲁士，南德诸邦分裂成以巴伐利亚、符滕堡为一方和以巴登、黑森、拿骚为另一方的两大集团。1825年2月，巴伐利亚和符滕堡之间草拟了一个关于南德关税和贸易同盟的基本条约，这一条约成为后来德意志关税同盟管理形式的前导。1827年4月，巴伐利亚和符滕堡签订预备条约。1828年1月18日，双方正式签订关税同盟条约，组成南德关税同盟。

与此同时，普鲁士试图建立关税同盟的努力也出现了突破性进展。普鲁士一直对黑森选帝侯国（黑森—卡塞尔）以及黑森—达姆施塔特情有独钟，因为这两个黑森邦国正处在普鲁士本土和它的莱茵省之间，如果能与两个黑森邦国联盟，对于普鲁士全境的商业流通自然大有好处。因此，普鲁士一直努力争取两个黑森邦国的合作。鉴于夹在普鲁士和巴伐利亚—符滕堡集团之间的黑森选帝侯国既不想与南方也不愿与北方联合，而且巴伐利亚—符滕堡的关税同盟预备条约已经签署，为了限制南德关税同盟，普鲁士才决定与黑森—达姆施塔特先行结盟。1827年8月，普鲁士财政部长弗里德里希·冯·莫茨开始与黑森—达姆施塔特就两个邦国之间实行关税联合问题进行谈判。1828年2月14日，普鲁士与黑森—达姆施塔特在1818年普鲁士关税法则的基础上建立了关税同盟。黑森—达姆施塔特的加入无疑是普鲁士在建立全德关税同盟的道路上迈出的重要一步，此后，在德国出现了南北两个关税同盟对峙的局面。

普鲁士在建立关税同盟方面的突破性进展引起了其他中等邦国的担忧和敌视。夹在普鲁士领土之间的汉诺威、黑森选帝侯国一直是普鲁士争取的对象。莫茨曾试图通过缔结一项贸易条约来

争取汉诺威，但遭到拒绝。同样，由于担心普鲁士在与黑森选帝侯国联合后会扼住南北交通要道，普鲁士拉拢黑森选帝侯国的努力也没有结果。它们都害怕普鲁士在北德意志建立起它的霸权地位，因而对普鲁士的努力反应冷淡。在各邦看来，抵制普鲁士的霸权比建立统一的关税和贸易体制更为重要，因为这些中小邦首先考虑到的是自己的独立地位不受威胁。于是，在各中小邦之间曾出现反对普鲁士关税体系的联盟计划。

1828年8月22日，在萨克森的策划下，汉诺威、黑森选帝侯国、萨克森、汉萨各城市以及包括科堡在内的图林根各邦结成“中部德意志商业同盟”，旨在与以普鲁士为首的北部关税同盟和南德关税同盟相对抗。这一同盟得到英国等西欧国家的支持，因为它的成员都是奉行自由输入的、与西欧经济关系密切的伙伴。

然而，中部德意志商业同盟的存在不仅没有阻挡住德意志关税一体化进程，反而在某种意义上促进了这一天的到来。由于中部德意志商业同盟实行亲奥地利的政策，“既反对普鲁士也反对巴伐利亚”^①，结果使得南北两大德意志关税同盟开始相互接近。

1828年以后，普鲁士看到了关税同盟的光明前景，开始将统一关税从普鲁士的，至多是北德意志的政策转变为一种全德意志的政策。它主动向南德关税同盟中的巴伐利亚接近。虽然南德诸邦对普鲁士潜在的霸主地位同样抱反对态度，但包括巴伐利亚公使卢克斯堡伯爵在内的巴伐利亚方面已经认识到了两个关税同盟联合的重要性以及日后的发展前景。因此，经过谈判，在1829年5月27日的普鲁士—南德条约中规定，保留巴伐利亚和符滕堡日后与普鲁士西部诸省及黑森—达姆施塔特缔结关税同盟的可能性。由于这一条约所涉及的各邦人口达到2 000万，可以

^① [德] 卡尔·艾利希·博恩：《德意志史：从法国革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下册，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532页。

说，这一条约的缔结已经为日后德意志关税同盟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与此同时，中部德意志商业同盟在普鲁士的打击下也迅速瓦解。当时的普鲁士政府采取了一种巧妙的手法来压服它的对手，即将公路建设加以政治化来作为对付中部德意志商业同盟的武器。结果，成效非常显著。

众所周知，德国两大贸易商品博览会城市莱比锡和法兰克福之间的通道具有极大的经济价值，而当时控制这条重要道路的萨克森—希尔德堡豪森和萨克森—科堡—哥达这两个图林根邦国在交通上却依赖它们的邻邦普鲁士。1828年，迈宁根因为修建通往莱比锡的贸易大道要穿过普鲁士的齐根吕克县，不得不请求普鲁士的帮助。几乎同时，科堡—哥达也为计划修建一条将科堡和哥达连接起来的公路而与普鲁士接近，因为这条公路必须穿过普鲁士的施劳伊辛根县。普鲁士答应了他们的要求，但条件也是很清楚的。根据1828年7月3日、4日普鲁士与迈宁根、科堡签订的条约，普鲁士将在建筑公路方面给予帮助，但这两个图林根邦必须最迟在1835年1月1日加入普鲁士或巴伐利亚的关税体系。这一行动实际上已经使中部德意志商业同盟瓦解。到1829年10月这一同盟延期时，萨克森王国和萨克森—魏玛已经保留了加入南北两大关税同盟的权利，其中后者于1831年2月答应，在1835年1月1日参加普鲁士的关税同盟体系。更重要的是，在1830年革命引起王位更迭后，黑森选帝侯国终于与普鲁士签订了一项关税同盟条约。普鲁士最终达到了将它被分割开的领土在商业上连接起来的目的，并将中部德意志商业同盟隔离开来。到此时，中部德意志商业同盟实际上已经宣告废止。有德国史学家在谈到普鲁士对中部德意志商业同盟的胜利时指出，中部德意志商业同盟的基础仅仅在于对普鲁士的恐惧和敌视，各成员邦之

间本身就相互妒忌，因此，其命运注定不会长久^①。

普鲁士的关税一体化目标在一步步实现。1830年，巴伐利亚和巴登达成了协议。次年，普鲁士与萨克森实现了联合。1833年，萨克森与图林根各邦签订了条约。同年，普鲁士—黑森关税同盟和南德商业同盟合并，正式组成德意志关税同盟，并订立了为期8年的关税协定。

德意志关税同盟于1834年1月1日正式启动。这一天，“长串长串的满载货物的四轮马车在等待通过边境线，货物现在首次不纳通行税”^②。德意志关税同盟在最初建立时共有18个邦，面积达16.28万平方公里，人口超过2300万，同盟内部的一切关卡都被废除。这是自中世纪德意志分裂以来，德国大小邦国的统治者第一次为了共同的利益而自愿放弃它们的部分权利和主权，因此在德国历史上是一件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此后，巴登和拿骚于1835年加入德意志关税同盟，法兰克福自由市于1836年入盟。这时，关税同盟区域内的人口达到了2500万。1842年，条约又被延长10年。

客观上说，德意志关税同盟的形成，对德国经济的一体化起了极为重要的促进作用，为日后德国的政治统一搭起了一个统一的经济框架。“经济上的统一和依赖的事实从此成为一种强大的、神秘的势力”^③，推动着分裂的德国向统一迈进。例如，19世纪50年代，当奥地利为阻止普鲁士的霸权，提出奥地利领导下的

^① William O. Henderson, *Die Rolle Preussens bei der wirtschaftlichen Einigung Deutschlands*. In: Manfred Schlenke (Hg): *Beiträge zu einer politischen Kultur*, Berlin 1981, S. 198—199.

^② J. H. Clapham,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France and Germany 1815—1914*, p. 97.

^③ Golo Mann, *The History of Germany since 1789*, Chatto & Windus 1987, p. 116.

大德意志—中欧关税同盟时，虽然许多中小邦国表示可以考虑，却遭到各邦资产阶级的强烈反对。结果，在支持德意志关税同盟的请愿风潮的压力下，包括反普鲁士的萨克森在内的各邦政府最后都不得不表示支持关税同盟。

关税同盟对德意志经济一体化的作用相当巨大，这种巨大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由于关税的统一，德意志境内关卡林立的情况得到改善，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政治上的分裂割据对经济的阻碍，为德国工商业的发展注入了巨大的活力。从德国内部商业流通情况看，关税同盟的建立方便了商品的流动，各邦之间互通有无，交往日益频繁。到19世纪60年代，工业发达的萨克森所需的大部分粮食来自普鲁士，南德各邦所需的生铁、煤炭等工业原料也来自普鲁士。更重要的是，劳动力和资本开始在同盟内部自由流通。一些巴伐利亚的织工来到毗邻的萨克森谋生，萨克森的企业家则到巴伐利亚投资设厂，进行纺织业的生产。在对外贸易方面，由于普鲁士的容克地主需要在自由贸易的条件下输出谷物等农产品，所以关税同盟一直奉行倾向于自由贸易的政策。1834年—1845年间，关税同盟所得的税收中只有28%的关税带有保护性质。

其次，关税同盟的建立促进了德国分裂各邦之间货币和度量衡的统一进程。从货币状况看，由于涉及到征税以及在同盟内部的收入分配等问题，各邦在1838年签订的德累斯顿货币条约中确定了北德地区的塔勒尔区和南德地区的古尔登区两大货币流通区域，并确定两种货币的比价为4:7。在度量衡方面，1833年关税同盟制定了统一的关税重量单位“关税公担”。1868年8月的法令则明确规定，米突制从1872年起将在全德意志境内实行。此外，在1847年协定的基础上，统一的票据章程在关税同盟内部得到公认。1857年—1861年，关税同盟还制定了于1869年付

诸实行的共同商业章程。

正是从以上意义上，在关税同盟建立以后，人们终于可以“从某种意义上谈论德意志的民族经济”了^①。

除了关税同盟带来的经济一体化的重大影响外，工业革命对分裂的德意志的命运同样有着巨大的影响力。众所共知，现代化大工业是建立在分工极细的社会化生产协作基础上的。随着社会工业化程度的提高，各个国家内部、国家与国家之间乃至全球范围内的各种交往和联系都必然日益紧密，相互之间的影响和依赖程度也就越来越大。因此，19世纪30年代开始的德国工业革命对加强德意志各邦之间的经济联系，磨合德意志国家长期以来的政治分裂状况自然也有其巨大的作用。例如，工业发达的萨克森对矿产原料丰富的普鲁士的依赖就日益增强，以农业为主体的巴伐利亚等南部邦国出于推销自己的农产品的需要，则对工业发达的普鲁士、萨克森的依附性不断增大。而工业革命对德意志的经济一体化起到最明显的促进作用的，当数大规模的铁路建设。德国大文豪歌德早在1828年的一次谈话中就已经预料到了日后铁路等交通的发展对分裂的德意志的作用：“我倒不怕德国不能统一，我们的很好的公路和将建筑的铁路对此都会起作用。”^②歌德的这一看法可谓远见卓识。

认识到铁路等交通的发展对德国的统一会起到促进作用者并非只有歌德，我们在前文中已经提到的德国著名国民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也已经看到了铁路建设对未来德国统一将要起到的作用。这位著名的学者将关税同盟和铁路系统并称为同时产

^① Robert-Hermann Tenbrock, *Geschichte Deutschlands*, S.181.

^② [德] 爱克曼辑录：《歌德谈话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第175页。

生的、互相支持的、促使德国统一的“连体胞胎”^①。由于受到美国修建铁路的影响，李斯特在1832年从美国回到德国后，就立即致力于德国铁路系统的规划和筹建，并因此而成为建造德国铁路网的倡导者。他在论及铁路建设对德国的重要意义时指出，在一个完善的铁路系统下，德国的社会经济就可以上升为“全民族的经济”，分裂的德国就会“联合成为一个伟大、文明、富裕、强大和不可侵犯的民族”。李斯特甚至看到了铁路建设在军事上的重要战略意义，认为铁路可以用来作为保卫国家的工具，因为在火车的运载下，德国军队可以在12个小时内从国境的一端迅速调动到另一端，从而“减轻武装力量在调动和指挥中的困难”。总之，建设铁路网对于“民族的统一，经济的强盛以及现代工业的腾飞”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在1833年所写的《论作为德国铁路总系统基础的萨克森铁路系统》的小册子中，李斯特更是对日后德国的铁路线作了概括性的描述^②。他从德国的全局出发，预见到日后大多数的铁路都将从柏林出发，而且他设想的6条铁路在以后的20年中得到了实现。他还亲自设计了德国第一条大的铁路——莱比锡到德累斯顿之间的铁路。李斯特的计划和著作中所描述的长期发展的准确性，使他成了“远远超出于他那个时代”的人^③。

除了李斯特外，一些实业家也对铁路建设倾注了很大的热情。前文曾经提及的著名实业家哈尔科特专门写了《铁路》一文以及《从明登通往科隆的铁路》一书，鼓吹修建铁路。他以一种

① Diether Raff, *Deutsche Geschichte vom alten Reich zur Zweiten Republik*, S.99.

② Friedrich List, *Schriften/Reden/Briefe*. Band 3. *Schriften zum Verkehrswesen*, Aalen 1971, S.155—159.

③ Helmut M. Müller, *Schlaglichter der deutschen Geschichte*, S.153.

企业家特有的敏锐眼光得出结论：铁路是“一种用于为了整体而克服局部利益的开路先锋”^①。而大银行家康普豪森、汉泽曼等人也都以敏锐的眼光投资于铁路建设，成为普鲁士西部很有成就的铁路企业家。

然而，并非所有的德国人都像李斯特和哈尔科特等人那样敏感地看到了铁路发展的重要意义。虽然第一条铁路于1825年在英国开通运营后，德国和欧洲大陆的其他国家一样也进行了铁路试验，但是，铁路建设项目在德意志各邦中却遭到许多非议，“多数诸侯立即都拒绝铁路穿过他们的地界，车夫们提出了抗议，医生们则担心因浓烟的发展和速度而造成对健康的损害”^②。在大邦普鲁士，政府对铁路建设也不感兴趣。当马格德堡人在李斯特的鼓动下前往柏林，交涉修建铁路事宜时，他们发现，政府对此态度冷淡。官员们认为，政府首先应该解决普鲁士恶劣的公路状况，而且在人们建议的路线上也没有足够的商业需要去促成修建一条铁路。邮政官员也反对因修建铁路而破坏他们的计划。工程师们则认为，铁路在战时不会有任何用处。如前文所提及的那样，甚至普鲁士国王也认为，应当把迅速旅行的方便仅留给王公贵族们。只是后来由于铁路运输体现出灵活、运费低等优点，反对的声浪才在事实面前渐渐平息下去。

如前所述，通过铁路建设而带动其他工业部门的发展，特别是煤炭、钢铁等重工业的发展，是德国工业革命的一个重要特点。铁路建设在德国工业革命中起了排头兵的作用，其发展速度相当迅速。正因为如此，有的德国史学家甚至认为，德国工业革

① Diether Raff, *Deutsche Geschichte vom alten Reich zur Zweiten Republik*, S.99.

② Helmut M. Müller, *Schlaglichter der deutschen Geschichte*, S.154.

命是随着铁路建设而开始的^①。

从发展阶段上看，德国的铁路建设是与德国第一次工业革命同步的，19世纪三四十年代是它的启动时期。按照李斯特的说法，德国的铁路建设也是与关税同盟同时起步的。关税同盟建立后的第二年，亦即1835年，在巴伐利亚的纽伦堡与其郊区菲尔特之间就开通了第一条铁路。此后，新的铁路接连不断地投入运营。1838年，柏林到波茨坦、不伦瑞克到沃尔芬比特尔、杜塞尔多夫到埃尔克拉特的铁路开通；1839年，莱比锡到德累斯顿之间的铁路建成；1840年，莱比锡到马格德堡、慕尼黑到奥格斯堡、法兰克福（美因河畔）到美因茨、波恩到科隆、柏林到施特丁（什切青）等铁路开通运营。到19世纪40年代后半期，德国已经形成了柏林、科隆、法兰克福、慕尼黑和纽伦堡、德累斯顿等铁路交通中心。

与铁路建设相比，这一时期的德国机车制造工业还比较薄弱。据统计，19世纪40年代初，德国铁路线上行驶的245辆蒸汽机车中，只有38辆是在德国制造的，其余的均来自进口。虽然波尔锡希早在1837年就已经在柏林建立了机器制造厂，但这一工厂直到1841年才造出第一辆蒸汽机车。这种机车制造工业与铁路建设速度之间的严重不平衡状况显然不利于德国铁路建设在更快和更大规模的基础上进行。因此，在制造出第一台蒸汽机车后，波尔锡希机器制造厂在此后的10年中加大了它的机车制造速度，生产出了500台机车^②，以满足铁路建设的飞速发展对

^① Helmut M. Müller, *Schlaglichter der deutschen Geschichte*, S.155.

^② Diether Raff, *Deutsche Geschichte vom alten Reich zur Zweiten Republik*, S.100. 另一说：波尔锡希工厂于1842年造出第一辆蒸汽机车。参见 [德] 卡尔·艾利希·博恩：《德意志史：从法国革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下册，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608页。

机车的需求。其后，卡尔斯鲁厄、卡塞尔、开姆尼茨和慕尼黑等地都建立起了机车制造厂。

德国的铁路建设与西方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相比，有一个极其明显的特点，这就是，在铁路建设初期先是私人资本大量注入，然后是国家大量投入，修建国有铁路，到德意志帝国时期则干脆实行铁路大规模国有化。

在铁路建设初期，由于各邦政府采取反对或观望的态度，这一现代化的交通基础事业只能由那些具有长远目光的私人企业家们来经营。因此，1835年—1850年是德国铁路建设史上所谓的“私营铁路时期”。1835年—1840年德国修建的数条铁路中，只有1838年开通的从不伦瑞克到沃尔芬比特尔的一小段铁路为国有铁路，这也是德国的第一条国有铁路。此后，出于战略角度的考虑，各邦为防止因交通不便而受到孤立，纷纷投入铁路建设。汉诺威在1848年前建成了约150英里的国有铁路；巴伐利亚政府则因感到私人经营铁路过于缓慢，于1844年开始介入铁路建设；符滕堡在1845年开始兴建国家铁路；巴登政府也加入了修建国有铁路的潮流。普鲁士虽然主要依靠私人企业来建设铁路和对之进行管理，但普鲁士政府对所有的铁路建筑计划都实行严密的监督，以防止竞争造成不必要的浪费，它采取的直接介入方式就是参加股份或给予铁路建筑以利息保证。由于以上状况，到1853年时，几乎有半数的铁路已经掌握在国家的手中。到1871年底，德国的私人铁路线长度为11569公里，国有铁路长度为9902公里^①。

大规模的铁路建设和关税同盟的建立一样，对德国的经济一体化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有的学者认为，关税同盟只是为德

^① [苏]波梁斯基：《外国经济史》（资本主义时代），三联书店1963年，第373页。

国的经济一体化搭起了一个框架，铁路则为这一框架填补上了内容^①。这一说法是对关税同盟和铁路建设在德国经济一体化中的各自作用的最好归纳。同样，覆盖全国的铁路网的建成，也为日后德国的政治统一打下了重要的物质基础。

首先，稠密的铁路网的修建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德国各地区和各邦之间经济上的封闭隔绝状态，使它们加强了相互间的联系和协作，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德国一直存在的政治上的分裂割据状态的消极影响，“在小邦分治主义偏见的长城上打开了一个巨大的缺口”^②。随着铁路的修建和开通，旅客的流量必然增加，并因此而加速整个德国境内的人口移动和电报发明前的消息的传递，货物运输也成千倍地增长。

直到19世纪初，由于交通条件恶劣，阻塞严重，一些德国人在出门旅行时仍和中世纪时一样，忘不了写下一张遗嘱，惟恐不能归来。然而，到19世纪中叶，情况已经大不一样，一个较完整的铁路系统已经在德国建立起来了。从德国南部的慕尼黑出发，人们可以乘火车到达莱比锡；在莱比锡和柏林之间同样有闪闪发亮的铁轨相通；从柏林出发，人们可坐火车到汉堡或马格德堡、汉诺威、杜塞尔多夫以及莱茵河下游地区，也可以去哈勒、魏玛、卡塞尔和奥德河畔的法兰克福；从汉诺威出发，人们则可以到达杜塞尔多夫、科隆、不莱梅。总之，到1850年时，人们已经可以从汉堡或不莱梅经由铁路贯穿德国，在较短的时间内到达东部的布拉格、克拉科夫及南部的慕尼黑和西部的科隆，从而大大缩短了空间上的距离。

从客观上讲，铁路建设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德国各

^① Golo Mann, *The History of Germany since 1789*, p.116.

^② [德] 弗兰茨·梅林：《中世纪末期以来的德国史》，三联书店1980年，第130页。

邦间的分离主义倾向，迫使各邦政府采取措施，以防止自己被排除于德意志经济一体化进程之外。以汉诺威为例，汉诺威政府之所以在1842年下决心修建铁路，参加德国铁路的发展进程，就是因为担心贸易通道会从它的领土上转移到其他地方去^①。有一位诗人曾写了以下的诗句，形象地赞颂铁路交通给分裂的德国带来的好处：

条条闪光的铁轨，
是婚姻的纽带和证婚的戒指，
它们柔情地将邦国媾通，
良缘就此缔结。

铁路网的建成对日后德国政治统一的另一个影响在于，如李斯特所预料的那样，它将在德国历史发展中显示出重要的军事战略价值。在修建铁路时，普鲁士等政府就已在战略上作了考虑。而1864年、1866年、1870年—1871年的战争中普鲁士军队之所以能够屡出胜绩，以毛奇为首的普鲁士总参谋部正确地估价到“铁路对于军事因素的重要性”当是一个重要的原因^②。

（三）发展是硬道理——普鲁士经济强权的崛起

在德意志诸邦中，普鲁士的发展史尤其令人感兴趣。它之所以能从一个偏于一隅且不开化的边陲小邦发展壮大为德意志的乃至欧洲的强国，其中必然有其过人之处。我们认为，它之所以取得如此的成就，虽然有众多的因素促成，但最主要的是它在整体

^① J.H.Clapham,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France and Germany 1815—1914*, p.153.

^② Helmut M.Müller, *Schlaglichter der deutschen Geschichte*, S.155.

上能以务实的态度面对各种问题，始终保持本身的活力不断进取。19世纪30年代后，普鲁士逐步发展成为德意志的经济强权。这种经济强权地位可以从两个方面突出地体现出来。

第一个方面，它在建立以自己为核心的德意志关税同盟的基础上，逐步确立起在德意志的经济领导地位。

如前所述，在1828年以后，普鲁士开始有意识地利用关税一体化为自己称霸德意志的政治目的服务，并通过努力终于在1834年建立起德意志关税同盟。然而关税同盟的建立并不意味着万事大吉，当时仍然存在着两股反对普鲁士的势力。

首先，在中等邦国中仍然存在着一股反对普鲁士的力量，这就是以汉诺威为首的、由北方诸邦组成的强大集团，这个集团包括汉撒城市、荷尔斯泰因、梅克伦堡和奥尔登堡。这些邦国和城市为何对普鲁士为首的关税同盟不屑一顾？原因很简单，这一集团的主要经济是商业和农业。汉堡、不莱梅、奥尔登堡、梅克伦堡等城市和邦国位于北海和波罗的海沿岸，它们靠的主要是对外商业贸易，对德国国内的经济往来则相对兴趣不大。荷尔斯泰因除了以上原因外，还因为它隶属于丹麦国王而必须与丹麦保持一致的关税政策。至于汉诺威，其理由更充足：它是英王的领地，须尽到对英国的义务，而且作为农业国，它既担心普鲁士农产品的强有力的竞争，又不愿意失去从英国输入价廉物美的工业品的自由。

1830年3月27日，汉诺威、奥尔登堡、不伦瑞克以及不久以后就加入了普鲁士关税同盟体系的黑森选帝侯国在艾因贝克签订条约，这一条约成为日后汉诺威组建新的同盟的基础。1834年5月1日，汉诺威和不伦瑞克在1831年签订的预备条约的基础上缔结了关税联合条约。根据这一条约，建立新的税务同盟(Steuerverein)，同盟内部自由流通，对外共同确定关税，收入按人口分配。该条约于次年6月1日生效。此后，奥尔登堡等也

陆续加入了税务同盟。

虽然税务同盟较之中部德意志商业同盟的命运要长一些，但它也经不起内部的分裂和普鲁士在外部的施压。

首先动摇税务同盟的是不伦瑞克。不伦瑞克与税务同盟的其他成员不一样，是一个内陆邦国，这使它意识到，它加入关税同盟会比它在税务同盟中获得的利益更多。因而它在1841年脱离了税务同盟，并于次年参加了以普鲁士为核心的关税同盟。对于难以驯服的汉诺威，普鲁士自然也要施加一番压力。它同样采用了公路政治化的方式，即利用修建公路对之进行胁迫。它与梅克伦堡达成协议，决定溯易北河而上，修筑一条从马格德堡到汉堡的公路，目的在于把从汉堡通过汉诺威、法兰克福到瑞士去的过境贸易吸引到通过马格德堡、纽伦堡的商路上来。德国著名史学家特赖奇克称普鲁士的这种方式是“同公开的敌人作战的一种合理的计谋”。结果，在1848年以后，汉诺威终因财政窘迫开始考虑加入关税同盟一事。1851年，它也签订了加盟条约。1854年1月1日，汉诺威和税务同盟的其他成员都加入了关税同盟^①。

眼见普鲁士日益成为德意志经济事务的主宰，另一德意志大邦奥地利自然不会袖手旁观。还在普鲁士建立关税同盟的过程中，奥地利首相梅特涅就已经看出了关税同盟将使普鲁士在与奥地利争夺德意志的霸权中取得优势，因此着手“组织一个反普鲁士的贸易联盟”，后来因考虑到在德意志联盟中与普鲁士政治上合作的需要，才没有对关税同盟采取打击性措施。然而，到1841年时，梅特涅已经看到了普鲁士正“巧妙地利用经济手段

^① 汉萨各城市由于传统的对外贸易联系，尤其与英国的联系，以及分离主义意识，在加入关税同盟方面行动迟缓。梅克伦堡和吕贝克在1867年才加入关税同盟，汉堡和不莱梅则到1888年才成为关税同盟的成员。

为政治服务”^①，并认识到，关税同盟的进一步发展将使奥地利处于被孤立的境地。因为关税同盟正在打破维也纳会议以后在德意志形成的奥地利、普鲁士以及其他中小邦国组成的“第三德意志”的三足鼎立的均势，使普鲁士在德意志日益占有“特殊的地位”^②。对此，梅特涅自然再也不能坐视不管，他要设法加以阻止，但是收效甚微，因为“与他的警察禁止思想的传播相比较，他的外交并无更大的能力来阻止商品的流动”^③。

1849年10月26日，奥地利商业大臣卡尔·路德维希·冯·布鲁克利用1848年革命后德意志关税同盟陷入混乱的形势，提出了所谓的“中欧关税同盟”计划（该计划后来在1849年12月30日、1850年5月30日和12月29日的备忘录中又多次提到），其中谈及包括建立关税联盟和经济联盟在内的中欧大经济区思想。奥地利首相施瓦岑伯格将这一计划看成是孤立普鲁士、搞垮普鲁士在德意志联盟中的经济领导地位的一剂良方。因为在施瓦岑伯格看来，普鲁士支配下的关税同盟是普鲁士这一竞争对手贯彻其“德意志政策的最强有力的基础”^④，基础一旦不复存在，普鲁士争霸德意志的威胁就会自然解除。

然而，奥地利的主张在德意志其他邦国受到冷遇。第一，奥地利的根本目的并不在于要使自己成为德意志统一的关税区的一个分子，其真正的用意是“保持奥地利在德意志的势力但不与它

① [德] 卡尔·艾利希·博恩：《德意志史：从法国革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下册，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536页。

② Thomas Nipperdey, *Deutsche Geschichte 1800—1866: Bürger Welt und starker Staat*, S.361.

③ Golo Mann, *The History of Germany since 1789*, p.116.

④ Diether Raff, *Deutsche Geschichte vom alten Reich zur Zweiten Republik*, S.116.

统一起来”^①。正是出于这样一个动机，奥地利提出了将它的非德意志地区也包括进德意志关税和经济体系中的主张。这一主张倘若实现，势必造成奥地利在德意志的压倒性优势，这自然是普鲁士所不能接受的。第二，奥地利的“商业机构和经济界有顾虑”，“害怕德意志工业家们的竞争”^②，始终不愿放弃保护关税政策，这显然是德意志其他邦国难以容忍的。普鲁士则相反，它推行的自由贸易政策受到各邦的欢迎。因此，在1851年—1853年间进行的一系列有关革新关税同盟的谈判中，奥地利收效甚微。1852年11月，关税同盟条约的有效期得到延长，但奥地利并没有被接纳为成员。其最大所得就是在1853年2月18日与普鲁士签订了贸易协定。该协定虽然在原则上宣布关税同盟和奥地利是统一的关税区，但是在事实上并没有实行，普鲁士已经保持着自己在“小德意志”地区的优势。

从以上关税同盟的发展情况可以看出，仅就经济上而言，普鲁士已经打败了奥地利，获得了在德意志的霸主地位，1866年的战争只是要对普奥两国争夺德意志霸权的斗争在政治上加以收场而已。

当普鲁士为首的关税同盟在德意志日益发展壮大的时候，它在国际上的地位也很快得到了巩固。1837年—1844年，德意志关税同盟先后与荷兰、希腊、土耳其、英国、比利时等签订了商业协定，尤其重要的是，1862年3月普鲁士与法国缔结了自由贸易条约。根据这一条约，不在关税方面给予奥地利优惠政策。虽然德意志的各中等邦国对于在法国支持下的普鲁士的称霸企图

① [奥]埃·普里斯特尔：《奥地利简史》，下册，三联书店1972年，第773页。

② Erich Zöllner, *Geschichte Österreichs*, München 1979, S.375; [奥]埃·普里斯特尔：《奥地利简史》，下册，三联书店1972年，第774页。

有所疑虑，但是考虑到普鲁士和法国联合的强大力量以及本身的经济利益，它们最终不得不同意给予法国最惠待遇而放弃顾及奥地利，甚至在极端反普鲁士的博伊斯特男爵领导下的萨克森政府也为了自己的工业和莱比锡的商业利益而不得不参加了普法贸易条约^①。奥地利则由于坚持保护关税政策而被置于局外。1865年，普鲁士政府在与奥地利缔结贸易条约时，就像对待外国一样对待奥地利。直到1866年，奥地利才在降低关税的基础上同法国签订了一项贸易条约，但已经太迟了。这时，在原德意志地区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以普鲁士为首的“小德意志”和奥地利两个不同的经济区域。从以上意义上，有人认为，1862年普鲁士与法国的贸易条约是“在波希米亚战场上的决战以前进行的贸易政策的柯尼希格雷茨”^②。从此，“尽管普鲁士在经济政策方面还没有成文的特权，但是事实上的特权已经通过顽强的斗争取得……普鲁士已经给小德意志（对它加以监督）的经济创造了起到促进和增益作用从而同经济比较落后的奥地利加大距离的条件”^③。

普鲁士成为德意志经济强权的第二个表现是，经过第一次工业革命，它在经济实力上已经牢牢地确立起自己在德意志的霸主地位。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应该说普鲁士政府在总体上是一个能够

① 关税同盟给各成员邦带来的巨大税收财源使它们无法强硬地坚持反普政策。巴伐利亚和符滕堡等都表示，除了“向普鲁士屈服”外别无选择。参见 Hahn-Werner Hahn, *Geschichte des Deutschen Zollvereins*, S.100, 178—179; Michael Stürmer (Hg), *Das Kaiserliche Deutschland: Politik und Gesellschaft 1870—1918*, Darmstadt 1976, S.39.

② 德国人习惯上称1866年普奥决战的萨多瓦战役为柯尼希格雷茨战役。

③ [德]卡尔·艾利希·博恩：《德意志史：从法国革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下册，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539—540页。

认清形势，不断调整自己的政策，跟上时代发展潮流的政府。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从英国波及到欧洲大陆时，普鲁士政府就已经敏锐地作出了正确的抉择，促进新工艺的发展和新技术的采用。早在1796年，在西里西亚就出现了德国境内用煤炭炼铁的第一座高炉。1821年，为了学习英国式的新兴工业形式，普鲁士政府在柏林建立了工艺研究所，专门传播有关新的工业方法的知识，进行各种试验，帮助政府进行各种工业教育。到1837年，在这一研究所的努力下，柏林已经有30台蒸汽机。也正是在这一年，工艺研究所的学生奥古斯特·波尔锡希创办了著名的波尔锡希机器制造厂。

普鲁士的工业革命进程与德意志其他邦国是同步的，但规模更大，发展更快。以工业革命首先涉及的纺织业为例，在1837年时，普鲁士境内有3300家纺纱厂，共有纱锭35.6万个，两年以后，即1839年，其纺纱厂数目减少为1780家，纱锭却增至45.2万个。到1846年，普鲁士境内的机械纱锭已经将近45.2万个。进入19世纪五六十年代后，普鲁士的纺织业得到了更快的发展。1846年—1861年间，普鲁士工厂中的机械织布机从4603台增加到15258台，手工织机则由78000万多台减少为28000万多台。

由于拥有莱茵—威斯特发伦和西里西亚等发达的工业区，在19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德国工业高涨中，普鲁士的表现尤其突出，这可以从它的几家大型企业的发展中得出结论。举世闻名的克虏伯公司，在1810年创立后，几经波折，到1849年时拥有职工683人，但到世纪中叶时已经拥有职工1700人以上，其生产的无缝铸钢车轮以及大炮等畅销国内外。前文提及的波尔锡希机器制造厂，自从制造出第一辆蒸汽机车后，发展也极为迅速，到1858年，已生产出1000台蒸汽机车。它成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机车制造厂之一。

此外，普鲁士的工业产量也在德意志各邦中占有明显优势。关税同盟的粗钢产量在1857年时有90%出产于普鲁士；同盟拥有的63.3万马力的动力中，普鲁士占有41.5万马力。19世纪60年代初关税同盟出口的纺织品中，普鲁士占有50%以上。以下两表中德国煤钢等重工业产量方面普鲁士所占的比重状况明确显示出普鲁士在德意志工业生产中的支配性地位。

表 1-5 1840年—1870年德意志联盟和普鲁士钢产量状况（单位：千吨）^①

年份	1840	1850	1860	1870
德意志联盟	122.0	196.9	426.3	1 044.7
普鲁士	92.1	149.3	352.5	916.7

表 1-6 1840年—1870年德国和普鲁士石煤开采量（单位：千吨）^②

年份	1840	1850	1860	1870
德国	3 180.00	5 184.00	12 348.00	26 398.00
普鲁士	2 821.00	4 575.00	10 657.00	23 316.00

综上所述，可见到19世纪五六十年代，普鲁士已经掌握了德意志地区的经济领导权，有了超出于其他邦国的经济实力，具备了统一德国的经济能力。正是从以上意义上，当普鲁士日后统

^① Wolfram Fischer, Jochen Krengel, Jutta wietog, *Sozialgeschichtliches Arbeitsbuch. Band 1. Materialien zur Statistik des Deutschen Bundes 1815—1870*, S.70—71.

^② Reinhard Spree, *Die Wachstumszyklender deutschen Wirtschaft von 1840 bis 1880*, S.439; Wolfram Fischer, Jochen Krengel, Jutta wietog, *Sozialgeschichtliches Arbeitsbuch. Band 1. Materialien zur Statistik des Deutschen Bundes 1815—1870*, S.70—71. 综合计算。

一德意志时，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称：“德意志帝国与其说是建立在血和铁之上，不如说是建立在煤和铁之上要更真实些。”^①

（四）识时务者为俊杰——普鲁士成为统一德国的先锋

虽然关税同盟的建立和大规模的铁路网的建成促成了德意志境内的经济一体化，事实仍然是，德意志并没有因为经济的日趋一体化而像普鲁士原财政大臣冯·莫茨所预料的那样，实现国家在政治上的统一^②。其中原因主要有三点：第一，各中小邦国的统治者从自己的私利出发，为了保住自己的独立统治地位，决不会自愿地放弃他们数百年来一直捍卫的权利；第二，另一大邦奥地利在与普鲁士的角逐中，也决不会轻易地放弃在德意志的霸主地位；第三，从地缘政治出发，德意志周边的法国和俄国等邻国自然也不愿看到一个统一而强大的德国出现在它们的身边。因此，德意志要结束它的分裂局面，实现政治上的统一，必须如我们在前面所提到的那样，有一种强大的力量，这种强大的力量足以使各个邦国的统治者屈服，同时它还有能力应付来自外部世界的干涉。到19世纪中叶，德意志已经出现了这样一个邦国，它拥有强大的力量，足以将德国统一在它的强力之下。这个强国就是已经成为德意志经济强权的普鲁士。

如前所述，通过操纵关税同盟以及第一次工业革命，普鲁士

^① J.M.Keynes,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Peace*, London 1919, p.40. 参见 J.H.Clapham,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France and Germany 1815—1914*, p.284.

^② 莫茨在谈到关税同盟的结果时曾指出：“进、出关和过关税只是分裂的各国的政治后果，反之也是真理，即这些国家结成关税和商业联盟时，同时必将统一自己的政治体系。”参见 Diether Raff, *Deutsche Geschichte vom alten Reich zur Zweiten Republik*, S.72.

已经成了德意志的经济巨人，有了统一德国的经济能力。同时，普鲁士也有心利用它的这种经济优势来为谋求在德意志的霸权服务。冯·莫茨的谈话实际上也是普鲁士政府的这种政治意图的暴露。正是从这一意义上，德国著名史学家弗兰茨·梅林认为，各小邦加入关税同盟就是“普鲁士统一德国的开始”^①。

与经济上的强大地位相对应，从19世纪上半期起，普鲁士政府在政治和文化方面的作为也使它的威望不断提高。1840年，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登基后，曾采取了一些自由化的措施，如为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在位时受迫害的著名爱国主义者雅恩和阿恩特平反等等，从而使资产阶级对之刮目。这一时期的普鲁士文化教育得益于洪堡、苏弗恩、舒尔策等人的努力，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1810年，普鲁士政府颁布了考选教师的法令，从而使中学教师成为一种专业工作者；1812年，普鲁士政府规定，只有持有文科中学（Gymnasium）的毕业证书者才能进入大学学习；1826年，普鲁士政府进一步要求，小学教师必须经过国家考试^②。在以上各种努力下，普鲁士的大学和初等教育的水平超过了西欧同等学校的水平。有关研究表明，在普鲁士，有文化的人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甚至超过了英国和法国^③。

与普鲁士的上述杰出表现相比，德意志的另一大邦奥地利却呈现出一种保守的、衰落的趋势。而且，由于其境内大量的非德意志人口的存在，奥地利政府对包括德意志民族统一运动在内的

^① [德] 弗兰茨·梅林：《中世纪末期以来的德国史》，三联书店1980年，第130页。

^② 参见 Peter Flora, *State, Economy, and Society in Western Europe 1815—1975: A Data Handbook, Vol. 1. The Growth of Mass Democracies and Welfare States*, Frankfurt, London, Chicago 1983, p. 584.

^③ [美] 帕尔默、科尔顿：《近现代世界史》，中册，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655页。

一切民族主义都采取一种消极的态度。所有这些，使得越来越多的德意志人开始将民族统一的希望寄托在普鲁士身上，期盼普鲁士能成为民族的领袖。

1815年以后的德意志联盟中，奥地利占有联盟主席一职。奥地利首相梅特涅在维持维也纳体系的幌子下，实际上操纵着联盟的事务。普鲁士在德意志事务中只是一个配角，这当然是普鲁士所不愿意的。因此，随着自身实力的增长以及德意志民族主义运动的高涨，普鲁士有心打垮奥地利这一竞争对手，将德意志纳于自己的霸权之下。德意志联盟 1848 年革命的爆发，正好给普鲁士在统一德意志方面提供了一次尝试的机会。

1848年，法国爆发二月革命，并迅速蔓延到整个德意志地区。3月13日，奥地利首都维也纳爆发革命，赶走了反动首相梅特涅。3月18日，普鲁士首都柏林也爆发革命。普鲁士国王面对革命形势的压力，被迫于3月21日发表《致我的人民和德意志民族》文告，答应建立一个统一的德意志经济区，并允诺缔造一个德意志联邦国家^①。而且事实上，普鲁士政府也愿意顺水推舟，借革命形势来扩大自己的影响，排挤奥地利，“利用全国人民的统一愿望来确立自己在德国的霸权”^②。

普鲁士统一德国的首次尝试，是利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问题做文章。根据 1815 年维也纳会议总决议，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泰因两个公国在君合国的基础上，即通过丹麦国王个人的关系与丹麦联合。在两公国中，整个荷尔斯泰因和石勒苏益格南

① 相关内容共七点。参见 Rudolf Huber, *Dokumente zur Deutschen Verfassungsgeschichte. Band 1. Deutsche Verfassungsdokumente 1803—1850*, S. 449—450.

② [德] 弗兰茨·梅林：《中世纪末期以来的德国史》，三联书店 1980 年，第 158 页。

部的居民为德意志人，前者还是德意志联盟的成员。1848年1月，丹麦国王弗里德里希八世登位后，试图进一步密切两公国和丹麦之间的关系，结果引发两公国争取从丹麦分离出来的民族运动。丹麦政府出兵镇压。普鲁士政府遂以德意志民族利益维护者的形象出面，向丹麦开战，企图吞并两公国，并提高自己在德意志的威望。4月，普军不宣而战，开进两公国，击败了丹麦军队。然而，普鲁士的举动遭到俄、英、法等欧洲列强的一致反对甚至武力威胁，因为俄国不想看到普鲁士在波罗的海势力的增强，英国也不愿比丹麦更强的普鲁士控制丹麦地峡^①，法国更不能坐视邻邦的强大。沙皇甚至命令俄军司令帕斯凯维奇，如果普军“不结束和丹麦的战争，就进军普鲁士”^②。在列强的联合压力下，普鲁士只得与丹麦停战，归还了两公国。

尽管在两公国问题上碰了壁，普鲁士却在与奥地利的德意志内部争霸中取得了前所未有的一次精神上的胜利。

1848年革命曾使德意志各邦政府一时失去了对局势的控制。5月18日，以资产阶级代表为主的全德国民议会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召开。议会在德国统一问题上分成了支持奥地利的“大德意志派”和支持普鲁士的“小德意志派”。前者主张建立一个包括多民族的奥地利在内的德国；后者则力图将奥地利排斥在外，建立普鲁士领导下的清一色的德意志民族国家。经过长时间的争论，“小德意志派”最终取得了胜利。议会于1849年3月28日通过了统一的德意志帝国宪法，决定将德意志领导权献给产生过马丁·路德、弗里德里希大帝，德国古典文学和解放战争的领袖，

① René Albrecht-Carrie, *A Diplomatic History of Europe since the Congress of Vienna*, New York 1973, p. 77.

② 北京大学历史系：《沙皇俄国侵略扩张史》，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349页。

代表最好的德意志传统的普鲁士^①，并选举普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为德国皇帝。

按照通常的说法，普王出于对革命的仇恨而不愿接受法兰克福议会的请求。我们认为，其实普王对德意志皇冠早就垂涎三尺，只是有三个因素使之在这顶金灿灿的皇冠面前犹豫不决，不敢接受：第一，作为正统的霍亨索伦王朝的继承人，不能接受革命奉献的皇冠；第二，接受皇冠意味着要和奥地利发生对抗，可能引发战争，这非普王所愿；第三，势力如日中天的沙皇也对之施加压力，反对他接受这顶皇冠^②。正是考虑到以上因素，普王终于拒绝了法兰克福议会奉献的德意志皇冠。

尽管遭到列强的压制，普鲁士却并未放弃谋求在德意志的霸主地位的努力。1849年5月，普王根据首相拉多维茨的建议，派军队前往萨克森和汉诺威，帮助恢复秩序，并与之结成“三王同盟”，希图以此为开端建立普鲁士领导下的新德意志联盟，取代奥地利操纵的旧德意志联盟。这一新联盟将有“统一的法律体系和强大的中央政府，并由普王控制军队”^③。结果，大部分德意志小邦参加了普鲁士领导的这一联盟，但萨克森、汉诺威、巴伐利亚和符滕堡等中等邦国因害怕丧失自己的独立地位而退出和拒绝了新联盟。1850年3月，普鲁士在爱尔福特召开新联盟议会。奥地利则以在法兰克福召开德意志联盟议会作答复，于9月

① [美]科佩尔·S.平森：《德国近现代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148页。

② 参见[美]帕尔麦·科尔顿：《近现代世界史》，中册，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661页；René Albrecht-Carrie, *A Diplomatic History of Europe since the Congress of Vienna*, p.78；[苏]波将金：《外交史》，第1卷（下），三联书店1979年，第741页。

③ J.A.S.Grenville, *Europe Reshaped 1848—1878*, London 1986, p.145.

1日正式宣布恢复旧德意志联盟，并与其余4个王国结成军事同盟。德意志出现了相互对立的两大联盟。不久，两大联盟因黑森选帝侯与议会之间的分歧而发生冲突，普奥双方为此动员了军队，并在黑森发生局部战争。这时，害怕普鲁士过于强大且不愿看到德国统一的俄国再次出面干涉。沙皇尼古拉一世不仅以武力威胁企图统一德意志的普鲁士国王，甚至对普鲁士在德意志联盟中与奥地利平起平坐的要求也嗤之以鼻^①。在俄奥的联合压力下，普鲁士被迫让步。1850年11月，在沙皇尼古拉一世的导演下，普鲁士被迫与奥地利签订了耻辱的奥尔缪茨协定。根据这一协定，普鲁士放弃新德意志联盟，继续在旧德意志联盟中充当配角，奥地利则重新掌握了在德意志事务中的最高领导权力。普鲁士只得忍受着“奥尔缪茨之辱”，再次收藏起统一德意志的图谋。

1859年，普鲁士再次有了夺取德意志霸主地位的机会。这年4月，撒丁王国为实现意大利的统一，联合法国对奥地利开战，希图从奥地利手中收回伦巴底和威尼西亚。奥地利转而求助于德意志联盟，特别是普鲁士^②。普鲁士视之为确立自己在德意志的领导地位的大好时机。摄政王威廉一方面动员军队，对法国进行威胁，另一方面却又要求“奥地利以承认普鲁士在德意志的霸主地位为代价”，换取帮助^③。然而，普鲁士的算盘再次落空。因为它万万没有想到，奥地利为了保住其在德意志的霸主地位竟宁愿割地媾和。战争双方迅速缔结了维拉弗朗加和约。

虽然统一德国的尝试因奥地利的阻挠和俄法等国的干涉而屡

① [苏]波将金：《外交史》，第1卷（下），三联书店1979年，第750页。

② [德]弗兰茨·梅林：《中世纪末期以来的德国史》，三联书店1980年，第172页。

③ J. A. S. Grenville, *Europe Reshaped 1848—1878*, p. 165.

遭挫折，但 19 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经济和政治形势却继续朝着有利于普鲁士统一德意志的方向发展。

在经济上，如前所述，由于这一时期的工业高涨，普鲁士在德意志的经济优势更加明显，成了德意志境内经济最发达的邦。普鲁士的工业产量占全德意志的一半以上，它领导下的关税同盟也由于汉诺威等邦的加入，已经扩大到了除奥地利外的几乎整个德意志。这种经济上的优势正是普鲁士统一德国的物质基础。

在政治上，普鲁士则已由一个封建的君主国逐渐过渡到容克资产阶级的君主国，这具体表现为普鲁士“钦定宪法”的出台和普鲁士政府开始推行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经济政策。1848 年革命虽然失败了，但革命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消除。德意志各邦的统治阶级被迫对资产阶级作了一些让步。在普鲁士，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于 1848 年 12 月颁布了“钦定宪法”，1850 年又出台了一部新宪法。据此，普鲁士设立两院制议会，贵族院由敕封的世袭议员组成，众议院则根据财产资格由三级选举产生^①。尽管这种选举的实质是“一千个富人”相当于“十万个穷人”^②，但在当时可以说是有一定进步意义的。因为在这一间接选举制下，下层民众毕竟能选出极少数代表进入议会。而在当时资本主义最发达的英国，直到 1867 年甚至 1884 年议会改革后，下层民众才有资格选出自己的代表进入议会^③。虽然普鲁士国王仍掌握

① 三级选举制根据纳税额将居民划分为三个等级。每个等级选出相等的复选人数，再从复选人中选出正式代表。

② Diether Raff, *Deutsche Geschichte vom alten Reich zur Zweiten Republik*, S.115.

③ 沈汉、刘新成：《英国议会政治史》，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1 年，第 335—342 页。

着各种大权，并拥有对议会立法的否决权，但经济上富有的资产阶级毕竟有了发言的机会，他们开始通过表决法案和批准预算加入统治者的行列。

普鲁士政府还推行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经济政策。1851年5月，普鲁士政府公布财产所有者法，给予矿山企业主广泛的自治权。1860年，矿山企业中封建官僚主义的障碍被明令取消。1865年的通用矿山法则统一了矿山法规。此外，普鲁士政府还通过“殷勤地”扶持股份公司，给予私人铁路公司以国家利息保证等一系列政策来满足“资产阶级经济上的需要”。所有这些表明，普鲁士“向资本主义基础的转变正在加速进行”^①。随着向资产阶级性质国家的转变，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满足资产阶级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的愿望，就成了普鲁士政府的当然职责。从以上意义上说，这种社会性质的变化，是普鲁士统一德国的重要政治前提。

德国资产阶级也日益钟情于普鲁士。当时德意志的两大邦国中，奥地利由于其多民族国家的特性，顽固地反对建立统一的德意志民族国家，主张维持松散的德意志联盟体制，甚至为此而不惜与外国列强勾结，遏制普鲁士统一德国的努力，而且它在1848年革命后又恢复了封建专制主义统治。因此，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对奥地利的等待就是德意志统一的死亡”^②。普鲁士则不然，德国资产阶级不仅青睐它推行的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经济政策，而且对于它在政治上表现出的“自由化”倾向也大为赞赏。因此，他们主张“普鲁士在德意志扮演皮蒙特在意大利的那

① Gustav Seeber und Karl-Heinz Noack, *Preussen in der deutschen Geschichte nach 1789*, Berlin 1981, S. 111.

② Diether Raff, *Deutsche Geschichte vom alten Reich zur Zweiten Republik*, S. 83.

种角色”^①。1859年9月成立的德意志民族协会就直接打出了“在普鲁士领导下统一德国”的旗帜^②。

普鲁士内部的政治结构也变得有利于德意志统一运动。普鲁士在地理上分成东西两大块，西部的莱茵地区是德国工业最发达的地方，也是德国资产阶级的根据地；东部地区则是农业区，是普鲁士容克地主阶级的根据地。资产阶级要求德国统一的愿望自然不必说，容克地主阶级对统一德国也有兴趣。从历史上看，代表容克地主阶级利益的普鲁士统治阶级向来有着强烈的征服欲和统治欲。与土地的密切关系以及军国主义传统，也使得容克地主阶级有一种无止境的领土扩张野心。此外，他们的大部分由于经济上采取资本主义经营方式而已经资产阶级化，他们也就与德国资产阶级一样，自然而然地把统一德国当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五）强权即公理——俾斯麦“铁血”浇铸统一的德国

在几经挫折后，普鲁士统治者们认识到，要统一德意志，必须有强大的武力作后盾。当时还是普鲁士亲王，后来成为普鲁士国王兼德意志皇帝的威廉在1849年以后就已得出明确的结论：“谁要统一德国，就必须征服德国”^③，即要用武力统一德国。然而，在1815年—1858年间，当普鲁士的人口从1100万增至1800万时，普军的规模却没有扩大。1815年时，根据普遍兵役制原则，普鲁士每年应召40700人人入伍，到1858年时每年应召

① J. A. S. Grenville, *Europe Reshaped 1848—1878*, p. 165. 皮蒙特即最后统一意大利的撒丁王国。

② [德] 弗兰茨·梅林：《中世纪末期以来的德国史》，三联书店1980年，第173页。

③ Hellmut Diwald,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Berlin 1978, S. 340.

65 000 人人伍。由于经济原因，40多年后的普鲁士军队的征召人数仍未超过原先的人数。因此，1858年起开始出任摄政王的威廉决定实行彻底的军事改革，建立一支强大的、有威望的军队^①。

1860年2月，普鲁士陆军大臣阿尔布莱希特·罗恩向普鲁士议会递交了一份军事改革法案《义务兵役法》，要求每年征集新兵的人数从40 000人增至63 000人，同时将服役期由2年延长到3年。为此，每年须增加拨款1 000万塔勒作为军费。下议院的资产阶级议员本应支持普鲁士政府为实现德国统一而进行的军事准备，然而，他们担心因此会增强掌握军队的容克阶级的力量，损害自己的利益，拒绝为改革拨款。1861年1月新登基的普王威廉一世为此在1861年和1862年两度下令改选议会。然而，在改选过的议会中，以进步党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对派力量不但没有被削弱，反而进一步增强。他们不仅否决军事拨款，而且更进一步提出了监督政府财政开支的新要求。在此情形下，威廉一世决定起用铁腕人物，强行推行军事改革。1862年9月，奥托·冯·俾斯麦出任普鲁士首相。从此，他致力于德意志的统一事业，并由于其实绩而成为19世纪下半期德国乃至欧洲最著名的政治家。

俾斯麦出身于普鲁士勃兰登堡容克世家，早年属于保守派。1848年革命时他曾准备武装去柏林“勤王”，当时他还认为德国统一是一种幻想。此后，他曾在1851年—1859年间担任普鲁士驻德意志联盟议会代表，并于50年代末60年代初出任驻俄公使和驻法大使。亲身的经历使他对当时的形势有了正确的现实主义的认识。一方面，他认识到德国统一已是无法阻挡的历史潮流，

^① Bernt Engelmann, *Preussen: Land der unbegrenzten Möglichkeiten*, München 1979, S.313-315.

认为由普鲁士掌握统一运动的领导权是顺应这一历史潮流的最有利的方式，因为它可以保证普鲁士君主政体和容克的特殊地位^①；另一方面，他也看清楚了，无论德意志各邦统治者还是俄、法两国，都不愿德国实现政治统一，因为前者担心因此而丧失自己的独立政治特权，后者则将保持德国的分裂当成“使自己在欧洲事务中取得政治优势的重要条件”^②。有鉴于此，俾斯麦特别欣赏著名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的观点：“德意志实现政治统一的道路只有一条，这就是通过剑，由一个邦支配其余各邦。”

1862年9月30日，出任首相不久的俾斯麦在预算委员会上发表了著名的“铁血演说”，声称：“德国所注意的不是普鲁士的自由主义，而是它的强权……普鲁士必须积聚自己的力量以等待有利的时机，这样的机会我们已经错过数次了……当代的重大问题不是通过演说和多数人的决议能够解决的——这正是1848年和1849年的错误——而是要通过铁和血。”^③此后，他根据所谓的“漏洞理论”^④，克服议会中资产阶级反对派造成的困难，强制实行兵制改革，使用军费开支，为武力统一德国作准备。议会

① 正是从以上意义上，有学者称俾斯麦日后主动承担起德国统一的历史使命是“向前逃遁”。参见 Wolfgang J. Mommsen, *Imperial Germany 1867—1918: politics, culture, and society in an authoritarian state*, London 1995, p.1.

② [苏]波将金：《外交史》，第1卷（下），三联书店1979年，第733页。

③ Ernst Engelberg, *Bismarck: Urpreusse und Reichsgründer*, Berlin 1985, S.527.

④ 根据这一理论，普鲁士王国宪法未曾明文规定如何解决国王与议会之间的冲突。由于国家事务不能停顿，在没有通过预算法案的情况下，政府可征收必要的资金处理国家事务。

中的资产阶级进步党当然不甘心就此丧失自己的预算批准权。双方开始了4年之久的“宪法纠纷”。就其本质而言，“宪法纠纷”实际上是普鲁士资产阶级和以国王为首的容克地主阶级之间争夺普鲁士国家领导权的斗争，他们在统一德国的根本问题上的态度则是一致的。俾斯麦也看穿了这一点。在他看来，只要政府满足资产阶级最迫切需要的国家统一，他们最终会改变态度。事实证明，俾斯麦的这一判断是正确的。1866年，当普鲁士战胜奥地利后，欢呼雀跃的资产阶级议会立即追加预算，拜倒在这位“铁血宰相”脚下。

普鲁士统一德国是通过俾斯麦策划的连锁反应式的三次王朝战争完成的。

第一次王朝战争是1864年丹麦战争。如前所述，1848年，普鲁士与丹麦之间曾因石勒苏益格—荷尔斯太因问题发生冲突。为解决丹麦与德意志之间在两公国问题上的矛盾，欧洲列强曾于1852年签订伦敦议定书，规定两公国在丹麦国王的个人领导下各自与丹麦联合，同时保证荷尔斯太因的德意志联盟成员资格以及两公国自古以来的不可分离。丹麦国王也答应不归并石勒苏益格^①。然而，1863年新即位的丹麦国王却在丹麦民族主义者的压力下批准了议会提交的《十一月宪章》，将拥有独立地位的石勒苏益格改由丹麦政府直接管辖，从而推翻了1852年伦敦议定书的规定。对此，德意志舆论哗然。德意志联盟议会在要求丹麦政

① [美]科佩尔·S·平森：《德国近现代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188页；R.B.Mowat：《近代欧洲外交史》，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284页。1460年，丹麦国王克里斯提安一世成为德意志荷尔斯太因大公阿道尔公爵的继承人。1481年，他颁布敕令，规定此后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太因要连为一体，“永远不可分离”。参见[丹]帕利·劳林：《丹麦王国史》，湖北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179页。

府收回法令未果的情况下，于1863年派萨克森和汉诺威军队开进了荷尔斯太因^①。

两公国争端的出现，成为俾斯麦检验其“铁血政策”的良机。他曾毫不隐讳地表示，“从最初起，我就着眼于兼并”，“各公国并入普鲁士是它们的顶点”^②。而此时的国际关系格局也有利于俾斯麦推行自己的政策。当时的德意志另一大邦奥地利不敢明确支持德意志在两公国争端上的民族主义，它害怕因此而引发本国非德意志地区的民族运动。俄国由于普鲁士支持其镇压1863年波兰起义而心存感激，作出了“绝不出兵打普鲁士”^③的保证。法国则正兵陷墨西哥，自顾不暇，且俾斯麦暗示可能将莱茵河西岸地区割让给法国^④，故而法国政府对因两公国争端可能引发的冲突态度淡漠。英国虽然威胁要进行干涉，但没有大陆盟国的配合，它仅凭自己的两万陆军难有作为，况且它还想利用普鲁士牵制法俄两国，故而没有全力介入^⑤。在这种有利形势下，俾斯麦采取了明智的策略。他的旗帜是维护1852年伦敦议定书而不是德意志民族主义，从而可以堂而皇之地抵制英、法、俄等国的干涉，避免“招致和其他强国的紧张关系”^⑥。他还与奥地

① Chris Cook & John Poxton, *European Political Facts 1848—1918*, New York 1978, p.5.

② [德] 奥托·冯·俾斯麦：《思考与回忆》，第2卷，东方出版社1985年，第7—8页。

③ [美] 巴巴拉·杰拉维奇：《俄国外交政策的一个世纪》，商务印书馆1978年，第131页。

④ 1863年底，俾斯麦向法国将军弗罗利作了上述表示。参见 Erich Eyck, *Bismarck and the German Empire*, New York 1968, p.88.

⑤ Paul Kennedy, *The Realities Behind Diplomacy: Background Influences on British External Policy, 1865—1980*, London 1985, p.77.

⑥ Andreas Hillgruber, *Bismarcks Außenpolitik*, Freiburg 1972, S.57.

利积极合作，这既可以防止英法的联合军事威胁，又可以使奥地利紧随普鲁士的政策，从而使普鲁士掌握德意志统一运动的领导权。而且他与奥地利结盟还有另一动机，这一动机直到1866年普奥战争爆发时才显露出来，即“为的是在后来又和奥地利成为不共戴天的仇敌”^①。

经过周密策划，普奥两国于1864年2月初联合进攻石勒苏益格，并迅速击败了丹麦军队。由于俄、法、英等国作壁上观，丹麦政府求援无望，被迫于10月30日签订维也纳和约，将石勒苏益格、荷尔斯太因和劳恩堡三公国交给了普奥两国。

俾斯麦根据以往的经验得出结论：“德意志命运的难解之结，不能用执行双雄并立政策这种温和方式来解开，而只能用剑来斩开。”^②因此，他在结束对丹麦战争后就立即将还没冷却的枪口对准了盟友，准备利用普奥两国在两公国问题上的矛盾向奥地利发难。

当时对普奥两国较量具有决定性影响的国际因素，是德意志周边两大强国俄法的态度。俄国原本在1848年和1850年的普奥争霸中是抑普助奥的，但由于奥地利在克里米亚战争^③中反对俄国，且与英法一道“在复兴波兰中与俄国敌对”，从而使俄国转而亲普疏奥。至于法国，俾斯麦主要以诱饵笼络之。他向法国放风，表示将承认法国在世界上一切通行法语的地方的扩张（这暗示法国可以获得比利时）。拿破仑三世信以为真，当即表示不

① [德] 奥托·冯·俾斯麦：《思考与回忆》，第2卷，东方出版社1985年，第11页。

② [美] 科佩尔·S. 平森：《德国近现代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191页。

③ 1853年—1856年俄国和英、法、土耳其、撒丁联军之间进行的战争。战争以俄国败北而告终。

会站在奥地利一边^①。稳住法国后，俾斯麦继而争取意大利的支持，以期在未来普奥战争中使奥地利腹背受敌，分散其力量。意大利正盼着收复仍在奥地利统治之下的威尼西亚，故而与普鲁士一拍即合，双方于1866年4月签订了同盟条约。

在一切准备就绪后，俾斯麦开始采取措施加剧普奥冲突。他向奥地利提出了貌似公允却难以被奥地利接受的解决普奥矛盾的条件：两公国由普鲁士亲王管理，但不得并入普鲁士；德意志军事领导权由奥普两国分享，即“普王要成为北德意志军队的首领”^②。显然，普鲁士要变相吞并两公国并确立在北德意志的霸权。为了打击普鲁士的这种野心，奥地利于1866年6月1日提出将两公国的前途交由德意志联盟议会会议决，以便使普鲁士与整个联盟为敌。

这正是俾斯麦等待着的机会。他立即宣称，奥地利将两公国前途交由德意志联盟裁决的决定破坏了奥普两国共管两公国的加施太因协定^③，并命令普军于6月7日开进了奥地利管辖下的荷尔斯太因。6月14日，德意志联盟通过反对普鲁士的议案。6月15日，普军侵入萨克森。意大利立即加入普鲁士一方作战。结果，虽然奥军在库斯托查战役中击败了意军，但在7月3日的萨多瓦战役中却遭到普军的决定性打击。

奥地利在败局已定的形势下，请求法国出面调停。这时俾斯麦力排普王和将军们进军维也纳的主张，提出了温和的停战条

① J. A. S. Grenville, *Europe Reshaped 1848—1878*, p. 290; [英] 艾伦·帕尔：《俾斯麦传》，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130页。

② Erich Eyck, *Bismarck and the German Empire*, p. 119.

③ 1865年8月14日，根据俾斯麦的提议，普奥签订加施太因协定。协定规定：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太因由普奥两国共管，但行政分开，前者管理石勒苏益格，后者管理荷尔斯太因；另一个小公国劳恩堡以250万塔勒卖给普鲁士。普奥共管两公国实际上是俾斯麦埋下的纷争的种子。

件：解散德意志联盟；奥地利退出德意志并同意建立以普鲁士为首的北德意志联邦。他之所以如此，除了防止法国可能的干涉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已考虑到日后对法国的战争。根据他的计划，“在对奥地利战争之后，接踵而来的必然是对法国的战争”，为此，“不羞辱奥地利是绝对必要的，不要干使未来与之友好相处不可能的事”^①，以免其在日后普法冲突时不顾一切地站到法国一边复仇。1866年8月23日，普奥两国签订温和的布拉格和约。和约规定：奥地利退出德意志；石勒苏益格—荷尔斯坦因以及协助奥地利作战的汉诺威、黑森选帝侯国、拿骚和法兰克福自由市并入普鲁士；建立以普鲁士为首的北德意志联邦；巴伐利亚、巴登、黑森大公国、符滕堡等南德四邦自主；威尼西亚归并意大利。

布拉格和约签订5天后，北德意志联邦成立。它包括21个邦和3个自由市，成为未来统一的德意志帝国的基础。根据联邦宪法，普鲁士国王和首相分别兼任联邦主席和总理，联邦的军政和外交大权也由普鲁士掌握。

然而，1866年战争仍未从根本上解决德国统一问题。美因河以南的巴伐利亚等四个邦国由于法国的阻挠仍滞留于北德意志联邦之外。拿破仑三世宣称，“德意志应划分为三块，永远不得统一”^②，如果俾斯麦“把南德意志诸邦拉进北德意志联邦，我们的大炮就会自动发射”。俄英两国也反对普鲁士强行吞并南德地区。沙皇亚历山大公开表示反对普鲁士“侵犯”该地区，英国外交大臣克拉林顿也表示“不能容忍普鲁士以压力政策对待美因

^① *Bismarck's Table Talk: Being the Story of the Life in His Own Words*, London 1898, p. 218.

^② 王绳祖：《国际关系史》，上册，武汉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91页。

河界线”^①。因此，普鲁士要最终完成德国统一，还必须克服法国的阻挠，并寻找可为英俄接受的时机。俾斯麦为此又开展了一系列外交活动。

首先，他在对奥战争结束后，加强德意志内部的团结。1866年8月—9月，他以宽大和约为交换条件，并利用法国对南德地区的领土要求而造成的压力，迫使南德四邦与普鲁士缔结了抵御法国进攻的秘密攻守同盟，使它们在军事上以及军事体制上普鲁士化^②。这种军事合作以及通过关税同盟形成的经济一体化，促进了德意志“政治上的进一步统一”^③。

其次，他设置外交陷阱，为孤立法国作准备。普奥战争结束后，当法国大使贝内德梯向俾斯麦提出将比利时并入法国作报酬时，这位普鲁士首相一面让法国大使提出有关书面材料供普王研究，一面却又暗中促使英俄出面，制止法国的要求。当英国大使考乌里勋爵向法国问及比利时问题时，拿破仑三世慌忙表示“不想用武力或威胁取得任何领土”^④。结果，法国不仅一无所得，而且有关领土野心的证据还落到了俾斯麦的手中。此后，法国又将目光转向卢森堡^⑤，但俾斯麦以卢森堡是“古老的德意志土地”为由予以拒绝。1867年5月的伦敦会议上，卢森堡被各大

① Andreas Hillgruber, *Bismarcks Außenpolitik*, S.100.

② [德] 卡尔·艾利希·博恩：《德意志史：从法国革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上册，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249页。

③ [英] 艾伦·帕麦尔：《俾斯麦传》，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163页。

④ [苏] 波将金：《外交史》，第1卷（下），三联书店1979年，第930页。

⑤ 由荷兰国王兼卢森堡大公管辖下的卢森堡是德意志联盟成员，普鲁士根据维也纳会议决议在此驻军。1867年3月，法国劝说荷兰国王将公国卖给法国，并就此征求普鲁士的意见。

国保证为中立国，但“经济上卢森堡仍保留在‘德意志关税同盟’中，并因此而继续属于德意志关税区域”^①。结果是，法国的补偿要求再次落空，而普鲁士虽放弃了在卢森堡的驻军权，却实实在在地享受着它的经济利益。

再次，当时欧洲其他大国的态度对普鲁士有利而于法国无益。英国将法国视为海上及殖民争霸的强敌，因而“总是欢迎加强中欧”。俄国则与法国在东方问题和波兰问题上有矛盾，因为法国反对俄国肢解土耳其的政策并支持波兰民族运动。普鲁士与法国相反，它推行媚俄政策，支持俄国修改关于黑海非军事化的巴黎条约。结果，俄国在1868年3月提出了与普鲁士结盟的主张，其内容为：一旦普法开战，俄国陈兵奥地利边境，以防奥法结盟；普鲁士则应同意终止黑海中立化，并阻止奥地利在巴尔干地区的扩张。俾斯麦虽无心与俄结盟，但此时已知“俄国是不会参加到法国那一边去的”。奥地利则还没有从1866年战争的惊恐中恢复过来，针对法国的结盟建议，表示普法开战6周后才能加入战争，这实际上是要等到法军胜利时，“才参加到法国一边作战”。另外一个稍有分量的国家意大利则对法国保护罗马教皇政策的政策极为反感^②。可见，法国在欧洲已陷于形影相吊的孤立境地。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1868年9月，西班牙女王伊莎贝拉二世被废逃往法国，新上台的西班牙军政府决定寻找一位新君主。俾斯麦认为这是刺激法国、挑起普法纠纷的良机，遂派人到马德里活动。1870年2月，西班牙政府提出将王位献给霍亨索伦—西格马林根家族的利奥波德亲王。俾斯麦力主利奥波德接受

^① Andreas Hillgruber, *Bismarcks Außenpolitik*, S.92.

^② 1867年11月，法军在蒙塔纳击溃了欲占领罗马的加里波的志愿军。

王位，其理由是：第一，这意味着霍亨索伦家族将从东南两面包围法国，因而必然遭到法国的反对；第二，这会使法国在日后战争中分兵比利牛斯山一线，从而减轻普军的压力；第三，通过促进与西班牙殖民地的贸易，可以使德国在经济上受益^①。

不出俾斯麦所料，7月初，当利奥波德接受西班牙王位的消息传到巴黎后，法国果然舆论大哗。法国不仅迫使普王说服利奥波德放弃继承王位，而且命令其大使到普王埃姆斯温泉疗养地，要求普王声明无意侵犯法兰西民族的利益和尊严，并书面保证永远不赞成霍亨索伦家族的亲王登上西班牙王位。普王虽感屈辱，仍表示将在柏林继续讨论这一问题，并将此情况电告了俾斯麦。俾斯麦自然不甘心自己的如意算盘因普王的忍让而落空，遂将埃姆斯电文加以删节和压缩，使原来表示委屈和解的电文在含义上有所转变，似乎普王粗暴拒绝了法国大使的要求。这一电文于是成了引逗“高卢牛”的红布，“原来听起来是退却的信号，现在是回答挑战的号角”^②。

1870年7月14日，经删节的埃姆斯电文见报。法国政府在一片“打到柏林去”的呼声中于7月19日正式向普鲁士宣战。这时欧洲局势更有利于普鲁士：沙皇对法国强加于普王的要求非常不满；以“比利时中立保护人”自居的英国则由于俾斯麦公布了证明法国对比利时领土野心的贝内德梯文件而大为愤慨，“更无意支持法国”^③。奥地利和意大利也先后于7月20日和25日

① [德] 奥托·冯·俾斯麦：《思考与回忆》，第2卷，东方出版社1985年，第61—63页。

② [英] 艾伦·帕麦尔：《俾斯麦传》，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173页。

③ [英] 波将金：《外交史》，第1卷（下），三联书店1979年，第943页；温斯顿·丘吉尔：《英语国家史略》，下册，新华出版社1985年，第530页。

宣布中立。

普法战争爆发后，由于普鲁士客观上的防御性和民族统一战争的正义性，加之外交、军事准备充分，很快击败了腐朽而孤立无援的法国。9月1日的色当战役中，拿破仑三世和10多万法军成为普军的阶下囚。战争中，南德四邦相继站到普鲁士的德意志爱国主义大旗下。9月19日，德军包围巴黎。11月25日，南德四邦与普鲁士签订联合条约。1871年1月18日，自称德意志帝国“助产士”的俾斯麦宣告德意志帝国正式成立，普王威廉一世在凡尔赛宫镜厅加冕为帝国皇帝。德国统一大业终于完成。

总的看来，德国统一是一个进步的历史事件。其一，它结束了中世纪以来德意志的分裂割据局面，使德意志民族不再受欧洲强邻的欺压。其二，国家的统一促进了德国生产力的发展，这一点在德国统一后不久就强劲地显示了出来。其三，国家的统一还为德国工人阶级在全国范围内的团结和斗争提供了有利条件。从以上意义上说，俾斯麦领导的德国统一运动是一次“自上而下”的“革命”^①。

与此同时，我们必须看到，由于客观历史条件的限制，德国统一带有明显的保守色彩。统一后的德国仍保留了专制主义政体。普鲁士容克地主阶级的统治扩张到整个德国，它们因此实力大增，并延缓了德国资产阶级民主改革的进程。普鲁士的军国主义传统以及统一过程中激起的民族主义情绪使新建立的德意志帝

^① [德]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599页。德国著名学者汉斯—乌尔利希·韦勒则称之为“白色革命”。参见 Wolfgang J. Mommsen, *Imperial Germany 1867—1918: politics, culture, and society in an authoritarian state*, p.1. 德国史学家路塔尔·加尔在其所著《俾斯麦：白色革命者》一书中对俾斯麦的“革命性”给予了积极的肯定。参见 Lothar Gall, *Bismarck. Der weisse Revolutionär*, Frankfurt am Main, Berlin 1990.

国充斥着沙文主义的喧嚣，使之成为国际上不安定的根源之一。

德国的统一对整个欧洲国际关系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亲眼目睹了德意志统一的著名政治家、英国保守党领袖迪斯雷里甚至将德国的统一比喻为影响大于法国大革命的“德国革命”，因为它使欧洲“所有外交传统被一扫而光”，“均势遭到彻底摧毁”^①。新统一的德国由于其人口、经济方面的潜能以及屡经证明的强大军事力量，成了欧洲大陆的潜在霸主。同时，普鲁士对法国的掠夺，特别是对阿尔萨斯—洛林的割占，也“给法德关系留下了一块难以愈合的溃烂的伤疤”^②，为日后新的战争埋下了祸根。

① Theodor Schieder, *Handbuch der Europäischen Geschichte*, Band 6, Stuttgart 1973, S.62; J.A.S.Grenville, *Europe Reshaped 1848—1878*, p.358.

② René Albrecht-Carrie, *A Diplomatic History of Europe since the Congress of Vienna*, p.78.

二 德意志帝国前期的政治状况

德国统一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1871年建立起来的德意志帝国却是俾斯麦推行“铁血政策”的产物，是普鲁士凭借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力量推行强权政治的结果。因此，这一帝国的政治体制在帝国建立初期不可避免地带有俾斯麦的个人主观色彩和普鲁士政治特色的印记。当然，帝国初期政治架构的设置也考虑到了德国长期分裂割据这一历史因素，即普鲁士在保持自己在新建立的德意志帝国中的主导优势地位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赋予这一帝国以联邦主义的色彩。这些影响我们都可以从1871年出台的德意志帝国宪法中一目了然。

（一）畸形怪胎——1871年德意志帝国宪法

德意志帝国宪法与其他西方资产阶级国家的宪法出台形式不同，它不是制宪会议或国民议会民主讨论的结果，而是和帝国的诞生一样，是由俾斯麦一手炮制的，实际上是“俾斯麦贯彻普鲁士霸权”的结果^①。

如前所述，1866年对奥地利战争胜利后，除奥地利和南德四邦以外的德意志其他邦国在普鲁士的领导下组成了北德意志联

^① *Der Spiegel*, Nr.7 / 9.2.1998, S.48.

邦。为了使这个新成立的联邦“有章可循”，惯于专断的普鲁士首相竟然像签发公文一样，将他拟定的一个宪法草案提交北德意志联邦议会，在只允许作少许修改的情况下，强行通过了事。故而有人称这部宪法是俾斯麦的个人“著作”^①。1867年4月16日，北德意志联邦宪法在北德意志制宪国会通过，次日得到联邦内各邦政府的认可，7月1日生效。而1871年的德意志帝国宪法就是在这样一部宪法的基础上形成的，不同之处是在原宪法中加上了与南德四邦签订的条约。宪法于1871年3月21日提交新选举产生的德意志帝国议会。4月14日，帝国议会（328票中仅有7票反对）原样通过，4月20日由俾斯麦公布^②。直到1917年，这部宪法只根据实用和习俗的需要作过几处修改。

根据1871年宪法，德意志帝国的政治结构呈现出两大特点。

第一大特点是它在行政结构上的联邦主义色彩。建立这种联邦主义结构的主要原因在于，新建立起来的德意志帝国实际上是各种力量妥协的产物。它既要照顾到德意志人民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的愿望，又要考虑到各邦的利益，特别是最大邦普鲁士的利益。这种特点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看出：

首先，最初的宪法文本中就含有明显的联邦主义成分。俾斯麦是一位极其现实主义的政治家。还在讨论北德意志联邦宪法时，他就已经考虑到联邦的大门要对南德各邦开着^③。为了减少南德诸邦分离主义势力的抵抗，顺利地实现德国的统一，他在不

① 钱端升：《德国的政府》，商务印书馆1935年，第5页。

② 有关1871年德意志帝国宪法全文，可参见Ernst Rudolf Huber, *Dokumente zur Deutschen Verfassungsgeschichte. Band 2. Deutsche Verfassungsdokumente 1851—1900*, Stuttgart 1986, S.385—402.

③ [德]卡尔·艾利希·博恩：《德意志史：从法国革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上册，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249页。

动摇根本原则的前提下，曾作出了很大的让步。对此，人们可以从提交德意志帝国议会讨论的宪法草案对有关国家及其首脑的称呼中可见一斑。根据1871年1月1日开始生效的宪法文本，新统一的德国称“德意志联邦”，其最高首脑为“联邦主席”。直到1月18日，人们才从发布的皇帝宣言中得知，“联邦主席”的名称改成了“德意志皇帝”。不过，这个“皇帝”的称号也是经过一番周折才分娩出来的。普王威廉一世曾表示，如果接受皇帝称号的话，希望自己能被称为“德国皇帝”（Kaiser von Deutschland），甚至直到加冕前的一天，他仍坚持这一点。然而这一要求遭到巴伐利亚国王和符滕堡国王的反对，其理由是：如果承认这一称号的话，就意味着正式承认普鲁士国王居于帝国内其他国王之上，同时也包含着对非普鲁士的领土提出领土主权的要求。对此，“各邦君主是不会同意的”。巴伐利亚国王明确提出要将“实施联邦的领导权力和德意志皇帝称号结合起来”^①。这意味着新统一的德意志国家必须给各邦政府保留一定的权力。作为新帝国助产士的俾斯麦左右为难，最后还是劝说威廉一世接受“德意志皇帝”（Deutscher Kaiser）这一折中方案了事。“德意志皇帝”的称号意味着只能与德意志民族联系起来，而不能与领土统治权联系起来。而且俾斯麦这位德意志帝国的创立者从一开始就确认了“皇帝在原则上不享受高于各国王的优先地位”^②。由此可见，德意志帝国在筹划建立时，就已确立了它的联邦主义性质。

其次，从新建帝国的组织结构上也可以看出它的联邦主义性

① [德]奥托·冯·俾斯麦：《思考与回忆》，第2卷，东方出版社1985年，第92—93页。

② [德]奥托·冯·俾斯麦：《思考与回忆》，第2卷，东方出版社1985年，第93页。

质。根据 1871 年的德意志帝国宪法，新成立的德意志帝国“缔结为一个永久的联邦”，由 25 个邦和帝国直属领地阿尔萨斯—洛林组成。帝国的主权实际上掌握在 25 个邦的代表，即 22 个诸侯和 3 个自由市的市议会手中，因为由他们派出的 58 名全权代表组成的联邦议会是帝国最重要的机构。根据宪法，联邦议会是帝国最高的权力机构，享有立法权。任何未经联邦议会同意的法律一概无效。它还有权否决帝国议会通过的议案。这样一来，“联合起来的 22 个君主和 3 个自由市的市议会才是国家主权的共同享有者”。而联邦议会中的议席分配则确保了联邦主义原则的贯彻。根据宪法，在联邦议会的 58 个议席中，作为国家统一运动领导者的普鲁士仅拥有 17 席，不足总数的 1/3。在这种情况下，普鲁士就有能力否决任何意欲修改宪法的议案和不利于它的法案（14 票足以否决议案），从而完全封杀了任何不利于普鲁士的议案在联邦议会中通过的可能性。但其他中小邦也可以联合起来以多数票制服普鲁士，确保自己的权利不受侵犯，甚至只要巴伐利亚（6 票）、萨克森（4 票）和符滕堡（4 票）联合起来就可以否决对它们不利的议案。

再次，帝国的联邦主义性质还表现为各邦保留有大量的体现国家主权性质的权利。例如，虽然宪法规定了在国际交往中皇帝是国家主权的惟一体现者，但帝国各邦在对外关系方面却仍然保留了派遣和接受外交使节的权利。巴伐利亚直到 1918 年时还在奥匈帝国、法国和梵蒂冈派驻着自己的外交代表机构。帝国的军队也是由各大、中邦国分担的份额军队组合而成的。除了普鲁士的陆军部以外，巴伐利亚和符滕堡也有它们自己的陆军部。尽管皇帝是帝国军队的最高统帅，巴伐利亚的军队却只有在战时才听从皇帝的命令。在邮政方面，除了帝国邮局外，巴伐利亚和符滕堡也有各自的邮政管理机构。此外，各邦还保留有教育、宗教、

部分司法、征收直接税等自治权利^①。据统计，在原北德意志联邦宪法的79条中，巴伐利亚共违反了26条。例如，在有关结婚和定居的法规中，巴伐利亚竟然规定，巴伐利亚国民在普鲁士或萨克森结婚，如果没有得到国王的批准，那么其婚生子女就法律上而言在巴伐利亚境内被视为私生子女^②。这俨然将普鲁士和萨克森视作外国。

以上情况表明，在德意志帝国建立初期，它是一个实实在在的联邦制国家，而且由于各邦权力有些过大，这一帝国甚至带有一些邦联的意味。俾斯麦本人也认为1871年宪法确实是一个同时包含有联邦和邦联因素的混合物。他在起草这部宪法时就曾公开地表示：“我们不得不保持邦联，与此同时，通过使用富有弹性的和不显眼的却是明明白白的表达方式，在实际上给予一种联邦的特征。一个联邦议会，而不是一个内阁，因此将行使中央权力。”^③由于各邦在内政管理上自主权极大，以致当时德国的一些资产阶级自由派人士抱怨新建立的德意志帝国“是一座尚未完工的建筑物，包含统一的因素太少”^④。

德意志帝国政治架构的第二大特点是帝国政治体制上的专制主义色彩，即一个用议会装饰着的君主专制体制国家。1871年的德国统一是由普鲁士来完成的，普鲁士因此在这一新统一的国

^① 参见 Ernst Rudolf Huber, *Dokumente zur Deutschen Verfassungsgeschichte. Band 2. Deutsche Verfassungsdokumente 1851—1900*, S.392, 393, 396, 400.

^② [德]梅林：《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第4卷，三联书店1966年，第13页。

^③ 参见 Wolfgang J. Mommsen, *Imperial Germany 1867—1918: politics, culture, and society in an authoritarian state*, p.23.

^④ [德]卡尔·艾利希·博恩：《德意志史：从法国革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上册，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276页。

家中占有明显的优势。在新建立的德意志帝国中它拥有 2/3 的土地和 3/5 的人口。帝国最重要的原料产地和工业都在普鲁士境内，帝国军队中有 2/3 是普鲁士的武装力量。在这种情形下，德国的统一实际上成了普鲁士邦的扩大。于是，普鲁士那种在立宪面具下的专制主义统治模式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了帝国的统治模式。关于这一点，可以从帝国宪法有关行政、立法权力分配的规定中得出结论。

首先，从行政权力上看，君主政体在法律上得到确认。作为帝国首脑的皇帝由普鲁士国王担任，他手中集中了“过多的、无论整体上还是部分地都不受影响的权力”^①。根据德意志帝国宪法，皇帝有任免国家官吏之权，帝国宰相由他任命；他还有法律的创制权，有权签署和公布帝国法律并监督法律的实施；他是帝国武装力量的统帅，帝国的全部陆海军组成一支统一的军队，在战时、平时均由皇帝统帅；他决定帝国的对外政策，皇帝在国际上代表帝国，以帝国的名义宣战、媾和，与外国缔结同盟和签订条约，委派驻外使节。

德意志帝国没有内阁。由普鲁士首相兼任的帝国宰相是全帝国惟一的大臣，主持帝国政府。由于帝国宰相是由皇帝直接任命的，因而他只对皇帝而非议会负责。同样，由宰相任命的国家各部门负责人则对宰相负责。虽然皇帝批准的一切法案必须经帝国宰相副署后才能生效，但这并不意味着宰相有什么牵制皇帝的权力，因为帝国宰相兼普鲁士首相的任免完全取决于帝国皇帝兼普鲁士国王的意愿。

其次，从有关立法机构权力的规定中，也可以看出德意志帝国政治生活中的专制主义色彩。根据 1871 年宪法，德意志帝国

^① Wolfgang J. Mommsen, *Imperial Germany 1867—1918: politics, culture, and society in an authoritarian state*, p.37.

按照联邦国家立法机构的模式建立了两院制的议会。其中，作为上议院的联邦议会代表各邦，作为下议院的帝国议会则是全体人民的代表。然而，就其实质而言，这些所谓的立法机构不过是掩盖专制主义的一个宪法门面。第一，联邦议会并不是一个什么真正的上议院，它体现的只是一种君主的权力。这一议会中的代表只是各邦君主委派的代言人，议会中各邦的代表人数也不像美国的参议院那样由各州以相等的代表组成，而是按各邦的大小和力量来决定的。这样一来，普鲁士就以它所拥有的超过否决权的票数控制了联邦议会。第二，虽然帝国议会是由25岁以上的男性公民通过普遍、平等、直接和秘密的选举产生的，从表面上看，它具备了一个真正的立法机构的一切外部特征，事实上它的权力却极其有限。它有权提出法案，但只有得到联邦议会和皇帝的同意才能生效；它对任命宰相、组织政府等都没有影响，因此不存在对它负责的政府；它对外交和军事问题也都毫无发言权。它的最大的权力就是审查和拒绝通过预算。因此，有人戏称德意志帝国议会只是一个“发表独白”的“没有政府的议会”^①。而且，不管是联邦议会还是帝国议会，它们的召集权和宣布休会的权力都掌握在皇帝手中。

此外，德意志帝国宪法在人民的基本权利等方面只字未提。天主教的中央党和南德资产阶级自由派的一些代表曾提出在宪法中增加一些有关基本权利的内容，但这些要求都以极其悬殊的票数被否决了^②。

总的说来，1871年建立起来的德意志帝国在政治结构上是

① [美]科佩尔·S.平森：《德国近现代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224页。

② 参见：[美]科佩尔·S.平森：《德国近现代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221页。

一个君主立宪制外衣下的专制政体国家。在这一国家中，贵族阶级居于领导地位，资产阶级则通过帝国议会从参与意义上加入了统治阶级行列。正是从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称德意志帝国是“一个以议会形式粉饰门面，混杂着封建残余，已经受到资产阶级影响，按照官僚制度组织起来，并以警察来保卫的军事专制制度国家”^①。

不过，倘若我们对1871年的德意志帝国宪法进行更细致深入的分析 and 思考，还会对它形成一些新的看法。

有德国学者认为，从宪法角度而言，德意志帝国是一个“怪物”（Monstrous）^②。这不无道理。如果我们对德意志帝国宪法只作单独的审视，就会如身处庐山之中，很难识其真面目，看到它的真正特点。当我们将视野放宽，将德意志帝国宪法规定的政治结构与当时欧洲各主要国家的政治结构作一个比较时，就不难发现，要仅仅就事论事，从德意志帝国宪法出发对这一个帝国的政治结构作一个绝对性的优或劣、进步或保守的评判，是很困难的，而且往往会出现错误。

首先，我们应该认识到，1871年的德意志帝国宪法是一部“约定性的宪法”。正是这部带有照顾各种势力利益的妥协性宪法，使得“德意志民族国家”这一大多数德意志人看来最重要的目标成为一种现实。如果我们从全方位加以考察，就会发现，这部宪法是在考虑到三个主要因素的基础上产生的，这就是各邦原统治者的利益、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建立统一民族国家的主张和普鲁士的霸权。可以说，1871年宪法的任何一个部分，如对国家

① [德]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1页。

② 参见 Helmut Böhme, *Probleme der Reichsgründungszeit 1848—1879*, Köln 1968, S. 455.

行政结构的设置、政治体制的构架等，皆可以从以上三大因素中找到根据。至于帝国宪法为何会出现这种照顾各方利益的形式，有人认为，这是因为俾斯麦使用的是一种波拿巴式的策略。他是要通过在各种旧势力和新势力之间保持平衡，来“加强自己的权力地位”^①。然而，不管怎样，从客观上说，这一带有各种势力之间妥协色彩的宪法对于建立新统一起来的德意志民族国家，巩固统一的成果，应该是利大于弊的。

其次，如果仅仅就宪法的政治色彩而论，不妨认为1871年德意志帝国宪法与欧洲其他国家的宪法相比，取的是中间道路。一方面，它比西欧、南欧的部分国家的宪法要落后一些；另一方面，它与东欧及东南欧的绝对专制独裁体制相比，仍不失为一部进步的宪法。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宪法中所包含的普遍、平等、直接选举和秘密投票制的民主原则，应该说在当时是相当进步的。这一点甚至比当时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还要进步，因为直到1884年—1885年选举改革后，英国才基本上实现了普选制。而在拿破仑三世统治下的法兰西第二帝国，虽然也实行普选制，却做不到平等^②。

当然，以上比较只说明了问题的一个方面，从整体上看并不意味着德国的宪政结构较之其他国家更民主和进步。例如，在作为国民代表的议会对各种政策和决定的影响方面，英、法等国就远远大于德国。德意志帝国宪法在规规定民主选举的同时，却又保存了一套与奥地利和俄国相类似的独裁主义结构的核心中央政府。如前所述的那样，德意志皇帝兼普鲁士国王手中握有几乎不

^① Wolfgang J. Mommsen, *Imperial Germany 1867—1918: politics, culture, and society in an authoritarian state*, p. 21.

^② [法]皮埃尔·米盖尔：《法国史》，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380—383页。

受限制的权力；行政的运转则掌握在帝国宰相兼联邦议会主席的手中，而他是受帝国议会多数的制约的；德意志帝国宪法中的联邦结构的设置虽然是为了照顾各邦的独立性，但其初衷有制衡代表民意的帝国议会和各政党的力量的考虑。议会本身的结构设置也极不利于民主。联邦议会代表各邦政府，绝非帝国议会可比。而且诸如军队等国家政权的核心因素也不受帝国议会的影响。于是乎，在德意志帝国中出现了一种怪现象：帝国政府不对帝国议会负责，却可以在得到联邦议会同意后解散代表民意的帝国议会。正是由于这些特点，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称德意志帝国是“半宪法的”甚至是“假宪法的”国家。以上各种因素综合起来，德意志帝国也就与德国史学家争论不休的所谓“德意志特殊道路”^①紧密联系在一起。

（二）斑驳陆离——德意志帝国初期的政党状况

要了解德意志帝国初期政党的状况，有必要先了解一下德国各政党的历史渊源。在德国，现代意义上的政党出现于1848年革命时期^②。在这次革命中，由于取消了书报检查制度，结社、集会等权利得到保障，整个德国境内在“三月革命”后出现了广泛的政治公开化，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5个党派性质的集团，他们分别是：资产阶级自由派，资产阶级民主派，保守派，政治性天主教以及早期的工人运动。此外，还有代表各种利益集团的社团和协会，而所有这些派别大体上可以归类为“保守派”和“自

^① Hans-Peter Ullmann, *Politik im Deutschen Kaiserreich 1871—1918*, München 1999, S.53.

^② Deutscher Bundestag, *Fragen an die deutsche Geschichte: Ideen, Kräfte, Entscheidungen von 1800 bis zur Gegenwart*, S.124.

由派”两种政治倾向。

作为一种现代意义上的政党政治，一般只有在一个国家建立起议会时才会产生。近代英、法等国的政党发展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于是，1848年德国革命中召开的第一个德意志议会全德国民议会（法兰克福议会）就成了德国政党的最初诞生的标志。在这一国民议会中，虽然还没有明确形式的政党，但参加议会的代表在事实上已经分成了右派、中派和左派3个派别，这3个派别之中又进一步分成了若干个小派别。

3个派别的基本构成情况是：极右派，主要由亲奥地利分子组成；右派，以拉多维茨、芬克等普鲁士的官员为代表。这两个派别不愿推翻各邦封建王朝，只要求实行君主立宪制，在各邦君主仍保留各种政治特权的前提下给资产阶级一定的参政权。在中派之中，有接近于右派的中间派右翼——中右派，它主要由一些著名的学者和教授组成，因而又称教授党，代表人物为海因里希·冯·加格恩、弗里德里希·克里斯托夫·达尔曼等。他们中的许多人受过政府的迫害，主张改革旧的封建制度。但是，他们反对用激进的革命手段来推翻封建政权，崇尚通过和平的方式走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制道路。他们与右派的区别在于反对给予君主过大的权力。中派之中倾向于左派的部分代表组成了中左派。他们在政治上较左派温和，赞成人民主权，要求实现某些民主原则，却又反对激进观点，同意保留君主制度。左派是法兰克福议会中最早形成的政治集团，其中大部分成员是1848年革命前受到过迫害，而在革命期间又回到德国的流亡者，许多人是“青年德意志”的成员。他们反对现存的政治制度，尤其反对1815年维也纳会议以后建立起来的德意志联盟议会。左派中又分成了以罗伯特·勃鲁姆为首的温和左派和以路德维希·西蒙等为代表的极左派，前者希望在德国建立联邦共和国，后者则要求在德国实现完

全的民主，建立统一的民主共和国^①。

1848年革命失败后，现代意义上的政党在德国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在普鲁士，1848年3月18日，普王威廉四世在革命形势的压力下曾被迫下令于4月2日召开联合的邦议会，允诺“将尽力缔造一个德意志联邦国家，建立一个德意志人民代议制，并制定一个立宪君主制的德意志宪法”^②。5月22日，通过间接选举制推选出的普鲁士众议院开幕。虽然这种选举制推选出的代表不可能真正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意志，而且这种议会也像根据1871年德意志帝国宪法建立起来的帝国议会一样，是一种专制独裁主义政府的装饰品，但议会制的出现本身意义是很大的，它给普鲁士政党的政治发展提供了一块空间。结果，在普鲁士议会中逐渐形成了几个大的党派，即保守党、自由保守党、民族自由党和进步党等。1861年，资产阶级自由派在1859年成立的“德意志民族联合会”的基础上首先建立了“德意志进步党”。它一方面继续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民主化、法律平等、教会和国家分离等传统要求，同时支持德国的统一运动。1861年11月的普鲁士邦议会选举中，资产阶级的进步党成为最大的议会党团。在19世纪60年代的“宪法纠纷”中已经带有明显的党派政治色彩，当时以进步党为代表的资产阶级与容克地主阶级保守派之间围绕着普鲁士的军事改革问题展开了争夺国家领导权的斗争，进步党试图利用控制预算来操纵国家政权。由此可见，在德意志帝国建立以前，德国的政党政治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

据笔者所知，许多著作对德意志帝国时期的政党都有所涉

① 以上法兰克福议会中的派别情况，见 Hildebrandt, *Opposition in der Pauls Kirche*, Berlin 1981.

② [德] 维纳·洛赫：《德国史》，三联书店1959年，第183页。

及，但是在谈及这些政党和分析它们的纲领时却不尽相同^①。这主要是因为德意志帝国时期政党状况相对混乱，变化组合迅速，且一些政党在纲领和主张上极其类似。我们认为，从总体上看，德意志帝国建立初期，帝国内存在的各个党派可以区分为旧党和新党两种类型。所谓旧党，是指在选民人数相对较少、广大的民众尚未投入政治领域的情况下形成的那些政党，例如前面提到的原普鲁士各政党，都属于旧党类，它们在德意志帝国建立初期仍占有重要地位。虽然19世纪60年代的普鲁士进步党在议会选举中得到多数选民的支持，但是，在三级选举制下这种选举的普遍代表性和民众参与性显然是不足的。所谓新党，即真正的代表民众的党派，它们拥有庞大的组织，并在民众的政治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诸如社会民主党、天主教的中央党等。在论及德意志帝国时期的政党状况时，我们不妨对这一时期的主要政党分别逐个地加以阐述。

保守党 (Die Konservativen)。保守党源于普鲁士的旧党。这

^① 例如，有的著述将德意志帝国时期的政党划分成民族自由党、左派自由主义者、保守派各党、帝国党、中央党和社会民主党等6个部分阐述。参见 *Deutscher Bundestag, Fragen an die deutsche Geschichte: Ideen, Kräfte, Entscheidungen von 1800 bis zur Gegenwart*, S.204—205；有的著作则认为德意志帝国时期的政党可分为5大集团，即保守党—农业集团、天主教集团、自由派—工业集团、激进派—商业集团以及社会主义者—无产者集团，这实际上是将各政党与其所代表的阶级或利益集团联系在一起。参见 Robert Herndon Fife, Jr., *The German Empire between Two Wars: A Study of the Political and Social Development of the Nation between 1871—1914*, New York 1916, p.120；路德维希·贝格施特莱塞尔在《德国政党史》中则对这一时期德国政党的发展状况作了较详细的介绍。参见 Ludwig Bergsträsser, *Geschichte der politischen Parteien in Deutschland*, München, Wien 1965。

一政党的核心成员是普鲁士易北河东部的容克地主^①。作为旧世界秩序的维护者，在德意志帝国建立以前，保守党拥护普鲁士王室及其传统政策，反对德意志的统一以及任何政治变动。其理由很简单，因为在德意志统一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减少一些邦国，这就动摇了“正统主义”原则；而且普鲁士保守党人也担心普鲁士会在统一的德意志国家中丧失自己的独立性。正是由于以上立场，当俾斯麦接受了作为1848年革命副产品的1850年普鲁士“钦定宪法”，而且从事德意志统一运动时，尽管俾斯麦也是容克地主阶级的成员之一，保守党在俾斯麦当政的最初10年中，却一直站在他的对立面。只是由于他们在普鲁士议会中仅占少数，才没有对俾斯麦统一德国的政策构成威胁。在政治上，保守党是社会民主党的死敌，仇视犹太人，却反对俾斯麦针对天主教的文化斗争。保守党的著名代表人物有路德维希·冯·盖拉赫、汉斯·冯·克莱斯特—雷措夫等。

德意志帝国建立后，部分保守党人看到普鲁士在新成立的帝国中仍拥有不可动摇的霸主地位，于是逐渐改变了对帝国的敌视态度，保守党因此而发生分裂，出现了所谓“老保守党人”和“新保守党人”。老保守党人仍顽固地坚持反对帝国的态度，新保守党人则支持帝国政府和普鲁士政府的政策。1876年，该党两派重新组织，并更名为德意志保守党，以表示对新建立的德意志帝国的默认。改组后的保守党的核心成员仍为普鲁士东部各省和梅克伦堡的容克地主，但他们的目光已经不再局限于普鲁士，而是扩展到整个帝国。在外交上，他们在拥护霍亨索伦王室的前提下，大力鼓吹德意志帝国的对外扩张政策，主张扩建海军和夺取殖民地。在经济上，他们在赞成发展工业的同时，特别强调保护

^① Gerhard A. Ritter, *Das Deutsche Kaiserreich 1871—1914: Ein historisches Lesebuch*, Göttingen 1977, S.124—126.

和发展农业，而且为了出口农产品和进口廉价工业品，他们在19世纪70年代末以前一直主张自由贸易。保守党虽然在新建立的德意志帝国议会中势力较小，但因其传统地位的作用以及与皇帝的密切关系，在普鲁士政治中却拥有巨大的影响力^①。

此后，从保守党中又分离出了基督教社会党、德意志改良党、德意志社会党和农业联盟等小党派，他们或反对犹太人，或主张保护农业，实际上是保守党的分支。

帝国党（Die Reichspartei）。该党源自普鲁士的自由保守党。1866年普奥战争之后，从普鲁士保守党中分离出另外一个集团，即自由保守党。这一党派起初很小，其核心成员是旧普鲁士各地区之外的大土地所有者、富商，特别是那些已经贵族化了的大工业家们^②。他们的主要目标是保护他们业已得到的各种特权，因此，他们对俾斯麦在保护贵族各种特权前提下统一德国的努力持支持态度。他们的口号是“祖国高于党”^③。德意志帝国建立以后，自由保守党更名为德意志帝国党，其主要根据地在接近波兰的各省、符滕堡以及莱茵河下游地区。帝国党的政治立场在保守党和民族自由党之间来回摆动。在政治上，该党支持俾斯麦的立宪政府形式以及其中包含的中央集权主义的因素，支持俾斯麦反对天主教的文化斗争。它因此而成为德意志帝国初期帝国议会中支持俾斯麦的主要力量。作为俾斯麦的亲信党，它的许多成员也因此而成了帝国的外交和内政方面的高级官员。但是，作为保守

① 参见 Gerhard A. Ritter, *Das Deutsche Kaiserreich 1871—1914: Ein historisches Lesebuch*, S.128—129.

② Golo Mann, *The History of Germany since 1789*, p.350.

③ [美]科佩尔·S.平森：《德国近现代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232页。

派政党，它反对帝国在议会化方面的任何进步^①。同时，它也反对社会民主党和犹太人。在经济方面，它同样重视农业；但与保守党相比，它更关心工业的发展。这种特性在相关人物身上特别突出。例如，德意志帝国党的主要代表人物威廉·卡尔多夫既是西里西亚的骑士庄园主，又是德国工业家中央协会的创始人之一。这一政党的其他代表人物还有卡尔·冯·施图姆—哈尔贝格等。

民族自由党 (Nationalliberale Partei)。1866 年 11 月，资产阶级进步党因是否在北德意志联邦中支持俾斯麦的宪法问题而发生分裂，进步党内一部分人分离出来，形成了民族自由党。这是一个真正的“帝国党”，其成员主要来自西普鲁士、被普鲁士吞并的汉诺威、黑森等地区以及南德的巴登、符滕堡等邦，代表信奉新教的、受过教育的资产阶级和工业大资产阶级。这一政党的主要目标有两个：第一，实现法制的、进步的、宪政的议会制国家；第二，实现民族的强权国家。民族自由党与包括进步党在内的其他资产阶级自由党人的最大区别在于，它将“实现民族的强权国家和实现自由主义的、民族的法制国家”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②，即同时兼顾到自由和国家利益。正是为了国家利益，它以自由贸易、议会通过预决算等为条件，支持俾斯麦统一德国的政策。在德意志帝国建立初期，民族自由党是帝国议会中最强大的政党，也是俾斯麦在帝国议会中的最强有力的支持者。它支持俾斯麦开展的反对天主教会文化斗争，但对社会问题不感兴趣。

民族自由党内部也并非铁板一块，它可划分为左右两派。左

^① Deutscher Bundestag, *Fragen an die deutsche Geschichte: Ideen, Kräfte, Entscheidungen von 1800 bis zur Gegenwart*, S.205.

^② [德] 卡尔·艾利希·博恩：《德意志史：从法国革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上册，商务印书馆 1991 年，第 287 页。

派领导人为爱德华·拉斯克，其追求的目标是保持基本的自由权利，反对政府，节约开支。由于他的这种立场，俾斯麦对他恨之入骨，称之为“德国的病患”。民族自由党的右派领导人为鲁道夫·冯·本尼格森，他是原德意志民族联合会的主席，对强权民族国家情有独钟。

进步党（Die Fortschrittspartei）。这是德意志帝国议会中资格最老的一个政党，1861年6月，该党成立于普鲁士。在19世纪60年代的宪法冲突中，它是普鲁士议会中最强大的政党。这一政党的主要支持者是商业资产阶级、手工业者、小商人、小官吏和知识分子。它可谓真正意义上的资产阶级自由党，是19世纪自由主义的代表。该党最重要的领袖有欧根·里希特和弗里德里希·诺曼。就其主张而言，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它都主张自由放任，力求将立宪君主制改变为议会君主制，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和中央集权下的统制经济。这种政治态度使得进步党一直处于和俾斯麦对立的状态，俾斯麦因此而毫不犹豫地称它是“帝国的死敌”^①。同时，它也反对军国主义、扩军备战，反对社会主义。

德意志人民党（Deutsche Volkspartei）。该党源自1866年成立于符滕堡的南德人民党，是从法兰克福议会中的民主派演变而来的，帝国成立后，改名为德意志人民党。该政党是资产阶级自由派中最激进的一派。在政治上，它笃信共和政体，主张平等、自由，发展人权，要求建立责任内阁，实行地方自治；在对外政策上，它主张和平和削减军备；在经济上，它反对经济自由主义而主张国家干预社会政策，要求进行各种经济和社会改良，实行劳工立法等。它因此又被称为民主党。德意志人民党的成员多为著名的自由派报纸《法兰克福报》创办者利奥波德·宗内曼的追

^① Golo Mann, *The History of Germany since 1789*, p.350.

随者。

以上各党派实际上都是我们前面所提到的旧党类型，他们的民众基础相对较窄，在民众中的影响力也有限。以中央党和社会民主党为代表的新党则由于其广泛的民众基础而呈现出蓬勃的生命力，逐渐成为德意志帝国时期最强大的政党。

中央党 (Das Zentrum)^①。综观欧洲乃至世界历史，没有一个欧洲大国像德国这样，一方面天主教徒占少数，另一方面天主教势力却又非常强大，中央党就是德国社会这种历史发展特点的一种奇怪的产物。众所周知，自16世纪马丁·路德宗教改革以来，德国就分裂成了新教和旧教两派。19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信奉新教的普鲁士的力量得到迅猛发展，而且它还得到反天主教的自由主义者的支持。这就迫使德意志的天主教徒们不得不利用新发展起来的政党政治来捍卫自己的宗教信仰和利益，保持天主教会在越来越强大的世俗国家力量面前的独立性，使教会能够在教育领域中立足。同时，天主教会还必须通过各种现代组织、报纸和俱乐部来保持对人们的灵魂的影响力。所有这些，都需要介入政治领域。正是出于以上原因，普鲁士的天主教力量于1852年成立了中央党，其目的在于与当时普鲁士的反天主教势力相对

① 一译“中间党”。参见钱端升《德国的政府》，商务印书馆1935年，第52页。其中认为，所以该党名为中间党，是因为它在普鲁士议会中处于保守派和自由派之间。著名德国史专家戈洛·曼认为，所以取中间党这一名称，不仅因为它站在介于左派和右派间的立场上，而且在于它吸取了保守派和社会主义者的倾向。参见Golo Mann, *The History of Germany since 1789*, p.354. 罗伯特·赫尔曼的《德国史》认为，中央党一名来源于该党在议会中的坐席处于中间。参见：Robert-Hermann Tenbrock, *Geschichte Deutschlands*, S.215. 笔者认为，无论从该党的政治主张还是从该党在议会中的座位来看，译为“中间党”更为合适，“中央党”容易使人产生误解。但考虑到约定俗成，笔者仍沿用旧的“中央党”译名。

抗，并反对政府取消和严格限制天主教的教会和学校的举动。该政党后来在普鲁士宪法冲突中已经解散。

19世纪70年代初，整个欧洲政治形势对天主教势力更加不利。首先，新教的普鲁士先后击败了作为天主教大国的奥地利和法国，并建立起在它主导下的德意志帝国，与此同时，意大利趁德法战争之机完成了国家的统一，作为天主教会中心的罗马眨眼间变成了意大利王国的首都。正是在这一背景下，1870年12月13日，普鲁士议会的天主教议员们在彼得·赖兴施佩格尔和路德维希·温特霍斯特的领导下，重新恢复了“中央党”。德意志帝国建立以后，中央党的组织就覆盖到了整个帝国境内。中央党的基础是德国的分离主义势力，是各种对帝国不满因素的联合，诸如阿尔萨斯—洛林的天主教代表、信仰天主教的波兰人、不顺从的汉诺威人^①等都成为它的坚定支持者，因此，中央党的成员和支持者就其成分而言呈现出一种“社会多元性”^②。

上述特点使得中央党的社会基础并非存在于特定的社会阶层之中。在最初，它只是为了对付新教的普鲁士和日益强大的自由主义，主要目的在于捍卫天主教群众的利益，是一个宗教性的党派。因此，它在政治立场上给人一种不可思议的混杂性，其主张既有保守性的一面，同时却又有类似社会主义的激进成分。

从保守性方面看，中央党都忠诚于自己历史上的邦国。因此，他们主张联邦制，反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所主张的中央集

^① 汉诺威国王格奥尔格出身于居尔夫（Guelfe，在中部高地德语中称韦尔夫 Welf）家族，汉诺威被普鲁士吞并后，他的财产被俾斯麦没收成立了居尔夫基金。那些仍效忠于原汉诺威宫廷的居尔夫家族者，就成了居尔夫派或韦尔夫派。中央党的著名领袖温特霍斯特就是原汉诺威的司法大臣和王家律师。

^② Hans-Peter Ullmann, *Das Deutsche Kaiserreich 1871—1918*, Frankfurt am Main 1995, S. 39.

权的国家形式。此外，它还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用自由主义理论来打击自由主义者，认为宗教信仰自由是公民的最基本的权利之一，每个个体的自由不应受到严格的限制。国家应该保护它的公民，照顾他们在物质和道德方面的幸福，与此同时，国家还应该承认各个兴旺的社团和协会的独立性，例如各宗教团体等。

但是，中央党的主张中也有一些社会主义的成分，在这方面，以德国社会天主教运动的创始人、美因茨主教威廉·埃马努埃尔·冯·克特勒的观点最具典型性。克特勒指出，天主教会不承认无限制的财产权利，富人和穷人之间的鸿沟是由于经济自由主义对财产的放任态度造成的，为了消除社会的苦痛，“必须填平社会中巨大的鸿沟，消除贫富之间根深蒂固的敌对……”^① 1864年，他出版了《工人问题和基督教》一书，强调必须强烈关心工人阶级的社会和经济状况。必须注意的是，尽管中央党的主张中有社会主义的成分，中央党却是反社会民主党的。

社会民主党（Die Sozialdemokratie）。德国社会民主党是除中央党以外的另一个群众性政党，是德国迅速工业化进程中工人运动发展的产物，代表德国工人阶级的利益。客观地说来，它的来源有两个，一个是1863年成立的、在斐迪南·拉萨尔领导下的全德工人联合会，一个是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在1869年创立的德国社会民主工党。1875年，两派在哥达合并为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1891年的爱尔福特大会上开始采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名称。如果说德国社会民主党与帝国时期的其他德国政党有区别的话，其最大特点在于它的斗争更着眼于未来。有关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发展详情，后文将有专述。

^① [美] 科佩尔·S. 平森：《德国近现代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253页。

除了以上各政党外，在德意志帝国中还有一些地方性党派，诸如波兰党、汉诺威党、丹麦党、阿尔萨斯—洛林党等，它们都是代表自己地方的利益，敌视新建立的帝国，甚至希望脱离帝国而回归自己原来的国家。就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各项主张而言，它们一般介于中央党和民族自由党之间，没有自己的特殊纲领。

（三）宗教世俗化——“文化斗争”掩盖下的教俗势力交锋

如果说，俾斯麦在先前与各旧党的斗争中都取得了胜利的话，那么，以民众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天主教的中央党和社会民主党的力量却大大出乎这位杰出政治家的预料。在德意志帝国建立前期，这位铁腕宰相针对以这两大群众性政党为代表的社会集团发动的两次规模空前的政治战役——它们甚至被称为帝国的“第二次建立”^①，都以失败而告终。这是俾斯麦自19世纪60年代初执政以来在政治上第一次遇到强有力的对手，也是在国内政治斗争中初尝失败的苦果。

俾斯麦发动的第一场政治战役是针对天主教的所谓“文化斗争”^②。总的看来，俾斯麦发动这次文化斗争，主要是出于国内和国际两个方面的原因。

从国内方面看，俾斯麦特别担心以中央党为代表的天主教势力会危及刚刚实现的德国统一，对新建立起来的德意志帝国不利。因为作为一个宗教集团，天主教势力“从一开始就站在这个

^① Martin Kitchen, *Cambridge Illustrated History: Germany*, p.210.

^② “文化斗争”一词是进步党领袖鲁道夫·菲尔肖在1873年1月的一次选举演说中首先使用的。参见 E.Schmidt-Volkmar, *Der Kulturkampf in Deutschland*, Göttingen 1962, S.119; Helmut M.Müller, *Schlaglichter der deutschen Geschichte*, S.186.

新国家和福音派新教皇权的对立面”^①。如前所述，中央党特别强调帝国内各邦的独立自主，反对各种加强中央集权的举动。在1871年春天公布的纲领中，中央党曾提出了它的两大要求：首先是各邦的独立和自决，其次是保护宗教团体不受世俗立法的干涉^②。中央党的主张因此得到阿尔萨斯—洛林人、波兰人、丹麦人和汉诺威人等分离主义势力的支持。俾斯麦无法容忍任何可能危及他平生的最得意之作——德国的统一的因素的存在，这位宰相曾经直言不讳地表示，在他看来，普鲁士领导下的德国统一是最重要的，“其他事情只是附属品”^③。因此，俾斯麦对主张分离主义的天主教势力绝对不会坐视不理。

从国际方面看，有两个重要因素促使俾斯麦对天主教采取打击措施。

第一个因素是出于反对罗马教廷可能干涉德国国内事务的动机。1864年，教皇庇奥九世曾发表《谬说汇编》。这位教皇从天主教信仰的立场出发，批驳了政治、文化和经济上的自由主义原则，然后把一切反对教皇统治的学说以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都列入了“谬说”之类。1870年的7月18日，梵蒂冈宗教会议又确认了“教皇无谬误”的信条，即教皇在教座上就教义和伦理学方面所作的决定是没有谬误的^④。罗马天主教会的举动在德国资产阶级自由派和新教世界中引起愤慨，他们视之为对现代民族国家和现代精神文化的挑战，并因此而提出了建立脱离罗马的民族

① Helmut M. Müller, *Schlaglichter der deutschen Geschichte*, S. 186.

② [德][德]梅林：《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第4卷，三联书店1966年，第28页。

③ Charles Downer Hazen, *Europe since 1815*, New York 1924, p. 293.

④ 参见 Gerhard A. Ritter, *Das Deutsche Kaiserreich 1871—1914: Ein historisches Lesebuch*, S. 194.

教会的要求。

俾斯麦起初把罗马天主教会的《谬说汇编》和“教皇无谬误”的信条看成是天主教会内部的事务，而且在1870年时仍要求普鲁士驻罗马教廷大使哈里·冯·阿尼姆伯爵采取克制和中立的态度，认为“无谬误说”暂时对普鲁士无关紧要^①。甚至在罗马于1870年9月20日被意大利占领后，俾斯麦还表示愿给教皇以外交上的协助，让他在德国享受庇护权^②。然而，天主教会德国内部事务的干涉使得这位德国宰相终于无法再保持超然的态度。

事情起因于70年代初德国天主教集团内部的分裂。当时在德国形成了由慕尼黑教会历史学家伊格纳茨·德林格勒等组成的天主教反对派——老天主教徒（Die Altkatholiken），他们拒绝接受“教皇无谬误”的信条。结果，天主教会不仅将这些反对派逐出教门，解雇了一些反对派教师和大学教授，而且还要求德国政府将他们其中一些人清除出国家机关。这显然是一种干涉世俗事务的举动。俾斯麦当然不会允许帝国内部有其他发号施令的机构存在，而且天主教会的这种举动本身也违背了普鲁士政府向来实行的宗教宽容和平等政策。另外，在普鲁士境内波兰语地区的一些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和学校视察员不仅不传布德语，反而鼓励用波兰语教学，提倡波兰文化，有使波兰民族运动复兴的危险。所有这些都使俾斯麦政府意识到，有必要调整和明

① [英] 艾伦·帕麦尔：《俾斯麦传》，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196页。

② 关于意大利与教皇的关系，意大利政府曾在1871年5月13日颁布《保障法》。它宣布教皇的人身不可侵犯，给予教皇在宗教管辖方面的完全自由，并给教皇每年300多万里拉的拨款。但教皇拒绝承认这一保障法，声称自己是梵蒂冈之囚。直到1929年墨索里尼的拉特兰协议（Lateran Agreements），这一裂缝才被弥合。

确国家与天主教会之间的关系，杜绝天主教会对于国家事务的影响^①。

促使俾斯麦采取措施打击天主教势力的第二个重要国际因素，是出于对当时国际形势的考虑。在1870年的对法战争中，德国不仅从法国掠夺了50亿法郎的赔款，而且割走了阿尔萨斯—洛林地区。对此，法国自然不会善罢甘休。因此，1871年德意志帝国建立后，俾斯麦对外政策的重点就是孤立法国，防止法国复仇。1873年，法国国内形势发生变化，共和派的梯也尔政府由于法国国民议会内部危机而倒台，主张复仇的保皇派麦克马洪当选为法国总统。这意味着法国将可能出现君主制的复辟。由于法王是正统的天主教徒，俾斯麦担心他会与尊奉天主教的奥地利一起对付德国，“如果法国建立一种天主教化的君主政体，那么同奥地利一起共同对我们施行报复的诱惑力就会大大增加”^②。法国的天主教主教们也确实联合发表声明，表示支持阿尔萨斯—洛林的天主教徒和德国天主教团，反对当时德国政府对天主教的压制政策。而当时反教权主义的意大利和信奉东正教的俄国却与罗马教皇关系不佳。面对以上国际形势，俾斯麦这位外交老手就试图通过打击天主教势力，来确保和俄、意等国的友好关系，孤立教权主义的法国^③。

出于上述原因，俾斯麦开始了他与天主教之间的文化斗争。1871年6月30日，普鲁士政府在一份呈文中向威廉一世建议，

^① Bernhard Pollmann, *Lesebuch zur deutschen Geschichte*, Dortmund 1989, S.699.

^② [德] 奥托·冯·俾斯麦：《思考与回忆》，第2卷，东方出版社1985年，第131页。

^③ [美] 科佩尔·S. 平森：《德国近现代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258页。

取消文化部的天主教处^①。7月8日，这一建议得到落实，以表示普鲁士政府对于作为天主教反对派的老天主教徒们的支持。数日后，在俾斯麦的授意下，保守党的喉舌《十字报》发起了一场反对教权主义的宣传运动。1871年12月10日，德意志帝国议会又通过了《布道条例》，禁止宗教人员在行使其职责时“以危害公共安宁的方式”处理国家事务^②。

1872年1月22日，原普鲁士文化大臣，温和派保守党人海因里希·冯·米勒由于和俾斯麦在教会政策上发生分歧而辞去职务，民族自由党法学家、对教士和任何宗教机构都带有自由理性主义仇恨的阿达尔伯特·法尔克开始负责文化事务^③。这一人物的上台为俾斯麦的反天主教政策打开了绿灯。当时俾斯麦给法尔克的任務就是，“恢复国家对教会的权力”^④。此后，德国的文化斗争正是朝着这一方向发展的。

1872年3月11日，根据法尔克的建议，普鲁士颁布了学校监督法，以确立国家对学校的监督权。根据这一法令，取消教会向地区或县级学校派遣视察员的制度，并将所有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都置于国家监督之下。1872年7月4日，联邦议会和帝国议会又通过了反耶稣会士法，禁止耶稣会在帝国内活动。虽然这一法令违背了自由主义以法治国的原则，但是以民族自由党为代表的多数自由派资产阶级这时已经处于“文化斗争”的一种狂热之中，仍然投票支持这一法案。俾斯麦则通过煽动民族主义情绪

① Gerhard A. Ritter, *Das Deutsche Kaiserreich 1871—1914: Ein historisches Lesebuch*, S.194.

② [德] 卡尔·艾利希·博恩：《德意志史：从法国革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上册，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337页；Helmut M. Müller, *Schlaglichter der deutschen Geschichte*, S.186.

③ E. Schmidt-Volkmar, *Der Kulturkampf in Deutschland*, S.77—79.

④ E. Schmidt-Volkmar, *Der Kulturkampf in Deutschland*, S.79.

来为反天主教会运动服务。他暗示，德意志帝国会像中世纪的亨利四世一样，反抗罗马教皇，洗雪 800 年以前皇帝所蒙受的耻辱^①。这年 5 月，他在帝国议会上宣布：“放心吧！我们是不会去卡诺莎的，肉体不会去，灵魂也不去！”

1873 年 1 月 9 日，法尔克进一步提出了一系列的反天主教法令，并于当年 5 月颁布，即所谓“五月法令”，试图以此断然解决天主教问题。根据这一法令，担任宗教职务的人员必须具备德国高级文科中学的毕业文凭，在德国大学学习，并须通过哲学、历史和德国文学等学科的“文化考试”，从而把教士的教育完全置于国家的控制之下；国家对教士的授职保有否决权，教会任命教职时有义务向普鲁士省长报告，省长则对此有权提出异议；教会对下属的惩戒权只限于德国的教会机关；设立负责教会事务的王家法庭，处理不服教会机构纪律裁决而提出上诉的案件等。这一法令自然激起天主教会的强烈不满，天主教会的主教们在富尔达集会并明确宣布：“天主教基督徒承认或自愿服从这些法令就是严重违背了自己的信仰。”

此后，普鲁士及帝国政府又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旨在打击天主教势力的措施和法令。1874 年 3 月，普鲁士开始实行强制的非宗教婚姻，规定只准举行世俗婚礼。出生、结婚和死亡等户籍登记工作也从教会转到了新成立的户籍机关。1874 年 5 月，根据普鲁士的提议，德意志帝国政府又通过了取消户籍法，规定各邦政府有权限制传教士住在一个特定的地区，甚至将他们驱逐出境。同时普鲁士政府授权文化大臣，他可以任命代表去治理无人管理的主教辖区，空缺的教士将通过教区选举补充。同年 7 月 7 日，教会青年运动成员库尔曼刺杀俾斯麦未遂，更使文化斗争火

^① 1077 年，德皇亨利四世在和教皇格里高里七世争夺主教的叙任权斗争中失败，被迫在严冬之际到意大利的卡诺莎城堡向格里高里七世忏悔。

上浇油。1874年12月，德国驻梵蒂冈大使馆完全停止了活动。1875年4月22日和5月31日，普鲁士政府又相继颁布“面包篮法令”和“寺院法令”，停发国家给天主教会的补助款；除了纯粹照顾病残者的教团外，取消一切教团在普鲁士的住所。到1876年时，普鲁士所有的主教或被逮捕，或被驱逐出境，天主教教士职位的空缺达到将近1/4^①。

俾斯麦政府反对教权主义的斗争得到了德国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支持。进步党领袖菲尔肖称之为两种不同的人生观和世界观的斗争。资产阶级自由派之所以竭力支持进行文化斗争，主要抱有两个目的。一方面，他们从根本上是反对与现代自然科学不相容的天主教教义的；另一方面，他们想借助这场斗争来打垮作为分离主义势力代表的中央党，巩固新统一起来的民族国家。

然而，事实出乎人们所料。尽管俾斯麦政府办法用尽，收效却甚微。1875年2月5日，教皇庇奥九世发布通谕，宣布普鲁士“违反教会神圣制度”的各项法令一概无效，并威胁要将所有遵守这些法令的人逐出教门，从而表明了罗马教廷的坚定态度。

最值得注意的是，中央党经过这场斗争不仅没有被打垮，反而愈加壮大起来。原先德国的天主教徒们对于一个“教派”建立政党是否可取的问题还存在分歧，文化斗争则使得他们认识到，建立一个代表自己的政党是有必要的。于是，他们纷纷团结在中央党的周围，抵制政府的各项反天主教的法令和措施。结果，中央党发展成了一个群众性的大党。这可以从两个方面得出结论。首先，中央党的影响力日益增长。这一点可以从中央党所控制的

^① [德] 卡尔·艾利希·博恩：《德意志史：从法国革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上册，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338—339页。

报纸数量上间接地看出来。1871年以后，中央党除创办了它的机关报《日耳曼尼亚报》外，还拥有《科隆国民报》、《西里西亚国民报》、《奥格斯堡邮报》、《美因茨日报》、《德意志国民报》等126种报纸，发行量达32万多份^①。其次，中央党在议会中的势力日益壮大。在1871年的议会选举中，中央党的得票数为72.4万多张，占选票总数的18%，拥有议席63个，约为议会最大政党民族自由党议席的一半（125席）；在1874年的议会选举中，中央党的得票数达到134.1万多张，几乎翻了一倍，得票率上升为27.9%，拥有议席91个，与议会第一大党民族自由党（155席）的差距明显缩小^②。

中央党为何能顶住普鲁士和德意志帝国政府的强大压力而发展壮大呢？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严厉的文化斗争激发了天主教中央党领袖们的战争精神，他们一时成了反抗政治迫害的英雄，并因此而得到天主教居民的同情和支持。他们意识到了中央党作为他们的代言人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中央党领袖温特霍斯特在帝国议会中与俾斯麦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激烈斗争^③。俾斯麦的下面一段话，或许可以说明一些问题：“恨和爱一样，都是生命的伟大动力。我的生命是由两个人维持着并给予愉快的——我的

① 到1912年，中央党控制的报纸达446种，发行量达262万多份。参见[美]科佩尔·S.平森：《德国近现代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805页。

② Gerd Hohorst, Jürgen Kocka und Gerhard A. Ritter, *Sozialgeschichtliches Arbeitsbuch. Band 2. Materialien zur Statistik des Kaiserreichs 1870—1914*, München 1978, S.173—175; Peter Flora, *State, Economy, and Society in Western Europe 1815—1975: A Data Handbook, Vol. 1. The Growth of Mass Democracies and Welfare States*, p.119.

③ Gerhard A. Ritter, *Das Deutsche Kaiserreich 1871—1914: Ein historisches Lesebuch*, S.196—198.

妻子和温特霍斯特。一个活着让我爱，另一个活着让我恨。”^①

其次，中央党采取了正确的斗争策略。他们理直气壮地利用自由主义的旗帜为自己的斗争服务。他们的理论是，宗教自由是普鲁士宪法中规定的最基本的权利之一，而如今普鲁士国家却在威胁着一切大的宗教团体^②。他们还利用普选、出版自由和集会自由等深入人心的口号，使自己受到大众的喜爱和支持。

再次，俾斯麦政府在教会策略上全面出击的失误使得其他党派力量转而支持中央党。《布道条例》的打击目标是天主教教士，但它的内容却让其他宗教派别也为之不安。普鲁士的保守党本来就不赞成建立新的德意志帝国，当《布道条例》通过后，一些正统路德教的保守派分子担心这种对天主教的进攻会殃及一切传统宗教，不仅会使天主教教士们的活动受到严格的限制，而且路德教和卡尔文教等新教牧师的嘴也会在危害公共安全的幌子下被封住，他们因而转向支持中央党。例如著名的保守党人、虔诚的路德教信徒路德维希·冯·盖拉赫在其生前的最后6年中就一直与温特霍斯特和中央党合作^③，作为保守党人的原普鲁士文化大臣冯·米勒也是因为不满俾斯麦的教会政策而辞去职务的。

复次，俾斯麦低估了德国社会的天主教传统力量。他想要在短期内通过国家政权力强行清除天主教会的势力的做法显然是行不通的，因为人们对天主教的信仰长久地植根于思想意识的深处，绝非普鲁士式的军事命令方式可以迅速解决的。诚如著名德国史学家梅林所言，俾斯麦“利用各种非常法令并令人讨厌地插

① [美]科佩尔·S.平森：《德国近现代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261页。

② Golo Mann, *The History of Germany since 1789*, p.353.

③ [英]艾伦·帕麦尔：《俾斯麦传》，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197页。

手教会内部生活，对教会步步进逼，以致激怒了全国所有信奉天主教的居民，使他们都起来反对俾斯麦”^①。结果，当普鲁士派人监视教师和迫害教士时，实际上只会促使德国的天主教徒们团结在教皇的周围，使多数的天主教徒带着本能的反抗心理在议会选举中一致地投中央党的票。天主教徒们还以消极抵抗的形式表示对天主教会的神职人员的支持和忠诚，抵制选举“国家教士”来补缺教区的空职。

既然反对教权主义的斗争近期内没有胜利的希望，作为现实主义的政治家，俾斯麦决定罢兵休战，而19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出现的国际国内形势也迫使他不得不将这一场所谓的文化斗争草草收场。从国际上看，他争取意大利、奥地利等国支持以反对罗马教廷的希望已经落空，而1875年德法战争危机更使得德国在国际上处于极为被动的境地^②。更重要的是，法国已经逐渐地确立了共和体制，法国本身也已经成了一个反教权主义的国家。因此，通过打击天主教会来孤立法国的最初目的已经失去了依据。同时，德国的国内形势也发生了新的变化。一方面，中央党力量的不断壮大使俾斯麦看到，文化斗争已经没有前途，他因此而开始考虑变换对待天主教会的策略；另一方面，他已经看到一股更可怕的力量——社会主义工人运动正在迅速发展壮大。与天主教会仅仅对国家统一的威胁不同，这股力量威胁的是整个统治阶级的利益。因此，俾斯麦决定要联合一切反对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力量来对付这股洪水猛兽。由于天主教会和中央党同样视社会主义工人运动为敌人，他们也就自然地成了俾斯麦可以联合的

① [德] 弗兰茨·梅林：《中世纪末期以来的德国史》，三联书店1980年，第211页。

② 1875年，俾斯麦曾对法国进行战争威胁，结果遭到英、俄等国的一致反对，德国陷于孤立境地。详见后文。

力量。正是出于以上原因，从1876年开始，俾斯麦开始转向，而罗马教廷和中央党也逐步停止了他们与俾斯麦政府的对抗。喧闹一时的文化斗争趋于停止。

1878年时，俾斯麦终于有了和天主教集团和解的机会。这年2月，执拗的教皇庇奥九世去世，温和的利奥十三世继位，从而为俾斯麦铺平了通向卡诺莎晋见的道路。这一年，教皇首先向德皇威廉一世表达了和解的愿望。1878年夏天和1879年夏天，俾斯麦和教皇的大使两度谈判。虽然双方没有达成一致，但俾斯麦首先采取了让步的态度。1880年7月14日，普鲁士政府颁布了第一个“和缓法令”，免除了主教一直对德意志帝国法律宣誓的手续，并把根据“面包篮法令”取消了的国家对教会的财政拨款重新发给了教会。罗马教会也相应地作出了妥协的姿态，允许德国的主教在教会授职前把神甫的名单报给普鲁士政府。1882年5月和1883年7月，德国政府又颁布了第二个和第三个“和缓法令”，允许被国家免职的主教返回原任职教区，限制帝国法庭对教会事务的管辖权，取消挑选“国家教士”，并允许免除文化考试。

此后，俾斯麦为了表示对教皇的恭敬，特请教皇出面调解德国和西班牙在加罗林群岛问题上的纠纷。受宠若惊的利奥十三世出于感激之情，竟在1885年12月31日向俾斯麦这位曾经发动德国文化斗争的旗手授予了教会的最高荣誉——基督勋章。俾斯麦也赶忙报之以李，在1886年5月21日发布了第一个和平法令。这一法令承认教皇有惩戒下属的权力，撤销了管辖教会事务的国家法院，取消了文化考试。利奥十三世则将在文化斗争中反对俾斯麦最激烈的梅尔歇斯大主教等调往罗马作为报答。1887年4月29日，第二个和平法令出台。它缩小了教会向政府报告的义务和给教士授职时国家的抗议权，并允

许除耶稣会以外的所有教团存在^①。1887年5月23日，教皇利奥十三世在一次公开的红衣主教会议上宣布，文化斗争已经结束。

这里有必要提到的是，作为文化斗争的一个连带产品，普鲁士各省进行了行政改革。1872年，当法尔克出任文化大臣后提出有关国家对学校进行监督的立法时，出乎俾斯麦意料，这一法案遭到普鲁士上议院中容克的反对。这使俾斯麦认识到，必须削减容克地主专断独行的权力。同年秋天，俾斯麦想通过法令形式在普鲁士实行针对容克特权的行政改革，又遭到上议院中容克的反对，因为他们知道俾斯麦的“改革矛头”是指向“容克特权”的^②。最后，俾斯麦不得不请求威廉一世任命了25名非保守派议员进入上议院，为政府在上议院中赢得多数，他的目的才得以实现。1872年12月13日，普鲁士政府通过了主要由普鲁士内政大臣弗里德里希·欧伦堡伯爵拟定的东部6省改革行政机构的法令——“普鲁士、勃兰登堡、波美拉尼亚、波兹南、西里西亚和萨克森诸省专区法”。

根据以上法令，取消地主在村社和乡区中的世袭警察和司法权；乡长和村长由选举产生；县长和区长分别由普王任命的各省省长从地方选举会议提出的候选人中委任。这一改革将容克地主的世袭政治特权变成了受政府委任的方式，从而将普鲁士农村中的容克政权置于中央政府的控制之下，这对于国家的统一和政令的畅通是有利的。而对容克地主的警察和司法权的剥夺，应该说

① 1880年3月，法国政府颁布法令，耶稣会在法国也同样遭到了禁止。参见[法]皮埃尔·米盖尔：《法国史》，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435—436页。

② [英]艾伦·帕麦尔：《俾斯麦传》，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199页。

也是清除封建残余、建立现代资本主义正常统治秩序的一种进步表现。

从整体上看，应该说俾斯麦发动的文化斗争是失败的，如前所述，俾斯麦最后向罗马教廷作了妥协和让步。但是，作为一名精明的政治家，俾斯麦在原则上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在与罗马教会和解后，一些涉及国家安全和世俗权力的措施，诸如《布道条例》、取缔耶稣会、取消普鲁士文化部的天主教文化处、强制非宗教婚姻等依然保存着。正因为如此，中央党对这场斗争的结果很不满意。然而，俾斯麦将他那圆滑的外交手腕运用于文化斗争的撤退战略中，避开中央党而直接与罗马教廷打交道，并利用后者对中央党施加压力，从而避免了彻底投降。

综上所述，19世纪70年代德国反天主教文化斗争其实与宗教、文化的关系不大。作为一场政治运动，反天主教文化斗争的根本目的显然不是出于维护宗教信仰的需要，而是更大程度上出于世俗因素的考虑。从这次斗争中采取的各种手段和斗争的结果看，也都明显呈现出强烈的世俗特征和倾向。罗马教廷的妥协态度也表明，它在文化斗争中坚持和争夺的是世俗权力，而非宗教信仰的原则。所有这一切都向人们展示了宗教的世俗化趋势。就本质而言，反天主教文化斗争实际上主要反映了以下三方面的内容：第一，这次斗争是德意志统一运动的继续，是俾斯麦政府统一德意志以后，在政治上对分离主义势力的继续清剿，是以俾斯麦、民族自由党等主张德国统一、加强中央集权的力量与以中央党为首，包括波兰人党、汉诺威党以及阿尔萨斯—洛林党等在内的分离主义势力之间的一场较量。第二，这场斗争实际上也是自中世纪以来世俗政权反对教权主义斗争的继续，是国家政权与教会间争夺世俗权力的又一场决斗。俾斯麦发动文化斗争的目的是很明显的，即要杜绝教会对德国国家事务的干预，因为“他决不

会容许在帝国内部有任何其他发号施令的机构存在”^①。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他的努力得到了南德地区天主教大邦巴伐利亚的支持。德意志联邦议会和帝国议会通过的反耶稣会士法就是出自巴伐利亚文化大臣卢茨和巴伐利亚前总理大臣霍亨劳厄侯爵的倡议。当时的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二世之所以支持文化斗争，也是为了一个“权”字，即“希望保住他对教会的统治权”^②。第三，如前所述，文化斗争实际上也是俾斯麦孤立法国、争取盟友的一项外交策略，是这位圆滑的外交家精心设计的外交步骤之一。

（四）“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社会主义工人运动和非常法

俾斯麦是一个资产阶级化的容克政治家，他的政府代表的是容克资产阶级的利益。如果说文化斗争是他对来自右面的威胁帝国稳定统治的势力所作出的回击的话，对来自左方的、蓬勃发展的社会主义工人运动他更是不会熟视无睹。因此，紧接在文化斗争之后，他又开始了对德意志帝国时期的另一个群众性的政党——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打击。

德国工人运动是随着德国工业资本主义发展和工人阶级队伍的壮大而发展起来的。1848年革命前，德国工人还不到60万，其中主要是手工业学徒和作坊工人。到19世纪60年代初，由于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普遍展开，德国工人队伍发展到了150多万人，其中产业工人的比重在工业革命的迅速扩张中快速增长。在

① [英] 艾伦·帕麦尔：《俾斯麦传》，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196页。

② [德] 卡尔·艾利希·博恩：《德意志史：从法国革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上册，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346页。

这一背景下，受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影响，德国工人运动也出现了新的气象。

德国工人阶级建立的第一个全国性组织是全德工人联合会。1862年秋，参观伦敦世界博览会归来的德国工人发出了建立独立的工人组织的呼吁。产业工人相对集中的柏林、汉堡、莱比锡等城市的工人遂开始筹划召开全德工人代表大会。1862年12月4日，正在筹备全国工人代表大会的莱比锡委员会致函因发表过《工人纲领》而在工人中有一定影响力的拉萨尔，请其出来领导工人运动。信中写道：“我们仅仅需要在德国寻找一个能够领导目前这个意义重大的运动的人，我们只是在寻找一个我们认为有能力完成这样艰巨任务的人，寻找一个我们完全可以信任的人，以致我们可以把他作为整个运动的领袖来服从，而您就是这样一个人。”^① 拉萨尔复函接受邀请，并应委员会的要求于1863年3月发表《致筹备全德工人代表大会的莱比锡中央委员会的公开答复》（简称《公开答复》），阐述了他在德国工人运动问题上的观点^②。最后，莱比锡委员会以6比4的多数票通过了将《公开答复》作为工人运动的纲领。

1863年5月23日，全德工人联合会在莱比锡召开，来自德国11个工业中心城市的代表参加了大会，拉萨尔被推选为联合会主席。全德工人联合会的成立是德国工人运动的重大进步。对

^① 转引自张文焕：《拉萨尔评传》，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36页。

^② 在《公开答复》中既有正确的合理的要求，又有机会主义的东西。一方面，拉萨尔认为，德国工人阶级应当摆脱对资产阶级政党的追随，建立独立的政党，并强调了争取普选权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他宣传改良主义论调，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的贫困是由“铁的工资规律”造成的。要废除这一规律，必须通过和平与合法的宣传争得普选权，获得议会多数，并由此取得国家帮助，建立生产合作社，使工人成为自己企业的主人。

此，拉萨尔在客观上有其不可抹杀的功绩。他的活动对于德国工人阶级在组织上摆脱资产阶级的影响，建立独立的政治组织，显然是有益的。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马克思指出：“在德国工人运动沉寂了十五年之后，拉萨尔又唤醒了这个运动，这是他的不朽的功绩。”^①

然而，拉萨尔有一种机会主义倾向。为了得到政府的帮助和实现普选，他从1863年起曾同普鲁士首相俾斯麦进行过多次通信和会谈，向其保证工人将支持普鲁士以王朝战争的方式统一德国，他甚至向俾斯麦透露全德工人联合会的组织状况和计划。拉萨尔的所有这些举动，引起组织内部越来越多的反对声音。生性高傲的他因此决定退出工人运动，移居国外。1864年8月，在瑞士疗养的拉萨尔与情敌决斗，死于日内瓦。此后，他的继任者贝克尔、施韦泽^②等继续推行他的机会主义路线，公开支持俾斯麦政府的政策。

德国工人运动史上的另一件大事是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成立。由于对拉萨尔主义不满，在全德工人联合会成立后的两星期，即1863年6月7日，来自柏林、纽伦堡和杜塞尔多夫等城市的工人在法兰克福成立了另一个全国性的工人组织——德国工人协会联合会。该联合会批评拉萨尔主义，首次打出了拉萨尔派反对派的旗帜。但当时这一新成立的联合会在组织上很松散，实权掌握在商业学校校长吕里希和印刷业资本家宗内曼等资产阶级自由派手中。

^① [德]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370页。

^② 伯恩哈特·贝克尔（1826—1882），德国政论家和历史学家，1864年—1865年任全德工人联合会主席。约翰·巴普提斯特·施韦泽（1833—1875），拉萨尔派的代表人物，1867年—1871年任全德工人联合会主席。

1869年5月，在原共产主义者同盟会员威廉·李卜克内西和德国工人协会联合会领导人倍倍尔^①的推动下，工人协会联合会理事会发出《致联合会和党的同志们》，提出建立社会民主党问题，并得到马格德堡全德工人联合会反对派领袖白拉克等人的支持。7月，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等在《民主周刊》上发表《告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决定召开德国社会民主党成立大会，号召各地派代表参加这一大会。

1869年8月7日—9日，全德工人代表大会在爱森纳赫召开，出席大会的有来自德国各地和瑞士、奥地利的260多名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了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称“爱森纳赫派”），并通过了基本上是马克思主义的纲领，号召“消灭阶级统治”和为废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斗争。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成立，无论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还是在德国社会主义工人运动史上，都具有重大意义。它是第一个按照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一国范围内组织起来的社会主义工人政党，也是德国工人运动发展到新阶段的重要标志。

1871年德意志帝国的建立，给德国社会主义工人运动在全国范围内的发展提供了便利条件。国家的统一极大地促进了德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工人阶级力量不断壮大。到1875年，德国已经有118家200至1000名工人的大型企业。然而，与此同时，工人的实际工资却由于经济危机而一度出现了下降的状况，1874年—1879年，德国工人的实际工资下降了17.5%。工人运动因此而趋于高涨。1871年11月，开姆尼茨机器制造工业的8000工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罢工。1872年夏，鲁尔河谷的16000名

^① 奥古斯特·倍倍尔（1840—1913），1864和1865年任德国工人协会联合会常委，1865年在李卜克内西的帮助下接受马克思主义，1867年担任德国工人协会联合会主席。

矿工为争取 8 小时工作日和提高工资，也举行了大罢工。同年，纽伦堡、莱比锡和柏林等地都发生了罢工运动。

不断高涨的工人运动迫切要求有一个统一而强有力的政治组织来领导，这将建立统一的德国社会主义工人政党的任务提上了日程。另有两大原因也加速了统一的德国工人政党的建立。一是俾斯麦政府的镇压政策。在德意志帝国第一届帝国议会上，议会中惟一的社会民主党议员倍倍尔曾发出了“对宫廷战争，对茅屋和平，消灭贫困和寄生现象”的号召。这一演说使德国统治阶级大为震惊，俾斯麦将这一演说当作他了解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实质的“光线”，遂采取镇压政策^①。从 1873 年夏天开始，德国国家检查官特森多尔夫对工人运动进行迫害，进入所谓“特森多尔夫时期”。仅 1874 年的头 7 个月，就有 87 名拉萨尔派成员被捕，爱森纳赫派的亨施、莫斯特等人也被判刑。当年 6 月，全德工人联合会被特森多尔夫查封，不久爱森纳赫派也遭到了同样的厄运^②。统治阶级的镇压政策迫切要求德国工人运动统一起来，共同对敌。二是德国工人运动朝着有利于爱森纳赫派的方向发展。爱森纳赫派曾多次向拉萨尔派提出联合的建议，但均遭后者拒绝。全德工人联合会书记特耳克甚至扬言，谈论合并者将以叛徒论处。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拥护国际工人协会并一直与俾斯麦政府的压迫政策进行顽强斗争的爱森纳赫派赢得了越来越多的工人的支持，加上有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等杰出活动家的影响，其威信日盛，力量日壮。到 1875 年 5 月前，社会民主工党成员已发展到 9 100 多人。与此相反，拉萨尔派由于推行机会主义路

^① [德] 梅林：《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第 4 卷，三联书店 1966 年，第 21 页。

^② [德] 梅林：《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第 4 卷，三联书店 1966 年，第 79—81 页。

线而越来越不得人心。1874年5月，全德工人联合会有2.1万名会员，到1875年5月，其人数锐减到1.5万名。为了摆脱困境，避免自己的组织垮台，特耳克一反常态，于1874年10月亲自来到莱比锡拜访李卜克内西，主动提出与爱森纳赫派合并的问题。

马克思和恩格斯原则上支持德国工人运动的统一，但告诫社会民主工党领导人不要拿原则做交易。然而李卜克内西等人为了达到“团结”的目的，仍然选择了在谈判中妥协的立场。1875年2月，两派在哥达举行合并代表大会的预备会议，为合并制定了纲领。纲领虽然克服了拉萨尔的宗派主义组织原则，却充满了拉萨尔主义的观点。该纲领于3月7日见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才知道这一既成事实。3月18日，恩格斯写信给倍倍尔，批判了纲领的原则性错误。5月5日，马克思将《对德国工人党纲领的几点意见》（《哥达纲领批判》）转交李卜克内西等人。但是，李卜克内西等没有接受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批评，他们怕因此而影响两派的合并。

1875年5月22日—27日，73名拉萨尔派代表和56名爱森纳赫派代表在哥达召开合并大会，正式成立了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大会选举了党的领导机关执行委员会（由三名拉萨尔派和二名爱森纳赫派组成），通过了含有拉萨尔机会主义思想的纲领。尽管如此，合并毕竟使德国工人阶级在一定程度上结束了分裂局面，壮大了工人运动的力量。合并后，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党员人数在一年内从2.4万人猛增到3.8万人，党办的各种报刊达23种。正因为如此，虽然俾斯麦政府实行镇压政策，工人阶级的力量反而日益强大。1874年的帝国议会选举中，社会民主党得到9个议席，到1877年，其议席又增加到12个，仅柏林一地

社会民主党就获得了选民票数的 40%^①。

工人运动的发展使作为容克资产阶级利益和意志体现者的德意志帝国政府非常恐惧。为了维护容克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俾斯麦政府在策略上对日益壮大的社会主义工人运动采取了所谓的“蜜糕加鞭子”政策。

俾斯麦首先举起的是鞭子。他决定采取更严厉的镇压措施来对付迅速发展的社会主义工人运动，而 1878 年发生的两次谋杀德皇事件正好给俾斯麦提供了强有力的口实。这年 5 月 11 日，洋铁匠帮工赫德尔在柏林菩提树下街刺杀皇帝未遂。6 月 2 日，一位名叫诺比林的知识分子再一次谋刺威廉一世并使之受重伤。俾斯麦遂抓住这两次事件大做文章，渲染“赤色危险”。早在 5 月 24 日，他就向议会提出了一项反对社会民主党的非常法草案，但被议会否决，因为议会中的资产阶级自由派担心因此而破坏法治国家的原则。于是，他利用第二次谋刺皇帝事件敦促联邦议会解散帝国议会，然后操纵新选出的保守派力量占优势的帝国议会于 10 月 19 日通过了由联邦议会提出的“反对社会民主党企图危害治安的法令”，即所谓“非常法”。该法令共 30 条，于 2 天后生效。

根据这一法令，凡社会民主主义者、社会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的活动，旨在推翻现存政府和社会秩序的各种组织，应一律禁止；违反这一禁令而参加被禁止的团体、继续出版和散布已被查封的出版物等，将处以巨额罚金或重刑；警察当局有权禁止违法者的逗留和撤销出版商、书商、租书人以及店主的营业执照；对社会民主党活动而使治安受到威胁的地区，各邦有权实行至

^① Deutscher Bundestag, *Fragen an die deutsche Geschichte: Ideen, Kräfte, Entscheidungen von 1800 bis zur Gegenwart. Die Parteienentwicklung von 1871—1990*; [德] 维纳·洛赫：《德国史》，三联书店 1959 年，第 250 页。

少一年的小戒严，在此期间，得到警察当局允许方可贩卖出版物或集会^①。为了获得帝国议会中民族自由党对“非常法”议案的支持，俾斯麦不得不作出一些让步，同意“非常法”的实施期限为两年半（1881年3月31日止）^②。此后，为了达到镇压社会民主党的目的，这一法令却一再延长，直到1890年。

“非常法”出台后，全国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之中。据统计，到1879年中期，政府共发出了627项禁令，有217个协会、5个互助会、127种定期刊物和278种不定期刊物被禁止。在“非常法”施行的12年间，共有1300多种社会主义刊物被禁止，332个工人组织被解散，900多人被放逐，还有1500多人被判处监禁和劳役。

由于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领导人对“非常法”缺乏思想准备，因而在突然来临的高压政策下立即陷入一片混乱之中。在“非常法”生效的当天，党的执行委员会和议会党团竟决定党自行解散，并要求地方党组织也作出相应决定。一些不坚定分子纷纷脱党。流亡于瑞士苏黎世的卡尔·赫希伯格、爱德华·伯恩斯坦和卡尔·奥古斯特·施拉姆等组成“苏黎世三人团”，于1879年用“三星花”之名在其创办的《社会科学与政治年鉴》上发表《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回顾》一文，认为“非常法”是党的“过火行为”的结果，要求党声明“走合法的改良道路”，鼓吹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与此同时，以约翰·莫斯特和威廉·哈赛尔曼为首的左倾无政府主义者则要求党采取个人恐怖策略，反对合法斗争，甚至策划组织新党。

就在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处于混乱危急的关键时刻，马克思

^① [德] 梅林：《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第4卷，三联书店1966年，第144页。

^② C. Grant Robertson, *Bismarck*, London 1947, p.360.

和恩格斯挺身而出，帮助倍倍尔、李卜克内西等认清形势，制定正确的路线和策略。1879年9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写了《给奥·倍倍尔、威·李卜克内西、威·白拉克等人的通告信》，谴责了“三人团”的投降主义路线。同时，他们还批判了莫斯特等人的左倾盲动，指出其策略只能使党脱离群众而陷于孤立。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帮助下，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等逐渐地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从“非常法”生效初期的慌乱中摆脱出来。1880年8月，社会主义工人在瑞士苏黎世州的维登宫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根据倍倍尔的建议，对《哥达纲领》作了修改，把其中“用一切合法手段争取自由国家”的提法改为“用一切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从而表明党将采取合法斗争和秘密斗争相结合的革命策略。代表大会还决定《社会民主党人报》为党的正式机关报。维登大会结束了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混乱和动摇时期，从而为其战胜“非常法”奠定了基础。

维登大会后，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将合法斗争和非法斗争有机地结合起来。一方面，他们用“教育俱乐部”、“互助储金会”等合法组织掩护活动，将《社会民主党人报》秘密运回国内散发，点燃群众的斗争火焰；另一方面，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等利用议会讲坛揭露俾斯麦的政策，扩大党的影响。由于以上活动，德国社会主义工人运动不仅没有被“非常法”压服，反而愈加壮大。工人罢工斗争达到空前的规模。1885年，柏林爆发1.2万建筑工人罢工。1889年5月，在党的领导下，鲁尔区9万矿工举行大规模罢工，卷入这次斗争的还有萨克森、萨尔和上西里西亚的矿工，参加人数达13.4万人。1890年，德国发生的罢工达200次^①。与此同时，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在议会斗争中也取得

^① [德] 赫伯特·瓦恩克：《德国工会运动简史》，三联书店1958年，第27—28页。

了巨大成就。1881年，由于“非常法”的冲击，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所获选票曾一度下降，只有31万多张，获得议席12个。1884年开始回升，得选票近55万张，获议席24个；1890年得选票近143万张，获议席35个。社会主义工人党因此而成了德意志帝国议会中的大党之一，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反对“非常法”斗争的历程以德国工人运动的“英雄时代”载入了史册。

俾斯麦也深知仅靠镇压手段不能摧毁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发展，因而从19世纪80年代初起又施以“蜜糕”，开始实行国家社会保障制度，试图以此来缓和工人阶级的不满情绪。然而，这一切并不能弥补他在镇压社会主义工人运动上的败绩。1890年，帝国议会以169票对98票否决了延长“非常法”的提案。同年9月30日，“非常法”被正式废除，社会主义工人党恢复了合法地位。10月12日—18日，为了适应新形势，建立新的组织，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在哈雷召开代表大会，并改名为德国社会民主党。1891年10月14日—20日的爱尔福特代表大会则制定出了新的党纲——“爱尔福特纲领”，论述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原理。

（五）量力而行——谋求欧洲大陆霸主地位的大陆政策

如果说在19世纪上半期拿破仑曾以其杰出的军事才能横行欧洲于一时，那么，19世纪下半期应该是俾斯麦以其纵横捭阖的外交手腕操纵欧洲的时代。从1862年出任普鲁士首相到1871年德意志帝国建立，他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就完成了德意志民族苦苦为之努力多年的民族统一大业，这一点已经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德意志帝国建立后，他在外交上又推行一套所谓的大陆政策，从保持欧洲和平中谋求德国在欧洲大陆的霸主地位，并使原来的欧洲僻壤柏林一跃成为国际政治注目的中心。推行大

陆政策的主要背景在于德国当时的工业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经济和军事实力尚无法与世界头号工业强国英国相抗衡，且整个欧洲的国际关系格局不容德国将争霸目光转向欧洲大陆以外的世界。

总的看来，大陆政策包括三个方面的主要内容：（1）孤立法国，防止其复仇。（2）建立以柏林为中心的德奥俄三皇同盟、德奥意三国同盟和德奥罗三国同盟体系。在这一体系中，一方面拉拢俄国，防止因法国和俄国的接近而使德国受到两面夹击的威胁，另一方面则支持奥匈帝国，以应付法俄两国可能的联合，并遏制俄国向欧洲中部和巴尔干地区的扩张。（3）在殖民地问题上持审慎的态度，一心一意谋求在欧洲大陆的霸权。其中，孤立法国是俾斯麦大陆政策的基点，是俾斯麦时代德国基本的外交路线。

大陆政策的基点在于德国的统一和德意志帝国的建立使欧洲国际关系格局发生根本性变化。原有的均势格局已经不再存在，德法矛盾成了欧洲国际关系的焦点。著名德国史学家欧肯曾经指出，德意志帝国从一开始就肩负着一种“抵押”，即“在将来，德国的每一个外交方面的敌人都可以无条件地指望法国的支持”^①。而这个抵押起因于1870年—1871年普法战争中德国对法国的掠夺。

1871年的法兰克福和约使法国丧失了阿尔萨斯—洛林和50亿法郎的赔款，这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民族感情上都是对法国人的一次无法忘怀的打击。特别是德国对阿尔萨斯—洛林的割占，埋下了未来法国和德国间纷争的种子。阿尔萨斯—洛林对法德两国而言都是重要的战略要地，当时，以毛奇为首的德国军方坚持

^① Charles Seymour, *The Diplomatic Background of the War 1870—1914*,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18, pp.14—15.

认为，占领麦茨和斯特拉斯堡等地可以使德军节省 10 万军队^①。因为德军在占领阿尔萨斯—洛林后，可以更容易更迅速地对巴黎构成威胁，从而使德国重新入侵的危险就像达摩克利斯之剑一样悬于法国人的头上。这自然是法国人所难以容忍的。因此，当时恩格斯就曾预言：“兼并的结果，法兰克福和约对法国来说只不过是暂时的休战”，“法国将力图而且必然重新得到”阿尔萨斯—洛林^②。

俾斯麦也深知法国不会善罢甘休，故而在对法战争结束后不久，他便肯定地回答了总参谋部关于法国是否会复仇的疑问^③。当时要遏制法国的复仇愿望，有三条道路摆在俾斯麦面前：一是要求法国人宽容并忘记国土的丢失。这显然是不切实际的。二是彻底击溃法国，使之不能东山再起。三是把一切可能成为法国盟友的国家联合在德国的周围，孤立法国。只要法国孤立无援，它仅凭自己的力量显然复仇无望。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使俾斯麦政府选择了第三条道路。

从国内看，年轻的德意志帝国需要一种和平的国际环境，以便有充裕的时间和精力来消除帝国内部的分离主义因素，巩固统一的成果。因此，俾斯麦在与法国签订和约后就立即宣布，新建

^① 从一开始俾斯麦就认识到，占领阿尔萨斯—洛林是一个错误，但他没有阻止军方的要求。参见 Count Julius Andrassy, *Bismarck, Andrassy and Their Successors*, Boston and New York 1927, pp. 12—13; 另一位德国史专家古奇也在其著述中称，俾斯麦不赞成吞并阿尔萨斯—洛林。他引用俾斯麦的话说：“我不想太多的法国人在我的屋里。”参见 G.P. Gooch, *Germany*, New York 1927, p. 31.

^② [德]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2 卷，人民出版社 1965 年，第 510 页。

^③ [德] 奥托·冯·俾斯麦：《思考与回忆》，第 3 卷，东方出版社 1985 年，第 231 页。

立的德意志帝国已经“满足”，它以后努力的目标只是要维持现状^①。从国际上看，客观形势不允许德国进一步打击法国。一贯在欧洲大陆奉行均势政策的英国不会接受德国继续削弱法国的举动，俄国则更不愿冒单独面对强大的邻国的风险，因而希望法国维持较强的力量。既然国际社会不允许进一步打击法国，俾斯麦政府就选择了拉拢可能成为法国盟友的国家，孤立法国，使之不能复仇的外交政策来作为基本的外交路线。这一政策被一些史学家称为“保守性的和平政策”或“保障和平的政策”^②。俾斯麦自己的话则是：“如果法国不愿和我们保持和平，我们就必须阻止她找到盟友。只要没有盟友，法国就对我们构不成威胁。”^③

由于俄、英、奥三国在近东巴尔干地区一直矛盾重重，当时的国际形势有利于俾斯麦推行上述外交路线。众所周知，向巴尔干扩张是自彼得大帝以来俄国历代沙皇一贯的对外政策，这一政策与当时已经被排挤出了德意志而转向巴尔干地区寻求补偿的奥匈帝国发生冲突。同时，俄国势力南下巴尔干，进入地中海，威胁到英国通往印度的生命线，故而也为英国所不容。鉴于以上矛盾，上述三国都想保持与德国的友好关系，以便争取其支持，这就为俾斯麦贯彻自己的外交意图提供了良机。

俾斯麦着手孤立法国的第一个步骤，是建立以德奥俄三皇同盟为基础的大陆同盟体系。他之所以将奥匈帝国和俄国作为他的首要拉拢对象，是出于以下考虑：第一，他认为，德、奥、俄三国因瓜分波兰而在波兰问题上有共同语言，而且三国都是不同于西方议会制的君主国家，容易找到联合的政治基础。第二，在当

① Lothar Gall, *Bismarck. Der weiße Revolutionär*, S.503.

② Erich Eyck, *Bismarck and the German Empire*, p.222; Robert-Hermann Tenbrock, *Geschichte Deutschlands*, S.210.

③ Emil Ludwig, *Bismarck*, Boston 1928, p.507.

时的欧洲五强中，鉴于英国奉行孤立政策，只要德、奥、俄三国团结一致，法国就不会妄动。而奥地利对外政策的转变正好为俾斯麦的这一联盟计划提供了机会。

奥地利在1866年失败之后，起初还想寻机恢复在德意志的霸主地位，但是，1870年普法战争的结果迫使它完全放弃了重返德意志的希望。当时满怀复仇希望的奥匈外交大臣博伊斯特男爵承认：“1866年和1870年的事件有如火山喷发。碎片落到了地上，如果希望将它们重新放回原来的位置，就不免愚蠢了。”^①奥地利遂将对外政策的目标转向东方，力图在巴尔干地区得到补偿。然而，奥匈在巴尔干遇到了比自己更强的对手俄国。由于法国新败不可依恃，英国虽支持奥匈的反俄政策，却不愿承担义务，奥地利只得转而争取德国的支持。接替博伊斯特的新任奥匈外交大臣安德拉西一上台便向德国大使表示，与德国密切合作将是她整个对外政策的基础^②。日后，他刻意讨取俾斯麦的欢心，以达到联德目的。

俾斯麦对奥地利寻求德国的友谊很高兴，但他不愿因奥地利之故而开罪俄国，而是希望德、奥、俄三国在君主制原则上团结起来，孤立共和制的法国。安德拉西虽不愿与俄国为伍，但仍决定迎合俾斯麦的意愿，暂与俄国言好，静观其变。“既然将俾斯麦从俄国那里拉开是不可能的，奥匈最好的政策就是参加这一联盟。”^③

① William Harbutt Dawson, *The German Empire 1867—1914, and the Unity Movement*, Vol. 2, New York 1919, p. 81.

② Nicholas Der Bagdasarian, *The Austro-German Rapprochement 1870—1879: From the Battle of Sedan to the Dual Alliance*, London 1976, p. 108.

③ Erich Eyck, *Bismarck and the German Empire*, p. 193.

这时的俄国也需要德国的支持。普鲁士之所以能顺利地完成了统一德国的大业，重要原因之一是争取了俄国的善意中立。然而，统一后的德国成了欧洲大陆首屈一指的经济和军事强国，俄国不得不在许多方面看德国的眼色行事。再者，19世纪70年代初，俄国正在中亚与英国争夺^①，法国新败待复，德奥两国的接近就使得俄国在欧洲有孤立之虞。因此，俄国也想保持与德国的友好关系。

1872年，奥皇弗兰茨·约瑟夫准备访问柏林，以便加强奥德之间的友好关系。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在得知这一消息后，决定通过介入德奥接触来改变可能导致俄国孤立的局面。这位沙皇向德国大使表示，“如果他最好的朋友与第三者相会，而他在其他两人交往时却必须留于其门外”，这对他来说是不怎么令人愉快的^②。其意不言而喻。结果，在1872年9月，德、奥、俄三国皇帝聚会柏林。俾斯麦将三皇聚会看成是君主制国家对共和制法国的一种示威性亲善。他在与英国大使罗塞尔的谈话中意味深长地说：“有史以来三位皇帝第一次为了和平而坐在一起吃午饭。我愿意他们如同加诺瓦（意大利雕刻家）所塑的一个美女一样组成亲爱的团体。我愿意他们沉默地站在那里任人欣赏。我决定不使他们多讲话。不管这件事如何困难我是做到了。”^③此后，俾斯麦继续加强三皇之间的关系。1873年5月，俄国陆军元帅贝尔格建议德俄签订一项旨在保障俄国西部边界安全的军事协定，

① [苏]赫沃斯托夫：《外交史》，第2卷（上），三联书店1979年，第77—78页。

② Walter Bußmann, *Das Zeitalter Bismarcks*, Frankfurt am Main 1968, S.130.

③ [苏]弗·鲍爵姆金主编：《世界外交史》，第3分册，五十年代出版社，第13页。

以便集中精力与英国在中亚争夺。俾斯麦却坚持要奥地利参加，否则“协定不会有效”^①。这一条件迫使俄国只得与奥匈修好。1873年6月，奥俄两国皇帝签订兴布隆协定，规定遇有第三国侵略危险时，两国互相协商，“议定所应采取的共同的行动方针”^②。10月，德皇在访问维也纳时也加入了该协定。三皇同盟至此形成。

1873年订立的三皇同盟虽然性质含糊，但俾斯麦的目的已经达到，因为“只要奥俄两国重视三皇同盟，就不存在在奥地利或俄国向共和制的法国提供援助的危险，而提供这类援助正是俾斯麦的主要忧虑”^③。

三皇同盟形成以后，俾斯麦为彻底孤立法国，继而拉拢意大利。意大利自统一以来，一直与罗马教廷关系不和。与此同时，法国政府却仍处于天主教会影响之下，与罗马教廷关系密切，意法两国因此而难以交好。而19世纪70年代初德国政府开展的反天主教会的文化斗争却使它与意大利有了共同语言。意大利报界在分析当时意、法、德三国间的关系时指出：“我们的主要敌人是教皇统治，而和教皇在一起的是法国，也即德国的死敌。”^④正是在这种背景下，1872年2月，德国的弗里德里希·查理大公前往罗马拜访了意王维克多·厄曼纽尔。同年5月，意王访问了柏林和维也纳。结果，在三国同盟的基础上又形成了四国协议。

① [苏] 赫沃斯托夫：《外交史》，第2卷（上），三联书店1979年，第45页。

② 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上册第1分册，武汉大学出版社1982年，第141页。

③ [英] 艾伦·帕麦尔：《俾斯麦传》，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203—204页。

④ Charles Seymour, *The Diplomatic Background of the War 1870—1914*, p.33.

1874年1月，俾斯麦在给德国驻法大使的信中要求转告法国：如果意大利受到法国的攻击，不论是否影响到德国的利益，也不论是否有正当的理由，德国都将立即援助意大利^①。

四国协议后，法国在欧洲大陆已经处于一种完全孤立的状态。最初的迹象表明，俾斯麦以孤立法国为基点的外交政策是顺利的。然而，就在俾斯麦洋洋自得之际，1875年德法战争危机给这位外交上一直一帆风顺的老手灌了一口失败的苦酒。

1875年德法战争危机起因于法国重整军备。法国虽然在1870年战败，但它决不会甘于永远被压制的状态。从1872年起，法国开始实行义务兵役制，并迅速恢复陆军。1873年，在德国占领军撤出法国的同时，主张复仇的保皇党在法国选举中获胜，麦克马洪出任总统。8月，法国南锡城主教发表《牧师教令》，号召教徒们为阿尔萨斯—洛林回归法国而祈祷。1875年初，法国计划在德国购买1万匹军马。同年3月，法国议会通过扩军法案，每个团由3个营增加到4个营。这一年，法国武装力量达46.1万人，军费开支为4.85亿法郎，两项指标均高于德国方面相应的数据^②。

法国的迅速重整军备和复仇呼声，引起德国军政各界的不安。俾斯麦也决定采取相应的对策来遏制法国日益增加的威胁。但是他反对一场“目的仅仅在于不让法国得到喘息和恢复元气的战争”，因为这“很可能使俄国、奥地利和英国在不信任和必要时积极反对年轻的、尚未得到巩固的帝国上意见一致起来”。所

① William Harbutt Dawson, *The German Empire 1867—1914, and the Unity Movement*, Vol. 2, p. 90.

② William Harbutt Dawson, *The German Empire 1867—1914, and the Unity Movement*, Vol. 2, p. 136.

以，这位宰相选择了“施加政治压力”来“制止法国重整军备”的方式^①。首先，在外交领域，外交官拉多维茨率领一个使团于1875年2月前往彼得堡，希望俄国不要声援法国。接着，德国的新闻媒体也开始制造舆论。《科隆日报》于4月5日发表文章，称“法军的重新组织”是“为了发动战争”。4月9日，柏林《邮报》又刊载《战争在望？》文章，认为德法“战争就在眼前”^②。两文一出，欧洲为之震惊，国际局势骤然紧张。

其实，俾斯麦组织的有关外交活动和德国新闻界的动向，都只是对法国的一种恫吓。因为俾斯麦知道俄、英等国不会允许德国再次打击法国而破坏欧洲均势，而且德国若真要打击法国，也无须大声喧嚣，给对手以外交和军事准备。因此，德国的威胁纯粹是策略上的需要。柏林《邮报》的《战争在望？》文章发表后3天，俾斯麦就已经向帝国议员巴尔豪森谈了他的看法：“当偶然有一束光亮投向一种混乱的形势时，是非常有用的。但战争是完全不可能的。”^③德军总参谋长毛奇在与英国大使罗塞尔的谈话中也表示，只要“列强都站到德国一边，并向法国表明其复仇的梦想是多么徒劳，则战争可以，也许能永远避免”^④。有关研究表明，1875年的战争危机实际上是一次“虚假的危机”，因为俾斯麦“没有时间认真考虑过要挑起一场对法国的战争，直到战争

① [德] 奥托·冯·俾斯麦：《思考与回忆》，第3卷，东方出版社1985年，第136页；Walter Bußmann, *Das Zeitalter Bismarcks*, S.131.

② Erich Eyck, *Bismarck and the German Empire*, p.216; Nicholas Der Bagdasarian, *The Austro-German Rapprochement 1870—1879: From the Battle of Sedan to the Dual Alliance*, p.165.

③ Nicholas Der Bagdasarian, *The Austro-German Rapprochement 1870—1879: From the Battle of Sedan to the Dual Alliance*, p.165.

④ Erich Eyck, *Bismarck and the German Empire*, p.218.

危机阶段也没有想过”^①。

然而，俾斯麦这次遇到了法国外长德卡兹这位强有力的对手。这位法国外长采用到处散布德国准备发动战争的消息的办法，来促使英、俄等国出面干预，达到保护法国，使德国处于被动的目的。当法国驻柏林大使刚多·比朗将拉多维茨在英国大使罗塞尔晚宴上的预防性战争的谈话报告巴黎后，德卡兹立即将消息告知了英国《泰晤士报》，并将报告副本送给列强宫廷。俄英两国深恐欧洲均势再遭破坏，赶忙出面干预。沙皇偕宰相哥尔查科夫在5月去柏林作例行拜会时，明确表示难以容忍德国再次打击法国。英国也支持俄国的态度。俾斯麦“本来并没有考虑侵略行动，因而对这种外来干涉反应非常强烈”^②，他矢口否认有对法国动武的计划。其实，“德卡兹已得知直接的战争危险并不存在，也未因拉多维茨的言语失检而惊慌失措”^③。他只是要利用俾斯麦的恫吓，使德国在国际上处于被动地位。俾斯麦首次遇到了重大的外交挫折。

就事件的结果看，法国在外交上取得了一定的胜利，但从整个欧洲国际关系的格局来看，俾斯麦德国并没有受到什么损失。英国著名史学家泰勒曾对1875年战争危机的结果作了这样颇有见地的分析：“如果这次危机使法国有了某种针对德国攻击的保

① [德] 卡尔·艾利希·博恩：《德意志史：从法国革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上册，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351页；Theodor Schieder, *Handbuch der Europäischen Geschichte*, Band 6, S.63. 详细内容参见邢来顺、高志平：《1875年德法战争危机真实性考察》，载《湖北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2期。

② [美] 巴巴拉·杰拉维奇：《俄国外交政策的一世纪》，商务印书馆1978年，第19页。

③ [英] 艾伦·帕麦尔：《俾斯麦传》，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214页。

障的话，那么也同样给了俾斯麦一种保障，即为一场复仇战争而言，法国将找不到盟友。俄国人和英国人既不想使德国也不想使法国在西欧称霸；他需要一种力量的均衡，而俾斯麦准备给他们这种均衡。”^①根据泰勒的看法，只要俾斯麦以孤立法国为基点的保守性的和平政策不变，他的对外政策与英俄维持均势的目标就无根本性冲突，德国也就不会受到英俄与法国结盟的威胁。

就在俾斯麦被德法战争危机弄得焦头烂额的时候，东方问题的重新出现使他摆脱了尴尬的窘境。

1875年7月，巴尔干地区的黑塞哥维纳爆发反土耳其统治的起义。这一事件立即引起欧洲列强的关注。俄国欲借此机会向巴尔干扩张，对起义者采取积极支持的政策。这对境内有上百万斯拉夫人且伺机向巴尔干扩张的奥匈帝国而言显然是不能接受的，因此奥匈立即表示反对斯拉夫人的解放运动和俄国南下巴尔干。英国也反对俄国势力南下威胁其通往印度的生命线。这时德国虽然在巴尔干地区尚无直接利益，但近东危机对俾斯麦而言也是福祸相依。一方面，列强在巴尔干的争夺为德国分化列强提供了有利机会，有助于减少它们联合起来反对德国的可能性；另一方面，由于俄、英、奥三国都希望得到德国的支持，德国的任何不慎举动都可能招致其中一方投入法国的怀抱去寻求支持。

俾斯麦当然不希望他建立起来的三皇同盟因奥俄两国的不和而发生动摇。因此，他在1875年11月与英国大使罗塞尔的谈话中表示，德国对土耳其的欧洲部分没兴趣，他所关心的是奥地利和俄国不要因为争夺土耳其这个病夫的遗产而发生冲突。他必须严格充当和事佬，不偏袒任何一方，以免在三皇同盟中出现两方

^① A. J. P. Taylor, *The Struggle for Mastery of Europe 1048—1918*, Oxford 1977, p. 227.

对付一方的局面^①。然而，在实际的外交过程中，俾斯麦却在和事佬的幌子下作出了种种有利于奥地利的表示。

1876年9月，俄国政府向德国方面提出了一旦俄奥开战，德国能否中立的问题，俾斯麦在无法推脱之下，于10月作了如下回答：德国既不允许俄国的武器因欧洲联合而失灵，也不能容忍奥匈作为欧洲均势因素受到削弱或消失。由于奥匈力量弱于俄国，这一貌似公允的回答实际上是“德国不支持俄国反对奥匈帝国，也不允许俄国击溃奥匈帝国”^②。

俾斯麦政府在俄奥对抗中的这种态度主要出于以下考虑：第一，1875年德法战争危机中俄奥两国的不同态度给俾斯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时俄国方面明确向俾斯麦表示不能容忍德国再次打击法国，而奥匈方面却刻意回避得罪俾斯麦。安德拉西在谈到不参加联合干预行动的原因时指出：“（对奥地利）惟一的危险是俾斯麦与俄国的结盟……如果我们将捍卫来自德国威胁和平的荣誉留给沙皇，那就没有什么东西能更好地阻止这种可能性了。”^③而俾斯麦是一个恩怨分明的人：“对于朋友我是更好的朋友，对于敌人我是更坏的敌人。”^④故而他在奥俄两国的对抗中作出了有利于奥方的表示。第二，德国公众舆论站在奥地利一边。德国金融界将奥地利占领巴尔干视为保证德国在那里投资的前提条件。中央党则认为，天主教大国奥地利卷入巴尔干地区关系到

① [英] 艾伦·帕麦尔：《俾斯麦传》，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219页。

② [苏] 赫沃斯托夫：《外交史》，第2卷（上），三联书店1979年，第126页。

③ Nicholas Der Bagdasarian, *The Austro-German Rapprochement 1870—1879: From the Battle of Sedan to the Dual Alliance*, p. 173.

④ Heinz Walter, *Bismarcks Außenpolitik 1871—1881*, Berlin 1983, S. 284.

“在东方的德意志文化”。民族自由党领袖本尼格森也宣称，德国必须保证巴尔干问题的解决不损害奥地利的利益。当时俄国驻柏林大使感叹：在柏林“没有任何人”怀有真正的对斯拉夫人的同情^①。第三，国际政治格局要求德国维持奥地利的地位。这位德国宰相在与其心腹霍亨劳厄的私下谈话中指出：“如果奥地利垮了，俄国对我们就过于危险。与奥地利在一起我们可以保持与俄国对弈。”^②

德国的态度迫使俄国与奥匈妥协。俄奥双方于1877年1月签订了《布达佩斯协定》。据此，奥匈在俄土战争中保持中立，俄国同意它占领波黑地区。但是俄国在打败土耳其后签订的《圣斯特凡诺和约》中建立大保加利亚的条款又引起与英奥的冲突。最后，各方不得不于1878年6月—7月在柏林召开国际会议来解决分歧。在会上，东道主俾斯麦自喻为“诚实的掮客”（Ehrlicher Makler），居中调停。一方面，他支持俄国对黑海海滨领土的要求；另一方面，他又支持奥匈驻军于波黑地区。然而，在英奥联合的形势下，德国的中立态度显然不利于俄国。最后，俄国被迫吐出了一些到口的胜利果实。

俄国恼怒于德国在近东危机中的不合作态度，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甚至指责柏林会议是“俾斯麦侯爵领导下的欧洲反俄联盟”^③。于是，俄国开始在外交、军事等领域给德国施加压力。俄国驻君士坦丁堡代表与法国代表“显示了引人注目的亲热”，俄国的《呼声报》甚至明确提出要“通过使法国摆脱孤立来获得

① Heinz Walter, *Bismarcks Außenpolitik 1871—1881*, S.208.

② Heinz Walter, *Bismarcks Außenpolitik 1871—1881*, S.211.

③ Gordon A. Craig, *Deutsche Geschichte 1866—1945*, München 1980, S.111.

它的感激”^①。俄国陆军大臣米留丁则大力扩军，并集重兵于俄德边境。

面对俄国的压力，俾斯麦政府采取针锋相对的政策。一方面，德国军方从1878年开始制定针对俄法的两线作战计划^②，以防不测；另一方面，俾斯麦开始从外交上“寻求其他的外交保障”，筹划德奥同盟，以防备法俄联合可能带来的威胁。早在1876年10月俄国因近东问题向德国施加压力时，俾斯麦就已在与奥地利外交官慕尼黑男爵的谈话中提到了德奥间建立“有机联盟”的可能性^③。1879年4月，面对德俄关系的进一步恶化，俾斯麦在给驻俄大使施韦尼茨的信中进一步明确了关于德奥同盟的看法：鉴于德国已不能像从前一样依赖俄国，故应和奥地利发展“更亲密的关系”，即“一种有机的、没有两国政府的协议不能解除的关系”^④。

1879年8月，安德拉西即将离任的消息促成了德奥同盟的建立。俾斯麦担心这位对德友好的奥匈外交大臣辞职后会导致奥匈对外政策的转变，遂赶忙建议与之会晤，并于8月27日—28日在加施泰因进行了会谈。安德拉西当然欢迎与德国结盟，但他反对缔结可能将奥地利拖入对法战争的广泛的防御同盟，而只同意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保持一个秘密的反俄防御同盟。1879年9月21日，俾斯麦到达维也纳。3天以后，德奥签订了针对俄国的联合备忘录。10月5日，反对这一条约的威廉一世在俾斯麦

① Heinz Walter, *Bismarcks Außenpolitik 1871—1881*, S.238, 284.

② Andreas Hillgruber, *Bismarcks Außenpolitik*, S.154.

③ Nicholas Der Bagdasarian, *The Austro-German Rapprochement 1870—1879: From the Battle of Sedan to the Dual Alliance*, p.200.

④ W.N.Medicott & Dorothy K.Coveney, *Bismarck and Europe*, New York 1972, pp.113—114.

内阁总辞职的威胁下，终于批准签订军事协定。10月7日，德奥同盟条约在维也纳由安德拉西和德国大使罗伊斯签字。根据这一条约，两缔约国之一受到俄国的进攻，另一方有义务全力援助；缔约国一方受到俄国以外的国家进攻时，另一方应善意中立；但如果进攻国得到俄国的支持，另一方应站在盟国一边作战，并不得单独媾和。双方对本条约保守秘密，须经协议才能通知第三国^①。

虽然建立了德奥同盟，但俾斯麦“不会作出彻底的和永久性的反对俄国的抉择”^②。相反，他想通过施加外交压力的“曲线”政策来迫使俄国重返三皇同盟。于是，在缔结德奥同盟的同时，他又授意驻英大使明斯特与英国谈判，试探英国在德俄冲突中将采取的态度。鉴于俄国在巴尔干问题上处于孤立状态以及俄英在黑海海峡问题上的紧张关系，俄国显然迫切需要改善对德关系，以便保证西部边界的安全。而德奥同盟和德英会谈的传言等更使俄国感到不安。不出俾斯麦所料，俄国政府被迫作出妥协，派沙布罗夫前往柏林，提出了缔结针对奥匈的双边协定的主张。对此，俾斯麦的答复是：“没有人愿当少数派。……只要这个世界上还为不稳定的五强均势所操纵，就要努力成为三成员中的一位。”^③他因此明确告诉俄国特使：“重建三皇同盟，在我看来是惟一保障欧洲和平的最大稳定体系。”

迫于无奈，俄国只得与奥匈和好。1881年6月，新三皇同

① 参见《国际条约集》(1872—1916)，世界知识出版社1986年，第58—59页。

② Heinz Walter, *Bismarcks Außenpolitik 1871—1881*, S.303.

③ Nicholas Der Bagdasarian, *The Austro-German Rapprochement 1870—1879: From the Battle of Sedan to the Dual Alliance*, p.302; Gordon A. Craig, *Deutsche Geschichte 1866—1945*, S.112.

盟条约在柏林缔结。与原先协议性的三皇同盟不同，新三皇同盟通过具体的条约义务将俄国拴得更紧。根据条约，一旦发生法德战争，俄国保持中立；在英俄战争中则德国保持中立。条约还保证了俄奥两国在巴尔干的势力范围。新三皇同盟事实上是迫使俄国让德国牵着鼻子走的一种手段，“在‘三皇同盟’的束缚下，俄国实际上同意背弃法国而迁就德国的策略，借以换取德国的诺言，即不帮助英国反对俄国”^①。

俄国重返三皇同盟后，俾斯麦继续巩固和扩大他的大陆同盟体系。

将敌手的利益从周围引开，是俾斯麦多年来的一贯做法^②。在1878年的柏林会议上，俾斯麦为转移法国对德国的注意力，曾鼓励法国向海外扩张，支持其占领突尼斯。同时，他又私下建议意大利去占领突尼斯，企图挑起法意冲突，自己火中取栗。1881年，法国抢先占领突尼斯。在争夺中败北的意大利自知力量不足，为了与法国对抗，便主动提出了加入德奥同盟的要求。1882年5月，出于在战略上孤立和包围法国的需要，俾斯麦拖着奥匈一道与意大利在维也纳签订了三国同盟条约。条约的主要内容是：意大利没有直接挑衅而遭到法国攻击，德奥以全部军队援助意大利；俄奥发生冲突，意大利保持中立；当德国未直接挑衅而遭到法国侵略或德奥未直接挑衅而遭到法俄攻击时，意大利才参加战争^③。虽然意大利承担的义务很轻，但在法国发动对德

① 亨利·赫坦巴哈等：《俄罗斯帝国主义》，三联书店1978年，第403页。

② Hans-Ulrich Welher, *Das Deutsche Kaiserreich 1871—1918*, Göttingen 1973, S.182.

③ 《国际条约集》(1872—1916)，世界知识出版社1986年，第67—68页。

国的战争时，意大利可以威胁其后方。这正是俾斯麦所需要的，按照他的话说，“只要在阿尔卑斯山岗上出现一个打着三色旗的意大利鼓手就行了”^①。

此后，俾斯麦又怂恿奥地利同罗马尼亚接近。在1878年柏林会议上，俄国抢走了罗马尼亚的南比萨拉比亚，同时其势力又通过保加利亚伸入巴尔干地区。这些使罗马尼亚既怨恨又害怕，它转而寻求德奥两国的保护。为了抵制俄国向欧洲中部的南部扩张，德奥也愿意接纳这一小伙伴。1883年10月30日，罗奥两国订立同盟条约。同日，德国加入此约。1888年5月，意大利加入该约。根据条约，罗马尼亚未有挑衅行为而遭攻击，德奥须及时援助；如果奥匈与罗马尼亚毗连地区在同样情况下遭到进攻，罗马尼亚须立即履行盟约^②。

至此，俾斯麦建立起了以德国为中心的德奥俄、德奥意、德奥罗三个庞大的联盟体系。这一体系包含着孤立法国和防备法俄联盟两个方面：一方面，只要这一体系不动摇，法国在欧洲大陆将永远陷于孤立，复仇无望；另一方面，一旦法俄联合，这一体系将变为反对法俄的同盟集团。俾斯麦苦心经营的这一复杂联盟体系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主导了欧洲国际关系，成功地孤立了法国，使德国左右着欧洲大陆的政治格局，为统一后的德国的发展提供了稳定的国际环境。但这一联盟体系内部从一开始就存在着错综复杂的矛盾，特别是俄奥两国在巴尔干的对抗。因此，这一联盟体系不可能长期地稳固下去。

俾斯麦外交政策的重心一直置于欧洲大陆，对于殖民扩张问

^① [英] 艾伦·帕麦尔：《俾斯麦传》，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247页。

^② 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上册第1分册，武汉大学出版社1982年，第173—174页。

题总是很谨慎。他认为，德国地处中欧，强邻环列，尤其宿敌法国随时会复仇，因此德国须将主要精力集中于欧洲大陆。而且他担心抢夺海外殖民地会导致与殖民强国英国的冲突，使英法联合对付德国。因此，他曾宣称：“只要我是宰相，我们就不会实行任何殖民政策。”^①然而，到19世纪80年代中期，由于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他竟一反往常，短时间内在殖民扩张方面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绩”。

当时的国际形势有利于德国的殖民扩张。第一，俾斯麦已经建立起庞大的联盟体系，德国在欧洲大陆的地位暂时有了保障。它不用担心法国的复仇，可以放手向外扩张。第二，此时法国政府对外政策的重心在殖民扩张上，法德关系趋向缓和，从而使德国暂时可以将目光从莱茵河边转向海外。第三，英国的国际困境是德国获得殖民地的重要原因。德国要夺取之地皆英国欲攫取之地，没有世界第一号海上和殖民强国英国的应允，德国难以在争夺殖民地中立足。当时正值英法因争夺埃及在殖民地问题上发生冲突，并引发了海军竞赛。英俄间则在阿富汗问题上剑拔弩张^②。在与法俄两国反目的形势下，英国自然不能再得罪欧洲大陆头号强国德国，故而在殖民地问题上向德国让步。当时英国首相格拉斯顿和外交大臣格伦维尔都表示，由于“德国已在欧洲外交中执着牛耳”，他们“特怕俾斯麦”。1885年接替格拉斯顿上台的索尔斯伯里说得更露骨：“为了取得德国在埃及和亚洲的支持，英国必须在桑给巴尔和加罗林群岛等地与德国合作。”^③

^① Andreas Hillgruber, *Bismarcks Außenpolitik*, S.167.

^② Richard Shannon, *The Crisis of Imperialism 1865—1915*, London 1986, p.169.

^③ Marvin Swartz, *The Politics of British Foreign Policy in the Era of Disraeli and Gladstone*, London 1985, pp.152—153.

俾斯麦创立德国殖民帝国也有现实的国内动因。第一，德国统一后工业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对国外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的需求增强。据统计，1878年，德国与萨摩亚、汤加群岛的贸易逆差达103万马克；1879年—1883年，德国向非洲出口由27.92万马克增至42.28万马克，而同期通过汉堡进口的非洲货物从519.65万马克增至910.52万马克^①。第二，推行殖民扩张是俾斯麦政府在国内争取政治主动的一个筹码。19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德国出现了许多以促进殖民扩张为目的的组织。1878年10月，商业地理及促进德国海外利益中央协会成立。1881年夏，西德意志殖民及出口协会在布伊克、克虏伯等人的支持下成立。1882年，民族自由党政治家约翰·米克尔等又策划建立了德意志殖民联合会。在这种形势下，推行殖民政策成了俾斯麦捞取政治资本的重要途径。这位圆滑的政治老手曾在私下谈话中表示：“所有殖民事务都是骗局，但我们需要它帮助选举。”^②

在国际国内各种因素的驱动下，德国政府开始进军海外。1882年11月，不莱梅商人吕德里茨在西南非洲的安格腊—佩昆纳湾向当地土著头领约瑟夫·弗里德里克斯买下第一块土地，并申请德国政府予以保护。1884年4月24日，俾斯麦电告德国驻南非领事，令其转告英国开普殖民政府，吕德里茨所占之地已被置于德国保护之下。德国殖民帝国因之诞生。接着，德国将殖民扩张目标转向西非。1884年7月，德国驻突尼斯总领事、著名探险家纳赫蒂加尔先后宣布将多哥、喀麦隆置于德国保护之下。随后，德国将矛头指向东非。1884年9月—11月，萨克森的一

^① Mary Evelyn Townsend, *The Rise and Fall of Germany's Colonial Empire 1884—1918*, New York 1930, pp. 47—49.

^② John Wroughton, *Documents and Debates: Nineteenth Century Europe*, London 1983, p. 96.

位牧师之子卡尔·彼得斯以小玩具和烈性酒为诱饵，诱使当地土著首领接受保护。1885年2月27日，德国政府向彼得斯颁发特许证，认可其在东非攫取的权利，德属东非殖民地诞生。德国在非洲进行殖民扩张的同时，在南太平洋的殖民活动也迅速展开。1884年8月，俾斯麦派帝国专员冯·奥尔岑前往新几内亚北部，以德皇名义宣布对这一带岛屿的所有权。1885年5月的英德协议中，德国又取得了新几内亚北部沿岸地区、所罗门群岛的部分岛屿以及新不列颠岛、约克公爵岛（即俾斯麦群岛）等的宗主主权^①。

在1884年4月至1885年5月的短短一年中，西南非、西非、东非以及南太平洋的许多岛屿上都升起了德意志帝国的大旗。一贯反对殖民扩张的俾斯麦的腔调也变了，他以开导性的口气指出：“殖民地将意味着为德国工业和商业扩张赢得新市场，为德国人的活动、文化和资本赢得新场所。”“试想一下，如果我们需要进口的棉花、咖啡产于德国的海外领地，那会意味着什么呢？那不就带来国民财富的增加吗？”^②

然而，正当德国人为新创立的殖民帝国兴奋不已之际，欧洲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法国茹尔·费里内阁因谅山战役中败给中国而于1885年3月倒台，法国国内对德复仇呼声再次高涨。同年9月，东鲁米利亚爆发反土耳其起义，东方问题又一次提上日程。列强间出现一系列外交冲突。以上形势的变化迫使俾斯麦政府急忙将注意力从海外转向欧洲大陆，以防不测。事后俾斯麦在

^① 有关这一时期德国殖民扩张的详细情况，参见邢来顺：《论德国殖民帝国的创立》，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3期。

^② Mary Evelyn Townsend, *The Rise and Fall of Germany's Colonial Empire 1884—1918*, p. 120.

会见非洲问题专家、殖民扩张鼓动者欧根·沃尔夫时指出：“您的非洲地图的确很美，可是我的非洲地图在欧洲。这里是俄国，这里是法国，而我们在中间，这就是我的非洲地图。”^①由此可见，虽然俾斯麦创立了德国殖民帝国，但在他的眼中，殖民问题同欧洲问题相比，始终只是“枝末问题”^②。

① Gordon A. Craig, *Deutsche Geschichte 1866—1945*, S.114.

② Andreas Hillgruber, *Bismarcks Außenpolitik*, S.174.

三 第二次工业革命与德意志帝国成为工业先锋国家

19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由于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继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又出现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浪潮。通过第二次工业革命，资本主义国家中原有的力量格局进一步被打破，英法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实力相对地继续下滑，美国、德国、日本等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力量则迅速增强，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规律愈加明显。其中，德意志帝国工业实力和综合国力的增长尤其引人注目。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德国通过传统产业的新技术改造以及建立新兴的化学和电气工业，确立起在工业资本主义世界的领先地位。

（一）新的机遇——第二次工业革命

众所周知，第一次工业革命是以工业机器的发明和蒸汽动力的广泛应用为其主要特征的，并由此带动了煤炭、冶金、机械制造等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发展。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第一次工业革命的进程中几乎无一例外地从棉纺织等轻工业的发展开始，然后带动煤钢等重工业的发展。到19世纪中期，发展重工业成为各国经济发展的关键，也成了衡量各国经济实力的基本依据。然而，随着资本主义工农业的发展和交通运输业的进步，当时建

立于旧技术基础上的煤炭、钢铁等重工业的发展已日益不能满足社会生产的需求。换言之，煤炭、钢铁等重工业的技术突破问题已经成为工业继续快速发展的一个瓶颈。在这种情况下，通过采用新科技实现重工业的突破性发展就成为各国面临的重大课题。此外，蒸汽机作为主要的动力源也在生产过程中日益显现出它的各种不足。它体积过于庞大，运转速度过低，这一些都不利于生产规模的扩大和产量的提高。第二次工业革命正是从以上两个困难点着手突破的。

首先，在煤炭、钢铁等生产生产资料的重工业领域出现了新的技术突破，其中以钢铁工业最为明显。1856年英国人贝塞麦发明的新炼钢法在1862年的伦敦展览会上公布于世后，迅速在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得到推广。后来又出现了新的平炉炼钢法和托马斯碱性炼钢法。所有这些新技术的发明和应用，使得往日单纯靠体力和经验进行的炼钢，变成了以大规模生产为特征的科学炼钢。各国的钢产量因此猛增。钢因此而逐渐取代铁，成了基本的工业原料和重要的建筑材料。

其次，在对工业发展全局具有决定性影响的动力技术上也出现了突破性进展，电能和内燃机逐渐取代蒸汽动力，成为新的主要的动力源。

第二次工业革命中的动力是以电力的广泛应用为其典型特征的。19世纪60年代后，由于发电机、电动机等的发明，电力成为取代蒸汽机的驱动机器的新的动力源。在这方面，以西门子为代表的德国人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此后，以电为能源背景的电灯、电话、电车、电报等一系列电气设备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电作为一种新能源的广泛应用，不仅为工业的发展带来了方便廉价的动力，而且带动了与之相关的一系列工业部门的建立和发展，诸如电机制造、输电设备以及其他电器工业作为新兴的工业部门迅速崛起。

内燃机的发明和应用也是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动力技术的一项巨大进步。在这方面，德国人同样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他们在19世纪70年代—90年代相继完成了一系列的内燃机的发明和改进。结果，内燃机不仅成为工业生产的重要动力源，而且使交通运输业出现了革命性进步。以内燃机为动力的机车、轮船、飞机、汽车等新型交通工具陆续出现，与之相关的汽车工业、石油开采业等新兴工业部门也建立和发展起来。1870年，全世界的石油产量只有80万吨，到1900年增加到2000万吨。

除了以上各项新的技术突破外，现代化学工业的建立和发展也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主要特征之一。首先，在无机化学工业方面，由于19世纪六七十年代发明了以氨为媒介生产纯碱和利用氧化氮为催化剂生产硫酸的新方法，这两种基本化学工业原料的产量有了很大的增长。其次，随着德国人在有机化学结构理论研究方面的进展，有机化学在煤焦油的综合利用等领域出现了革命性突破，人们陆续制造出了人造染料、塑料、橡胶和纤维等合成物质。瑞典化学家诺贝尔和德国化学家赫普先后发明了硝化甘油炸药和梯恩梯炸药。现代化学工业因此蓬勃发展起来。

此外，第二次工业革命在信息传递技术方面也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1876年，美国人贝尔发明了电话。1895年，意大利人马可尼发明了无线电通讯。这些发明与交通运输工具的进步一样，使人类社会的联系变得日益紧密。

与第一次工业革命相比，第二次工业革命有着明显的特点。

其一，第一次工业革命中的多数发明和创新是生产者依据长期实践经验积累的结果，主角是工匠和技师，与科学技术的联系不是特别紧密。而第二次工业革命则不然，这次工业革命中的几乎所有技术发明和创新都是人们自觉将电磁学、化学等新兴科学研究成果运用于生产生活领域的结果，各类掌握专门知识的科学家和工程师起了最重要的作用。科学技术在社会生产中越来越显

示出特别重要的地位。

其二，从展开方式上看，第一次工业革命首先发生于英国，继而向欧美各国扩张开来，进程长达一个多世纪。英国在这次工业革命中起了核心作用，这次工业革命中几乎所有的重要技术发明都出自英国人之手。第二次工业革命则不然，它几乎同时发生于美、英、法、德几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从一开始就表现出一种整体效应，且起步迅速，发展迅猛，时间短促，在不到半个世纪中就完成了它的进程，其中以德国和美国这两个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表现最为突出。

其三，第一次工业革命的重点是轻工业，机器设备相对比较简单，投资较少。第二次工业革命则不然。由于生产中的科学技术含量较高，生产成本的投入和生产规模都比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要大得多，工业结构也偏重于重工业和新兴的高科技含量工业。工业生产中呈现出的社会化特点更加明显，企业规模更大。而第二次工业革命的这种发展特点又为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从自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垄断资本主义创造了物质、技术和组织基础。

（二）后来居上——德国工业的跳跃性发展

如前所述，德国的分裂割据使德国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中成为一名迟到者，它不仅落后于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母国英国，而且落后于比利时、法国等西欧国家。在19世纪30年代开始工业革命后，虽然经过19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高速工业发展超过了法国，缩小了与英国的差距，但德国要想在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旧技术平台上超越英国，实非易事。因为到19世纪70年代初，第一次工业革命中形成的技术潜力基本上已经耗尽，而英国却牢牢地占据着各主要工业生产领域的优势地位。正是在这种状况下，德国和美国等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抢先一步，一改第一次工业革命中在英国之后亦步亦趋的被动局面，发动新的工业革命，利用建立在

新的技术平台上的优势，使自己的工业出现了迅猛的跳跃性发展。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德意志帝国已成了工业国集团的领导者之一。

德国成为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旗手并非偶然。首先，国家的统一为德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扫除了政治上的障碍。1871年建立的德意志帝国改变了德国长期分裂割据的局面，确立了容克资产阶级的联合统治，为德国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安定的环境。虽然德意志帝国还保留有一些封建的特征，但著名德国史专家杰夫·艾利认为，就政治秩序而言，俾斯麦所建立的帝国是“资产阶级社会”在德国的一个变种，资产阶级在他们所真正看重的领域里还是相当自由的^①。德意志帝国政府在对内对外政策中都采取了有利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政策。

其次，应该承认，1870年对法战争的胜利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德国经济的发展。根据法兰克福和约，德国从法国得到50亿法郎的战争赔款和工业发达、矿产资源丰富的阿尔萨斯—洛林地区。数十亿法郎的流入不仅使德国巩固了金本位制，偿付了国债，而且为工业发展注入了较充裕的资金，德国因此出现了一个创办企业的热潮。阿尔萨斯—洛林对德国工业发展的意义更大。这里有丰富的钾盐资源，特别是洛林的铁矿，日后与鲁尔的煤矿联合起来成为德国最重要的重工业基地。

再次，在普鲁士军国主义战旗下建立起来的德意志帝国始终保持着强大的军事力量。这就大大刺激了与军事有关的军火工业，特别是重工业的发展。我们只要看一下军火巨头克虏伯的发展情况就可见一斑。1873年，克虏伯企业拥有员工7000人，到

^① Wolfgang J. Mommsen, *Imperial Germany 1867—1918: politics, culture, and society in an authoritarian state*, pp.104—105.

1913年时增至78 000人^①。

正是在以上历史条件下，德国人抓住机遇，从第一次工业革命的迟到者一下变成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急先锋。19世纪70年代以后，当以电能、内燃机动力以及新兴化学工业为主要特征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在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展开后，德国立即以此为契机，充分利用各种新技术和新装备，彻底完成了以农业为主体的经济形态向以工业为主体的经济形态的转变，使自己驶上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快车道。

某些德国学者认为，1850年—1913年间德国的经济发展可划分为三个主要阶段：（1）起飞进入持续增长时期（1850年—1873年）；（2）“大萧条”^②时期（1873年—1896年）。这一时期开始于1873年经济危机，这一危机结束了德国经济的繁荣年代（Gründerjahre 1871年—1873年）；（3）经济加速扩张时期（1896年—1913年）^③。按照这一划分方法，德意志帝国时期主要处于后两个经济发展阶段。

我们认为，整个德意志帝国时期的经济发展基本上是连贯性的持续发展。虽然帝国建立后不久德国经济就遭受到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冲击，但帝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并没有受到大的影响。因此，我们在涉及德意志帝国时期的经济发展时，不必以阶段性的形式去加以考察和论述，而可以进行整体性的把握。当然，如果

① [法]米歇尔·博德：《资本主义史1500—1980》，东方出版社1986年，第175页。

② 这一名词源于1882年英国一个王家委员会调查物价、利润和出口等下降原因时的表述。其实，这一时期的大部分年份中，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都得到了引人注目的发展。参见Norman Stone, *Europe Transformed 1878—1919*, London 1983, p.20.

③ 这一划分方法参见Wolfgang J.Mommsen, *Imperial Germany 1867—1918: politics, culture, and society in an authoritarian state*, p.103.

从帝国经济尤其是工业的发展特点来看，人们完全可以以 1890 年前后为界线，将其划分为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中，旧式的工业部门仍占据主导地位；在第二阶段中，以电气、化学等为主体的新兴工业则已经扮演着特别重要的角色。

从整体上看，德意志帝国时期的经济发展速度是相当惊人的。单从工业增长的角度看，统一前的 1860 年—1870 年年均增长率仅为 2.7%；1870 年—1880 年，增长幅度则达到 4.1%；1880 年—1890 年为 6.4%；1890 年—1900 年为 6.1%；1900 年—1913 年仍达到 4.2%，其增长速度远远超过英、法等国，仅次于美国^①。此外，德意志帝国时期的工业生产效率也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从 1875 年到 1907 年，德国企业的平均生产指数由 100 上升到 410，工人平均劳动生产率指数由 100 上升到 225^②。如果我们将德意志帝国时期的工业生产指数列一个表，或许更能看出它的发展速度。

表 3-1 1871 年—1913 年德国工业生产指数表 (1913 年 = 100)^③

1871 年	1880 年	1890 年	1900 年	1910 年	1913 年
21.0	49.4	57.3	61.0	86.0	100.0

快速的工业增长使后起的德国迅速赶上和超过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仅工业生产而言，德国在 1874 年已超过了法国，1895

① 樊亢、宋则行：《外国经济史》，第 2 册，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第 110 页。

② [法] 夏尔·贝特兰：《纳粹德国经济史》，商务印书馆 1990 年，第 5 页。

③ Geoff Layton, *From Bismarck to Hitler: Germany 1890—1933*, London 1995, p.11.

年又超过了英国^①。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在德国，“科学技术研究受到政府广泛的支持，此外，大型的工业公司开始建立独立的研究部门”。到1900年，最大的研究部门中受雇者多达200人。德意志帝国时期的高速工业增长虽然是多方面原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这种对科学技术研究的重视以及新的科学技术的运用无疑起了最重要的作用。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这一时期德国工业发展的特点中得出结论，这种发展的特点是：采用新技术装备起来的煤炭、钢铁等重工业发展迅速；建立在全新科学技术基础上的化学、电气等新兴工业走在世界前列。两者相互促进，前者为后者提供雄厚的基础和持久的动力，后者则加速经济的发展并反过来以新技术武装前者，使之更快增长。

首先，作为第二次工业革命时代衡量一国工业实力标志的煤炭、钢铁等重工业高速增长。

如前所述，德国钢铁工业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中有了强劲的增长。它在19世纪60年代先后超过比利时和法国，成为欧洲仅次于英国的钢铁生产大国。尽管如此，与当时世界头号工业强国的英国相比，德国的钢铁产量实在微不足道。以生铁产量为例，1870年世界生铁总产量为1290万吨，其中英国为670万吨，占世界总产量的近52%；美国为190万吨，占15%；德国约为140万吨，仅占世界总产量的12%^②。美、德等国之所以难以威胁英国在钢铁生产领域的霸主地位，主要原因在于英国掌握着钢

^① Klaus Schulz, *Deutsche Geschichte und Kultur: 500 Bilder aus 2000 Jahren*, Königstein im Taunus 1987, S.103.

^② Karl Erich Born, *Wirtschafts- und Sozialgeschichte des Deutschen Kaiserreichs (1867/71—1914)*, Stuttgart 1985, S.42.

铁冶炼技术方面的优势。例如，英国人亨利·贝塞麦在1856年发明的转炉炼钢法使炼钢效率大大提高，英国的钢产量因此而大增，但这种工艺的两大前提条件却使德国人只能望而兴叹：第一，它无法用于含磷的生铁类；第二，它需要高额投入，仅两个转炉设备就需投入上百万马克。这对于缺少不含磷铁矿和资金不足的德国而言，应用推广的难度显然很大。因此，直到19世纪70年代以前，德国只有克虏伯等少数几家钢铁企业采用了贝塞麦炼钢法。1865年西门子—马丁炼钢法出现后，同样由于无法解决脱磷问题，长时间内也难以在德国推广。结果，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德国在采用贝塞麦法和西门子—马丁法炼钢方面一直落后于英国。1865年，英国贝塞麦和西门子—马丁钢产量为225万吨，德国为99.5万吨，相差125.5万吨。到1879年，英国达到1030万吨，德国为478万吨，差距扩大为552万吨^①。由此可见，德国若想在钢铁工业领域动摇英国的霸主地位，必须得到适合德国钢铁工业发展的新技术的支持。

19世纪70年代后期，英国人托马斯通过向衬有白云石的贝塞麦转炉中掺入石灰的方法，解决了含磷铁矿石的脱磷问题。这一技术突破使得广泛利用含磷铁矿、提高钢的质量和降低生产成本等有了可能。德国钢铁行业因此对这一最新技术成就作出了迅速反应。1879年，莱因钢铁厂和霍尔德尔联合会等德国钢铁企业迫不及待地将这一专利引入了德国，德国的钢产量由此而出现了突飞猛进的增长。是年，德国生产托马斯钢1782吨，贝塞麦钢46.5万吨。到1913年，德意志关税区域（包括卢森堡）内的

^① H.J. Habakkuk,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Vol. 4.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s and After: Incomes, Population and Technological Change (1)*, Cambridge 1966, p.485.

托马斯钢产量已经达到近1 063万吨，贝塞麦钢产量却下降到了15.5万吨。从下表中可以看出，托马斯法引入后德国的钢生产中各种工艺使用比例的显著变化。

表 3-2 1880年—1900年德国低碳钢生产中各种工艺所占比重^①

年份	西门子—马丁钢	贝塞麦钢	托马斯钢
1880	4.9	92.6	2.5
1884	27.4	63.9	21.9
1888	21.9	17.0	61.1
1892	17.8	9.1	73.1

新工艺的采用使德国钢铁生产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呈现出两大趋势：第一，钢铁产量直线上升。到1913年，德国的钢铁产量分别达到1 620万吨和1 931万吨，在世界钢铁生产中的比重分别上升到24.7%和24.1%，而英国在世界钢铁生产中的比重却下降到了10.2%和13.3%^②。第二，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以生铁生产为例，在1879年以后的30年间，德国每座高炉的生铁产量提高了3倍，工人劳动生产率提高2倍以上。这种钢铁产量的直线上升和劳动生产率的大幅度提高显然都是原有技术基础上难以想像的。

^① Wilfried Feldenkirchen, *Die Eisen- und Stahlindustrie des Ruhrgebiets 1879—1914*, Wiesbaden 1982, S.187.

^② Hans-Ulrich Wehler, *Deutsche Gesellschaftsgeschichte. Band 3. Von der "Deutschen Doppelrevolution" bis zum Beginn des Ersten Weltkrieges 1849—1914*, München 1995, S.601; Wilfried Feldenkirchen, *Die Eisen- und Stahlindustrie des Ruhrgebiets 1879—1914*, S.170, 190.

表 3-3 1879 年—1909 年德国生铁生产指数 (1879 年 = 100)①

年份	每座高炉产量	每个工人的产量
1879	100	100
1894	219.0	174.2
1909	396.8	233.8

钢铁工业的高速增长使得第一次工业革命中建立起来的这一传统工业部门在新时期呈现出巨大活力，并成为德国工业领域中最强大的主导性部门。到 1913 年时，德国已成为世界上第二大金属生产国和最大的金属出口国。这一年，德国出口金属达 20 亿马克，占德国出口商品总额（101 亿马克）的 20%②。技术的进步还使得这一时期德国钢铁工业的竞争力得到大幅度提高，从 19 世纪 90 年代初开始，德国生产的生铁、钢等都成了当时欧洲价位最低的产品。1900 年前后，德国钢厂的年平均产量为 75 000 吨，而英国同类企业的产量却只有 40 000 吨③，其差距之大可见一斑。

在钢铁等工业快速发展的同时，德国的煤炭工业也出现了迅猛增长，而这一传统工业部门再上新台阶的主要动力也是得益于新科技的运用，即新的矿井设备和开采机械等的使用。1894 年安东尼·拉基发明的快速钻探机，就在亚亨地区的采煤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1902 年，人们在威斯特发仑地区开始将凝固工艺

① Wilfried Feldenkirchen, *Die Eisen-und Stahlindustrie des Ruhrgebiets 1879—1914*, 附表 41 (无页码)。

② Karl Erich Born, *Wirtschafts-und Sozialgeschichte des Deutschen Kaiserreichs (1867/71—1914)*, S.43.

③ Hans-Ulrich Wehler, *Deutsche Gesellschaftsgeschichte. Band 3. Von der "Deutschen Doppelrevolution" bis zum Beginn des Ersten Weltkrieges 1849—1914*, S.602—603.

运用于“不固定”山体的矿井中，从而使可开采矿区得到进一步扩大。诺贝尔发明的炸药则使得爆破技术有了新突破。19世纪80年代，电力矿用铁路开始投入使用。19世纪末，电动泵开始运用于矿井汲水，电动马达驱动的通风机也取代了原来的蒸汽机。采煤工具中则出现了开采锤、簸动输送机等新设备。

以上新技术和新工具的使用，使得德国采煤业规模不断扩大，煤炭开采量迅速上升。其中，石煤开采量由1871年时的2900万吨猛增到1913年的19000多万吨，增长5倍多^①。从以下英、法、德三国的石煤开采量统计中可以看出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德国采煤业的兴旺局面。

表 3-4 1880年—1913年英、德、法三国石煤开采量（单位：百万吨）^②

年份	英国	德国	法国
1880	149	47 + 褐煤 12.1	19.4
1900	228.8	109.3 + 褐煤 40.5	33.4
1913	292	191.5 + 褐煤 87.5	40.5

上表统计表明，1880年—1913年，德国石煤产量增加3倍以上，同期英国石煤产量增加却不到1倍。1880年时，德国的石煤开采量尚不到英国的1/3，到1913年时，则已经上升到将近英国产量的2/3，如果加上褐煤开采量，德国产煤量实际上已经接近英国的水平。由此可见德国采煤业的发展速度。

从上述德国钢铁和煤炭工业在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的迅速发展中可以看出，利用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提高劳动生产率，实

^① Franz F. Wurm, *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 In Deutschland 1848—1948*, Opladen 1969, S. 105.

^② Karl Erich Born, *Wirtschafts- und Sozialgeschichte des Deutschen Kaiserreichs (1867/71—1914)*, S. 41.

不失为后进国家赶超先进国家的选择道路之一。

列宁曾经指出：“电力工业是最能代表最新的技术成就和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资本主义的一个工业部门。它在美国和德国这两个最先进的新兴资本主义国家里最发达。”^① 德意志帝国时期工业高速增长的另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以电气、化学等为代表的新兴工业的迅猛发展。而正是电气、化学工业等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具有代表性的新兴工业部门的异军突起，成为德国确立自己工业强权地位的重要标志，也使德国成为第二次工业革命中真正意义上的领袖国家。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部门的迅速发展都是与最新的科学技术紧密联系在一起。

电能的发现和运用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核心内容和主要标志，它将人类文明从“蒸汽”时代带入了“电气”时代。由于德国人敏感地觉察到了电能运用的广阔前景，牢牢把握电气工业发展的前沿，结果使德国电气工业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一直在世界上“处于领导地位”^②。

对近代德国电气工业的发展作出最重大贡献的是韦尔纳·冯·西门子和埃米尔·拉特瑙。西门子是工程师和发明家中将科学技术的发明迅速运用于工业的典型人物。他原是一名普鲁士军官，1849年退伍后在柏林创办了一个“电报机械所”。1866年，他在法拉第电磁感应原理的基础上制造出第一架大功率直流发电机，从而首次完成了将机械能转变为电能的发明。1879年，他又发明了电动机，从而实现了将电能再转变为机械能的突破，西门子

① [苏]列宁：《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788页。

② H.J.Habakkuk,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Vol.4.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s and After: Incomes, Population and Technological Change* (1), p.514.

公司因此而成为强电流方面最主要的公司。他还建造了第一条电车轨道，并很快在全德国推广了有轨电车。拉特瑙则将爱迪生发明的电灯的专利从美国带回了德国，并于1883年创办了德国爱迪生公司，即后来的通用电气公司。西门子公司和通用电气公司成为当时世界电业界的巨头。远距离输送电力在德国也变成了现实。1891年，位于内卡河上游的劳芬的一座发电厂将3万伏的电流输送到了179公里以外的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

19世纪80年代后，随着电话的普及和电灯的使用，德国人率先开始了电气工业的大规模发展。德国经济史家W. 佐姆巴特曾形象地描述了这一时期德国电气工业的繁荣景象：“19世纪80年代，特别是19世纪90年代，这一部门中从事工业活动的企业，有如森林中一场温暖夏雨后的蘑菇，一个超一个地猛长，以致今天的德国（1912年）已经遍布这一新兴工业，而这一工业在30年前还几乎无人知晓。”^①这些电气工业企业的业务主要集中于发电机和电动机制造、建设电气工厂、安装电力照明系统和建造电车等。到1896年，德国电气工业中已有39家股份公司，并逐步形成了西门子—哈尔斯克和通用电气公司等七大巨头。

德国电气工业发展如此迅速，还得益于以通用电气公司等为代表的德国企业采取的正确发展战略。通用电气公司创立者拉特瑙在总结通用电气公司的成功经验时提出了三大要素：大规模生产、高质量和高利润^②。这实际上意味着规模效益、客户的信赖和对投资者的吸引力。这种正确的发展战略大大促进了德国电气工业的扩张。电气工业迅速向各社会生产领域渗透。迅猛发展势

^① Werner Sombart, *Die deutsche Volkswirtschaft im neunzehnten Jahrhundert und im Anfang des 20. Jahrhunderts*, Berlin 1923, S.314.

^② W.O.Henderson, *The Rise of German Industrial Power 1834—1914*,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1975, p.198.

头可以从柏林交易所电气股份资本的增长中窥见一斑。1890年，电气股资仅为2 350万马克，1900年则已猛增到了39 670万马克^①，10年间增加近16倍。其投资总额在1900年时仅次于冶金工业，居第二位。

1900年以后，德国电气工业发展速度不减。根据德国著名经济史学家W.G. 霍夫曼的统计，以1913年德国电气工业生产指数=100计算，相关年份分别为：1900年12，1905年33，1910年67，1914年则达到110^②。1891年，德国还只有35个地方可供电力，1913年，已有17 500个地方通了电，约有一半的德国居民用上了电。德国正在成为电气化国家。而就世界范围而言，当时无一国能在电气工业的发展方面与德国相比。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电气工业生产中的比重分别为：德国34.9%，美国28.9%，英国16%，法国4%。德国电气工业产品的约1/4销往世界各地，其电气工业产品的出口占世界电气产品出口量的46.4%。1913年，德国生产白炽灯泡9 700万只，其中近2/3用于出口^③。

电气工业的发展还大大改变了德国工业领域中动力分布不均的状况。1913年，德国电力生产中除了火电外，已有11%的电力来自水电。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中由于缺乏煤矿资源而动力不足的德国中、南部地区因此有了新的发展机会。丰富的水力资源使

① Volker Hentschel, *Wirtschaft und Wirtschaftspolitik im wilhelminischen Deutschland: Organisierter Kapitalismus und Interventionsstaat?* Stuttgart 1978, S.222.

② Walther G. Hoffmann, *Das Wachstum der deutschen Wirtschaft seit der Mitte des 19. Jahrhunderts*, Berlin, Heidelberg, New York 1965, S.388.

③ Hubert Kiesewetter, *Industrielle Revolution in Deutschland 1815—1914*, Frankfurt am Main 1989, S.221.

他们能够利用河流等水能发电解决自身的动力源，将生产的电力输往所需地区。于是，德国中、南部的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纽伦堡等地区成为德国经济增长的新热点。此外，发电机和电动机的使用也使得原先只有较大型企业才能利用的机械动力逐渐进入小型企业，从而提高了小企业的生产效率。对此，莱茵—威斯特发伦地区工匠联合会于1913年曾指出：“如今，甚至只有4个帮工的小手工企业也可以使用机器工具，这得感谢‘电气’。”^①

电气工业因此很快成了德国经济迅速增长的主要因子之一。1882年时，在工业调查中还没有设电气一栏，数千名电业工人都被列入其他项目之下。到1895年，电气工业一栏中已有26 000名工人，1906年更增至107 000人。著名的西门子公司就是这一时期德国电气工业发展的一个缩影。1872年，该公司员工不到600人，1890年增至2 900人，1895年增至4 100多人，到1912年时更猛增到近56 800人。到1910年，德国已有195家电气公司，资本总额达12亿马克。而德国电气工业总产值在1891年—1913年间竟增加了28倍。在电气工业的发展中，或许电缆产品的输出能够说明一些问题。在19世纪80年代，德国还没有什么电缆工业，90年代上半期平均每年也仅输出15万英镑的电缆产品，然而到1908年，其输出量竟达到2 150万英镑。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进口德国电缆最多的竟是电缆工业故乡的英国。到1913年，德国生产的电气产品占全世界的34%^②，居各

① Hubert Kiesewetter, *Industrielle Revolution in Deutschland 1815—1914*, S.220—221.

② 另有资料认为，到1913年，德国的电气产品占有了世界电气市场的将近50%。参见 Geoff Layton, *From Bismarck to Hitler: Germany 1890—1933*, p.11.

国之首，而作为头号工业大国的美国仅占29%^①。同年，德国的发电量达到80亿千瓦时，比英国、法国和意大利三国发电量的总和还要多^②。到20世纪初，德国在电炉炼钢、铁路电气化等电能应用方面也都居世界之首。

化学工业也是德意志帝国时期令德国人最感到骄傲的工业之一。现代化学工业的最初成长也是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母国的英国，而不是在德国。当时棉纺织工业发展对苏打和硫酸需求的不断增长，导致了现代化学工业的建立和发展。但德国同样后来居上。

19世纪中期以后，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化学工业领域中出现了合成物质代替天然材料的趋势。德国著名化学家威廉·冯·霍夫曼在19世纪50年代就已经开辟了相关的研究领域。1856年，霍夫曼的学生，英国年轻的化学家威廉·亨利·珀金利用煤焦油首次制成了一种合成染料。不久，时任伦敦皇家化学研究院院长的霍夫曼又提炼出两种染料。但是，由于当时英国可以从广大的殖民地得到天然植物染料，英国工业界并没有因为珀金和霍夫曼的发现而紧紧把握住生产人工合成染料方面的领先机会。与此相反，德国工业界却看到了合成化学工业的诱人前景，作出了果断而正确的抉择，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进行煤焦油的综合开发和利用，逐渐在世界化工市场中占据了主导地位。

1865年霍夫曼从英国回到德国，被认为是德国化学工业发

① 以上数据见 J.H. Clapham,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France and Germany 1815—1914*, pp.307—308; [美] 科佩尔·S. 平森：《德国近现代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311页；樊亢、宋则行：《外国经济史》，第2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11页。

② Norman Stone, *Europe Transformed 1878—1919*, London 1983, p.160.

展的转折点。他培养出一批杰出的科学家，他们在德国各化学企业实验室中不断推出新的研究成果，从而确保了德国化学工业在世界上的领先地位。巴登苯胺—苏打企业、弗里德里希·拜尔公司等迅速发展成世界著名的大型化学工业企业。例如，巴登苯胺—苏打企业在1865年建立时还只有30名工人，到1900年前后已拥有职工6000多人。

德国化学工业的迅速发展是在德意志帝国建立以后。仅1870年—1874年的短短5年中，德国就成立了42家化学公司，资本达4200万马克。到1896年，德国已拥有108家化工股份公司，总资本达33290万马克。化学工业生产也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化工产品的生产规模不断扩大。以合成染料中的茜素为例，在1871年—1884年的14年间，茜素产量由1.5万公斤增至135万公斤，提高了89倍^①，足见其发展速度。化工企业的经济效益更是令人刮目。著名的迈斯特·卢齐乌斯和布吕宁公司在1863年成立时仅有资本6.6万古尔登，到1904年其资本已达到2250万马克。

化学工业以惊人的速度增长。有关统计表明，德意志帝国时期的化学工业生产翻了三番以上。从各类化学产品的产量看，化学染料尤其引人注目。1904年，德国焦油染料生产已达65000多吨，占当时德国全部化学原料出口的34.3%，德国染料工业在世界染料工业生产中的地位因此大幅上升。1880年以后，德国生产的合成染料占当时世界总产量的50%，1900年以后这一比重进一步上升到90%。此外，德国还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钾盐生产者，生产和加工着世界上95%—98%的钾化合物。1900

^① Hans Pohl, *Die chemische Industrie in den Rheinlanden während der industriellen Revolution. Band 1. Die Farbenindustrie*, Wiesbaden 1983, S.82.

年，德国的硫酸产量仅相当于英国的 55%，到 1913 年，形势逆转，德国硫酸产量已相当于英国的 155%。

德国化学工业在自身不断发展的同时，还大力吸取和应用其他工业领域的新工艺和新成果。19 世纪 90 年代以后，催化、电解工艺等新科技的出现成为化学工业发展的新动力。德国化学工业界不失时机地大规模推广电能等新能源在强碱电解和大气氮肥生产等方面的运用，将化学工业和新科技紧密结合在一起，从而使自己始终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化学工业的迅猛发展使德国在这一领域中几乎处于一种“旁若无人”的境地，以致有人称之为“德意志帝国最伟大的工业成就”^①。

表 3-5 1872 年—1913 年德国化学工业生产发展状况 (1913 年 = 100)^②

1872 年	1882 年	1892 年	1902 年	1912 年	1913 年
8.4	15.5	27.1	46.8	93.7	100

化学工业在德国工业生产中所占的比重并不大。1911/13 年，化学工业在整个工业生产中的比重仅为 2.3%，职工人数为 2.5%。但是，与电气工业一样，作为新兴工业部门的化学工业给德国经济带来的巨大活力却远远大于这个数字。1913 年的德国出口商品中，化工产品就占了 10%，销售额达到 24 亿马克，远远高于其在工业生产中所占的比重。同年美国化工产品的销售额仅为 15 亿马克。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化学工业可观的经济效益。

^① H.J. Habakkuk,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Vol. 4.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s and After: Incomes, Population and Technological Change* (1), p.107; Werner Sombart, *Die deutsche Volkswirtschaft im neunzehnten Jahrhundert und im Anfang des 20. Jahrhunderts*, S.109.

^② Walther G. Hoffmann, *Das Wachstum der deutschen Wirtschaft seit der Mitte des 19. Jahrhunderts*, S.361—362.

1900年以后，其股息一直在20%—30%之间，甚至基础化工的红利也达到了12.4%^①。高额的回报吸引着人们将更多的资金注入化学工业领域，充盈的资金则反过来为新化工产品的研究和开发以及整个化学工业的发展提供了保证，德国化学工业因此进入了一种良性循环的发展轨道。1875年，德国化工行业的就业人数仅为6.5万人，1911/13年已增加到了29万人^②。

作为新兴的现代化工业产业，电气和化学工业的迅猛发展在一定意义上体现了后来居上的德国这一新兴工业化国家的旺盛工业活力，使其在世界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处于领头羊的地位。从这一意义上讲，电气和化学工业的高速发展对于“国际比较中的德国工业地位”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③。

从上述德国的工业发展状况中我们可以看出，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大潮中，德国人在将科学技术运用于生产的环节上动作十分迅速。在苯胺染料、电动机制造等方面，德国人从理论到应用的过程比英、法等国要快3年—5年。正是德国人这种对最新科技的敏感性，使得许多发明出现了“英法开花，德国结果”的状况。从世界工业生产中所占的比重看，1870年时德国为13%，居英国和美国之后；1910年则已达到16%，仅次于美国（35%）。与此同时，英国和法国的工业生产下降到世界工业生产总值的14%和7%。德国成了欧洲第一、世界第二的资本主义工业强国。

① Thomas Nipperdey, *Deutsche Geschichte 1866—1918. Band 1. Arbeitswelt und Bürgergeist*, München 1990, S.235.

② Karl Erich Born, *Wirtschafts- und Sozialgeschichte des Deutschen Kaiserreichs (1867/71—1914)*, S.46.

③ Thomas Nipperdey, *Deutsche Geschichte 1866—1918. Band 1. Arbeitswelt und Bürgergeist*, S.234.

毋庸置疑，德意志帝国时期资本主义工业的跳跃性高速发展固然与德国人能够抓住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契机，充分利用新兴的科学技术有关；但我们同样要看到的是，德意志帝国政府采取的一系列保护和发​​展资本主义的措施同样起了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

统一经济法规。市场经济必须在法律的规范下才能正常运转。19世纪70年代，德意志帝国已经建立起一套较完整的司法制度，其中，经济法规也完善起来。在70年代上半期，帝国政府相继颁布了商业法、营业自由法、统一的度量衡法、迁徙自由法、货币法、关税法以及保护国外的商业法等一系列法规，从而使德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有了可靠的法律保障。

帝国政府还统一了货币，在金本位制的基础上将马克确定为货币单位，取代了一直在流通的各邦自己发行的货币。统一的度量衡体系也建立起来，公尺、公升和公斤等（米突制）取代了各邦自成体系的、完全不同的度量衡标准。这些都有利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运行。

1869年，北德意志联邦根据工商业条例实现了职业和迁徙自由。帝国建立后，作为资本主义社会主要特征之一的这种职业和迁徙的自由在整个帝国内得到实行。此外，帝国政府还统一了邮政，统一了对铁路的管理。所有这一切都有利于德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为什么德意志帝国政府会如此不遗余力地实行保护资本主义发展的经济政策？原因在于这一时期德国特殊的阶级结构，即容克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已开始在经济上，且部分地在政治上相互融合，利益日趋一致，也即容克资产阶级化，资产阶级容克化。一方面，容克因投资于工商企业而日益资产阶级化^①。俾斯麦就

^① Thomas Nipperdey, *Deutsche Geschichte 1866—1918. Band 1. Arbeitswelt und Bürgergeist*, S. 418.

是一个众所周知的资产阶级化的容克政治家，而君临全德国的德皇既是大地主，同时又是大军火企业克虏伯公司的股东。另一方面，资产阶级的一些代表性人物如韦尔纳·西门子等人则通过购置地产、谋取爵位挤进贵族行列，从而成为统治阶级上层圈子中的人物。据统计，在德意志帝国时期，通过贵族化方式加入贵族行列的资产阶级就占到普鲁士贵族总数的9%^①。作为容克资产阶级代表的德意志帝国政府自然要维护本阶级的利益，于是，德意志帝国就成了德国史学家们所称的“贵族大地产和高炉之间的联盟”^②。

（三）从农业国到工业国——德国经济结构的根本性转变

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深入展开给德国的经济和社会结构带来了显著变化，整个社会类型出现了根本性的转变，德国“‘从一个拥有强大工业的农业国’过渡‘到了一个拥有强大农业基础的工业国家’”^③。确切地说，德国在德意志帝国时期由一个农业国变成了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工业国家，而这种工业化带来的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变化可以从以下各个方面展现出来。

在迅速工业化进程之下，德国的经济结构首当其冲地出现了明显的变化。

① Heinz Reif, *Adel im 19. Und 20. Jahrhundert*, München 1999, S.34.

② Helmut Böhme, *Thesen zur Beurteilung der gesellschaftlichen, wirtschaftlichen und politischen Ursachen des deutschen Imperialismus*. In: Wolfgang J. Mommsen (Hg), *Der moderne Imperialismus*, Stuttgart, Berlin, Köln, Mainz 1971, S.39.

③ W.R.Lee, and Eve Rosenhaft, *State, Social Policy and Social Change in Germany 1880—1994*, Oxford, New York 1997, p.104.

首先,受第二次工业革命背景下高速工业化浪潮的冲击,工业逐步确立起在德国经济结构中的主体地位。行业就业人数、各经济部门的价值创造以及资本投入重心的转移等数据都无不清楚地展示着这样一个事实:德国已经从一个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化国家。

从行业就业人数看,1871年时德国农业领域的就业人口为854.1万人,而工业、手工业和采矿业等行业的就业人数仅为501.7万人,仍大大少于农业部门。到1913年时,农业就业人数为1070.1万人,而工业就业人数则猛增至1172万人,双方位置发生逆转。从德国各经济领域的总体就业结构比重看,1867/71年,农业领域在就业总人口中的比重高达50.9%,工业、手工业和采矿等领域仅占27.6%,商业、交通等领域占7.2%;到1910/13年时,相应比重则分别改变为35.1%、37.9%和14.6%^①。由此可见,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德国工业领域中的就业人数已经超过农业领域中的就业人数,成为主导性就业群体。

各经济领域的价值创造比重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1870年,德国农业领域的价值创造为57.38亿马克,工业、手工业和采矿等行业的价值创造为39.97亿马克,而商业、交通等领域的价值创造仅为13.62亿马克。到1913年,以上三大部门的价值创造分别上升到112.7亿马克、218.05亿马克和75.61亿马克。同期农业生产部门在社会生产总额中所占的比重由原来的约40%下降到23.4%,工业、手工业和采矿等部门在社会生产总额中所占的比重则由28%上升到了45%以上,而商业和交通等部门在社会生产总额中所占的比重也有明显的增长^②。由此可见,到

^① Walther G. Hoffmann, *Das Wachstum der deutschen Wirtschaft seit der Mitte des 19. Jahrhunderts*, S. 205, 35.

^② Walther G. Hoffmann, *Das Wachstum der deutschen Wirtschaft seit der Mitte des 19. Jahrhunderts*, S. 454—455.

1913年时以工业经济为主体的非农业经济已经在德国国民经济中占据了支配性地位。

德意志帝国时期的资本投入趋向也发生明显转变。资本投入是衡量和判断一个国家经济结构重心调整和转移的重要依据。德意志帝国时期，各社会生产部门中最快的投资增长点也转向工商业等领域。工商业领域的投资额在净投资总额中所占的比重从1865/69年的14.5%上升到1910/13年的42.9%，而农业领域的投资额在净投资额中所占比重却由21.8%下降到13.9%。不同经济领域在净投资总额中所占比重的这种巨大变化同样反映了德国工业化进程中社会经济结构的转变状况，即经济重心已经由农业生产领域转向工商业等经济领域。实际上，从19世纪80年代起，工商、铁路等部门已逐步确立起其几乎不可动摇的投资主体对象地位^①。同时，这种投资结构的调整也在一定程度上对德国以工业为主体的新型经济结构的确立起到了促进和巩固作用，因为大规模的资本投入带来的通常是生产领域中包括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科学技术含量的增加等多方位的效应。据统计，1867年—1913年，德国农、林、渔等第一产业的生产率仅增加0.99，工业、手工业和采矿业等第二产业的生产率增加了1.80。而在这一时期的生产增长中，有1/3来自劳动力投入的增加，2/3则得益于资本的投入和生产率的提高^②。可见，投资的增加以及由此带来的生产率的提高，对于确立工业经济的主体地位显然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其次，工业生产领域本身结构也处于不断调整之中，即旧的

① Walthor G. Hoffmann, *Das Wachstum der deutschen Wirtschaft seit der Mitte des 19. Jahrhunderts*, S. 143.

② Thomas Nipperdey, *Deutsche Geschichte 1866—1918. Band 1. Arbeitswelt und Bürgergeist*. S. 273.

工业部门生产萎缩，新兴工业部门规模进一步扩大，同时企业的组织、经营形式以及诸如工业界与金融界的关系等也出现了新的变化。

在各工业领域中，旧的生产部门的企业数目在减少，新兴工业部门的企业数目在迅速增加。1871年—1914年，德国的纺织业和木材加工业的企业数减少了38%，而电气工程、光学、精密机械、化学、交通工具制造等行业的企业数目却增加了52 100个^①。

工业的飞速发展使德国企业的规模不断扩大，促成了经济领域中德国垄断资本的形成。德国工业后来居上，起点较高，不管是重工业还是新兴工业部门，一开始就以生产和资本高度集中的大企业出现，而这种企业规模的发展正是卡特尔和辛迪加等垄断组织“形成的前提条件”^②。按照当时的标准，雇佣50人以上的企业即算大企业。据此，1882年，德国这类大企业占企业总数的22.8%，1895年这一比例上升为33.5%，1907年则达到了42.5%^③。从大企业的数目和雇佣人数看，1882年，德国有1万家大企业，雇佣人数160万；1907年，大企业数目达到3.2万家，拥有职工540万人^④。据统计，1907年，占企业总数0.9%的大企业占有了3/4以上的蒸汽动力和电力，其中586个最大的

① [德] 卡尔·艾利希·博恩：《德意志史：从法国革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下册，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684页。

② Volker Hentschel, *Wirtschaft und Wirtschaftspolitik im wilhelminischen Deutschland: Organisierter Kapitalismus und Interventionsstaat?* S.99.

③ Wolfgang J. Mommsen, *Imperial Germany 1867—1918: politics, culture, and society in an authoritarian state*, p.111.

④ Klaus Schulz, *Deutsche Geschichte und Kultur: 500 Bilder aus 2000 Jahren*, S.110.

企业占有了几乎 1/3 的蒸汽动力和电力。以通用电气公司为例，经过令人吃惊的集中后，到 1911 年，该公司已经控制了 175—200 家公司，雇佣了 6 万多工人。这种生产和资本的高度集中显然有利于垄断组织的产生。此外，作为后起资本主义国家，德国不仅产品竞争力相对较弱，而且在海外的市场份额过窄。这就迫使德国企业界为增强竞争力而联合起来，以便在国内垄断价格，在国外市场上实行倾销战，打击对手。而德国政府从 19 世纪 70 年代末开始实施的保护关税等政策则给德国垄断企业的发展起了打气作用。正是由于上述原因，德国成为世界上较早发展垄断组织的国家。

德国垄断组织的普遍形式是卡特尔，即生产同类商品的企业在划分商品销售市场、规定商品产量和销售价格方面达成协议而形成的垄断组织。各企业组成卡特尔的目的有二：一是为了在国内消除竞争，一是为了便于在国际上竞争。早在 19 世纪中期工业高涨时期，德国已出现了一些尚不稳定的卡特尔^①。帝国建立后，由于经济危机和工业化的飞速发展，特别是 1879 年保护关税的实行，刺激了德国企业界的卡特尔化。据统计，在 1866 年普奥战争前，德国有 4 个卡特尔组织，1875 年时也只有 8 个卡特尔，1887 年时发展到 70 个卡特尔，1895 年时卡特尔数量达到 143 个。此后 15 年中，德国的卡特尔数量出现爆炸性发展，1914 年时已经达到 700 个左右^②。到 1900 年时，小到制针、皮鞋，大到钢铁、煤炭，几乎没有一个行业没有自己的卡特尔。这

① Hans-Pohl und Wilhelm Treue, *Die Konzentration im der deutschen Wirtschaft seit dem 19. Jahrhundert*, Wiesbaden 1978, S.7.

② Hans-Ulrich Wehler, *Deutsche Gesellschaftsgeschichte. Band 3. Von der "Deutschen Doppelrevolution" bis zum Beginn des Ersten Weltkrieges 1849—1914*, S.634.

些卡特尔在高关税政策的保护下，在国内实行高价位，在国际市场上则试图倾销过剩产品。垄断已渗入德国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成了德国全部经济生活的基础。

一些卡特尔还进一步将价格与生产联系起来，逐渐发展成为拥有统一销售组织的辛迪加。1893年组成的“莱茵—威斯特发伦煤炭辛迪加”当时就集中了该地区产煤量的86.7%，1903年时则控制了该地区煤产量的98.7%。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这一垄断组织仍控制了德国煤产量的50%以上。1904年成立的钢业联盟和1910年成立的铁业联盟则垄断了全国钢铁产量的98%。在一些主要工业部门中还形成了更高级的垄断组织形式康采恩，著名的克虏伯公司就是一个集采煤、冶金、机器制造和军火生产于一身的巨大康采恩。由于拥有巨大的财力和物力，“这些大公司无论在经济条件上还是在技术条件上都支配着市场”^①，它们甚至涉足世界市场。1908年，德国的两家电气工业巨头西门子公司和通用电气公司联合后，就与美国通用电气公司瓜分了世界市场，前者占有欧洲，后者占有美洲。

德国的银行是在19世纪中期后随着工业的发展而成长起来的。工业的迅速集中引起为之服务的银行资本的集中，在德国出现了与大企业相适应的大银行。1873年经济危机时，德国有70家银行倒闭，1890年—1891年危机期间又有许多银行破产。1901年的危机甚至被称为“清理危机”。在这次危机中，德意志银行兼并了49家银行，德累斯顿银行兼并了46家，贴现银行兼并了28家。到1909年，德意志银行、贴现银行、达姆斯塔特银行、德累斯顿银行、沙夫豪森银行、柏林商业银行、商业贴现银行、中德信贷银行和德国国民银行等9大银行占有资本113亿马克，集中了德

^① Wolfgang J. Mommsen, *Imperial Germany 1867—1918: politics, culture, and society in an authoritarian state*, p. 110.

国银行资本的83%，从而成为德国银行界的绝对统治者。

工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在高度集中的同时又相互融合，巨大的规模以及相互联合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投资的风险。“每家银行都是一批公司的金融中心。而且，为了分担风险，几家银行联合向同一家公司贷款。”^①各银行在他们所参与公司的董事会中派驻代表，并鼓励组建卡特尔，保住现有市场份额，消除竞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各大银行分别派驻代表的企业数目为：德意志银行186个，贴现银行161个，沙夫豪森银行联合会148个，达姆施塔特银行132个，柏林商业公司123个，德累斯顿银行120个，德国国民银行100个^②。银行的经理们还参加一些企业的监事会。1911年，德国6大银行的经理出任企业监事会代表的情况为：采矿企业112个，金属加工企业41个，机器制造业64个，电气工业27个，纺织工业34个。各大银行通常有自己传统的投资重点，沙夫豪森银行联合会的侧重点在采矿业和金属加工业中，德意志银行则钟情于电气工业^③。经济上的密切关系最终使各大银行成了诸如西门子、通用电气公司、克虏伯等一些大企业的“利益代表者”^④。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德国实

① [法] 米歇尔·博德：《资本主义史 1500—1980》，东方出版社 1986 年，第 175 页。

② Hans-Ulrich Wehler, *Deutsche Gesellschaftsgeschichte. Band 3. Von der "Deutschen Doppelrevolution" bis zum Beginn des Ersten Weltkrieges 1849—1914*, S. 630.

③ Volker Hentschel, *Wirtschaft und Wirtschaftspolitik im wilhelminischen Deutschland: Organisierter Kapitalismus und Interventionsstaat?* S. 132.

④ 有关西门子、克虏伯等大企业与大银行之间的关系，参见 Volker Wellhöner, *Grossbanken und Grossindustrie im Kaiserreich*, Göttingen 1989, S. 164—165, 218—221, 320, 336.

际上由 300 个与容克地主结成联盟的金融巨头统治着。

当然，我们在看到德国的银行业在集中的同时，还应看到它的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方面，即德国的银行资本善于寻找每一个投资的机会，善于筹集资金为工业发展注入动力，并因此而推动工业的发展，德国银行界因此而颇感自豪。1908 年，德累斯顿银行的一位官员在谈到德国银行的作用时曾洋洋自得地表示：“在德国，我们的银行主要是对帝国的发展负责。因此，较之其他机构，迄今所取得的伟大辉煌的成就或许更多地归功于银行。”^①

再次，高速工业化带来的高速增长以及由此而造成的国民经济结构从农业主导型形态向工业主导型形态的转变，也促使德意志帝国时期的对外贸易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德国逐渐转变为外向型经济国家。德国著名史学家托马斯·尼佩代因此而将对外贸易的这种变化称作德国“从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的重要标志^②。

德意志帝国时期对外贸易发展的最明显特征是对外贸易量的大幅度增长。以下为霍夫曼的相关统计。

表 3-6 1880 年—1913 年间德国的进出口总额（单位：百万马克）^③

年份	1880	1890	1900	1910	1913
出口	2 923.0	3 335.1	4 611.2	7 474.7	10 097.5
进口	2 813.7	4 162.4	5 768.6	8 926.9	10 750.9
总计	5 736.7	7 497.5	10 379.8	16 401.6	20 848.4

① Frank B. Tipton and Robert Aldrich, *An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Europe 1890—1939*, London 1987, p.21.

② Thomas Nipperdey, *Deutsche Geschichte 1866—1918. Band 1. Arbeitswelt und Bürgergeist*, S.275.

③ Walther G. Hoffmann, *Das Wachstum der deutschen Wirtschaft seit der Mitte des 19. Jahrhunderts*, S.520—524.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1880年—1913年的30多年间，德国对外贸易总额由57亿多马克增加到了208亿多马克，增加幅度达265%。其中出口增长速度整体上高于社会生产的增长。1900年以后，这一趋势更为明显。据统计，1903年，德国社会生产增长5.2%，出口增长7.0%，1910年，社会生产增长为3.6%，出口增长却高达12.7%^①。

对外贸易的迅速增长使德国成为世界性进出口贸易大国。1870年，德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三大出口国和第二大进口国，19世纪80年代以后，德国和美国作为后起的工业化国家又在世界出口贸易中超过法国，成为紧随英国之后的世界第二大出口国。

表 3-7 1910年英、德、美三国进出口贸易状况（单位：百万马克）^②

国 别	进 口	出 口
英 国	11 723	8 784
德 国	8 934	7 475
美 国	6 396	7 182

国家的工业化使德意志帝国时期对外贸易结构发生了巨大改变。这种变化在整体上表现为：出口商品中原料、粮食等产品比例下降，成品、半成品比重上升；进口则相反，原料、粮食等比重大增，而工业制成品等的比重却大幅度减少。也就是说，德国的工业产品加工和制造能力大大加强了。具体说来，1871年时德国出口商品中成品和半成品占51%，原料占25%，食品占24%。到1910年时，成品和半成品的比重已经上升到出口商品的74%，原料和食品则分别下降为16%和10%。在进口货物

① Volker Hentschel, *Wirtschaft und Wirtschaftspolitik im wilhelminischen Deutschland: Organisierter Kapitalismus und Interventionsstaat?* S.236.

② Hubert Kiesewetter, *Industrielle Revolution in Deutschland 1815—1914*, S.283.

中，情况完全相反。1870年，成品和半成品占德国进口商品的34%，到1910年时，这一比例下降到了24%。同一时期的原料在进口中所占的比重在45%和48.5%之间波动，而食品在进口中所占份额却由13.9%上升到了26.7%，几乎翻了一番^①。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德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金属、机械、化学、电气等产品的输出国。例如，在1880年—1913年间，德国的机器、动力运输工具和电气产品类的出口就由4450万马克增至102470万马克，增长高达22倍以上^②。这种出口商品结构表明，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德国已经成为工业主导型经济强国。

高速增长的工业经济还使得德国与对外贸易对象之间的关系发生微妙变化。由于德国工业发展对原料和粮食的不断增长，一直作为德国最重要贸易伙伴的欧洲地区在德国进口中所占的份额呈下降趋势，而来自非欧洲地区的食品、原料却不断增长。这些产品在1890年时还不足25%，到1910年时已经增至45%^③。出现这种变化的主要原因在于工业化改变了德国的进口货物结构。英国是德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德国对英国贸易中商品结构的改变可以典型地说明德国工业能力的提升对其对外贸易的影响力度。1870年，德国输往英国的产品中仅39.7%为工业品，原料和食品却分别达到34.7%和25.6%。到1913年时，德国出口英国的产品中工业品已占70.8%，而原料和食品类却分别下降到

① Karl Erich Born, *Wirtschafts- und Sozialgeschichte des Deutschen Kaiserreichs (1867/71—1914)*, S. 73.

② Walther G. Hoffmann, *Das Wachstum der deutschen Wirtschaft seit der Mitte des 19. Jahrhunderts*, S. 520.

③ Thomas Nipperdey, *Deutsche Geschichte 1866—1918. Band 1. Arbeitswelt und Bürgergeist*, S. 276.

20.4%和8.8%^①。这一转变表明，如果说1870年时德国还是当时有“世界工厂”之称的英国的原料和粮食供应者的话，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英国实际上已经成为德国工业产品的主要销售地。德国工业产品在英国的倾销震动了英国朝野，1896年，英国人厄内斯特·埃德温·威廉姆斯为此专门出版了《德国制造》(MADE IN GERMANY)一书，分析英国在世界贸易中比重下降和德国迅速上升的原因以及应该实施的相关对策。

(四) 走向现代社会——德国社会结构的变化

在德意志帝国统治时期，伴随着快速的工业化进程，德国的人口状况出现了重大变化。德国的人口总数迅速增加，且增长幅度有逐渐扩大的趋势。

德国人口普查始于1816年，在这一年，德国的总人口约为2500万^②。德意志帝国建立时，境内总人口为4100万。到1913年，德国总人口已达到6600万^③。也就是说，以1871年为界，在此以前长达55年的时间中，德国增加了1600万人，

① P.M.Kennedy, *The Rise of the Anglo-German Antagonism 1860—1914*, London 1980, pp.46, 294.

② 这一数字是以1871年建立起来的德意志帝国国境为界统计的。

③ Gerhard A.Ritter, *Das Deutsche Kaiserreich 1871—1914: Ein historisches Lesebuch*, S.27. 另：[德]卡尔·艾利希·博思的《德意志史：从法国革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称1913年德国人口为6500万（第302页）。[美]科佩尔·S.平森的《德国近现代史》中称1914年的德国人口为6779万（第302页）；Peter Flora, *State, Economy, and Society in Western Europe 1815—1975: A Data Handbook, Vol.1. The Growth of Mass Democracies and Welfare States*一书中的统计数据是，1910年德国的人口已经达到6492.6万人（第42页）。根据这一时期的德国人口增长率推算，1913年德国人口为6600万更为可信。

而在此以后的42年中德国人口却增加了2500万，远远超过前一个时期的人口增长速度。德意志帝国时期的人口密度也迅速增加。1871年时，德国每平方公里为76人，1900年增加到104.3人，1910年更增加到120人^①。

人口的迅速增加给人们一种假象，似乎德意志帝国时期的人口出生率很高。而事实是，在此期间，德国的人口出生率一直在下降。根据下面的德意志帝国时期的人口出生和死亡率表，我们会惊奇地发现，在整个德意志帝国统治时期，德国的人口出生率一直呈下降趋势，但是死亡率下降更快。从1871年到1912年，每1000居民每年出生人口减少11.6人，而同期死亡人口却减少了12.4人。由此可见，德意志帝国时期的人口增长并非高出生率而是低死亡率的结果。

表 3-8 德意志帝国时期人口出生和死亡率状况表（单位：每1000居民）^②

年平均率	出生人口	死亡人口	净增人口
1871—1880	40.7	28.8	11.9
1881—1890	38.2	26.5	11.7
1891—1900	37.3	23.5	13.9
1901—1910	33.9	19.7	14.3
1911	29.5	18.2	11.3
1912	29.1	16.4	12.7

德意志帝国时期何以出现出生率下降而死亡率下降更快的

^① Johannes Müller, *Deutsche Bevölkerungsstatistik: ein Grundriss für studium und Praxis*, Jena 1926, S.17.

^② 资料来源：Gerhard A. Ritter, *Das Deutsche Kaiserreich 1871—1914: Ein historisches Lesebuch*, S.28.

现象？这必须到德国经济的跳跃性发展中去寻找答案。

帝国建立后的高速经济增长使德国人的生活条件普遍得到改善，这既是以上问题的重要答案，也是工业化的又一个重要社会后果。从19世纪70年代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德国人的实际工资增长了1/5。与此相对应，银行存款也不断增加。从1880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德国银行的储蓄存款增长了9倍，达168亿马克，也就是说，储蓄的增长大大超过了同一时期人口的增长。到1913年，全国已有60%的人口达到了应纳税的最低收入^①。这一时期的就业率也一直相当高，在1900年—1914年只有一年的失业率超过3%^②。这种日益优裕的物质生活条件，加上工业化带来的高度紧张的工业节奏，使人们既不愿意也无法承受多子女家庭的重负。他们更多地将主要精力从生儿育女转向工作和娱乐，在匆匆忙碌了一天，去电影院等娱乐场所消磨时光。

更重要的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德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劳动立法，使用童工受到禁止。早在1851年，普鲁士政府已经禁止12岁以下的童工工作。1878年，德国政府进一步规定，禁止让妇女和儿童从事有害健康的劳动。同时，随着社会的进步，普及教育得到巨大发展。以普鲁士为例，1861年时，普鲁士有初等学校24 763所，36 783班。到1901年时则已经有初等学校

① [法] 米歇尔·博德：《资本主义史 1500—1980》，东方出版社 1986 年，第 165 页；[德] 卡尔·艾利希·博恩：《德意志史：从法国革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下册，商务印书馆 1991 年，第 686 页。当然，对于德意志帝国时期普通百姓的生活标准不能估计过高。弗尔克·亨切尔就认为，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德国仍有 30% 的家庭生活窘迫，另有 1/3 多刚过温饱。参见 Volker Hentschel, *Wirtschaft und Wirtschaftspolitik im wilhelminischen Deutschland: Organisierter Kapitalismus und Interventionsstaat?* S. 74.

② Geoff Layton, *From Bismarck to Hitler: Germany 1890—1933*, p. 15.

6 745所, 99 002 班^①。所有这一切, 不仅使孩子们停止了为家庭赚取部分收益, 而且使他们因接受教育而在经济上依附父母的时间越来越长, 父母还必需为子女支付越来越高的受教育费用。结果, 当生儿育女日益成为经济负担的象征时, 父母们少要孩子的倾向就愈加明显了。1884年, 德国政府颁布有关养老的社会保障立法, 从而解除了人们对于养儿防老的后顾之忧。以上这些因素都是出生率下降的重要原因, 而它们又无一不和社会经济的进步联系在一起。正是在这一意义上, 某些史学家认为, 出生率的下降是“现代文明的一个标准”^②。

人口死亡率的下降则得益于因国家工业化而带来的卫生保健和社会保障工作的改善。在德意志帝国时期, 饮用水净化、防疫注射、消除产褥热等工作开始得到普遍推行, 社会保障体系在19世纪80年代建立后也日臻完善^③。所有这一切, 对于降低因饥饿和各种疾病带来的死亡率, 显然有重要作用。

与出生率的下降和死亡率的降低相伴随的, 是德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1871年, 德国总人口中0岁—15岁者占34.3%, 15岁—65岁者占61.0%, 65岁以上者占4.6%; 1900年, 0岁—15岁者占34.8%, 15岁—65岁者占60.3%, 65岁以上者上升到4.9%^④。这一统计数字表明, 在德国社会中, 老年人口的比例正在缓慢增加。这与国家的工业化带来的社会进步而导

① [德] 恩斯特·约翰·耶尔格·容克尔:《德意志近百年文化史》, 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 第43页; [德] 弗·鲍尔生:《德国教育史》, 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年, 第172页。

② [美] 帕尔默·科尔顿:《近现代世界史》, 中册, 商务印书馆1988年, 第757页。

③ 详情参见后文有关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部分。

④ [奥] 迈克尔·米特罗尔:《欧洲家庭史》, 华夏出版社1987年, 第130页。

致疾病、死亡的减少显然有直接的关系，越来越多的人因此颐享高年。

迅速工业化也使德意志帝国时期的人口分布状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农村和城镇人口的比例发生逆转，全国出现了急剧都市化的发展趋势。

从1871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德国新增人口1/3以上，其中绝大部分分布于不断扩大的新兴城市中。此外，许多原本居住在农村的人口也陆续进入城市，以满足工业发展对劳动力资源的需要。城镇人口因此而迅速增加，农村人口相对减少。1890年—1900年是德国城乡人口比例发生变化的转折期。据统计，若以2000人以上聚居区为城镇人口计算，1871年德国农村与城镇人口的比例为63.9%和36.1%，1880年为58.6%和41.4%，1890年为57.5%和42.5%，1900年为45.6%和54.4%，1910年为40%和60%^①。由此可见，到1900年，农村人口已经成为德国居民中的少数，而城镇人口则成了国家的主体居民。

德国农村和城镇人口比例的这种变化可以从每年人口变动的百分率中看得更清楚。据统计，1880年—1910年，德国农村人口的平均年增长率为-0.1%，而城市人口的平均年增长率却为+2.5%^②。从这种变动的百分率中我们可以看到，当城镇人口在迅速增加之时，农村人口却在减少，呈负增长。农村人口的这种负增长显然并非因为农村人口的低出生率所致，而是大量农村

^① Geoff Layton, *From Bismarck to Hitler: Germany 1890—1933*, p.11.

^② [美]阿瑟·刘易斯：《增长与波动》，华夏出版社1987年，第205页。小罗伯特·赫恩顿·法伊夫也认为，1880年以后，德国的新增人口全部在城市，农村人口则在下降。参见Robert Herndon Fife, Jr., *The German Empire between Two Wars: A Study of the Political and Social Development of the Nation between 1871—1914*, p.270.

人口流入城镇的结果。

迅速工业化和城市人口的猛增，使德意志帝国时期出现了急剧城市化的趋势。众所周知，城市一般兴起于交通便利的要地。因此，工业革命前，城市主要集中于适合船只航行的海岸或江河湖畔。第一次工业革命后，铁路对城市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铁路运输将便利的交通带向各地，许多现代化城市沿着铁路两旁发展起来，它们利用闪闪发光的铁轨不断运进生活用品和运出工业制品。在德意志帝国时期，德国的铁路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1870年时，德国有铁路18600多公里，到1914年时增加到61700多公里^①，这在当时的中欧和西欧是首屈一指的。与大规模的铁路建设以及高速的工业增长形势相适应，德国的城市也如雨后春笋般地迅速发展起来。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有关学者认为，德国的城市化“开始于铁路的发展”，“加速于德国工业的增长”^②。

总的看来，德意志帝国时期的城市化有两大特点。一是大城市不断涌现，其增加速度之快令人瞩目。1871年，德国超过10万人的城市只有8座，1880年达到14座，1890年增加到26座，1900年增加到33座，1910年更达到48座^③。40年间，10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数目增加了5倍。原来以农业为主的鲁尔区，如今成了德国的工业心脏地带，在这里，众多的城市彼此相连，只能靠市政界线来划分。

^① Hubert Kiesewetter, *Industrielle Revolution in Deutschland 1815—1914*, S.256—257.

^② Robert Herndon Fife, Jr., *The German Empire between Two Wars: A Study of the Political and Social Development of the Nation between 1871—1914*, p.207.

^③ [德] 卡尔·艾利希·博恩：《德意志史：从法国革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下册，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484页。

德意志帝国时期城市发展的另一特点是，城市人口的增长，尤其是大城市人口的增长极为迅速，城市人口增长速度与其规模成正比。1885年，德国拥有2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居民总数为860万，占全国人口的18.4%。1910年，这一数字上升到2240万，占总人口的34.5%，几乎翻了一番，超过全国总人口的1/3。城市越大，人口增长越快。在以上同一时期，德国10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居民由440万增至1380万，在全国人口中的比重由9.4%上升到21.1%^①，也就是说，由原来不足全国人口的1/10上升为超过1/5，从而大大超过了整个城镇人口的增长速度。核心城市的人口增长幅度尤其惊人。

表 3-9 德意志帝国时期 8 大城市的人口增长状况 (单位: 万人)^②

城市	1870 年	1900 年	1910 年
柏林	77.4498	188.8313	207.1907
布雷斯劳	20.7997	42.8517	51.7367
科隆	20.0132	46.4272	60.0304
埃森	9.9887	29.0208	41.0392
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12.6095	31.4026	41.4576
汉堡	30.8446	72.1744	95.3103
莱比锡	17.7818	51.9726	64.4644
慕尼黑	44.0886	65.9392	66.5266

以上数据表明，除慕尼黑以外，其他7大城市的人口在1870年到1910年的40年间均增长了150%以上，埃森、汉堡、

^① Gerhard A. Ritter, *Das Deutsche Kaiserreich 1871—1914: Ein historisches Lesebuch*, S. 30.

^② [美] 科佩尔·S. 平森:《德国近现代史》, 上册, 商务印书馆1987年, 第303页。

莱比锡的人口增长更是超过 300%。

德国核心城市的人口增长如此迅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合并附近的中小城镇和郊区造成的。例如，柏林在 1871 年—1910 年间由于合并以及郊区的建设，人口增加 1.3 倍。莱比锡在 1880 年—1910 年合并了 18 万居民。同一时期，德累斯顿和科隆则通过扩张合并了 11.5 万居民^①。

从国际角度来看，德意志帝国时期的德国城市人口增长率明显高于英、法等国。统计数据表明，1880 年—1910 年，德国城市的人口年增长率为 2.5%，而英国（1871 年—1911 年，不包括苏格兰和爱尔兰）和法国（1891 年—1911 年）城市的人口年均增长率仅为 1.6% 和 1.0%^②。德国的城市化速度如此之快，以致“1870 年以后，在现代工业都市化方面已经堪与英国相匹敌”^③。

工业化和城市化对德国社会的影响是巨大的。传统的生活方式受到挑战，原有的大家庭形态受到冲击。以工业文明为主导的现代社会是一种相对传统农业社会更具流动性的社会。由于城市工商业的繁荣带来的众多就业机会以及职业的流动性，子女们在长大成人后便离开父母去寻找新的工作，并因此而走向独立。他们与大家庭的联系日益减少，从而出现了“后期与父母的朋友式关系”现象^④。

① Robert Herndon Fife, Jr., *The German Empire between Two Wars: A Study of the Political and Social Development of the Nation between 1871—1914*, p.277.

② [美]阿瑟·刘易斯：《增长与波动》，华夏出版社 1987 年，第 205 页。

③ [美]帕尔默、科尔顿：《近现代世界史》，中册，商务印书馆 1988 年，第 759 页。

④ [奥]迈克尔·米特罗尔：《欧洲家庭史》，华夏出版社 1987 年，第 135 页。

同样，在城市中，人们的观念也在发生变化。居民们来自各个不同的地区，他们逐渐地摆脱了与土地捆绑在一起的各种传统意识，善于接受新观念和新思想。同时，高度密集的人口和便利的交通也为各种思想的传播提供了便利的条件，为各个政治派别的活动提供了有利的场所。德国的各大城市因此成为思想文化最活跃的中心地区。德意志帝国时期也因此成为社会主义思想迅速传播、社会民主党等党派活动频繁的阶段。

经济的高速发展和工业化的深入，对德意志帝国时期的职业分布状况产生了巨大影响，职业结构和就业人数比例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从事传统的农业、林业等职业的人数的比重明显减少，工业、商业、交通等行业的就业人数比例呈快速上升的势头。以下两表可以具体清晰地说明这种变动情况。

表 3-10 1882 年、1907 年农林、工业、商业和交通领域在职人数^①

职业分布	年份	在职人数 (千人)	在职人员 及家属、 佣人(千 人)	占全国人口百分比	
				在职人员	在职人员 及其家属
农业林业	1882	8 236.5	19 225.5	18.0	42.0
	1907	9 883.3	17 681.2	15.9	28.5
工业	1882	6 396.5	16 058.1	14.0	35.1
	1907	11 256.3	26 386.5	18.2	42.5
商业交通	1882	1 570.3	4 531.1	3.4	9.9
	1907	4 377.6	8 278.2	5.6	13.3

说明：其他如家庭服务、军事、宫廷、教会等职业以及诸如无职业和无职业说

^① 资料来源：Gerhard A. Ritter, *Das Deutsche Kaiserreich 1871—1914: Ein historisches Lesebuch*, S.30.

明者，在 1907 年有 561.5 208 万人，没有列入上表。

表 3-11 德意志帝国时期劳动力结构变化状况 (单位: 百万人)^①

部门	1875 年	1895 年	1913 年
农业	9.23	9.79	10.07
矿业	0.29	0.43	0.86
工业	5.15	7.52	10.86
运输	0.35	0.62	1.17
商业/银行	1.12	1.97	3.47
旅馆/佣人	1.49	1.57	1.54
国防	0.43	0.61	0.86
其他	0.59	0.89	1.49
总计	18.64	23.40	30.97

从以上两表中我们可以看出：在德意志帝国统治时期，农业、林业、工矿、商业和交通运输等行业的在职人数均有不同程度的增加，其中以商业和交通运输部门增长最快。以表 3-11 为例，在 1875 年—1913 年间，这两个部门的在职人数都增长了 200% 以上，反映了迅速工业化过程中城市化高速发展的情况下必须优先发展的交通、生活设施等部门的兴旺需求状况。工业部门在职人数的增长仅次于商业和交通，在同一时期内的增长幅度超过了 100%。农业和林业部门的在职人数则增长最慢，从表 3-10 的农业和林业以及表 3-11 的农业部门看，它们在近 40 年间增长幅度都没有达到 20%。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可以从表 3-10 中看到，当工业、商业和交通运输领域的在职人员及其家属

^① 资料来源：Geoff Layton, *From Bismarck to Hitler: Germany 1890—1933*, p. 12.

等总人口同步增长的情况下，农业和林业领域却出现了一种矛盾现象，即在职人数由1882年的823.65万人上升到1907年的988.33万人，增加164.68万人，而同期农业总人口却由1922.55万下降到1768.12万，减少了154.43万人。这一数字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农村剩余人口在减少，大量过剩劳动力正流入城市中发展强劲的工业、商业和交通等领域。这正是步入工业化和城市化时代的一个普遍的社会特征。

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瑟·刘易斯曾指出：“对于经济发展来说更为重要的是劳动力的增长而不是人口的增长。”^①这一论点与德意志帝国时期的高速经济增长情况完全吻合。在德意志帝国时期，总人口中的就业人口比例呈不断上升趋势。1882年时德国就业人口占总人口的35.4%，1895年上升到36.4%，1907年更上升到39.7%^②。就业人数在全国总人口中比重的增大，说明德国经济充满活力，可以消化吸收更多的劳动力。而工业、商业和交通等领域中就业人数的优先增长以及超过农业和林业等传统产业部门的就业人数，则证明德国此时已由一个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了。当然，在这里我们也应该指出，这一时期德国的农业规模与英国等国相比，仍然非常庞大，1907年时仍雇佣了劳动力的35%^③。

国家的迅速工业化对德国的移民领域也产生了深刻而持久的影响。对于这一问题，我们可以从出境移民、入境移民和国内迁

① [美]阿瑟·刘易斯：《增长与波动》，华夏出版社1987年，第189页。

② Gerhard A. Ritter, *Das Deutsche Kaiserreich 1871—1914: Ein historisches Lesebuch*, S.29.

③ Frank B. Tipton and Robert Aldrich, *An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Europe 1890—1939*, p.21.

徙等三个方面加以考察。

近代德国一直是向海外移民的主要欧洲国家之一。特别是1815年以后，德国向海外移民的人数持续增长。根据保守的估计，在帝国建立前的1862年—1870年间，德国有97万人移居国外^①。甚至在国家统一后，仍有大量德国人漂洋过海，去他乡寻找安身之所。究其原因，主要是当时农业歉收，德国经济发展还不足以吸收所有自然增长的人口，人们不得不开开放土，去国外谋生。直到19世纪90年代以后，高速工业化带来的经济高涨局面和国家社会保障制度的实行，才遏制住了德国向海外移民的浪潮。下表清楚地反映了随着德国工业化的深入而给向外移民带来的影响。

表 3-12 1881 年—1912 年德国境外移民状况表^②

年平均数	人口净增数	境外移民	境外移民与净增人口百分比
1881—1890	551 300	134 200	24.3
1891—1900	730 300	52 800	7.2
1901—1910	866 300	28 000	3.2
1911	739 900	22 700	3.1
1912	839 900	18 500	2.2

上表说明，在1881年—1890年的10年间，德国境外移民

^① Mary Evelyn Townsend, *The Rise and Fall of Germany's Colonial Empire 1884—1918*, p. 36.

^② 资料来源: Gerhard A. Ritter, *Das Deutsche Kaiserreich 1871—1914: Ein historisches Lesebuch*, S. 28.

的人数占了同期全国净增人口的将近 1/4，也就是说，德国每增加 4 个人就有 1 个人移居国外。这一比例是相当高的。但是，19 世纪 90 年代以后，这种大规模的境外移民热骤然降温。进入 20 世纪后，出境移民人数与全国净增人口相比已经微不足道了。从这种人口外流的锐减的情况看，它本身应该是德国工业化带来的更多的就业机会和生活状况的改善的一个结果。到世纪之交时，德国人已无须离开自己的祖国而远走他乡。按照阿瑟·刘易斯的理论，“由于德国城市经济发展迅速，所以它注定可以赶上人口的增长”，从而可以留住外流人口^①。而这种外流人口的减少本身对德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也有着积极的意义，它给正处于跳跃性发展中的德国工业经济提供了劳动力资源保证。

德国的迅速工业化和经济繁荣，不仅有效地遏制了人口的外流，而且从奥地利、荷兰和意大利等国吸引了大批移民前来定居。19 世纪 90 年代以后，德国开始由出境移民国家逐渐转变为入境移民国家。据统计，在 1895 年—1905 年的 10 年间，德国入境移民与出境移民相比，多出 14.6 万多人^②。1900 年—1910 年间，迁入德国的移民达 50 万人之众。此外，还有大量的外籍季节性工人到德国帮助采矿和收割庄稼等。1913 年，仅来自俄国的季节性工人就达 85 万人，另有 15 万同类性质的工人来自意大利。这种人口反流现象表明，德国人口的自然增长已经无法满足本国工业经济高速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了，它已经由一个劳务输出国变成了劳务输入国。就移民出入的人数而言，德国在 19

① [美]阿瑟·刘易斯：《增长与波动》，华夏出版社 1987 年，第 261 页。

② Friedrich Burgdörfer: Die Wanderungen über die deutschen Reichsgrenzen im letzten Jahrhundert. In: Wolfgang Köllmann und Peter Marschalck, *Bevölkerungsgeschichte*, Köln 1972, S.287.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后“已由一个出境移民国家转变为入境移民国家了”^①。

迅速工业化也引起了德国国内的人口流动和迁徙浪潮。除了农村地区的人口大量流向城市以外，以农业经济为主体的东部人口也大量流向西部发达的工业地区，到 1910 年时，已有大约 400 万东部人和他们的第一代后裔来到东部以外地区。从各地人口增长的不平衡中我们同样也可以看出德国国内的人口流动趋向。1875 年—1910 年，以农业为主体的东普鲁士人口由 185.6 万人增加到 206.4 万人，增长率为 11.2%，而同期莱因地区和威斯特发伦地区的人口分别由 380.4 万人和 190.6 万人猛增到 712.1 万人和 412.5 万人，增长率分别为 87.1% 和 116.9%。这种相差极为悬殊的增长速度，显然不能用纯粹的自然人口增长来解释。众所周知，东普鲁士地区一直是德国典型的农业区，而莱因—威斯特发伦地区却集中了德国的主要工业。这种人口的不平衡增长表明，德国农业地区的相对过剩人口正快速向工业发达地区转移。这与前文中所提到的职业结构变化的结果是一致的。这种国内人口的迁徙和流动为德国的工业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保证，正是从这一意义上，某些德国史家认为，内部移民和越界移民一样，都是“重要的经济动力源”^②。

工业化也对社会各阶级力量的变化产生了巨大影响。工业化首先使工业资产阶级和工业无产阶级的力量得到壮大，这一点人所共知，不作过多的阐释。我们要注意的，在这一时期，德国社会中的所谓 *Mittelstand*——中产阶级或中等阶层，即介于资产

① Gerhard A. Ritter, *Das Deutsche Kaiserreich 1871—1914: Ein historisches Lesebuch*, S.29.

② Wolfgang J. Mommsen, *Imperial Germany 1867—1918: politics, culture, and society in an authoritarian state*, p.111.

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社会阶层——出现了新的变化。这种变化在于，除了小商人和小手工业者为代表的旧的中产阶级外，还出现了一个以科研、管理人员、教师和公务员等为主体的新中产阶级群体。因此，从整体上看，由于工业化和社会经济的进步，中产阶级得到了扩大。但新旧两个中产阶级群体在工业化面前境遇迥异。

就新的中产阶级而言，其队伍在不断扩大。无论在工业部门还是在教育领域和政府机构中，具有科学、技术和管理才能的新的白领，如企业科研和管理人员、教师和公务员等，都由于社会发展的需要而大量增加。在以上白领中，后两者都被称为国家官员，他们的人数随着国家教育事业的发展和行政管理机制上的中央集权主义化而不断增加。至于德国企业中科研和管理人员等白领阶层人数的增加则可以从西门子公司的发展中窥见一斑。1872年，西门子公司有职员50人，1895年增至685人，1912年猛增至12502人，增长神速。据统计，在1882年，德国共有白领99.2万人，其中农业领域6.2万人，其他领域（包括专业人员和公务员）93万人。到1895年，德国的白领已经达到146.7万人，其中农业领域6.7万人，其他领域140万人^①。

与以上正在上升的新中产阶级白领阶层相比，由手工业者和小商人等构成的旧的中产阶级在高速推进的工业化浪潮面前似乎日子有些不好过，他们非但没有因工业化而得到好处，反而日益陷入窘境之中。从整个阶层来看，他们受到来自强大的工业和商业企业的挤压，力量趋弱。

尽管境况不同，整个中产阶级的政治态度却颇为相近。由手工业者和小商人构成的旧中产阶级面对现代工业文明的冲击，所

^① 资料来源：Wolfgang J. Mommsen, *Imperial Germany 1867—1918: politics, culture, and society in an authoritarian state*, p. 259.

作出的反应自然是不满意。他们将已经成为历史的前工业社会看成是“黄金时代”^①，并天真地相信，通过支持保守党和专制主义统治可以抵消这种现代工业社会的冲击。白领阶层虽然受益于现代工业文明，却也反对社会变革，因为他们是既得利益者。他们不仅拥有较高的薪金，而且职位受到国家的保障，还享受退休金等好处。他们的这种地位是令人羡慕和受人尊敬的。既然满足于已有的社会地位，他们也就不愿意看到因社会的变动而损害自己的利益。

迅速工业化给德意志帝国社会带来的又一个重要社会后果是，各生产和服务领域中妇女角色日益重要。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是，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造成对劳动力需求的强劲增长，同时工业化引发的社会分工中各种适合女性特点的工种的出现也为女性进入社会生产领域创造了条件。其结果是：农业领域因男性劳动力大量流入城市和工矿区而使劳动妇女人数大幅增加；工业领域中的职业妇女数量不断增长；同时，随着商业、交通和服务业的发展，相关领域的就业妇女人数也呈现上升趋势。在农业领域，1882年，妇女劳动力为253万多人，占该领域劳动力总数的30.8%；到1907年，则已上升到近460万人，占农业劳动力总数的46.5%。在工业领域，1882年，女性就业人数为112万多人，占这一领域就业总数的17.6%；1907年时则已增加到210万人，占这一领域就业总数的18.7%。同期德国就业人数中妇女的比重也由29%上升到33.7%^②。妇女大量进入生产领域，

^① Geoff Layton, *From Bismarck to Hitler: Germany 1890—1933*, p.15.

^② 以上数据参见 Ulla Knapp, *Frauenarbeit in Deutschland. Band 2. Hausarbeit und Geschlechtsspezifischer Arbeitsmarkt im deutschen Industrialisierungsprozess*, München 1984, S.650, 651, 643.

给社会的冲击和影响显然很大，因而遭到一些保守势力的反对。他们认为妇女的解放是对家庭生活、风俗习惯和上帝秩序的破坏^①，并试图通过分配给妇女们相应的职业来阻止这种发展趋势。然而，这种阻挠在迅速的社会进步面前是徒劳的。从19世纪中期以后，德国就出现了各种妇女运动。妇女们不仅打破了社会对她们进入职业领域的阻挠，而且在19世纪90年代以后，她们进入高等学校学习的权利也逐步得到了认可。然而，由于时代的局限，当时德国妇女运动主要的努力目标是社会方面的同等权利，除了蔡特金领导的社会主义妇女运动外，资产阶级妇女运动等对政治方面都相对缺乏兴趣^②。由于这种状况，德国妇女在政治上的同等权利直到1919年以后的魏玛宪法中才得以实现。

① Hans-Ulrich Wehler, *Deutsche Gesellschaftsgeschichte. Band 3. Von der "Deutschen Doppelrevolution" bis zum Beginn des Ersten Weltkrieges 1849—1914*, S.1091.

② 有关著述参见 Barbara Greven-Aschoff, *Die Bürgerliche Frauenbewegung in Deutschland 1894—1933*, Göttingen 1981.

四 工业化进程中的德意志帝国政治状况

在德国的迅速工业化过程中，不仅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德意志帝国的政治状况同样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这种变化主要表现为帝国建立初期政治上的两大特点，即行政结构上的联邦主义和政治体制上的专制主义，开始出现走形：在行政结构上呈现出中央集权主义发展趋势，在政治体制上出现了议会化和民主政治的倾向。同时，由于工业化带来的社会各阶级、集团力量的变化，帝国内各政党的力量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消长、分化和重新组合。在帝国各个政党之中，德国社会民主党作为与工业化大生产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工人阶级利益的代表，其力量发展尤其迅速，并最终成为德意志帝国议会的第一大党；同时要注意的是，这时的社会民主党也因工业化带来的社会各阶级内部利益调整，出现了分裂的迹象。

（一）现实的即是合理的——行政结构上的中央集权主义发展趋势

前已提及，德意志帝国初期，根据 1871 年宪法建立起来的帝国行政架构是各种势力妥协的产物。当时无论从宪法条文的规定，帝国的实际组织形式，还是各邦所保留的主权上看，联邦主

义性质都是确定无疑的^①。从当时的实际情况看，这种照顾各方利益的联邦体制对于缓和各方矛盾，巩固新统一起来的民族国家，无疑是有益的。

然而，随着统一的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工业化的飞速发展，随着帝国力量的增长，陆、海军的更多需求以及帝国国际作用的不断增长，原来包含过多的分离主义因素的联邦体制日益显露出弊端，已经无法满足整个帝国的政治和经济发展的需要。

于是，在帝国内部围绕联邦制和中央集权问题出现了两大对立势力的斗争。以各小邦政府、保守党、中央党等为一方，代表的是主张尽可能地保持各邦独立地位的分离主义势力，他们竭力维持帝国的联邦性质，捍卫各邦的自治权利。保守党担心，任何加强中央集权的倾向都可能会增强代表中央集权主义的帝国议会的力量，并导致民主趋势的加强。而中央党之所以反对处于新教的普鲁士支配下的中央集权国家，不但是为了维护各小邦的权利，同时也是为了保证在天主教居民占多数的地区让天主教拥有自治地位。以民族自由党等左派政党以及各中派政党为代表的另一方，则赞成和支持加强帝国中央政府的权力。在帝国建立初期，后一派力量在帝国议会中占有明显的优势。

在政治结构上，对帝国行政结构的中央集权主义倾向影响最大的一个因素显然是普鲁士在帝国内部的特殊地位。有史学家认为，俾斯麦统一德国走的是“小德意志”道路，而“小德意志”就等于“大普鲁士”。也就是说，新建立起来的德意志帝国实质上是普鲁士的放大。虽然帝国建立之初，俾斯麦为缓和各邦分离主义势力对国家统一的阻挠，曾作了一些让步，使德意志帝国的行政体制上含有较浓的联邦主义色彩，但随着帝国统一成果的稳固，普鲁士在帝国内的压倒性优势会使它的要求和愿望自觉地或

^① 参见第二部分“德意志帝国前期的政治状况”。

不自觉地成为各邦必须奉行的准则，从而使帝国初期的联邦色彩逐步褪色，让位于政令统一的中央集权主义，因为实际上由普鲁士把持着的帝国行政权力机构不会长时间地容忍各邦自行其是的行为。正是出于以上原因，虽然有各种分离主义势力的抵制，帝国内部依然出现了要求扩大帝国政府权力和某些悄然地却是实实在在地向中央集权主义转变的趋势。

从另一个角度说，中央集权主义倾向的发展本身也是德国工业化所带来的国民经济发展和职能部门不断强化的一个必然结果。众所周知，直到19世纪早期，国家的行政职能除了外交和军事以外，在内务管理上只有财政、教育和司法等部门，经济领域中所涉及的管理部门也仅为农业、采矿、铸币、商业和工业、手工业等。此后，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启动，经济领域的活动日趋复杂化，国家相应的经济政策也不断出台。结果是，“经济政策愈多，经济管理也就愈多”^①，国家必须涉猎农业、工业和手工业、商业、银行、交易所、保险业、竞争、专利、商标、卡特尔、度量衡、统计、交通、通讯等一系列五花八门的领域和问题，并设立相应的专门机构进行规范管理。国家职能部门权力的加强，必然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加强国家中央各部门在日常经济和政治生活中的核心地位，“改变帝国与各邦之间以及联邦主义体系内的力量对比”^②，从而引发中央集权趋势。

帝国建立后，逐步确立起了统一的司法制度。1872年，继在北德意志联邦时已经在各邦实行的商法典之后，帝国刑法典成为全国统一的法典，这一法典是在根据1851年普鲁士刑法典制

^① Thamas Nipperdey, *Deutsche Geschichte 1866—1918. Band 2. Machtstaat vor der Demokratie*, München 1992, S.110.

^② Thamas Nipperdey, *Deutsche Geschichte 1866—1918. Band 2. Machtstaat vor der Demokratie*, S.112.

订的北德意志联邦刑法的基础上作微小的修改后由帝国议会通过的。1873年，帝国政府开始制订民法典，该法典于1888年才完成，1896年，该法典经过重大修改后由联邦议会和帝国议会通过，1900年开始生效，并且直到今天依然有效。此后，帝国又统一了诉讼和法院制度。1876年—1879年，帝国政府相继通过了法院组织法、刑事诉讼法和民事诉讼法，统一调整了法官和检察官的地位、法院人员的任命和管辖权限、审判程序和诉讼程序等。1879年，帝国在莱比锡建立最高法院——帝国法院，这表明德意志帝国已经拥有了自己的“帝国司法权”^①。帝国政府之所以能如此顺利地建立起统一的法制体系，资产阶级自由派在帝国议会中占有多数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在建立统一的法典和法院制度中起领导作用的人物，是民族自由党的议员拉斯克和普鲁士司法大臣莱翁哈特。

帝国政府统一货币之举既是加强中央权力的重要步骤，同时对于德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也颇为有利。由于长期分裂割据的缘故，德国的银行系统一直十分混乱。直到1871年，在德意志帝国内尚有7个不同的货币区和33个具有钞票发行权的银行，各银行按照完全不同的规定印发钞票。然而，随着国家的统一和经济的发展，建立统一的银行货币系统显得十分必要和迫切。这不仅是在理顺混乱的货币状况和加速商品流通的需要，也是在整个帝国范围内提供便利的银行业务和为帝国保管现金储备的需要。

因此，德意志帝国建立后，以资产阶级自由党议员、银行业专家路德维希·班比格尔和帝国宰相办公厅主任鲁道夫·德尔布吕克为核心，开始了帝国货币的统一工作。在1871年，马克成了帝国的法定货币单位。1873年，帝国政府利用它在普法战争中

^① Diether Raff, *Deutsche Geschichte vom alten Reich zur Zweiten Republik*, S.151.

得到的赔款建立起黄金通货，货币由银本位改成了金本位^①。这一举措正好在白银危机爆发之前，因而在一定程度上使德意志帝国避免了货币危机的冲击。

1875年3月，帝国通过了银行法，将原普鲁士银行改成帝国银行。帝国政府还规定了极为苛刻的纸币发行条件，以达到限制其他银行发行纸币的目的。根据规定，发行银行均不许承兑汇票；不能自行或代理顾客先期买卖货物和证券；不能发行面额在100马克以下的银行券；必须公开其全部业务等。此外，不经帝国法律许可，不得创立新的发行银行，每个银行发行的无需现金担保的银行券均定有最高限额。所有这些严厉的规定使得纸币发行权对银行的吸引力大大减小。结果，前面提到的33家银行中，到1876年时，已有14家放弃了它们的纸币发行权；到1897年时还有7家保留着发行权；1907年时已只有4家银行保留着纸币的发行权，而且它们都是半国家性质的银行。到1912年时，德国全国发行货币总额为1.34亿英镑，其中1.26亿出自帝国银行，这意味着其他银行在纸币发行方面已经无足轻重了。帝国银行还在全国建立起庞大的子系统，在30年中，它开设了将近100家分行和4000家支行^②。

帝国统一的邮政系统的建立既是中央集权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同时也是高速工业化之下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的一个结果。

与其他部门一样，德国的邮政在国家分裂时期也是一盘散

① 1857年，德意志各主要邦国曾与奥地利签订协定，各签字国永久实行银本位制。

② J.H.Clapham,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France and Germany 1815—1914*, pp.378—379, 391—393; [德]卡尔·艾利希·博恩：《德意志史：从法国革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上册，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327页。

沙。直到1867年后，才在北德意志联邦境内根据邮政法建立起联邦邮政，实行起统一的邮资标准。德意志帝国建立后，在统一帝国邮政方面作出突出贡献者是原普鲁士邮政领导人、1871年出任帝国邮政总局局长、1880年起担任帝国邮电部国务秘书的海因里希·冯·施特凡。施特凡的一个重要举措就是由国家出面控制和建设邮电通讯事业。1876年，德国各邦的电报系统在帝国邮政总局之下合并起来。1889年，德国政府通过购买从博尔库姆岛到洛夫斯托夫特以及从格利特希尔到瓦伦提亚岛之间的电缆，为国家控制国际海底电缆开创了先例。1891年，德国又和英国合作铺设从博尔库姆岛到东海岸的第二条线路，从而开创了国家铺设海底电缆的先例。1897年，施特凡的后任波特比尔斯基取消了柏林、汉诺威等地的最后几十家私人邮政。

国家集中掌握邮电建设的大权后，德国邮电事业得到了飞速发展。在邮政方面，1850年德国的信件、印刷品、货样邮寄等数量为8590万件，1870年为38200万件，1880年为84300万件，1910年达到了702400万件。德国的电报事业也是在德意志帝国建立后才出现快速发展的。19世纪70年代中期帝国邮政和电报系统合并后，电报网络迅速从铁路系统扩张到各个部门，电报机构和电报线路里程快速增长。1870年，德国有电报机构2405个，电报线路81840公里，到1913年时，电报机构则增加到了38509个，电报线路达到了1863600公里^①。

电话的迅速发展尤其典型地反映了德意志帝国时期邮电建设的成果。在德意志帝国时期，德国的电话建设远远走在世界的前列。1881年，柏林开通了第一部电话分机。此后，德国开始大规模发展电话事业。到20世纪初，德国的电话系统较之英国等

^① Walther G. Hoffmann, *Das Wachstum der deutschen Wirtschaft seit der Mitte des 19. Jahrhunderts*, S.420—422.

国已经处于无可争议的优势地位。1912年，德国的电话线里数将近法国的3倍，单线达到5倍，电话设备超过法国4倍，德国人在电话上的交谈将近法国人的7倍^①。而这一切成果都是因为电话建设集中掌握在国家手中，由国家统一建设的结果。

帝国政府还统一了对铁路的管理。如前所述，在德意志帝国时期，德国铁路建设发展特别迅速。1870年时，德国的标准轨距铁路线为1.89万公里，到1910年时已达到5.9万公里。但是，与铁路建设的这种发展速度相比，对铁路的管理却显得大大滞后。在当时的德国，存在着帝国铁路线、各邦铁路线、私营铁路线、私人所有而由各邦经营或各邦所有而由私人经营的铁路线等多种体系，显得极为复杂和混乱。而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都需要帝国加强对铁路的统一管理。首先，1875年德法战争危机以后，法俄两国在外交上的接近使德国出现了两线作战的阴影，从而使对铁路的统一管理提到了战略意义的高度；其次，对铁路进行统一管理也是国家经济政策的需要。一方面，这是克服混乱、提高效率的有效途径，另一方面，随着对外贸易的增长，人们提出了铁路运费率的问题，即对进出口货物实行不同的运费标准，以便限制进口，鼓励出口。

正是出于以上原因，俾斯麦于1873年创立了“帝国铁路局”来协调各所属系统铁路的建设、装备和营运。为了统一和简化各种铁路公司的运费体系，在帝国铁路管理局的领导下，原本有67家铁路管理局和1357种运费的德国铁路终于在1876年组成了实行统一运费原则的自由联合，从而使铁路运费率实现了统一和系统化。1876年，俾斯麦政府还一度想实施铁路国有化的帝国铁路计划，但由于各邦不愿放弃铁路这一财源而宣告失败。此

^① J.H.Clapham,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France and Germany 1815—1914*, S.364.

后，俾斯麦政府继续通过普鲁士的铁路国有化来带动其他邦的铁路国有化。1879年—1880年，普鲁士开始实行铁路国有化，1884年，这一进程趋于结束。到1890年，已有1.4万公里的私人铁路实现了国有化。1895年，普鲁士和黑森铁路联合，形成一个3.3万公里的统一铁路网，占全德国铁路的近3/5。

除了以上事务以外，19世纪70年代末以后接踵而来的保护关税、军备以及殖民扩张等一系列事务的需要，也都向帝国政府提出了加强权力的新要求。正是与这些要求相适应，德意志帝国的行政体制“逐渐地呈现出中央集权而非联邦的特点”^①。

德意志帝国中央集权主义发展趋势的另一个明显特征，是帝国中央行政机构的扩大。

随着帝国政府所承担的各项管理任务和拥有的权力的日益扩大，对帝国的行政管理机构也提出了相应的扩充要求。起初，除了前普鲁士外交部这一负责外交事务的外交官厅外，帝国宰相办公厅是负责包括商业、财政、司法、铁道和邮政等全国内政事务的最高官厅。作为帝国宰相的俾斯麦在帝国行政机构的扩充问题上并没有一定的计划。1872年，普鲁士海军部被帝国接收，并于1889年发展成为由国务秘书领导下的帝国海军部，专门负责帝国的一切有关海军的工作。后来，作为帝国宰相办公厅主任的鲁道夫·德尔布吕克在俾斯麦的默许下，把归入帝国管理的各项任务都并入帝国宰相办公厅之下，结果形成了一个“和帝国宪法中的联邦原则是不相符的”、权力高度集中的、坚强有力的帝国官厅。在这一强大的帝国官厅面前，最后甚至连普鲁士的大臣们也失去了参加联邦议会讨论帝国事务的兴趣，因为联邦议会已经成了一种摆设。这当然是俾斯麦所不愿看到的。他愿意加强帝国

^① David Blackbourn and Geoff Eley, *The Peculiarities of German History*, Oxford 1984, pp.276—277.

政府的权力，但他想将这种权力的加强建立在帝国政府和普鲁士政府“合二为一”的基础上，即将帝国和普鲁士之间存在于君主、主要大臣和军队中的一人兼二职的制度推广到其他官厅，普鲁士的大臣应领导相应的帝国各管理部门。如果俾斯麦的这一想法付诸实施，德意志帝国政府意味着将完全由普鲁士来领导。后来“考虑到各邦面对这样一种大普鲁士的解决方案可能产生不满情绪，同时又考虑到普鲁士内部的情况”，俾斯麦没有完全实施这一计划^①。

1876年6月，主张自由贸易的德尔布吕克与俾斯麦在保护关税政策上发生分歧，辞去帝国宰相办公厅主任的职务。俾斯麦开始按照他的意愿来加强帝国政府的行政权力。1878年—1880年，他通过“普鲁士国务秘书化”等形式对帝国与普鲁士之间的关系以及帝国行政管理部门的结构进行了多次部分性的解决。通过1878年3月的“副职法”，帝国和普鲁士官员一身兼二职的办法被延伸到帝国和普鲁士主要大臣的副职身上。例如，设立了帝国副宰相之职，帝国副宰相有权代表宰相处理各项工作，他同时又是普鲁士的副总理大臣。后来，俾斯麦又将帝国宰相办公厅分解成帝国内政、司法、财政、邮政、铁道等帝国官厅，然后任命在普鲁士政府中享有席位和表决权的普鲁士国务大臣来充当帝国各官厅的国务秘书，领导这些官厅，例如，帝国外交厅的国务秘书又是普鲁士的国务大臣。不过，在俾斯麦下台之后，“普鲁士国务秘书化”的组织制度才得到更有力的推行。

此外，德国政府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实行的国家社会保障体系适用于整个帝国，从而对帝国政府的统一管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此，帝国政府专门设立了覆盖全国的社会保障管理

^① [德] 卡尔·艾利希·博恩：《德意志史：从法国革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上册，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330页。

和监督机构。

随着政府各项管理事务的增多，德国政府的人员编制不断扩大。仅帝国最高层厅局级官员人数而言，1876年为500人，到1914年时已经增加到约2000人，增幅达300%^①。同时，帝国政府管理人员的数目也有相当规模的增长。

表 4-1 德意志帝国全体政府管理人员统计数字^②

年份	1871	1880	1890	1900	1910	1913
人数(万人)	20.4	22.4	26.7	35.3	44.2	46.0

根据以上统计数字，从1871年德意志帝国建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1913年，德国政府的管理人员数额翻了一番多。虽然这一数字不能完全说明与德国的中央集权主义发展趋势有关，但有一点或许可以说明，即政府管理人员不断增加的事实表明，后来的德意志帝国政府较之帝国建立初期管理的事务要多得多。而且，这种政府管理人员增加的趋势和我们前文所述的白领人数增加的趋势也是一致的。

(二) 春潮带雨晚来急——政治体制上向议会政治和民主化的迈进

我们在述及德意志帝国建立初期的政治特征时已经指出，德意志帝国是一个议会制门面之下的专制主义国家，立宪为虚，君主是实，德意志皇帝的手中集中了巨大的权力。贵族在国家政权中占据统治地位，资产阶级只是从参与意义上加入了统治阶级的

^① Manfred Rauh, *Die Parlamentarisierung des Deutschen Reiches*, Düsseldorf 1977, S.34.

^② 资料来源: Peter Flora, *State, Economy, and Society in Western Europe 1815—1975: A Data Handbook, Vol 1. The Growth of Mass Democracies and Welfare States*, pp.214—215.

行列。然而，时过境迁，随着德国工业化进程的飞速发展，德国社会的阶级结构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作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两大主要阶级的德国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力量日益壮大，他们都反对专制主义统治，要求取得政治权利，民主的呼声因此不断高涨。所有这些，最终促使德意志帝国的专制政治体制出现了向议会政体和民主政治转型的迹象。

就议会化倾向而言，我们必须分两个阶段，即俾斯麦统治时期和威廉二世统治时期进行阐述，才能弄清德意志帝国时期政治体制的这种转变趋势。

从帝国建立到1890年俾斯麦下台，是德意志帝国政治发展的第一阶段。在这一时期，国家的政治发展基本上操纵在俾斯麦的手中。有史学家认为，虽然俾斯麦耗费了很多精力在帝国议会和普鲁士邦议会上，并且在那里发表了许多精彩的演说，但在事实上他是一个议会和政党政治的反对者。他拒绝接受政党统治或多数派统治的原则，也拒绝任何扩大议会制政府的举动^①。其实，这一点在俾斯麦出任普鲁士首相之日起就已经很清楚，当时他宣称：大臣是国王的奴仆，而不是议会的奴仆。这意味着他是一个坚定的君主主义者。

不过，俾斯麦虽然拒绝承认他依靠多数派进行统治，但在实际的政治斗争中却又在表面上表现出对多数派的依赖性。这种依赖性可以从德意志帝国早期的政治生活中得出结论。在帝国初期，俾斯麦依靠民族自由党在帝国议会中的多数来开展他的巩固国家统一、加强中央集权的工作。在19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他又转而依靠不久前还反目为仇的、开始成为帝国议会第一大党的天主教的中央党，以便推行他的保护关税政策和打击社会民主党。俾斯麦之所以如此，其目的是为了利用议会多数派来实

^① Golo Mann, *The History of Germany since 1789*, p.365.

现自己的意图，而他不为议会多数派所左右。这种主动与被动的关系是俾斯麦与帝国议会多数派政党关系的关键和实质所在。正是由于这层关系，俾斯麦政府在处理与议会政党的关系上就牢牢掌握了主动权，也就是说，只要需要，政府随时可以寻找议会中另一政治集团的支持。因此，在俾斯麦统治时期的德意志帝国政治生活的特点是，帝国议会多数派角色可以不断地调换，但帝国宰相却始终是一个政治家。俾斯麦认为，他依靠的是他的威望和皇帝对他的信任而不是帝国议会的多数来进行统治的。他的委任状来自德意志帝国皇帝兼普鲁士国王，而不是议会。因此，帝国议会如果不服从的话，可以予以解散。而事实也表明，俾斯麦本人最善于选择适当的时机解散议会，并以煽动性的口号来发起一场选举战役。即便在新一轮选举中没能产生一个驯服的议会，“敌视帝国者”对当权者还是构成很大的威胁的话，俾斯麦仍然有其他办法“保持在自己家中的主人地位”^①。因为德意志帝国及其宪法实际上都是当局的恩赐，如果国家不感激的话，当局可以收回这些恩赐。在俾斯麦眼中，政府不是与国家一致的执行机关，而是可以与国家讨价还价的一种力量。

在政党问题上，俾斯麦也有一套令常人不解的理论。一方面，他反感政党政治，但同时，他又需要他们通过预算和法律，他通过利用他们而毁掉他们。他需要的是顺从的而非和他讨价还价的独立政党，否则他就弃之一边。他曾利用民族自由党来打击中央党，但当民族自由党在保护关税问题上成为他的政策的障碍时，他又转而争取他所痛恨的“敌视帝国者”中央党，依靠他们来为他的保护关税政策在帝国议会中鸣锣开道，同时帮他打击另一个“敌视帝国者”社会民主党。

俾斯麦为什么既反感德国的政党和议会政治，又要保存这一

^① Golo Mann, *The History of Germany since 1789*, p. 365.

套制度呢？1884年7月，俾斯麦在瓦尔青对“国内敌人”进行评论时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根据比洛夫在回忆录中的记载，俾斯麦并不想进行独裁统治，而且真正的专制独裁是与当时的德国政府完全不同的。作为现实主义政治家，他已经完全意识到了，在19世纪下半期的德国实行专制主义和独裁是不可能的。然而，一个议会制的政府对他来说也是不可能的，其理由基于俾斯麦对德国的政党和人民的政治能力的认识。这位宰相认为，德国的政党“既没有法国人的那种爱国主义，又缺乏英国人的常识”。因此，只要他还在官位上一天，他就不会支持建立对议会负责的政府。“由于普通德国人缺乏政治能力，理智的议会制度会导致1848年时所出现的那种状况，也就是说，上层的软弱和无能以及下层的自负和不断的新要求。”^①

俾斯麦的独裁统治不仅遭到资产阶级自由派政党和社会主义党等的反对，甚至普鲁士王储也抱怨，在俾斯麦的独裁统治下，“柏林的生活几乎使人无法忍受了”^②。

俾斯麦虽然不喜欢议会政治，但作为敏感而务实的政治家，他毕竟能够正确地认识到，在19世纪下半期的德国已经不可能再实行专制主义和独裁统治。于是，他在德意志帝国的政治生活中设置了一个议会门面，在不涉及专制主义实质的前提下，尽量地利用它来为自己服务。这正是俾斯麦的高明之处。其实，只要我们对俾斯麦以前的所作所为回忆一下，就对俾斯麦的这种策略有似曾相识的感觉，因为俾斯麦所推行的在普鲁士领导下统一德国的政策也是出于同一道理，即：既然德国统一是大势所趋，普鲁士容克阶级与其在统一的潮流中任人摆布，不如主动地面对统一潮流，并对之进行引导，利用它来为自己服务。他在谈到自己

① John Wroughton, *Nineteenth Century Europe*, London 1983, p.94.

② Golo Mann, *The History of Germany since 1789*, p.367.

承担起统一德国使命的原因时指出，“政治家如同森林中的一位漫步者”，必须“知道其前进的方向”^①。

但是，俾斯麦这一策略的运用有一个度，即只能在一定的条件下有效。当国家迅速工业化引起各种社会政治力量重新调整，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力量不断增强的时候，他的这一套策略就失效了。1890年，这位在德国及欧洲历史上叱咤风云数十载的人物终于挂冠而去，辞去了帝国宰相的职务。

从客观上讲，尽管俾斯麦顽固地坚持君主制，反对议会制政府，但在他执政期间，议会仍然在事实上发挥了一定的影响，有时他必须借助于帝国议会中某一集团的支持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而帝国议会中的反对力量也往往使这位宰相的意图一波三折，这一点可以从俾斯麦反对社会民主党的斗争中窥见一斑。1873年，俾斯麦为对付日益发展的社会主义工人运动，曾经提出了新闻出版法草案，该草案的第20条规定：“在印刷品中破坏道德、法制或爱国心的方式，攻击家庭、财产、义务兵役制或国家制度的其他基础的人，或把法律认为应该惩罚的行为说成是仿效的、有价值的或忠于职责的，或用危害公共安宁的方式攻击市民社会的有关系的人”，处两年以下徒刑或要塞监禁^②。后来，他又提出修改刑法，在刑法中加入对“煽动阶级仇恨者”处以刑罚的条款。然而，这两个提案都遭到当时在帝国议会中占多数的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拒绝，因为他们担心这两个提案中伸缩性很大的条文会对言论自由权利造成危害。甚至在1878年5月赫德尔刺杀威廉一世的事件发生后，当俾斯麦提出取缔社会民主党时，帝国议会中的资产阶级自由派和中央党仍然拒绝了他的提案。只是

^① Lothar Gall, *Bismarck: Der weisse Revolutionär*, S.128.

^② [德] 梅林：《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第4卷，三联书店1966年，第45—46页。

6月威廉一世再次遭到行刺，德国上下舆论哗然时，俾斯麦才得以利用形势，改选出新的保守派占多数的议会，通过了反社会主义者非常法。

由此可见，在俾斯麦执政时期，德意志帝国议会的影响和作用虽然相对微弱，但并非毫无作为。

到威廉二世统治时期，帝国议会的作用则有明显的增强，其地位也日益提高^①。按照美国史学家小罗伯特·赫恩顿·法伊夫的说法，“在威廉二世统治下，向议会制政府、尤其大臣对帝国议会的负责制正在发展，确实，那是极其缓慢的，然而却是实实在在的进步”^②。对此，我们可以从威廉二世统治时期帝国议会对帝国政治的影响中得出结论。

俾斯麦辞职后，威廉二世根据这位老宰相的推荐，任命格奥尔格·莱奥·冯·卡普里威伯爵为帝国宰相兼普鲁士总理大臣。由于镇压社会民主党的“非常法”的失败，这位新任宰相一反俾斯麦在国内政治中的强硬政策，转而实行国内和解政策。与此相对应，他在施政方针上也与老宰相的独断专行不同，而是更多地受到议会的影响。可以说，是议会政治直接地或间接地终结了这位德意志帝国宰相兼普鲁士总理大臣的政治生命。

1892年，普鲁士文化大臣策德利茨—特吕茨施勒向普鲁士邦议会提交了学校法草案。根据这一提案，普鲁士今后不再兴办混合教派学校，城市中此类学校的校理事会由教派的理事会接替，教会有权考察教师讲授的宗教课是否合格等。这一提案虽然

^① David Blackbourn and Geoff Eley, *The Peculiarities of German History*, p.277.

^② Robert Herndon Fife, Jr., *The German Empire between Two Wars: A Study of the Political and Social Development of the Nation between 1871—1914*, p.110.

受到中央党的欢迎，却遭到资产阶级自由派、各大学和许多城市的强烈反对。最后，威廉二世不得不出面要求修改此法案，策德利茨也因此而辞职。同时，卡普里威也遭到资产阶级自由党人和中央党人的批评。由于他曾在普鲁士众议院中支持过这一法案，因而遭到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反对；由于他后来又同意撤销这一法案，又遭到中央党的指责。卡普里威在两面夹击之下，不得不于1892年3月辞去了普鲁士总理大臣的职务。

1893年的帝国议会选举中，社会民主党取得巨大胜利。威廉二世和普鲁士总理大臣博托·欧伦堡^①提出制定一个新的特别法令来对付社会民主党。但卡普里威反对这样一个法令，因为他很清楚，这样的法令在帝国议会中得不到多数议员的支持。后来，他又说服威廉二世放弃了欧伦堡策划的用等级选举制代替普选制的计划。最后，由于这位帝国宰相和普鲁士总理大臣之间矛盾加剧，威廉二世于1894年10月同时免去了卡普里威和欧伦堡的职务，接替他们职务的是克劳特维希·霍亨劳厄—施林斯菲尔斯特侯爵。

霍亨劳厄曾任巴伐利亚总理大臣、德国驻巴黎大使和阿尔萨斯—洛林总督。他担任帝国宰相期间，受普鲁士财政大臣约翰内斯·冯·米克威尔和内政大臣冯·德尔·雷克等人的影响，继续实行反社会民主党的政策，其特点是所谓的“集结政策”（Sammlungspolitik），即集结一切居于支配地位的社会精英来抵制社会民主党，以保护自身的权力^②。1894年12月，他向帝国

^① 博托·欧伦堡在1878年担任普鲁士内政大臣时曾制订过“非常法”。

^② Geoff Layton, *From Bismarck to Hitler: Germany 1890—1933*, p.25; [德] 卡尔·艾利希·博恩：《德意志史：从法国革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上册，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445—446页。

议会提交了所谓的防止颠覆法草案。根据这一草案，唆使犯罪行为，煽动阶级仇恨，侵犯婚姻、家庭和财产以及污蔑国家及其机关都要受到比过去更严厉的惩罚。为了争取中央党的支持，草案中又加进了关于侵犯基督教、教会的教义和习惯也要受到惩罚的补充条款。然而，这一草案在帝国议会中遭到社会民主党、自由思想党和民族自由党等多数议员的反对，并于1895年5月11日被否决。

帝国政府当然不会坐视社会民主党的壮大和工人运动的发展。1899年5月，新任帝国内政部国务秘书阿图尔·冯·波萨多夫斯基—韦纳尔伯爵根据威廉二世的提议，向帝国议会提出了一项“长期监禁法案”，旨在加重惩罚强制结社，以便阻止社会主义自由工会用结社的方法壮大自己的队伍。然而，这一法案由于违背法治国家的权利平等原则，又遭到保守党以外的各政党的反对而流产。反社会民主党的提案在议会中的多次失败使波萨多夫斯基认识到，“压制政策是没有前途的”，遂转而“重新奉行社会改革和社会协调的政策”。

1900年10月，伯恩哈德·冯·比洛夫侯爵接替霍亨索伦出任帝国宰相兼普鲁士总理大臣。此后一段时期内波萨多夫斯基主持国内政策，而他从反对社会主义工人运动和社会民主党的法案不会得到帝国议会中多数派的支持而流产的事例中已经得出结论：要进行有效的统治，必须要赢得议会中多数派对政府的支持。因此，在以后制定某些法令时，他总是首先同帝国议会中的多数派达成协议，然后使联邦议会面对既成事实^①。这说明，帝国议会的态度在威廉二世统治时期确实已经成为帝国政府在施政时必须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帝国议会的地位较之帝国初期时已经有很

^① Thamas Nipperdey, *Deutsche Geschichte 1866—1918. Band 2. Machtstaat vor der Demokratie*, S. 491—492.

大的提高。

帝国议会作用的增强突出表现在帝国的财政改革上。自德意志帝国建立以来，财政困难一直是困扰帝国政府的一个问题，俾斯麦曾戏言“帝国是各邦的包伙人”。从德意志帝国建立之日起，拨归帝国国库的关税、几种间接消费税、帝国邮政的纯收入以及帝国直辖的阿尔萨斯—洛林的铁路收入等就无法满足帝国财政的需要。到世纪之交时，由于在社会保障方面的补贴、军费开支、殖民扩张等，帝国的财政更是入不敷出。1875年—1908年，军费支出按人口平均增长了95%^①。殖民扩张也使德国政府的开支大大增加。例如，1904年，德属西南非殖民地人民奋起反抗德国的殖民压迫，迫使德国政府调兵17 000人前往镇压，历时数载，耗资巨大，以致政府不得不要求议会追加军费。

面对庞大的预算赤字，德国政府不得不靠发行公债应急。到1904年时，帝国公债已经达到30亿马克。因此，帝国财政改革势在必行。

表 4-2 1900年—1908年德国政府财政收支情况 (单位：千马克)^②

年份	支出	收入	超支
1900	1 688 878	1 475 159	213 719
1901	1 768 755	1 512 686	256 069
1902	1 764 334	1 829 913	- 65 579

^① [法] 米歇尔·博德：《资本主义史 1500—1980》，东方出版社 1986 年，第 183 页。另：根据诺曼·斯通的《欧洲的转变 1878—1919》（第 166 页），19 世纪 70 年代早期，德国的国防预算为 10 亿马克，1909 年为 15.95 亿马克，1913/1914 年达到 24.05 亿马克。

^② 资料来源：Gerhard A. Ritter, *Das Deutsche Kaiserreich 1871—1914: Ein historisches Lesebuch*, S.320.

续表

年份	支出	收入	超支
1903	1 815 763	1 612 407	203 356
1904	1 872 120	1 687 820	184 300
1905	2 006 089	1 839 250	166 839
1906	2 186 575	1 888 069	298 506
1907	2 614 824	2 269 555	345 269
1908年预算	2 589 116	2 213 686	375 430

从上表可以看出，1900年—1908年短短数年间，德国政府的财政超支就达到了近20亿马克。

然而，财政改革必须得到帝国议会的认可。1906年，帝国政府获得了直接征收遗产税的权利。但仅此增加的收入远不足以满足政府的财政开支。1906年秋，帝国政府为镇压西南非殖民地起义，提出追加预算2900万马克，但因遭到帝国议会中最强大的中央党和社会民主党的反对而失败。当时中央党趁机提出了通过人事变动来清除德国殖民管理中的弊端的要求。为此，比洛夫政府不得不于同年12月解散议会，并将中央党作为反对党看待。

虽然如此，在财政问题上比洛夫政府仍必须与帝国议会打交道。1909年，帝国财政赤字继续存在，国债达到41亿马克。为了弥补亏空，帝国财政部国务秘书聚多夫提出了把遗产税由旁系亲属遗产扩大到子女遗产和夫妇遗产，并提高和新征各种消费税的议案。但是，这一提案在议会中同样遭到多方反对。社会民主党和自由意识党认为，消费税的提高将会使日用品价格上涨；保守党对比洛夫改革普鲁士议会选举法表示不满；中央党则痛恨比洛夫在1906年将它推到了反对党的位置上。结果，征税提案在帝国议会中遭到预料之中的失败，比洛夫在走投无路之下，被迫

于1909年6月提出辞职。7月，特奥巴尔德·冯·贝特曼—霍尔维格出任帝国宰相。最后，这位新宰相不得不接受了由中央党和保守党联合组成的帝国议会多数派提出的有关财政改革的决议。一位宰相因为在帝国议会中的失败而去职，这在德意志帝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更可喜的是，帝国财政改革最终还是顺从了帝国议会中多数派的愿望。这不能不使人感到，帝国议会的作用和力量确实增强了。

帝国议会作用的增强给议会中各政党在推动议会化方面以更大的鼓舞。1908年12月，社会民主党、中央党和自由意识党等进一步提出了新的要求：详细规定帝国宰相的职责，修改帝国宪法，今后任何宣战必须得到议会的赞同等。这些议案虽然没有得到通过，但议会在1912年时获得了关于质询时以多数决议确定议会意见的权利。这样，尽管议会不能推翻宰相，却可以表示对宰相的不信任。

帝国议会地位的提高还有许多具体的表现。19世纪90年代，新建的帝国议会大厦落成。1906年，帝国政府批准给予议员每月400马克的津贴。这是俾斯麦一直反对的，因为他企图通过拒绝发给议员津贴来给社会民主党议员参加帝国议会会议造成困难。帝国议会议员还可以在全德国免费乘坐火车。此外，帝国议会处理的事务日益增多，帝国议会的多数派政党领袖在各项政治决定中的影响力明显增强，从而使得帝国议会在事实上日益拥有联邦议会所拥有的那种权力。这一切都表明，议会政治在德意志帝国内的合法性正以一种积聚性的方式在悄悄发展^①。

在威廉二世统治时期，德意志帝国的民主化倾向也日益

^① 有关德意志帝国时期议会化倾向的详细情况，参见 Manfred Rauh, *Föderalismus und Parlamentarismus im Wilhelminischen Reich*, Düsseldorf 1972; Manfred Rauh, *Die Parlamentarisierung des Deutschen Reiches*.

明显。

1888年是德意志帝国三代皇帝交替接位的一年。3月9日，91岁高龄的威廉一世因肺炎去世，弗里德里希三世继位。然而，百天以后，即6月15日，这位德意志帝国的第二代皇帝因喉癌去世，年仅57岁。弗里德里希三世本是德国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希望。他娶了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的长女为后，曾在英国游历，熟悉英国的议会制度。他也曾多次对俾斯麦采用强制手段无视议会和公众舆论表示不满，希望“德国成为统一、自由和强大的国家”。因此，弗里德里希三世的继位得到资产阶级的欢迎，他们将他视为自由时代的曙光，期望这位新皇帝能给德国沉闷的政治生活带来一股清新的空气。1888年3月17日的《法兰克福报》曾写道：“皇帝的文告预示了立宪制度的美好前景，这种制度将能理解文明生活的要求并与之步调一致。”^①然而，这位带有自由主义色彩的皇帝的早逝使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希望破灭了。新皇帝威廉二世继位时年仅30岁，可谓正当年少，意气风发。从整体上看，威廉二世给人的印象是君权至上。1892年，他曾在慕尼黑来的来宾留言簿上写下了“君主的意志是最高法律”的字句，并承认自己从未读过宪法^②。甚至独断专横的俾斯麦也败在这位权力欲十足的新君主之下，于1890年拱手让出了紧握于手中20年的大权。威廉二世在1891年给新兵的一次演讲更能让人看清楚这位年轻皇帝的独裁专制面目：

^① [美] 科佩尔·S. 平森：《德国近现代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374页。

^② Robert Herndon Fife, Jr., *The German Empire between Two Wars: A Study of the Political and Social Development of the Nation between 1871—1914*, p.106; [美] 科佩尔·S. 平森：《德国近现代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379页。

新兵们！你们曾发誓效忠于朕。……这就是说，你们现在是朕的士兵。你们已经将你们的肉体 and 灵魂交给了朕。对你们来说只有一个敌人，那就是朕的敌人。因为目前社会主义的煽动，朕可能会命令你们向你们的家庭，你们的兄弟，对，还有你们的父母开枪——这也许会遭到上帝的禁止——但那时你们也必须毫无二话地服从朕的命令。^①

然而，威廉二世的“君权至上”论无法阻挡因国家迅速工业化而带来的社会进步和民主化进程。这种民主化趋势主要表现为一种民众政治的潮流，即民众在物质生活日益丰富、信息传递日益迅速的条件下开始关心和参与政治生活，公共舆论对政治的监督力度也明显增强。

其一，民众参与政治生活的意识日渐增强。这一点可以从历届帝国议会选举时民众参加投票人数增加的趋势上表现出来。

表 4-3 德意志帝国时期享有选举权公民参加帝国议会选举投票的百分率^②

年份	1871	1874	1878	1884	1887	1893	1903	1907	1912
选民参加选举的百分比	50.7	60.8	63.1	60.3	77.2	72.2	75.3	84.3	84.5

从上表可以看出，在德意志帝国时期，拥有选举权的公民参加帝国议会选举的比例整体上呈现逐步上升的趋势。1871年帝国建立时还只有一半的选民参加帝国议会选举的投票，到1912年时，投票率已经高达84.5%。由此可见，民众参与政治生活的热情在上升。

其二，在威廉二世统治时期，人们对威廉二世专制性的言论

^① Geoff Layton, *From Bismarck to Hitler: Germany 1890—1933*, p.18.

^② 资料来源: Gerhard A. Ritter, *Das Deutsche Kaiserreich 1871—1914: Ein historisches Lesebuch*, S.366.

表现出日益强烈的对抗情绪，专制政府左右政局的能力减弱。1893年，威廉二世在一次高级军官的集会上曾发出威胁，要将议会中新军事法案的反对者击得粉碎。这一演说虽然理所当然地引来一些尖锐的批评，但这些批评仅局限于议会各集团的小圈子中，而且只是小心的和不公开的批评。然而，到1912年时，情况大变。是年5月，由于反民族的煽动性宣传，在阿尔萨斯—洛林，人们要求采用新宪法。威廉二世盛怒之下，向斯特拉斯堡市长作了如下表示：“朕会将你们的宪法击成碎片，并将你们合并为普鲁士的一个省。”^①这件事本应会得到所有爱国的德国人的支持，而且事实上人们也不相信皇帝真的会将他的威胁付诸行动。然而，使人意想不到的，这件事却引发了一场大规模的反对“个人政府”的运动，因为威廉二世要将阿尔萨斯—洛林变为普鲁士一个省的言论表明，这位君主没有将宪法对这一帝国直辖领地的规定放在眼里。于是，不仅社会民主主义者、资产阶级激进派的各种杂志，以及对普鲁士的支配地位特别敏感的巴伐利亚和符滕堡的各种期刊表现出他们对威廉二世的言论的愤怒，而且资产阶级自由派的许多报纸以及中央党和保守党的一些报刊也趁机警告这位君主，“不要超越宪法的约束”。这一事件的结果表明，宪法已经超出了君主攻击的范围^②，在人们的心目中成了高于君主的东西。

其三，人们对专制政府也日益表现出不满情绪，这一点我们

① Robert Herndon Fife, Jr., *The German Empire between Two Wars: A Study of the Political and Social Development of the Nation between 1871—1914*, p. 106.

② Robert Herndon Fife, Jr., *The German Empire between Two Wars: A Study of the Political and Social Development of the Nation between 1871—1914*, pp. 110—111.

可以从公众舆论对政府对外政策的批评中有所体会。根据德意志帝国宪法，德意志帝国的外交事务的权力是直接由君主来掌握的。然而，进入20世纪以后，德国公共舆论对皇帝在外交方面的态度显现出日益敏感的趋势。

1900年，英国人与布尔人争夺南非的布尔战争爆发。在此期间，威廉二世曾出访英国。当时德国在南非有着巨大的利益，且英国和德国在南非矛盾尖锐。据统计，仅1886年—1896年间德国向南非德兰士瓦的商品输出就从每年的30万英镑增至1200万英镑。德国资本家还和荷兰资本家一道，于1893年—1894年获得了在比勒陀利亚的铁路修筑权。因此，“泛德意志联盟”为了巩固德国在南非的利益，提出了“上德意志和下德意志分子（即德国移民和布尔人）之间的团结”的口号^①。结果，德皇威廉二世与维多利亚女王以及英国王室的血缘关系成了“德国爱国者们恼怒的根源”。

1905年，德国为打破法国人对摩洛哥的独占，确保自己在这一地区的利益，挑起了第一次摩洛哥危机。德皇威廉二世亲自出访摩洛哥港口城市丹吉尔，对法国进行示威，声称要有效地保护德国在摩洛哥的利益。德国宰相比洛夫则以战争相威胁，要求法国同意召开国际会议，调整各国在摩洛哥的地位。然而，1906年1月在西班牙阿尔杰西拉斯召开的国际会议上，出席的14国代表中只有奥匈帝国支持德国，甚至连三国同盟成员之一的意大利也站到了法国一边。德国完全陷于孤立，德国对摩洛哥的野心因此而破灭。德国舆论界为此而“感到痛苦”。于是，政府遭到各种“尖锐的批评”，宰相比洛夫和威廉二世皇帝一起成了“阿

^① 参见王鹏飞等编著：《近代国际关系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378—379页。

尔杰西拉斯会议上失败的替罪羊”^①。

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每日电讯》事件。1908年10月28日，伦敦《每日电讯》刊登了英国人斯图亚特—沃特利写的威廉二世访问记，该文的发表得到了威廉二世的同意。根据此文，威廉二世称自己是英国人的朋友，由于这种态度，他在德国属于少数派。在布尔战争期间，他阻止建立一个反英大陆同盟，并曾给维多利亚女王送去对布尔人作战的计划，这个计划和英国人据以战胜布尔人的计划完全一致。德皇的这一谈话当时在国内外立即引起了极大的不满。英国人据此认为德国的反英态度是德英关系恶化的原因，并将威廉二世所谓给英国人提供战胜布尔人良策的说法视为一种傲慢自负，因而愤慨不已。法国和俄国则把德皇关于大陆同盟的说法视为离间它们与英国关系之举。在国内，泛德意志派则指责“皇帝对英国人过份友好，从背后袭击了布尔人”。结果，德国所有党派都为皇帝独断专行地破坏德国对外关系的做法感到愤慨，甚至保守党也发表声明，“要求皇帝今后要更多地克制自己”。帝国议会则开会讨论这一事件。宰相比洛夫在激烈的舆论批评面前，不敢承担责任而为皇帝辩护，反而声称，“即使在私人谈话中，如果今后皇帝不更多地加以克制，宰相就不能对帝国的政策负责”。德国舆论的普遍抨击动摇了威廉二世的自信心^②。最后，这位皇帝不得不“从社会和政治生活中脱身”。

① Robert Herndon Fife, Jr., *The German Empire between Two Wars: A Study of the Political and Social Development of the Nation between 1871—1914*, p. 111.

② 参见 Thomas Nipperdey, *Deutsche Geschichte 1866—1918. Band 2. Machtstaat vor Demokratie*, S. 485; Robert Herndon Fife, Jr., *The German Empire between Two Wars: A Study of the Political and Social Development of the Nation between 1871—1914*, pp. 111—113.

他公开发表声明，允诺今后将履行他的“宪法方式的责任”^①。在皇帝认错下，报刊和议会中的风暴才平息下来。

综上所述可见，在德意志帝国中后期，特别是在威廉二世统治时期，政治发展已经有了向议会化和民主化方向转变的迹象。当然，这时我们还不能因此而过高地估计德意志帝国在政治方面的进步。从整体上说，在整个德意志帝国时期，君主专制统治始终是德国政治体制的最基本的特征。

（三）暗涛汹涌——各种利益集团的出现和主要政党力量的消长

工业化的一个重要后果是社会分工趋于复杂化，各种新型职业和新式行业部门不断出现。正是由于这种原因，自19世纪中期以后，随着工业化的深入，在德国出现了代表各种新型职业、经济部门和社会集团的利益组织^②。从形式上看，这些利益组织可分为两类：一类为国家授权的、拥有官方权力的利益组织，诸如商会等；另一类则为自由组合的民间协会组织。从活动内容上看，这些利益组织又可分为经济和政治两大类。尽管这些利益组织的类别和活动内容不尽一致，但总的说来，他们都是当时德国社会中复杂的政治和经济关系的实质性反映^③。

① Deutscher Bundestag, *Fragen an die deutsche Geschichte: Ideen, Kräfte, Entscheidungen von 1800 bis zur Gegenwart*, S.223.

② Hans-Peter Ullmann, *Organisierte Interessen im Deutschen Kaiserreich*. In: Helmut Rumpler (Hg), *Innere Staatsbildung und gesellschaftliche Modernisierung in Österreich und Deutschland 1867/71 bis 1914*, Wien, München 1991, S.92.

③ Gerhard Schulz, *Über Entstehung und Formen von Interessengruppen in Deutschland seit Beginn der Industrialisierung*. In: Heinz Josef Varain (Hg), *Interessenverbände in Deutschland*, Köln 1973, S.25.

在商业领域，19世纪初，美因茨、科隆和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等城市早在拿破仑统治时期就建立起了自己的商会。普鲁士东部各省也在1820年后建立了一些商人同业组织。1848年，普鲁士政府专门颁布“关于商会机构的规定”，确定商会有义务根据官方的要求汇报，并有权监视商业和手工业组织，从而使之有了官方色彩。在19世纪中期以后相继建立的商业利益组织有1858年成立的“德国国民经济学家大会”、1861年的“德国商业议会”等。19世纪中期以后，这类利益组织扩散到其他领域。在工业领域，早在19世纪中期就出现了一些旨在促进工业和交通发展的利益组织，其中有1852年成立的“关税同盟各邦冶铁和矿山联合会”、1859年成立的“南德棉纺织工业家联合会”、1858年成立的“多特蒙德高级矿务局专区采矿利益联合会”等。在德国农业界，早在19世纪40年代就出现了一些利益组织，其中有1842年的“农村经济协会”、1848年的“保卫地产利益联合会”和1862年成立的“威斯特发伦农民联合会”等。在政治领域中，则出现了德意志帝国时期的民族主义组织的一些先驱性组织，如德意志民族联合会、德意志改革同盟等。

德意志帝国时期，利益组织得到进一步发展。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深藏于经济和政治两个方面。从经济上看，1873年开始爆发的大规模经济危机使德国经济遭到沉重打击，各利益集团为了捍卫自己的利益，纷纷建立起利益组织。进入19世纪90年代，随着德国经济的繁荣，经济及社会竞争加剧，利益相同或相近的部门和集团于是组成特定的代表性组织，以便能从繁荣的经济中争取最大利益。从政治方面看，德意志帝国建立以后出现了中央集权化的趋势^①，国家干预加强。由于这种干预政策不可能

^① 有关德意志帝国时期中央集权化的趋势，参见邢来顺：《略论德意志帝国时期政治架构的发展趋势》，载《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2期。

对帝国内各社会经济和政治集团产生均衡的利益影响，各种利益集团因此积极行动和组织起来，以便对帝国政府的有关决策施加重大影响^①。

从内容上看，德意志帝国时期的利益组织基本上可分为经济和政治两大类，呈现三大发展特点。一是数量明显增加。以工业、手工业和商业领域为例，1869年共有27个利益组织，1879年为47个，到1907年时，在所谓的“每个新目标一个新联盟”的原则下，猛增到522个，分支组织更达到5000个^②。足见其惊人的增长速度。

德意志帝国时期利益组织发展的第二个特点是规模扩大，出现了集中趋势，呈金字塔型组织结构。

由于工业化发展程度的关系，大型的利益联盟首先出现在工业领域。1871年，德国成立了第一个大规模的地区性企业家协会——“莱茵—威斯特伐尔保卫共同经济利益联合会”。1874年，该组织与西里西亚冶铁工业界联合，建立了第一个全国范围的大规模行业协会——“德国冶铁工业家联合会”（同年10月改名为德国钢铁工业家联合会）。1876年2月，主张保护关税的钢铁、纺织等工业界又组织成立了“德国工业家中央联合会”（Centralverband Deutscher Industrieller）。1895年，中、小型加工工业企业又组成了“工业家同盟”（Bund der Industriellen）。为

① Hans-Peter Ullmann, *Organisierte Interessen im Deutschen Kaiserreich*. In: Helmut Rumpler (Hg), *Innere Staatsbildung und gesellschaftliche Modernisierung in Österreich und Deutschland 1867/71 bis 1914*, S.92.

② Hans-Peter Ullmann, *Organisierte Interessen im Deutschen Kaiserreich*. In: Helmut Rumpler (Hg), *Innere Staatsbildung und gesellschaftliche Modernisierung in Österreich und Deutschland 1867/71 bis 1914*, S.95, 97.

了表达自己的意愿，德国商业界也分别于1900年和1909年成立了“商业条约联合会”和“手工业、商业和工业汉萨同盟”，手工业者则于1883年建立起自己的全国性利益组织“全德手工业者同盟”。在农业领域，也出现了1893年建立的“农场主同盟”以及1900年成立的“基督教农民联合会”等。

德意志帝国时期全国性政治类利益组织，则主要有带有民族主义和扩张主义色彩的1882年建立的“德国殖民联合会”，1891年建立的“泛德意志协会”和以维护阶级利益为特征的“德国雇主协会联合会”、“德国自由工会”等。

在形成以上全国性利益组织的过程中，一个突出的特点是集中的趋势，即通过小的利益组织加入大的利益组织的方式，组成金字塔结构的大的利益集团。以工业领域为例，19世纪90年代以后，实际上已经只有两个巨大的顶级性的利益组织，即“德国工业家中央联合会”和“工业家同盟”。其中，“德国工业家中央联合会”发展成为德国最大的工业利益协会。1881年，“德国工业家中央联合会”包括38个联盟会员，1916年时增加到了216个。“工业家同盟”在1897年时有12个联盟会员，到1916年时也增加到了204个^①。这种发展一方面加强了利益集团的力量，使其影响力越来越大，但同时也使其内部各成员之间的利益均衡问题提上日程，矛盾越来越大。

帝国时期利益组织发展的第三个特点是，无论是经济类利益组织还是政治类利益组织，其斗争目标都很明确。

在工业部门，早期的利益协会大多是为了改善交通状况和促进工业发展而建立的。如1858年建立的“多特蒙德高级矿务局

^① Hans-Peter Ullmann, *Organisierte Interessen im Deutschen Kaiserreich*. In: Helmut Rumpler (Hg), *Innere Staatsbildung und gesellschaftliche Modernisierung in Österreich und Deutschland 1867/71 bis 1914*, S.98.

专区采矿联合会”以及“莱因—威斯特发仑商业和手工业联合会”等都致力于促进低运费铁路交通运输事业的发展。1852年成立的“关税同盟各邦冶铁和矿山联合会”、1859年成立的“南德棉纺织工业家联合会”以及1871年建立的德国第一个大规模的地区性企业主协会“莱因—威斯特发仑保卫共同经济利益联合会”等则将反对自由贸易、保护本行业免受英国的竞争作为自己的努力目标。1876年2月，主张实行保护关税的钢铁、纺织工业界又成立了“德国工业家中央联合会”，旨在通过贸易保护主义捍卫其成员的经济和社会政治利益。这一协会迅速发展成为当时德国最大的工业利益协会。

商业界的利益组织主要处于商会的支配之下。19世纪中期以后，商会向全国性规模发展，其中有1858年成立的“德国国民经济学家大会”和1861年成立的“德国商业议会”等。与工业界利益组织不同的是，各商业利益组织从本身的利益出发，都是自由贸易的鼓吹者，反对保护主义，因为保护主义不利于商业的发展。19世纪70年代末以后，由于德国政府转向贸易保护主义，商业利益组织的主张往往受到忽视。虽然1900年建立的“贸易条约联合会”和1909年建立的“汉萨手工业、商业和工业同盟”等使自由贸易主张者的力量得到加强，但其对德国政府的影响力仍相对微弱^①。

作为传统行业，农业界利益组织的出现相对较早。早在18世纪下半期，德国农业界就已经出现了著名的“王国农业经济协会”等组织^②。19世纪以后，这类组织继续增加，如“农村经济

^① Hans-Ulrich Wehler, *Das Deutsche Kaiserreich 1871—1914*, Göttingen 1977, S.91.

^② Gerhard Schulz, *Über Entstehung und Formen von Interessengruppen in Deutschland seit Beginn der Industrialisierung*. In: Heinz Josef Varain (Hg), *Interessenverbände in Deutschland*, S.34—35.

协会”(1842年)、“保卫地产利益联合会”(1848年)、“北德大农场主大会”(1868年)、“莱因农民联合会”(1882年)等。比较大的农业利益组织则有1871年成立的“税收与经济改革者联合”以及1893年成立的“农场主同盟”等。从整体上看,农业利益组织在19世纪70年代以前主张自由贸易,以便输出农产品和进口廉价工业品,但在19世纪70年代以后,由于经济危机的爆发,这些组织迅速转向贸易保护主义,寻求对农产品实行关税保护,以防止美、俄等国廉价农产品的竞争。

此外,手工业者也于1883年建立了自己的利益组织“全德手工业者同盟”,希图通过相互间的团结来对付工业化的冲击。然而,在大工业竞争压力下处于不断分化之中的这一阶层显得有些软弱无力,影响力甚微。

除了以上各种以经济利益为目标的利益组织外,还有一类专门将某种政治目标作为努力方向的利益协会。其中,与1882年建立的“德国殖民联合会”、1884年成立的“德国殖民公司”有紧密联系的“德国殖民协会”(1887年)实际上就是一个宣传帝国主义殖民扩张的联合体^①,而1891年建立的“泛德意志协会”则充满着种族主义、泛日耳曼主义和扩张主义的意识,1894年成立的“德意志东马克联合会”则是一个反波兰人的民族主义组织,1898年成立的“德国海军联合会”和1912年成立的“德国国防军联合会”则是扩充军备的鼓吹者^②。

各利益组织分别侧重于不同的经济和政治目标,同时他们还

^① Hans-Ulrich Wehler, *Expansionistische Interessenverbände und der "Deutsche Kolonialverein" von 1882*. In: Heinz Josef Varain (Hg), *Interessenverbände in Deutschland*, S.175—184.

^② Hans-Ulrich Wehler, *Das Deutsche Kaiserreich 1871—1914*, S.92—93.

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阶级特征十分明显。作为现代大工业产物的工人阶级较早地广泛地建立起了自己的利益组织。1866年左右的经济危机造成的工人工资的下降、失业和农业歉收所引发的生活品价格的上涨等迫使工人起来为增加工资进行斗争，从而对第一批工人组织的建立起到了推动作用^①。1865年，“全德烟草工人联合会”和“裁缝协会”成立。1866年，“全德印刷工人联合会”成立。1868年，又成立了“全德面包工人联合会”。起初，这些工人组织都保持政治上的中立，1868年以后则开始形成政党影响下的工会组织。这一年，施韦泽领导下的全德工人联合会建立了与该组织紧密联系的“全德工人阶级协会”，资产阶级进步党人马克斯·希尔施和弗兰茨·东克尔也建立了依附于进步党的“希尔施—东克尔行会联合会”。最强大的工会组织则是根据奥古斯特·倍倍尔的建议于1868年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德国自由工会”。1894年，德国另一大工会组织“基督教工会”建立。

三大工会无论在指导思想上还是在发展规模上都大不相同。“希尔施—东克尔工会”主张在现存的国家和社会秩序范围内改善工人的状况，除了罢工斗争外，这一工会还有保障功能，即在其成员陷于困境时给予帮助，但该工会规模一直较小。“自由工会”的目标则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它不仅要在现存制度下改善工人的状况，而且希望建立一种全新的经济和社会秩序。“基督教工会”则信仰基督教并承认现存君主制。虽然工会运动处于一种分裂状态，但它在德国工人阶级自我意识的培养、工人职业培训以及成员互助等方面都是有积极作用的。

除了以上工会组织外，19世纪90年代以后还出现了一批职业工人协会，其中有“五金工人协会”（1891）、“木工协会”（1893）、

^① Arno Klönne, *Die deutsche Arbeiterbewegung: Geschichte—Ziele—Wirkungen*, Düsseldorf 1980, S.69.

“钳工和机器制造者协会”（1892）、“锻工协会”（1912）等。

面对日益壮大的工人运动，企业主们也试图通过成立利益联盟来共同对付工人阶级的威胁。在这类利益联合会中，最早可追溯到1869年为对付“德国印刷工人联合会”而成立的“德国印刷业联合会”。此后又陆续出现了“汉堡—阿尔托纳雇主协会”（1890年）、“德国钢铁工业家联合会”（1900年）和“德国木器行业雇主协会”（1902年）等。1904年，为了对付不断高涨的工人罢工，德国纺织业雇主成立了全国范围内的“德国纺织工业雇主协会”。同年，“德国雇主协会联合会”成立。据此，凡参加工会宣传的工人都被列入雇主协会的黑名单，以便他们无法在同一个行业的其他企业中找到工作^①。

从总体上看，每一个利益集团都倾向于某一政党势力，其中，以重工业集团占主导地位的“德国工业家中央联合会”与保守党、自由保守党，特别是后者有着密切的关系。商界利益组织多与民族自由党、进步党等有关系。农业利益组织则是保守党的阵地。至于工会组织，“自由工会”是社会民主党的天下，“基督教工会”和“希尔施—东克尔工会”则分别是中央党和进步党的势力范围。同时，各利益协会内部也并非铁板一块，以德国工业家中央联合会为例，由于以重工业和纺织工业为主导地位的利益集团主张贸易保护主义，与当时称霸世界的德国化学工业集团的自由贸易主张相悖，最后“保卫化学工业利益联合会”于1889年离开了“德国工业家中央联合会”。

各利益协会虽非政党性组织，但其影响力不可低估。“德国工业家中央联合会”以及“税收和经济改革者联合会”农场主集团等就对俾斯麦时期德国政府的经济政策由自由主义转向保护主

^① Karl Erich Born, *Wirtschafts-und Sozialgeschichte des Deutschen Kaiserreichs (1867/71—1914)*, S. 99—100.

义产生了巨大的影响^①。而工会的各种罢工斗争等也对德国政府社会保障立法的出台起到了促进作用。

德意志帝国的政党政治与英、美两国的政党政治相比，有着自己的特点。

首先，无论在英国还是在美国，主要是一种两党政治，即一个党持一种相对自由主义的思想，另外一个党持一种相对较保守的思想。在两大政党之外，有时有一些短命的小党。德意志帝国的政党政治则不然，它可以分为许多小的派别，每一种社会、政治和经济潮流都可以使德意志帝国政治生活中出现一个新的党派。例如，19世纪70年代初，天主教势力为捍卫自己的利益，成立了中央党；由于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并入，在普鲁士众议院中出现了丹麦党，与此类同的地方党派还有汉诺威党、阿尔萨斯—洛林党、波兰党等。德意志帝国政治生活中政党的这种复杂多变的特点随着19世纪八九十年代经济的发展和由此而引发的帝国对内和对外政策的变化而更趋复杂化。例如，社会民主党的力量随着工人阶级队伍的壮大而迅速增长，原有的资产阶级自由派集团也由于在关税以及其他经济问题上的意见分歧而不断分裂。

其次，与英国和美国等的各党轮流执政不同，由于德意志帝国的宰相和各邦大臣都是由皇帝和各邦君主任命的，并不服从于政党政治，德国的政党因而不存在执政党和反对党的角色互相更迭的问题，也就是说，它们都没有组织政府和执政的可能，它们充其量只能在对待政府的态度上划分为政府派政党和反对党。

虽然政党政治在德意志帝国政治架构中的作用并不显得十分

^① Hans Rosenberg, *Interessenorganisation und wirtschaftspolitische Umorientierung im Bismarckreich*. In: Heinz Josef Varain (Hg), *Interessenverbände in Deutschland*, S.167—170.

重要，但随着国家的工业化，德意志帝国内各阶级和各阶层的经济和社会利益呈现出大幅度的调整，各阶级和阶层间的力量对比也发生巨大变化。与这种变化相对应，帝国的各政治派别的力量也必然会出现不断的消长变化。

鉴于德意志帝国时期政党数目众多，且各政党力量消长和分化组合复杂，我们不妨先将各政党派别按照其政治立场大致划分为保守派集团、天主教集团、右翼自由派集团、左翼自由派集团和社会主义集团等五个大的利益群体，然后逐个予以分述。

保守派集团由德意志保守党（极端保守党）和帝国党（自由保守党）所组成。

我们在德意志帝国前期的政治状况中已经述及，德意志保守党来源于普鲁士的保守党，主要代表普鲁士容克地主的利益，因此，其政治态度有两大特点：一是普鲁士主义，强调普鲁士在德意志帝国中的特权地位，反对将普鲁士的利益淹没在帝国的利益中；二是强调农业的重要性，把维护农业利益作为自己的重要职责。

就政治影响力而言，保守党的力量与它的规模的大小极不相称。由于它是普鲁士君主制的支柱，在德意志帝国这种特殊的政治结构中就明显地占有一种优势，它始终与德皇及其政府保持着密切的关系。虽然在帝国早期因反对俾斯麦统一德国的政策而一度与俾斯麦政府微有不和，但自 1878 年俾斯麦与民族自由党分道扬镳后，它就一直是政府派的政党，军队中的大部分军官和将军、国家官吏中的大部分大臣和最高官员都来自保守党。从保守党在帝国议会中的力量来看，它在德意志帝国时期的历届选举中从未获得过 80 个以上的席位，常处于第三或第四位。

作为政治特权阶层和旧势力的代表，面对工业化以及由此而带来的社会主义工人运动和资产阶级的议会化要求等，保守党起初采取一种僵硬的防御态度。但是从 19 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开始，保守党开始改变其政治策略，即力图像中央党和社会民

主党一样，通过群众性运动，使自己变成民众性政党。而这一策略的转变确实一定程度上使保守党显现出某种生机。

首先在这方面作出尝试的是社会政治活动家、柏林宫廷传教士阿道夫·施丢克尔。施丢克尔认为，必须通过广泛的社会改革来与社会主义作斗争，即“用建立在基督教基础上的健康的社会改革来消除社会革命”^①。为此，他提出了一套国家社会政策的纲领，即通过实行累进所得税等，将工人争取到教会和君主制的立场上来。1878年，他创立了基督教社会党（Christlich—Soziale Partei）。1879年，保守党为了壮大力量，将施丢克尔的基督教社会党吸收到自己的队伍中。19世纪90年代后，由于保守党将主要力量集中于农业利益方面，施丢克尔于1896年率领他的基督教社会小组退出了德意志保守党。

施丢克尔对保守党的另一个影响是反犹太主义。施丢克尔起先因宗教的原因而主张反犹太主义，然而这一思想很快超出了宗教的范畴，成为种族意义上的反犹太主义。在19世纪90年代早期，保守党为了争取德国中等阶级集团的力量，也将反犹太主义纳入自己的政治纲领中，以此来赢得那些因欠债而对犹太人持嫉视态度的地主和农民的支持，并吸收其他的反犹太人派系^②。而保守党推行反犹太主义的结果是，它“在提高威信方面取得了它所能希望的最大收获”^③。

这一时期德国保守主义阵营中反犹太主义抬头是有其历史背景

① [美] 科佩尔·S. 平森：《德国近现代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233页。

② Robert Herndon Fife, Jr., *The German Empire between Two Wars: A Study of the Political and Social Development of the Nation between 1871—1914*, p.121.

③ [美] 科佩尔·S. 平森：《德国近现代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234页。

的。从历史上看，虽然在欧洲和德国一直存在反犹主义，但这一时期德国反犹主义的高涨则另有其原因，从根本上说，它是工业化进程中农业及手工业受到日益强大的经济压力的结果。众所周知，在1878年以后，德国政府考虑到容克地主和大工业家的利益，开始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然而这一政策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农业阶层在迅速工业化进程中的被动局面。在整个“大萧条”时期，农产品价格一直处于低水平上^①，而且工业化使许多劳动力脱离农村走向城市，从而使得农业工人的工资上涨。同时，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化学家们开始生产原来只有农业中才能生产的产品，如“糖精”和“人造黄油”等。到19世纪90年代初，“大萧条”达到顶点。所有这一切，都使得农业陷入困境中，手工业也在呈加速趋势的工业化浪潮面前日益陷入窘境。在这种形势下，人们将矛头指向犹太人，认为他们是德国农业陷入困境的好处获得者。例如，汉诺威的马商通常是犹太人，他们在报价时并不总是那么大方慷慨。而地方财政和进出口生意等通常都掌握在犹太人手中，犹太人受益于现代环境也远远高于德国的其他社会集团。据统计，在普鲁士，每10万新教男性公民中有58人受过高等教育，天主教徒中有33人受过高等教育，而犹太人受高等教育的比例却达到519人^②。所有这一切都不能不引起债务缠身的德国农业界和手工业界的愤恨和嫉视，保守派因之利用反犹来获取支持力量。

保守派势力反犹的另一个原因，是想以此来打击资产阶级激

① 据统计，1868/69—1875/76年德国每吨小麦的价格为223马克，1885/86—1891/92年降为181马克；同期黑麦的价格从173马克降到156马克，大麦的价格从165马克降至148马克。见A.Sartorius von Waltershausen, *Deutsche Wirtschaftsgeschichte 1815—1914*, Jena 1923, S.323.

② Norman Stone, *Europe Transformed 1878—1919*, p.181.

进派。当时的资产阶级自由派与犹太人之间关系密切，自由派的一些著名领导人都与犹太人有关系，如拉斯克就是一名犹太人，班贝格和欧根·里希特等人或是半犹太人、或娶了犹太人为妻。

19世纪90年代后，保守党在维护农业界利益方面的立场显得日益突出，这主要是因为从19世纪90年代初开始，德国农业陷入更深的困境之中。当时，俾斯麦的继任者卡普里威政府出于以下考虑，决定放松对食品的关税：首先，工业资产阶级要求降低食品关税，否则的话，他们将不得不支付较高的工资；其次，卡普里威想通过降低食品关税来取得左翼党派对军备提案的支持。这一举动自然遭到代表容克地主利益的保守党等右翼势力的强烈反对。于是，保守党开始将主要精力集中于维护农业方面的利益，保守党的一位领导人卡尼茨—波丹根伯爵为此提出了通过国家保证粮食价格的办法来击败“犹太人的”自由贸易^①。自从1893年“农场主同盟”建立后，维护农业上的利益更成为该党政治中最主要的特征。有人在评价保守主义在德国的发展时曾作了精辟的归纳：“普鲁士的保守主义在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统治时期还是一种政治的世界观，在俾斯麦执政时，无论如何还体现着一种思想传统，到卡普里威执政时期则成为一种单纯的利益集团。”^②

至于自由保守党，其利益范围较之德意志保守党要广，它不仅与农业界有联系，而且与大工业家们也有联系。它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完全支持俾斯麦政府的政党，因此，它和保守党一样，许多成员同时又是政府的要员。当1878年俾斯麦与民族自由党分

^① Norman Stone, *Europe Transformed 1878—1919*, p.183. 保守派将主张自由贸易的资产阶级自由派称为“犹太人”。

^② [德] 卡尔·艾利希·博恩：《德意志史：从法国革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上册，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419页。

裂后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时，代表大土地所有者和大工业家利益的自由保守党和代表农业利益的保守党都支持俾斯麦政府的新政策，双方相互接近，两党的政纲因此变得难以分清。按照资产阶级进步党领袖弗里德里希·诺曼的说法，这时的自由保守党和保守党已经结成了“铁、煤、纱和粮食的联盟”^①。

右翼自由派集团的核心是资产阶级的民族自由党，它从工业家们那里得到资助，主要支持者是城市以及部分农村中的中等阶级。在政治上，它反对各邦分离主义，主张中央集权，要求建立资产阶级议会制国家。在经济上，它的主要特征是坚持自由贸易政策。然而，诚如有关史学家所言，德国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发展显得很不幸。在德意志帝国建立前，它要首先满足国家的统一，从而成了推行国家统一政策的“铁血政策”的牺牲品。帝国建立以后，民族自由党又遭到来自政治和经济两方面的压力，在政治上，社会民主党力量的发展和壮大迫使民族自由党日渐趋于保守；在经济上，它则遭到了贸易保护主义的打击。

在德意志帝国建立初期，民族自由党是帝国议会中的第一大党，也是俾斯麦政府在议会中的主要支柱，在打击天主教势力和中央党的文化斗争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然而，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使得这一资产阶级政党遭到来自左右两方面的压力，出现了左右两方面的分离趋势：左的方面对它的自由主义的力度表示不满，右的方面则对它的民族主义倾向提出质疑^②，它因此而日渐走向衰落。

民族自由党受到的最致命的打击是1878年以后德国政府对

① [美]科佩尔·S.平森：《德国近现代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232页。

② 参见：David Blackbourn and Geoff Eley, *The Peculiarities of German History*, p.263.

外贸政策的转变。1873年以后，资本主义世界出现经济危机，面对英国的大量廉价工业品和北美、东欧的大量农产品的涌入，德国的工业界和农业界纷纷要求实行保护关税。俾斯麦政府也因此由自由贸易政策转向贸易保护主义。主张自由贸易的民族自由党不仅因此而失宠于俾斯麦政府，而且在1878年的帝国议会选举中遭到大败，由1877年的128个席位降至99个席位，勉强维持了帝国议会中第一大党的地位。

1879年7月保护关税法案的通过更给民族自由党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这一政党内部开始分裂。在这次议会投票表决中，民族自由党国会党团中特赖奇克等15名右翼议员违背党的命令，投票赞成保护关税。一年以后，即1880年夏天，该党的左翼分子在拉斯克等人的带领下退出了民族自由党，组成了新的“自由联合”（*Liberale Vereinigung*）。从此，民族自由党由帝国议会中的第一大党逐渐降为第三四位的政党。1881年帝国议会选举时，它只赢得了47个席位。从1870年到1912年，民族自由党的得票率由原来的1/3降到了1/6。

在真正的自由主义者脱党后，本尼格森领导下的民族自由党日益右倾。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市长约翰内斯·冯·米克威尔接替本尼格森成为该党领袖后，民族自由党更是成了拥护政府的经济、社会和国防政策的亲政府政党，其政纲与保守党已经难以区别，于是，有学者干脆称之为“依附于保守派的中等阶级势力”^①。1887年，民族自由党利用因德法之间紧张关系激发出的民族主义情绪赢得选举胜利，获得99个议席，并且与两个保守党结成了竞选联盟—卡特尔，夺取了帝国议会的多数票。然而这一形势未能保持多久。1898年以后，民族自由党在恩斯特·巴塞爾曼领导下，成了帝国主义和殖民扩张政策的最有力的支持者，

^① Norman Stone, *Europe Transformed 1878—1919*, p.177.

因而变成越来越“民族”而非“自由”的政党^①，旧的党名对它实际上已经不再适用了。

资产阶级左翼自由派集团在德意志帝国时期分裂组合最为频繁，进步党是这一集团的核心。从政纲上看，进步党是德意志帝国时期真正的资产阶级自由派政党。在帝国建立后的最初10年中，它在帝国议会中力量并不强大，通常在40~50席左右。在俾斯麦和民族自由党决裂后，其势力才开始壮大。1884年春，面临民族自由党日益右倾的压力，进步党和从民族自由党中退出的“自由联合”联合组成“德意志自由意识党”（Deutsche Freisinnige Partei）。在合并时，两派在反对国家社会政策和关税政策上达成了一致，在国防问题上则由原“自由联合”的温和立场来决定党的纲领。合并之后，这一政党的领导者仍为欧根·里希特。

到1893年，自由意识党在帝国扩军问题上出现分歧。这年5月，卡普里威政府向帝国议会提出扩军草案。虽然这一提案在帝国议会中未获通过，却造成了自由意识党的分裂。在议会表决中，自由意识党的部分议员，即那些先前从民族自由党内分离出来的人，投票赞成这一提案。结果，根据欧根·里希特的提议，这些赞成政府提案的人被开除出党。被开除的右翼分子于是建立起新的“自由意识联合”（Freisinnige Vereinigung），它仍沿用1884年的政纲。原德意志自由意识党的主干部分则改组为自由意识人民党（Freisinnige Volkspartei）。它在1894年制定了新的纲领，反对放任主义，主张节制资本和社会立法。

1896年，一帮左翼分子在弗里德里希·诺曼的领导下脱离民族自由党，另组成“民族社会联合”（National-soziale Vereinigung）。

^① [美] 科佩尔·S. 平森：《德国近现代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235页。

诺曼受施丢克尔的基督教社会党的学说以及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影响，主张自由派与工人阶级和社会民主党联合起来。1903年，民族社会联合并入自由意识联合，使该派别重新左倾。1910年，自由意识联合、自由意识人民党以及左翼自由主义集团的另一小党德意志人民党合并成为进步人民党（Fortschrittliche Volkspartei）。

在德意志帝国时期，左翼自由主义集团和社会民主党一样，一直是一个反对党。只有在“比洛夫集团”（1907年—1909年）时期，这一集团才和保守党及民族自由党一度结成联盟，反对中央党和社会民主党。

从整体上看，不管是右翼的民族自由党还是左翼的进步党，它们都存在组织上的软弱无力问题，而这种组织上的软弱无力导致了它们在整体力量上的削弱。以民族自由党为例，1902年时，它在柏林的中央办事处仅有3名办事人员^①。而进步党则面临着虽然支持它，但政治主张上却完全不同的选民。例如，在支持进步党的选民中，北部的贵族们支持有限的公民权并反对社会民主党，而南部的德国人却喜欢谈论分离主义的话题。而且进步党内部在许多重大问题上的态度也不完全一致：一部分人支持帝国的扩军备战，另一部分人则持反对态度；一部分人主张拉拢民族自由党，另一部分人则主张求助于社会民主党。因此，其内部也不断出现分裂。最关键的一点是，不管是民族自由党还是进步党，它们都不是群众性政党，缺乏强大的群众基础。所有这些因素，使得标有自由主义招牌的各政党集团在帝国议会中的力量不断下降。1871年时，它们尚占有一半的席位，到1912年时，其席位已经下降到1/4。

天主教集团在德意志帝国时期拥有相当大的势力。虽然与新

^① Norman Stone, *Europe Transformed 1878—1919*, p.177.

教居民相比，天主教徒在整个德国占少数，但由于新教居民在政治上分成许多派别，团结一致的天主教徒在政治上因此又成了相对的多数，他们因此而成为德意志帝国政治生活中不可忽视的一支重要力量。

表 4-4 1871 年—1910 年德意志帝国时期各类宗教信仰居民所占百分比^①

年份	新教	天主教	犹太教	其他
1871	62.3	36.2	1.3	0.2
1880	62.6	35.9	1.2	0.3
1890	62.8	35.8	1.1	0.3
1900	62.5	36.1	1.0	0.4
1910	61.6	36.7	1.0	0.7

我们在前文中已经提到过中央党的特点，与其他政党不同，它没有特定的社会阶层作基础。最初，只是出于对付信仰新教的普鲁士和日益强大的自由主义，以及捍卫天主教群众的利益的目的，成立了这样一个宗教性的党派。因此，它在政治立场上给人一种不可思议的混杂性，其主张既带有保守性，同时却又有类似社会主义的激进成分。然而，这样一个政党却经常遭到各方势力的反对。由于它持分离主义倾向，俾斯麦政府从帝国建立之初就将它视为帝国的敌人，并发动了文化斗争来打击它所代表的天主教势力。资产阶级自由派则将它视为一种消极因素，因为它反对中央集权，主张保护宗教教育。社会民主党也将它视为当然的右翼势力。

尽管如此，在 19 世纪 70 年代末以后，中央党在德国政治生

^① 资料来源：Peter Flora, *State, Economy, and Society in Western Europe 1815—1975: A Data Handbook*, Vol 1. *The Growth of Mass Democracies and Welfare States*, p.58.

活中的重要性显得日益突出。其一，由于文化斗争，中央党一时间成了德国天主教势力和各种分离主义势力聚合的中心，其力量因此而迅速壮大，到1881年时，它已经成为帝国议会中的第一大党。其二，俾斯麦政府在经济政策上从自由贸易到保护主义的转变需要得到中央党的支持。其三，俾斯麦需要中央党的支持来进行反对社会主义工人运动和社会民主党的斗争。中央党的地位和身价因此而得到提高。

中央党政治立场上的复杂性以及其强大的力量，使得它在保守派与自由派的斗争中，时常能在帝国议会中处于操纵均势的位置上^①。因此，它的支持对政府而言也就显得特别重要。而它的政策也处于一种机会主义性的不断变化之中。在俾斯麦时期，中央党是支持保护关税的，但进入90年代后，它又转而支持卡普里威政府削减关税。1895年—1906年，它是帝国政府的主要支持者。而1907年以后，每一届政府的多数派中都有中央党的参加。“胜利是天主教的”，这是当时德国政界的一句流行语。在比洛夫和霍亨劳厄任宰相时，甚至他们每每前往帝国议会之前总要和中央党领袖们先讨论新的重要议案的草稿^②。

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中央党内出现了一种新的特点，即70年代在中央党内部起支配作用的一些社会名流，如主教、诸侯等逐渐被中等阶级的律师和中小学教师所取代^③。与此相对应，中央党的群众性特点也变得日益明显，到90年代，它“已

① Robert Herndon Fife, Jr., *The German Empire between Two Wars: A Study of the Political and Social Development of the Nation between 1871—1914*, PP.127—128.

② [美]科佩尔·S.平森：《德国近现代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263—264页。

③ 其代表人物有：卡尔·特里姆博恩、彼得·施帕恩、约瑟夫·维尔特、马蒂阿斯·埃茨贝格尔等人。

经从一个社会名流的联合组织改变成为一个固定组织的群众性政党”^①。在这一发展趋势下，中央党内部也出现了两个敌对的派别。左翼民主派集中了较贴近基督教工会等群众组织的人们，主张改善工人的结社权利，赞成扩大社会保险，要求把立宪君主制改变成议会君主制。这一派在中央党帝国议会党团中占有多数。右翼保守派则坚持立宪君主制，反对工业社会的发展趋势，认为拥有现存政治制度的德国是德国天主教徒所可能拥有的最好的国家。这一派的势力主要在各邦议会中。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党的政策给人一种矛盾的感觉。一方面，它在帝国议会中努力谋求民主化；另一方面，它又在普鲁士的邦议会中捍卫三级选举制。

以上两派的矛盾导致了中央党内部的争论。左派要求把中央党变为一个超教派的基督教政党，即为吸收其他宗教集团的成员打开党的大门，以便扩大党的基础，与其他非天主教集团合作。1906年3月，尤利乌斯·巴赫姆在《天主教德国历史政治报》上发表的《我们必须从塔里走出来》一文就代表了这种看法。右派则和左派对立，提出了彻底的天主教思想。

中央党比较注意争取群众的支持，其争取的政治对象主要是农民、手工业者和工人。在90年代初，它曾一度支持卡普里威政府的减低关税的政策，然而，当农业界起而反对，并于1893年成立“农场主同盟”后，它又转到反对派一边，并导致卡普里威的下台。到1902年，它支持比洛夫政府进口每百公斤谷物征收5马克关税的政策。这一切都是为了争取农业界的支持。从以上意义上，有学者认为，在1890年后，中央党已经变成了一个具有强烈农业意识的政党^②。此外，中央党为了争取工人的支

① [德] 卡尔·艾利希·博恩：《德意志史：从法国革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上册，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293页。

② Norman Stone, *Europe Transformed 1878—1919*, p.186.

持，还于1895年支持成立了基督教工会。

虽然中央党在争取各种力量支持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但是收效不大。整体上看，中央党的势力主要分布于2000居民以下的小城镇以及农村地区。1912年的选举中，中央党所获得的91个议席中有73个来自农业地区。

以上便是帝国各主要政治集团的发展情况。至于社会民主党的发展情况，由于它的迅速壮大以及内部的变化，我们不妨予以专论。

在德意志帝国时期，与工业化带来的各阶级、集团政治力量的实际变化有些不相一致的地方在于，影响帝国议会中各政党力量消长的两个极为重要的因素是政府的态度和民族主义情绪。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帝国议会的几次重要选举中得出结论。

1878年选举是德意志帝国建立以来帝国议会中各主要政党力量的第一次大调整。如前所述，帝国建立之后，资产阶级自由派，尤其是民族自由党一直是帝国议会中最强大的政党，也是俾斯麦政府最强有力的支持者。直到1877年，帝国议会中势力增长最快的政党有两个，即中央党和社会民主党。其中后者增加更快，从2席增加到12席，增长率达600%。然而，当俾斯麦在1878年对迅速发展的社会主义运动提出进行镇压时，却遭到帝国议会中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拒绝，他们害怕因此而损害基本的自由权利。就在这时，对威廉一世的两次刺杀事件帮了俾斯麦的忙。他趁机于1878年6月解散帝国议会，进行了新的选举。结果，由于公众对刺杀皇帝的反感，大批选票流向各保守派政党，而资产阶级自由派和社会民主党的力量却受到严重削弱。两个保守党在帝国议会中的席位从原来的78席增加到116席；民族自由党和进步党则从180席减少到138席；社会民主党从12席降到了9席；中央党仍保持了它原有的席位。在选举中受挫的民族自由党由于害怕受到进一步的打击，不得不与保守党一起投票支持了“非常法”，从而放弃了它的原则立场，为日后的进一步

裂埋下了伏笔。到1881年时，这一曾经辉煌一时的资产阶级大党在帝国议会中猛地下降到了第四位。

1887年选举则明显受到德法间紧张关系^①激起的民族主义情绪的影响。在这次议会选举中，无条件支持政府扩军计划的保守派各党和民族自由党成为受益者，两个保守党和民族自由党为了竞选，结成了竞选联盟-卡特尔。结果，它们以总数220个议席夺得了议会的多数，其中，两个保守党从106席增至121席，民族自由党由51席猛增到99席。而持反对态度的各左派政党却损失惨重，社会民主党从24席降到11席，进步党从74席降到32席。俾斯麦利用两个保守党和民族自由党结成的卡特尔通过了政府的新军事预算法案。

1893年，卡普里威政府为使新的扩军法案在帝国议会中获得通过，解散了原先的议会并进行重新选举。结果，在国防政策所激起的民族主义情绪的笼罩下，右翼政党再次赢得选举胜利，反对扩军法案的进步党和中央党的议席则都有所下降。

1906年，比洛夫政府要求帝国议会批准用于镇压霍屯督人的补充预算，遭到社会民主党和中央党的反对。比洛夫政府故伎重演，于1907年解散议会，进行重新选举。结果，保守派和自由派组成的“霍屯督联盟”在选举中获胜。在反对派中，虽然中央党的议席由100个上升为105个，社会民主党却丢掉了38个席位，由81席下降到43席。

德意志帝国议会历届选举中各政党的力量变化状况可以从下表中得到一些规律性的认识。

^① 1886年1月，主张对德复仇的布朗热将军出任法国陆军部长，并积极进行各种备战活动。俾斯麦政府为使帝国议会通过第三个“七年期”军事预算法案，趁机大肆渲染德法战争危险，形成所谓的“布朗热危机”或1887年法德战争危机。

表 4-5 1871年—1912年德意志帝国议会选举结果^①

年代	1871	1874	1878	1881	1884	1887	1893	1898	1903	1907	1912
保守党	57	22	59	50	78	80	72	56	54	60	43
自由保守党	37	33	57	28	28	41	28	23	21	24	14
民族自由党	125	155	99	47	51	99	53	46	51	54	45
进步党*	47	50	29	115	74	32	48	49	36	49	42
中央党	63	91	94	100	99	98	96	102	100	105	91
韦尔夫家族	7	4	10	10	11	4	7	9	6	1	5
社会民主党	2	9	9	12	24	11	44	56	81	43	110
波兰人	13	14	14	18	16	13	19	14	16	20	18
丹麦人	1	1	1	2	1	1	1	1	1	1	1
阿尔萨斯—洛林	—	15	15	15	15	15	8	10	9	7	9
反犹太主义	—	—	—	—	—	1	16	13	11	16	13

(* 进步党在此涵盖左翼自由主义各党,即包括自由联合、自由意识联合、自由意识党、自由意识人民党以及 910 年合并而成的进步人民党)

由前文所述以及上表中可以看出,德意志帝国时期各政党在帝国议会中力量的消长,在短期内主要受政府的态度和民族主义情绪两大因素的影响。每当帝国议会的力量比例对政府的施政方针不利时,帝国政府经常通过改选帝国议会,“更换”帝国议会多数派的做法来为自己在帝国议会中寻求支持。如前所述,俾斯麦政府就曾为反社会主义法案的通过,解散了 1877 年选举出的资产阶级自由派占多数的议会,并在 1878 年的帝国议会改选中使保守派取得巨大胜利。1907 年,比洛夫政府也是通过解散帝国议会并重新选举的办法,为自己在帝国议会中赢得了多数派的

^① 资料来源:Gerhard A.Ritter, *Das Deutsche Kaiserreich 1871—1914: Ein historisches Lesebuch*, S.366—367.

支持。而且，凡是在德国政府要通过新的扩军法案时，支持扩充军备的各党派总能得到比原来更多的选民的支持。因而有的史著认为，“带着浓厚的国防政策色彩的国会选举，一直到1914年都给右翼政党带来好处”^①。

尽管如此，我们从上表中同样可以看出，政府的态度和民族主义情绪对帝国议会中各党派力量的影响是暂时性的，真正对各党派力量消长产生长远和整体影响的是迅速工业化之下德国社会结构变化带来的经济利益的调整和阶级结构的变化。如前文所提到的那样，反犹太主义的出现一定程度上就是因为工业化造成的农业和手工业的窘境的产物，自19世纪90年代以后，反犹太主义者一直在帝国议会中占有十几个席位。阶级变化状况折射于帝国议会中，则是社会民主党力量的增长，虽然饱经政府的敌视和镇压，它仍然由帝国建立初期拥有2个议席的小党发展到1912年时拥有110个议席的帝国议会中的第一大党，这从根本上说是工人阶级力量发展壮大的结果。

（四）兄弟阋墙——工人运动的继续发展和社会民主党内部的思想裂变

作为快速工业化的一个必然结果，德国工人阶级队伍得到迅速发展壮大，这一点我们从前文所述的职业结构的变化中已经可以看出。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从事工、矿劳动的职工已经达到950万人，几乎等于从事农业劳动人口的2倍。工人阶级发展为德意志帝国人数最多的社会集团。自1890年“非常法”被废除以后，工人阶级的政治能量更进一步地释放出来，从而对德国各派政治力量的对比产生了重大影响。工人阶级因此而成为德国

^① [德] 卡尔·艾利希·博恩：《德意志史：从法国革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上册，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422页。

各派政治力量竞相争夺和拉拢的对象。

德国工人运动的发展首先表现在工会运动的发展上。如前所述，在德国，真正的工会运动起始于19世纪60年代。这是随着工业革命的大规模展开，工业无产者在工人阶级中数量占主导地位的一个结果，同时也是工人阶级维护自身利益的一种体现。但是，德国工会运动从一开始就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即在组织方面分裂为派别工会，起初分为社会主义的自由工会和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希尔施—东克尔工会，19世纪90年代后又出现了在天主教会中央党影响下的基督教工会。德国的工会运动之所以呈现这种分散的特点，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工人阶级力量的壮大引起德国一些政治势力的重视，他们想通过涉足工会运动来操纵这支令人生畏的力量；另一方面，“社会民主党和自由工会对群众的思想工作做得不够”^①，从而使其他政治势力在拉拢工人阶级方面有机可乘。

德国工会运动的大规模发展是在1890年以后。曾经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工作的帕尔乌斯在谈到德国工会运动时指出，“自从反社会党人法垮台以来，德国工人的最大功绩是工会的发展”。而根据梅林的看法，这种发展的主要动力是“工业繁荣”^②。我们认为，这正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因为如果没有工业的高速发展，就不可能有工人阶级力量的迅速壮大。到1913年，工会拥有的会员总数已经达到300万人。

在德国工会运动中，最强大的工会派别是社会主义的自由工

① [德] 赫伯特·瓦恩克：《德国工会运动简史》，三联书店1958年，第33页。

② [德] 梅林：《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第4卷，三联书店1966年，第340页。帕尔乌斯（1869—1924），俄国社会民主党人，19世纪90年代起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左翼）工作，后成为极端社会沙文主义者。

会。领导自由工会的是“德国自由工会总委员会”。它是德国工会运动的第一个常设的总领导机构，在它的下面团结着一批同行工会组织。在1914年以前，这一工会在卡尔·列金的领导下，成为欧洲最强大的工会组织。参加工会的工人人数比例也在增加，有27种行业参加工会的工人人数在20%以上，还有15种行业参加工会的工人人数达到30%以上。工会会员总数在1890年—1913年间也增长了9倍。

值得注意的是，自由工会虽然受社会民主党的影响，但它与社会民主党之间还是存在一些意见分歧。它倾向于享有一定的独立自主性，并且这一要求在1906年的社会民主党曼海姆代表大会上得到了承认。此外，自由工会主张，工会应该在现存的政治和经济条件下做到改善工人的生活，换言之，工会必须和现存的制度进行妥协。这种倾向导致了日后自由工会内部改良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滋长。

除了自由工会外，还有于1868年建立的希尔施—东克尔工会，即“德国工艺协会”，建立者是资产阶级进步党的两个雇主希尔施和东克尔。由于自由主义基本上只局限于资产阶级集团，对工人的吸引力很小，所以这一工会组织的力量相对较小，其会员也大多是职员。从纲领上看，希尔施—东克尔工会主张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利益调和”，反对罢工和参加任何有政治要求的斗争。

1895年，为了遏制天主教和新教工人转入社会主义的自由工会，并为自己争取更多的群众支持，天主教中央党支持成立了基督教工会。这一工会的势力主要集中在鲁尔区、萨尔区和西里西亚地区等一些信仰天主教的工人之中。从纲领上看，基督教工会主张超教派、“阶级调和”和“工人雇主同道相亲”^①。这些主

^① [德] 赫伯特·瓦恩克：《德国工会运动简史》，三联书店1958年，第33页。

张显然对工人的吸引力较大，因此，虽然基督教工会的出现晚于希尔施—东克尔工会，但其力量发展要快于后者。

表 4-6 1869年—1913年德国自由工会、基督教工会
和希尔施—东克尔工会会员发展状况^①

年份	自由工会	基督教工会	希尔施—东克尔工会
1869	47 194	—	30 000
1878	56 275	—	16 525
1885	85 678	—	51 000
1895	255 521	5 500	66 759
1905	1 344 803	191 690	116 143
1913	2 573 718	341 735	106 618

德国工人运动的发展还表现为轰轰烈烈的游行示威和罢工斗争，特别是后者。这些示威和罢工主要是由各工会来组织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工人的日常利益。同时，各工会在争取缩短工作时间、实行劳动保护立法和提高工资方面也都作出了巨大的努力。1890年“五一”节，德国工人首次提出了8小时工作制和颁布劳工保护立法的要求。

德国工人主要通过罢工手段来展示自己的要求，在这方面，德国工会倾注了很大的力量，而且作出了重大牺牲。从1895年初到1899年底，德国工会从自己的金库中拿出了525万马克支持罢工，此外，还有自由募集的250万马克用于这一目的，这一时期的罢工使德国工人损失了2500万马克。就罢工的效率来看，并非尽如人意。以1899年为例，在这一年的罢工中，只有

^① Gerd Hohorst, Jürgen Kocka und Gerhard A. Ritter, *Sozialgeschichtliches Arbeitsbuch. Band 2. Materialien zur Statistik des Kaiserreichs 1870—1914*, München 1978, S.135—136.

45.5%导致了工人状况的改善，其中31.4%以工人全胜结束，14.1%以工人一半胜利结束^①。

尽管如此，德国工人的罢工次数和人数在整体上仍呈上升的趋势。

表 4-7 1890 年—1910 年德国工人罢工情况^②

年份	1890/91	1896	1900	1905	1910
罢工次数	226	483	1 500	2 657	3 228
参加人数	38 536	128 808	131 888	526 810	369 809

从以上数据中可以看出，1890年—1910年，德国工人的罢工次数从226次增加到了3228次，增幅达13倍以上，参加罢工人数由不足4万人上升到了近37万人，增加幅度也达到了800%以上。这表明，工人阶级反对资本主义剥削和压迫的斗争日益具有广泛性，并从一个角度表明了工人阶级维护自己利益的积极性正在提高，罢工成了“德国大众生活中一个众所周知的特征”^③。这是德国社会民主党日益壮大的群众基础。

正是在工人阶级队伍不断壮大、工人运动蓬勃发展的形势下，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也发展成为德意志帝国政治生活中惟一个势力不断增长的政党。这一点我们从社会民主党在帝国议会中议席的增加上已经可以得出结论，只不过由于帝国选区划分的不合理，仅仅从帝国议会的议席数上仍不能完全看出社会民主党真正的群众支持率。

在德意志帝国成立时，选区是按每个选区10万选民来划定

① 有关统计数据引自[德]梅林：《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第4卷，三联书店1966年，第342—343页。

② 资料来源：[德]维纳·洛赫：《德国史》，三联书店1959年，第300—301页。

③ Norman Stone, *Europe Transformed 1878—1919*, p.190.

的，同时，对8个人口不到10万人的小邦也允许它们在帝国议会选举时各为一个选区。这一划分办法一直保持到1918年。而在事实上，随着国家的迅速工业化而带来的大规模人口流动和城市化，原来的选区划分已经过时。我们在前文涉及工业化带来的社会转型时已经提到，在发达的工业地区和城市，人口的增长远远高于农业地区和农村的人口增长。这样一来，在许多选区之间，居民人数的增长就出现了很大的差别。例如，在人口稠密的特尔托—夏洛滕堡选区，到1912年时已经拥有130万居民，而在绍姆堡—利珀却只有4.7万居民。这就意味着，在特尔托—夏洛滕堡选区当选为议员，至少要赢得10万张选票，而在绍姆堡当选议员只需要赢得4000张—5000张选票。这种形势显然有利于诸如保守党和中央党等在农村和小城镇居民中获得支持的政党赢得帝国议会的席位，而对于社会民主党这种主要依靠集中于大中城市的工业无产者选票的政党则明显处于不利地位。如果仅从选举得票率来看，早在1890年，社会民主党就已经超过中央党，成为赢得选票最多的政党，并且此后一直处于领先地位^①。然而，它在帝国议会中的席位数直到1912年才超过中央党。我们只要举两个数据就可以看出选区划分不合理对社会民主党在帝国议会中所得席位数的影响。1890年选举中，中央党得票134.2万张，赢得议席106个，而拥有142.7万张选票的社会民主党却只得到了35个议席。1912年，中央党得选票不到200万张，赢得了91个议席；而社会民主党得选票425万张，赢得议席仅为110个。

尽管如此，德国社会民主党在19世纪90年代以后成为德意志帝国最强大的政党之一已经成了一个不争的事实，它的支持基

^① 具体数据参见 Peter Flora, *State, Economy, and Society in Western Europe 1815—1975: A Data Handbook*, Vol. 1. *The Growth of Mass Democracies and Welfare States*, p.119.

础也变得日益广大。例如，一直被视为中央党势力支持者的德国天主教徒，在1912年的选举中就有一半投了社会民主党的赞成票^①。

然而，正当社会主义工人运动蓬勃发展和社会民主党力量日益壮大之时，从19世纪90年代开始，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部却出现了思想裂痕，逐渐形成了右、中、左三派。

在右派中，修正主义思潮开始发展起来，并且不久蔓延到整个第二国际，其主要代表人物就是爱德华·伯恩斯坦。从1896年10月起，这位曾经在社会主义理论宣传方面有一定影响力的人物，在《新时代》杂志上以“社会主义问题”为总标题，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自称为“修正主义者的社会主义派别”，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提出了“修正”马克思主义的要求。而在1899年出版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民主党的任务》中，伯恩斯坦更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进行了全面的、系统的“修正”^②。因此，修正主义派也称为伯恩斯坦派。在这一派别中，除了伯恩斯坦以外，还有格奥尔格·冯·福尔马尔等人。

关于修正主义的理论问题在此不便加以阐述，重要的是它所主张的一些现实政策。对于这一问题，列宁在《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一文中谈得很明确：“临时应付，迁就微小的政治变动，忘记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忘记整个资本主义制度、整个资本主义演变的基本特点，为谋取实际的或可以设想的一时的利益而牺牲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这就是修正主义的政策。”^③ 列宁

^① Norman Stone, *Europe Transformed 1878—1919*, p.186.

^② [德] 伯恩斯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三联书店1958年。

^③ [苏] 列宁：《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7页。

的这一段论述可以说是对以德国社会民主党内一部分人为代表的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所推行的政策的一个精辟的见解。

从整体上看，修正主义派首先表现为一种改良主义的倾向。早在伯恩斯坦系统地抛出他的修正主义思想前，福尔马尔已经在慕尼黑“黄金国”大厅发表的一系列演说中阐述了他的右倾主义思想，改良主义倾向初露端倪。他鼓吹议会主义，反对暴力革命，认为“通过议会可以达到一切目的”，可以“和平地长入社会主义”。因此，他要求社会民主党放弃死板地坚持纯粹的理想，采用实际上能取得部分成效的政策^①。伯恩斯坦还得出结论：德国社会民主党无需等待革命也无需准备革命，只需努力从事实际有效的活动，谋求部分成果，进行部分改革，以达到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他在为《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作的序中指出：“我认为社会民主党的当前任务为争取劳动者政治权利的斗争、为城乡劳动者拥护自己阶级利益而进行的政治活动、以及劳动者的经济的组织事业，具有非常大的价值。在这个意义上……对于我来说，运动就是一切，而一般所谓的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实际上是算不得什么的。”^②至于实现社会主义的手段，伯恩斯坦也否认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学说，“实则在百年以前想来是需要流血革命的改革，在今天则只需用投票、示威运动以及诸如此类的威压手段就能贯彻了”^③。

为何19世纪90年代以后会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出现修正主

① [德] 卡尔·艾利希·博恩：《德意志史：从法国革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上册，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296页。

② [德] 伯恩斯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三联书店1958年，第4—5页。

③ [德] 伯恩斯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三联书店1958年，第7页。

义思潮呢？综观当时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形势，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修正主义的出现是“在几十年的‘和平’时期培植起来的”^①，是在长期的和平环境中和平演变的结果。巴黎公社以后，包括德国在内的资本主义世界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推动下，出现了持续的工业高涨和经济繁荣，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普遍得到改善，社会保障制度也开始建立起来。在这种和平的环境中，一些社会民主党人被资产阶级议会选举中的不断胜利冲昏了头脑，“把合法主义的事实——议会制、资产阶级民主和改良加以绝对化，把它们同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对立起来”^②。

其次，工人生活在客观上的改善是修正主义思潮出现的经济基础。关于这一问题，史学界的看法是有分歧的。以往的一些史著在很大程度上强调工人在工业化过程中生活水平的不断下降，并举出一些史例^③。我们认为，对于某一时期的历史发展特征，必须通过把握它的主流和全局来说明问题，否则的话，容易陷入主观主义和片面性，因为在任何一个历史时期的历史论题上我们都可以找到完全相反的史例。因此，在看待德意志帝国时期人民生活水平是否提高的问题上，我们同样应该作出整体的、主流性的判断，而这一点前文已有明确的结论^④，即这一时期的德国工人群众的生活确实较之以往有所改善。根据德国史专家莫姆森教授的看法，“工业工人的地位在狭义上似乎较之社会底层其他集

① [苏]列宁：《列宁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91页。

② [苏]布·恰根：《反对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哲学修正主义斗争史》，三联书店1964年，第9页。

③ 维纳·洛赫即持这种观点。参见其所著《德国史》，三联书店1959年，第299页。

④ 参见“走向现代社会——德国社会结构的变化”部分。

团要更有改善”^①。有关史著在专门就工人的经济状况进行分析时也指出，1887年以后，名义工资的发展趋势就是不断向上，1871年—1913年，工人的名义工资高出一倍多，实际工资增长了50%。此外，19世纪80年代国家社会保险体系的建立也使工人的经济状况比帝国成立时有所改善，应付意外事故的能力得到增强。所有这些，使得部分工人失去了革命的积极性，安于现实较平静的生活。

更重要的是，随着工人运动的发展和社会民主党的壮大，在工人运动队伍中确实出现了一批工人官僚，形成了一个工人贵族阶层。例如，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有近3000名工会官僚占据了中央和地方各级工会机关的肥缺。这些人主要是来自社会民主党的国会议员、报纸编辑、作家、工会和合作社领导人，他们因较为优裕的生活条件，已经放弃了革命的要求。于是，在工会中出现了所谓的“中立论”，即工会对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应采取中立的态度，工会应当把社会民主党视为平等的组织。1905年在科隆召开的第五次工会代表大会甚至作出决定：“意欲宣扬群众政治罢工，从而规定出某种策略来的任何企图，都是令人嫌恶的。”^②

再次，我们必须认识到，德国政府统治策略的改变也为修正主义的出现提供了合适的气候。在俾斯麦统治时期，德国政府对待工人运动和社会民主党采取的还是一种鞭子为主、辅以蜜糖的镇压政策。1890年以后，德国政府采取了所谓的新路线，废除了“非常法”，在国内实行所谓的“和解”政策，这在很大程度

① Wolfgang J. Mommsen, *Imperial Germany 1867—1918: politics, culture, and society in an authoritarian state*, p. 112.

② [德]赫伯特·瓦恩克：《德国工会运动简史》，三联书店1958年，第43页。

上麻痹了德国工人阶级和社会民主党的革命斗争精神，也为改良主义的出现提供了有利的口实。所以，伯恩施坦在1890年的《社会民主党在国会中的任务》一文中提出了“取得充分政治自由的道路是通过国会的道路”的论点。1893年时，他又进一步提出：“如果工人政党通过妥协或联盟能够更容易地在政治和经济方面达到自己的目的，那末，它为什么要拒绝它们呢？”^①

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出现，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立即遭到倍倍尔、卡尔·李卜克内西、罗莎·卢森堡等左派的反对^②，德国社会民主党在6年内召开了4次代表大会^③，辩论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问题。在1903年德累斯顿代表大会上，根据倍倍尔的提议，以228票对11票的多数通过了谴责修正主义观点的决议：“修正主义者企图改变我党久经考验且一向奏凯的以阶级斗争为基础的策略，以期用妥协的政策来代替夺取政权的政策，代表大会严厉谴责此种企图。”^④

从表面上看，左派取得了反对修正主义斗争的胜利。而在实际上，由于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的调和态度，主张党内各派进行“同志式的论战”，加上中间派对修正主义派的呵护，结果右派还是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逐渐地占据了优势。

中间派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内以考茨基为代表的派别。这一派别的特点是，在口头上，它是马克思主义的，但在如何对待

① 转引自〔苏〕布·恰根：《反对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哲学修正主义斗争史》，三联书店1964年，第17页。

② 左派对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批判可以从罗莎·卢森堡的《社会改良还是社会革命？》等有关著述中窥见一斑。参见中共中央马列著作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编：《卢森堡文选》，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

③ 即1898年的斯图加特代表大会、1899年的汉诺威代表大会、1901年的吕贝克代表大会和1903年的德累斯顿代表大会。

④ 〔德〕维纳·洛赫：《德国史》，三联书店1959年，第308页。

修正主义的态度上，却又认为修正主义包含有一些积极的东西，是“社会民主党前进中的产物”，是“寻求”达到社会主义的“新道路”的反映。而且他们在团结的旗帜下不断粉饰党内的矛盾，从而袒护了修正主义者。正是基于这一点，列宁称考茨基主义“是口头上忠实于马克思主义而实际上屈服于机会主义的社会产物”^①。

由于修正主义的发展壮大，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德国社会民主党实际上已经变成了一个社会改良主义的政党。

（五）抱残守缺——贵族占据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国家

19、20世纪之交的德国已经从一个农业国转变成了一个高度发达的工业化国家，资产阶级力量进一步得到增强，德意志帝国的政治体制也出现了向议会制度和民主政治转型的迹象。但从实际上看，统治这样一个现代化的资本主义国家的不是资产阶级，而是带有封建特权等级色彩的贵族阶级。

作为前工业社会等级制度的产物，这一时期的德国贵族阶级在工业化浪潮导致的普遍的社会变革之中已经呈现出一派衰败的景象。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具有代表性的普鲁士容克地主的状况中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首先，以经营农业为主的容克地主在工业经济的冲击下处于不利的地位，陷入了高筑的债台之中。这一状况主要表现为易北河以东地区容克地主手中土地的大量丧失，以致在普鲁士所属波兰地区出现了所谓的德意志人和波兰人之间的“土地战争”。由于工业化冲击下大量劳动力流向工业地区，造成农业劳动力价格上涨，而农业又持续萧条，农产品价格不断下跌，结果，到19世纪

^① [苏]列宁：《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680页。

末 20 世纪初，普鲁士东部的许多德意志人不断陷入破产境地，其出卖的土地纷纷落入了波兰人手中。据统计，在 1903 年—1907 年间，易北河以东（包括西里西亚）有一半以上的德意志人的土地被卖掉。在波兹南地区，到 1907 年为止，波兰人达到了 90 万，而德意志人却只有 76 万。波兰人之所以取得如此的成就，主要是因为他们工业区的工人将挣得的钱寄回家乡，然后“从那些挥霍无度的容克手中购买土地”。德国的资产阶级自由派因此而指责德意志贵族们：是他们为了经营而引来了大量的波兰季节工人，然后又因为他们的无能经营而把土地卖给了波兰人^①。

其次，自“大萧条”以来，经济上的不景气，也使得从弗里德里希大帝以来一直作为普鲁士国家统治支柱的容克地主阶级的人数在减少，甚至容克地主们所赖以装饰门面的小孩人数也因经济困难而变得越来越少。有关统计表明，1878 年时，他们每个家庭平均有 3.85 个小孩，1888 年时只有 3.17 个，到 1910 年时已经只有 2.85 个。一些容克地主的女儿甚至因家中无法维持或资助其生活，被迫进入路德教的女修道院中出家^②。关于容克贵族的这种破败没落景象，我们可以从同时代著名作家托马斯·曼的作品《布登勃洛克一家》^③中看到这种缩影。

尽管在迅速工业化浪潮的冲击下，包括普鲁士容克阶级在内的各邦贵族们在经济上每况愈下，然而，在德意志帝国时期，他们在帝国中的政治特权地位却仍然稳如磐石。他们控制着帝国的各个要害和关键部门，把持着重要的职位。

① Norman Stone, *Europe Transformed 1878—1919*, p.172.

② Norman Stone, *Europe Transformed 1878—1919*, p.184.

③ 托马斯·曼的小说《布登勃洛克一家》(Buddenbrooks)的副标题为“一个家庭的没落”(Verfall einer Familie)，发表于 1901 年，描写了布登勃洛克这一望族祖孙四代从兴旺到破败的过程。

首先，贵族地主们在行政管理部门拥有相当大的优势，在地方行政管理上的优势尤其突出。以普鲁士为例，省长、县长和行政区长官的职位都被贵族超比例地占据着。在东普鲁士、西普鲁士、西里西亚、波兹南、波美拉尼亚和勃兰登堡等易北河以东的东普鲁士各省，地方行政管理的大权实际上都掌握在容克地主手中，因为地方的行政事务都掌握在政府指定的官员——县长(Landrat)手中，而这些县长通常是由取得了法学学位的容克子弟来担任的。这些县长在处理政务的过程中则与他们在地方上的亲戚们抱成一团，在这方面最典型的事例莫过于默许其亲戚逃避税收。1909年，容克阶级的一位代言人艾拉德·冯·奥尔登堡—雅努肖曾在公共场合吹嘘，普鲁士贵族在税收上比犹太人更忠诚。他还致函农业部索取有关材料。结果，他得到的答复是，在普鲁士，越向东，逃避税收越多。整个普鲁士的逃避税收额占税收总额的4.5%，而在易北河以东的容克心脏地区这一比例更高：在波兹南达7.7%，在阿伦施泰因达8.6%，在布罗姆贝格则达到11%^①。

在高级官职方面，国家虽然对资产阶级开放，但最高职位依然只是贵族的领地。大臣们大多是贵族，在德意志帝国时期的各大邦中，只有巴登的大多数大臣是由资产阶级分子担任的^②。而在所谓的驻外“古典”使馆，即驻伦敦、维也纳、巴黎和圣彼得堡使馆，都一律由贵族外交家出任领导。

下面是1910年年底时普鲁士高级官员的社会成分状况表^③，

^① Norman Stone, *Europe Transformed 1878—1919*, pp.168—169.

^② [德]卡尔·艾利希·博恩：《德意志史：从法国革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上册，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301页。

^③ 资料来源：Gerhard A.Ritter, *Das Deutsche Kaiserreich 1871—1914: Ein historisches Lesebuch*, S.70.

从以下列表中我们可以看出贵族在普鲁士国家政权机关中的特权地位。

表 4-8 地方官员的社会成分状况 (1910 年末)

供职级别	人数	旧 (农业) 贵族	新贵族	非贵族
省长	12	7	4	1
行政专区主席	36	16	7	13
省参议	12	6	—	6
高级行政参议	141	27	5	109
行政法院部门处长	36	2	—	34
警察要员	22	11	4	7
政府参议	612	117	22	413
政府候补文职人员	506	161	34	311
县长和高级行政官员	481	241	27	213

表 4-9 国家官员社会成分状况 (1910 年末)

职务	人数	旧 (农业) 贵族	新贵族	非贵族
国家大臣	11	5	2	4
副大臣	9	2	—	7
各部局长	28	5	1	22
高级行政法院首脑	8	1	—	7
高级行政法院委员	45	4	—	41

从以上两表中我们可以看出,除了法院系统等部门外,贵族(特别是农业贵族)在各重要实权部门都占据了明显的优势。在这一点上,资产阶级自然有所不满。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德国最大的卡特尔的首脑基尔多夫在社会政策协会的一次会议上就曾伤

心地抱怨，“我们不幸毫无发言权”。弗里德里希·诺曼更是将德意志帝国形象地称为“穿着农业国政治服装的工业国”^①，因为这个国家主要靠资本主义工业部门的钱来支持，却受着来自农业领域的封建贵族的统治。

其次，贵族在军官团中所受到的优待比他们在国家文官领域中更占有明显的优势。在普鲁士和萨克森取消了贵族的全部特权后，普鲁士的军官团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仍有大批的军官是贵族。据统计，1914年，52%的上校军官出身于贵族，这一比例甚至高于1866年贵族支配下的军队中贵族的军官的比例。之所以出现这种贵族回潮现象，是因为19世纪80年代以后，总参谋部卡紧了军官的提拔规定，使得军官更贵族化了。到1910年，军队的许多领导人都急于保护贵族对军队军官的垄断权，以防止“民主的”因素进入军队^②。

当然，由于贵族人数有限，加上军队编制的不断扩大，他们不可能对军队中的整个军官阶层都加以垄断，而只是保持对军队上层官职的控制权。在帝国成立时，军官团中有2/3的成员出身于资产阶级，1913年的2.5万名军官中则有4/5出身于资产阶级。然而，资产阶级在军官中的这种数量上的优势并不能代表他们在质量上也占有优势。在指挥25个集团军的将军中，有22个出身于亲王和贵族，另有3个是知名的资产阶级人物。师级军官中贵族也占2/3以上^③。贵族和资产阶级在军官中所构成的形势是：级别愈高，贵族所占的比重就愈大；级别愈低，则资产阶级

① [美]科佩尔·S.平森：《德国近现代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340、238页。

② Norman Stone, *Europe Transformed 1878—1919*, p.169.

③ Karl Erich Born, *Wirtschafts-und Sozialgeschichte des Deutschen Kaiserreichs (1867/71—1914)*, S.81.

所占的比重愈大。对于这种状况，德国资产阶级自然深为不满。在1910年1月26日的帝国议会上，民族自由党议员阿尔托·小奥萨恩明确表示对贵族在军队中的优越地位“感到不快”，抱怨“整个团级都让贵族军官给占据了”^①。

再次，贵族集团在经济上也受到帝国政府的特别保护和支持。这种保护和支持表现为谷物关税保护^②、税收减免等。

必须指出的是，德意志帝国时期还有一个重要的政治现象，那就是如前所述的那样，一些大的工业资产阶级贵族化了。西门子、克虏伯等大工业资本家都通过购买地产、爵位等，加入了贵族的行列，一些工厂主和商人子弟则选择军官职业。这种大工业资产阶级的贵族化不仅出于他们追求显贵的社会心理，更重要的是，在他们与贵族之间有着共同的政治利益，那就是，共同对付日益壮大的工人运动，捍卫符合他们利益的现存国家政权和社会制度。而大工业资产阶级和贵族在政治上的接近在政治上又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后果，即代表大资产阶级利益的民族自由党与保守党日益接近。

综上所述可见，在德意志帝国时期，贵族仍是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实际统治者，资产阶级只是通过起装饰作用的帝国议会加入了统治阶级的行列。资产阶级的这种软弱地位，在所有已经进入高度发达的垄断资本主义国家中，实在难得一见，真可谓德国特色。

至此，人们不仅要问，为何带有封建特性的容克地主阶级能在政治上驾驭一个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呢？我们认为，其根本的原因在于德国容克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特性。

① 参见 Gerhard A. Ritter, *Das Deutsche Kaiserreich 1871—1914: Ein historisches Lesebuch*, S.97.

② 参见后文“德国政府对外贸易政策的变化”部分。

德国资产阶级自产生之日起，就以小市民的姿态出现在历史舞台上，表现得软弱、狭隘，而不像法国资产阶级那样充满朝气和生命力。这种特点在16世纪的德国农民战争、1848年革命和60年代的德国统一运动中已一再体现出来，并广为人们所共识。而且，如我们在前文中曾经提到过的那样，德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封建统治阶级进行改革的结果，这使得德国资产阶级对统治者有一种先天的依赖性。再者，德国资本主义发展较之英法等国迟缓，当资产阶级在德国同封建势力展开斗争之时，西欧已出现了大规模的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本国的无产阶级也已成长起来。面对这一现状，软弱自私的德国资产阶级宁愿“去同君主制度和贵族进行任何的、甚至最懦弱的妥协”^①，以对付站在自己背后的无产阶级。列宁在《关于德国各政党的最新材料》一文中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②。德国资产阶级的这种特性，使得它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都表现出两面性要求。一方面，它与其他国家的资产阶级一样，在经济上要求消除封建势力的束缚，自由发展资本主义；另一方面，政治上懦弱的本性使它力图用旧的封建杠杆去制服受雇于它的无产阶级，利用君主制度和专制国家机器对付日益高涨的工人运动，并满足于国家政权支持和帮助发展资本主义。一些资产阶级的代表性人物如西门子等人还通过谋取爵位成了贵族行列的一员，并且在政治上与统治阶级的最上层形成了极为密切的关系^③，这种资产阶级的贵族化

① [德]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178页。

② [苏] 列宁：《列宁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265页。

③ [德] 维尔纳·冯·西门子：《西门子回忆录》，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

显然有利于容克地主的政治统治。

此刻的容克阶级也已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纯粹的封建贵族统治阶级。我们知道，普鲁士是通过改革而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在改革的过程中，绝大部分容克地主由于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普鲁士式道路”和纷纷投资于工商业及矿山开采等，经济上已经资产阶级化，从而与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日趋一致，这就使得他们在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主题上与资产阶级有一致的追求。如前所述，德皇本人既是一个大地主，又是克虏伯公司的股东，俾斯麦不仅拥有大片地产，而且在工业上有大量投资。这种容克的资产阶级化正是以容克阶级为主体的德意志帝国政府大力推行有利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政策的根本动因所在。当然，作为一直享有各种封建特权的统治阶级，容克地主在政治上有别于德国资产阶级，他们希望尽可能地继续保持自己的政治优势，压制资产阶级的参政要求。

以上所述，正是德意志帝国时期经济高速发展，政治却相对滞后的主要原因。当然，正如前文中提到的，尽管德意志帝国的政治滞后于经济，但随着工业化带来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人们日益不满于原有的专制政治体制，帝国在政治架构方面已经出现了向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迈进的迹象。

政治滞后于经济的特点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德意志帝国的对内对外政策。就国内政治而言，它延缓了德国的民主化进程，使德国资产阶级在国家政治生活中长期处于一种对容克阶级的依附地位。就对外政策而论，普鲁士的军国主义传统和容克地主传统性的向外扩张、夺取土地的强烈欲望，使得德意志帝国有着极强的对外侵略性。而强大的现代化工业经济则为德国容克资产阶级的向外扩张提供了有力的物质保障，这就使得德国较之其他帝国主义国家更富于战争冒险性。

(六) 继承与发展——工业化背景下的文化繁荣和 思想意识多元化

文化从来是一种历史现象的反映。不同的人类发展阶段都会出现不同的文化特征。在19世纪上半期，德国文化界为争取民族统一，反对拿破仑外族统治，曾掀起过包括浪漫主义在内的文化民族主义浪潮。1815年以后，在梅特涅的反动统治下，德国文化界用其特有的方式来表现其现实的态度。其中有对政治失望而“专注于小民”、寻求“小民幸福”^①、脱离政治生活的毕德麦耶尔派（Biedermeier），也有与反动统治者展开抗争，以笔作“刀剑”的“青年德意志”。19世纪中期以来，特别是德意志帝国建立以后，随着工业革命的深入和社会结构的改变，包括文学、艺术等在内的德国文化界面临着诸如工业化以及工业化所造成的日益壮大的无产阶级、日趋没落的手工业者和小商人等中等阶级、城市中下层劳动阶层恶劣的居住条件、妇女解放运动等一系列新的现象和问题。在这种形势下，文化界首先必须寻找一些新的表达形式，以便更好地反映新的现实。

关于德意志帝国时期的文化，我们必须承认，它已经没有了18世纪下半期到19世纪上半期那种令人骄傲和灿烂眩目的德意志古典文化的恢宏和灵气，再没有出现诸如歌德、席勒、莱辛等那样的世界重量级文坛泰斗，也没有了康德、黑格尔一类的思维缜密的哲学巨匠和贝多芬、莫扎特等雄视世界的旷世音乐奇才。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与工业化带来的社会进步相适应，德意志帝国时期的文化在一种更加丰富的社会生活面前仍然呈现出一种相对繁荣，依然出现了一些杰出的人物。就这一时期的德

^① Heinz Fischer, *Deutsche Kultur: Eine Einführung*, Berlin 1977, S.148.

国文化而言，由于工业化背景下社会流动性的增强和信息交流的加速，社会开放性日益增强，贵族阶级、大资产阶级、中等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和农民等多元社会阶级、阶层和集团逐渐形成，它较之往日表现出新的发展趋势和特点，即更浓厚的政治色彩和纷呈多样的思想。针对这种文化的发展趋势，德国著名史学家沃尔夫冈·J. 莫姆森曾作了这样的评价：“自（19世纪）80年代以来，文化生活逐步与主导性的社会价值和资产阶级的生活理想脱离，并建立起一种独立的体系。作家和艺术家们逐渐从资产阶级思想的意识形态前提下解放出来。”^①

这一时期的德意志文化较之往日更加丰富和多样化，除了以中等阶级（或称之为市民阶级）为主体的文化外，还出现了为德意志帝国政治服务的、民族主义的和工人阶级的文化。从整体上看，这一时期的德国文化带有明显的工业化痕迹和德意志帝国政治色彩的烙印。

在历史学领域，受史学泰斗利奥波德·冯·兰克的影响，史学研究在德意志帝国时期的社会科学领域中显得特别令人瞩目。兰克主要关心的是政治国家的历史，而他的一些门徒则有过之而无不及，把历史著作几乎完全写成了政治史。兰克标榜的是“客观主义”和“科学方法”，主张用不偏不倚的态度写出公正的历史。然而他的门徒达尔曼、聚贝尔、德罗伊森等史学家们却赤裸裸地主张历史应为现实政治服务，并因此而形成了兰克学派的变种——普鲁士学派。由于普鲁士学派在德意志帝国的建立和日后向外扩张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普鲁士学派的史学因而被列宁称

^① Wolfgang J. Mommsen, *Die Kultur der Moderne im Deutschen Kaiserreich*. In: Wolfgang Hardtwig und Harm-Hinrich Brandt, *Deutschlands Weg in die Moderne: Politik, Gesellschaft und Kultur im 19. Jahrhundert*, München 1993, S.255.

为德意志容克和大资产阶级御用的“宪警史学”^①。

普鲁士学派的精神祖师是弗里德里希·克里斯托弗·达尔曼，他曾宣称，“我们德意志人最需要的是武力而不是自由”，这和俾斯麦的“铁血”政策如出一辙。作为普鲁士学派真正建立者的约翰·古斯塔夫·德罗伊森则鼓吹德意志在普鲁士的周围团结起来，其最重要的著作《普鲁士政策史》（第14卷）中充满了民族沙文主义的情绪，并试图用历史来证明，只有普鲁士才能担当起德意志民族复兴的重任。海因里希·冯·特赖奇克是普鲁士派中最著名的代表，其最重要的著作《十九世纪德国史》中充满了“大日耳曼主义”的喧嚣。

在19世纪的德国史学家中，特奥多尔·莫姆森自成一家。与兰克局限于研究中世纪史和近代史不同，莫姆森的研究大大超出了历史学的范畴，进入了古典哲学、考古学和法学的领域中。在史学界，他不仅首次描述了罗马国家制度的组织机构，而且在他所著的3卷本《罗马国家法》中给这些机构以法律上的定义，并系统地加以阐述。他所著的《罗马史》以及历时二十载编著的《拉丁文铭文集成》使他享誉世界。1902年，莫姆森因其《罗马史》而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莫姆森因其在历史学领域中的巨大贡献而得到极高的评价，有学者认为，“古代史之所以没有缩小成为单纯的政治史和思想史的汇编，而是达到世界史水平”，这一点主要归功于莫姆森的作用^②。

另一位历史学家卡尔·兰普莱希特则打破了兰克的专注于政治史的模式，致力于文化史的研究，并导致了对仅重视国家的兰

① 郭圣铭：《西方史学史概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87页。

② [德]卡尔·艾利希·博恩：《德意志史：从法国革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上册，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319页。

克政治历史学派的背离。此外，德国学者们在《圣经》考据和闪语研究方面也处于世界的领先地位。尤利乌斯·韦尔豪森在他的《以色列史绪论》和《以色列和犹太史》中揭示出《圣经》和先知犹太教从原始形式往后的不断发展情况；弗里德里希·德利奇则通过其解释亚述语和苏美尔语的工作以及近东的考古工作而成为近代最重要的东方学家之一。总之，19世纪下半期到20世纪初的德国历史学术成就仍堪称全世界史学研究的典范。

德意志帝国时期在社会学领域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学术成果，这些成果包括在费迪南·滕尼斯、保罗·巴特以及马克斯·韦伯等人的著作中，其中马克斯·韦伯对西方社会学影响最大。马克斯·韦伯是现代社会学的创立者，一个严谨的理性主义者，他的主要思想集中于其去世后出版的《宗教社会学论集》和《经济与社会》中。他在上述著作中首先为社会学进行了定义：社会学就是人类行为科学，它涉及到人类所生活的社会中接触到的社会、政治、经济、宗教、习俗等各种关系。正是出于这种考虑，他所研究的社会学涉及政治、社会、经济、民族、历史和文化等诸多领域，并建立了经济社会学、统治社会学、宗教社会学和法制社会学等。他试图通过比较的方法，去探讨世界各主要民族的精神文化气质与该民族的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内在关系。《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是他一系列研究中的杰作之一，在该著作中，他论述了宗教改革以后的新教对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重大作用^①。马克斯·韦伯对社会科学有他自己的一套看法，他认为，社会科学决不能被用作价值判断，“以经验为根据的科学不能教人们应该做什么，而只能是教人们能做什么，以及在某些条件下他想做什么”。他还希望能将政治置于科学研究之外，以便能达

^① 参见【德】马克斯·韦伯著，于晓、陈维纲等译：《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三联书店1992年。

到最高的客观程度。

在文学领域中，虽然德意志帝国时期已没有了歌德时代的那种辉煌，但也出现了歌德时期所不曾有过的另一番景象：多种流派同时并存的局面。

在德意志帝国建立初期，韵文学的现实主义文学仍处于极盛时期。这种现实主义就是资产阶级社会和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在艺术和文学上的表达形式，它把现实性和人性结合在一起，精确地描述日常的世界或历史的境遇，深入地刻画人物的性格。这一流派的主要代表有特奥多尔·施托姆、威廉·拉贝、特奥多尔·冯塔纳等，其中，特奥多尔·冯塔纳（1819—1898）可以说是一位资产阶级现实主义的批判大师。他曾长期担任报纸编辑和记者，并到各地多次游历，因而对德国的社会状况非常熟悉，这使他后期的小说就表现出一种社会现实主义。在他晚年所写的《私通》（1882年）、《迷惘、混乱》（1888年）、《燕妮·特赖贝尔夫人》（1892年）等小说中，都涉及到对当时社会的批判。冯塔纳的代表作《艾菲·布利斯特》（*Effi Briest*, 1895年）则通过对贵族小姐艾菲·布利斯特的悲剧婚姻的描写，揭露了普鲁士社会道德的虚伪，使人们认识到，在普鲁士这种虚伪的道德观念的束缚下，人的最单纯、最低的要求都无法达到。不过，冯塔纳仍对普鲁士社会眷情依依，并以一种乐观主义的心态相信它完全有能力进行改革^①。

自然主义是19世纪80年代下半期开始的又一种文学思潮。它受现代自然科学的影响，反对传统宗教和道德，将人及其周围的社会条件以及内心冲动不可避免地纠缠在一起的现象作为它的主题，下层社会的生活条件、精神和道德的衰败等等都是自然主义作品乐于采用的题材。自然主义将能够通俗地表现这些题材的戏剧作为表达其思想的主要形式，结果，德意志帝国时期的戏剧

^① Martin Kitchen, *Cambridge Illustrated History: Germany*, p.220.

在自然主义的推动下出现了一个新的繁荣时期。1889年，格尔夫·豪普特曼所写的第一部德国自然主义的戏剧《日出之前》在柏林的“自由舞台”^①首次演出。这一剧本中所描写的资产阶级的道德和家庭的瓦解引起了人们极大的震动。在演出时，观众中的一位医生竟在狂怒中将一把钳子扔到了舞台上。1892年，豪普特曼的另一部戏剧《织工》的演出更使自然主义的戏剧达到了高潮。这是一部以西里西亚织工起义为背景，描写工人反抗斗争的作品，在这一剧本中，劳苦大众第一次以主人公的身份出现在舞台上。

就在自然主义控制着戏剧舞台时，在抒情诗方面却出现了法国象征主义派影响下的作品。象征主义者们批评自然主义“单纯反映状态的东西，扼杀了本质的东西”，他们到工业化以前的农民和小城市的社会中去寻找题材和人物，追求所谓的“健康的乡土艺术”，从而变成了文学颓废派。威廉二世时期著名的抒情诗人赖因内尔·玛丽亚·里尔克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

到20世纪初，德国文坛上又出现了以海因利希·曼和托马斯·曼兄弟为代表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海因利希·曼在其代表作长篇小说《臣仆》中，描写了一个纸厂老板的儿子赫斯林通过无耻的投机和出卖他人而飞黄腾达的故事，并由此而反映出当时德国的阶级关系和社会矛盾。关于托马斯·曼的代表作，我们在前文中已经提及，即1901年出版的《布登勃洛克一家》。在这一部小说中，通过对大资产阶级布登勃洛克一家四代人的兴衰史，反映了德国从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时期的社会现实，在这里，托马斯·曼已经完全没有了冯塔纳的那种对普鲁士社会抱有的乐观主义想法。有关德国文化史著述对托马斯·曼的这部

^① 由于宫廷剧院和国家剧院不愿演出自然主义戏剧，1889年，奥托·布拉姆和保尔·施伦特在柏林创建了“自由舞台”。

作品给予了高度的评价，称之为表现了艺术家对于精神和艺术的追求，主题新颖，不落俗套，继承了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狄更斯、福楼拜和冯塔纳等人的创作方式^①。

德意志帝国时期的音乐当然不可能有古典时期的那种群星争辉的局面，但还是出现了两位世界级的音乐大师，从而在巴赫、格鲁克、海顿、贝多芬、莫扎特等群星闪烁的德国音乐史上又续写下了辉煌的篇章。

约翰·勃拉姆斯（1833—1897）是18、19世纪德国古典音乐的继承人，正是他在19世纪下半期将德意志这一辉煌的音乐传统继续发扬光大，并因此而得到了“古典遗产的掌玺官”的美誉^②。勃拉姆斯有音乐方面的天赋，在他年仅20岁时，著名音乐大师舒曼就称之为天才了。但是，直到1869年他的《德意志悲歌》上演后，他才获得广泛的成功。在勃拉姆斯的身上，人们几乎可以看到各位音乐巨匠的身影。就交响乐、钢琴和小提琴协奏曲而言，他无疑继承了贝多芬的传统；从他的浪漫派钢琴曲来看，他又是舒曼和门德尔松的继承人；而在声乐曲方面，他又显然是与舒伯特和舒曼并列的德国浪漫曲大师。在他的许多作品中，保存了交响曲、协奏曲和室内乐等古典音乐的全部技能^③。虽然他在古典音乐方面有杰出的成就，他的音乐却相对保守，几乎没有了“时代精神”^④，因为19世纪下半期的德国毕竟不属于“古典”时期了。他因此而对现代音乐抱以成见，并成了李斯特

① [德]恩斯特·约翰·耶尔格·容克尔：《德意志近百年文化史》，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3页。

② [美]科佩尔·S.平森：《德国近现代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359页。

③ Martin Kitchen, *Cambridge Illustrated History: Germany*, p.220.

④ Robert-Herman Tenbrock, *Geschichte Deutschlands*, S.231.

和瓦格纳的“新音乐”的尖锐批评者。

19世纪下半期最能震撼德国乃至世界乐坛的是集诗人、作曲家、指挥家和导演于一身的理查德·瓦格纳（1813—1883）。瓦格纳的音乐生涯以歌剧为主，一生写有14部歌剧。在19世纪上半期，他所创作的歌剧基本上承继了格鲁克、贝多芬等人的传统。此后，他提出了一套自己的音乐理论。根据这一理论，“未来的音乐”将在“总体艺术作品”（Gesamtkunstwerk）的音乐剧中实现，即音乐将成为一种“综合艺术”。他认为，歌词和音乐是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从戏剧情景的需要中产生出来的，音乐曲调应配合歌词内容。19世纪下半期，瓦格纳受到叔本华悲观主义思想的影响，其创作的歌剧大多取材于古代的日耳曼神话，在音乐上无一不表现出悲观和死亡的情绪。在《尼伯龙根》中，人们看到了毫无人性的特性，上帝、巨人和侏儒统治着舞台，他们的动机是欺骗、暴行、兽欲，甚至乱伦。在《女神》、《特列斯坦和伊佐尔达》中，人们所看到的无一不是死亡的结局。瓦格纳的作品就这样给人以“浓厚的感伤情调和忧郁的烦闷”，因而人们对他的作品也有许多不同的看法。尽管如此，新颖脱俗的特征使瓦格纳的作品总是具有一种现代艺术的感人力量，瓦格纳因此也赢得了众多的崇拜者，他的那座在1872年—1876年修建的拜罗伊特歌剧院成了世界上众多的“瓦格纳分子”崇拜的“圣地”。

与瓦格纳等在音乐创作上对古典音乐的离经叛道一样，在德国的哲学领域中也出现了与康德、黑格尔等理性主义的古典哲学背道而驰的非理性主义哲学，其主要代表是叔本华和尼采。

阿尔图尔·叔本华（1788—1860）是唯意志论哲学的创始人，主要代表作有《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论自然意志》、《伦理学的两个根本问题》等。这位非理性主义哲学的创始人认为，万物存在和运动的根源在于求生意志，理性只是意志的奴仆和工具，它无法阻挡求生意志的冲动，即无法遏止盲目的冲动和欲

求。由于欲海难填，人类总是处于痛苦之中。因此，叔本华的哲学是一种非理性的悲观主义哲学。

在叔本华的信徒中，弗里德里希·尼采（1844—1900）当是对德国人的精神生活最有影响的杰出人物。尼采与传统的德国哲学家们不同，他的著作缺乏严密的逻辑论证，更多地像散文诗和狂诗，显得有些杂乱无章，因而又被称为“诗人哲学家”^①。其主要著作有《不合时宜的观察》、《快乐的科学》、《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善与恶的彼岸》、《反基督教》、《权力意志论》等。他不满于叔本华的消极的唯意志论，主张积极的唯意志论，于是，在他的非理性主义的哲学思想中“权力意志”就代替了“生存意志”。他从唯意志论出发，提出了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要求，并因此而成了一切传统价值的破坏者和他所处时代的一切精神的否定者。他否定传统宗教，否定民族国家，否定自由主义，以及直到包括瓦格纳的音乐在内的哲学和艺术。他反对基督教的伦理学，认为，传统道德是一种建立在基督教基础上的“奴隶道德”（Sklavenmoral），是对自然价值的颠倒，造成了人的顺从和劣根性，压抑人的生命力和权力意志，因此应该摒弃，然后用所谓的“主人道德”（Herrenmoral）取而代之。他甚至喊出“基督死了”。在此前提下，他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提出了他的“超人哲学”，以便与已经没落的基督教文化相抗衡，其中有一句格言为后来的恶魔希特勒所终身恪守：

“强人的格言。

别理会！让他们去唏嘘！

夺取吧，我请你只管去夺取！”^②

① Robert-Herman Tenbrock, *Geschichte Deutschlands*, S. 231.

② 邢来顺：《德国精神》，长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189页。

尼采的所谓“超人”就是具有强大意志的、在智力和体力上都超群的强者，世界应由这种超人来统治和支配。尼采以上思想的历史意义在于，他敢于向作为西方文明基础的基督教文化传统发出挑战。也许正是这一原因，在19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尼采的著作成了人们最喜欢阅读的哲学书籍。据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开赴前线的德国士兵的背包中有两本书是最常见的，一本是《圣经》，另一本就是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与以上提及的文学、音乐和哲学相比，德意志帝国时期的绘画和雕刻等视觉艺术在欧洲和世界文化中所占据的地位要低得多。作为这一领域的配角，它们一般追随着欧洲绘画和雕刻的各种表现潮流，起初出现的是现实主义画派，代表人物有阿道夫·门采尔（1815—1905）、弗朗茨·伦巴赫（1836—1904）和安塞尔姆·费尔巴哈（1829—1880）等。

门采尔最初致力于画日常生活的一些小场面，其素描和色调都画得很准确。重要作品有《有阳台的房间》和《吉姆纳塞剧院的回忆》等，而他在1875年所绘制的《轧钢厂》更是新工业时代的一个重要艺术表现。门采尔具有当时现实主义画家所需要的素质，但由于受政治的影响，他最终将自己摆到了官方画家的位置上。结果，他因画了一些歌颂弗里德里希大帝、威廉一世等普鲁士统治者以及其统治功绩的油画和插图而声名大振。伦巴赫则在复制古代大师的作品的过程中学到了精湛的绘画技艺，他因绘同时代的德国和国际著名的人物的肖像而成为可与16、17世纪艺术大师相比的杰出画家^①。

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的绘画艺术在法国绘画艺术的

^① [德] 德斯佩泽尔与福斯卡：《欧洲绘画史》，人民美术出版社1984年，第202页。

影响下出现了数种画派并存的局面。印象主义画派^①是当时德国的一个重要派别，它不仅受到法国印象派画家的影响，而且受到安东·莫费等荷兰派的影响。在德国印象主义派画家中，有弗里茨·冯·乌德、马克斯·施勒福格特等人，但以马克斯·利伯曼（1847—1935）最为有名。例如，在《马球运动者》（1902年—1903年）和《阿姆斯特丹的犹太人街》（1905年）等作品中，利伯曼都是通过对自然环境的直接印象的描绘来展示他的作品的表现方式。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德国的绘画艺术又受到抽象主义的挑战，出现了表现主义画派。1911年，俄国画家瓦西里·康丁斯基在德国的艺术之都慕尼黑创作了第一幅表现主义作品。在新出现的表现主义画派中，弗兰茨·马尔克（1880—1916）是主要代表之一。与康丁斯基一样，他也是1911年在慕尼黑成立的德国表现主义画派团体“蓝色骑士”（Der Blaue Reiter）的成员，《蒂罗尔》^②等是他的代表作。

德意志帝国时期最著名的雕刻家有马克斯·克林格尔和阿道夫·希尔德布兰等，另外，威廉·莱姆布鲁克（1881—1919）的表现主义雕刻值得一提。莱姆布鲁克一生短暂，创作的雕刻不多，但他的艺术感染力却使人难忘。他的雕刻作品大都是人体比例过于拉长的裸体雕像，略带夸张的细长四肢构成直线性运动的多棱角结构，深思默想的神情似乎是表现静态的美，但在肌肉绷紧的躯体中却蕴藏着不可遏止的激情，其代表作为1913年的石雕“青年立像”。这一作品以清晰的轮廓和线性运动的雕刻结构取代了传统雕刻中团块式的沉重体量，以强调精神因素的内心激情取

^① 印象主义画派一词是指1874年参加卡普辛大道绘画展览的美术家们，它起源于1872年法国画家克劳德·莫奈绘制的油画《日出的印象》。

^② Klaus Schulz, *Deutsche Geschichte und Kultur: 500 Bilder aus 2000 Jahren*, S.112.

代了以往雕刻注重肉体力量的表现。与此同时，这一雕刻的拉长人体的极端变形和重灵魂甚于肉体的倾向，却又使人们联想到中世纪哥特式艺术的神秘风格^①。

在建筑艺术领域中，彼得·伯伦斯、阿尔弗雷德·梅塞尔和路德维希·霍夫曼的实用理性主义占了上风并确立起现代主义基本原理的准则^②。新建筑风格讲究的是技术和实用，摆脱了以前建筑风格上的华而不实的装饰，代表了社会工程的利益。

我们必须指出的是，德意志帝国时期的文化和艺术，较之以往表现出某种更浓厚的政治色彩。这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反映出来。

首先，这一时期的文化往往与德意志帝国的政治生活结合在一起，为政治服务。例如，在德意志帝国完成国家统一之时，德国的绘画、音乐等艺术领域对这一重大事件有所反映和表现自然无可非议，但要注意的是，它们过多地带有半官方的歌功颂德的艺术手法。在绘画领域，安东·冯·韦尔纳曾妙手绘下了多幅有关德意志帝国建立的名作，诸如《毛奇在色当战役中》和《凡尔赛皇帝宣言》等。其他的画家如伦巴赫和门采尔等，也都在威廉一世、俾斯麦等一些显赫政治人物画像方面有所成就。这些作品也都成了历史决定论画派的最杰出的代表作^③。在音乐领域，瓦格纳专门在1871年写了一首名为《献给巴黎前的德国军队》的诗，不久他又谱出了一首《皇帝进行曲》(Kaisermarsch)，用以祝贺德国对法国的胜利。另一位大音乐家勃拉姆斯则作了一首《凯旋之歌》(Triumphlied)以纪念德国的胜利。在历史学领域，特赖奇克

① 欧阳英等编著：《欧美雕塑名作欣赏》，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15页。

② Martin Kitchen, *Cambridge Illustrated History: Germany*, p.219.

③ 参见 Wolfgang J. Mommsen, *Imperial Germany 1867—1918: politics, culture, and society in an authoritarian state*, p.124.

作为普鲁士学派的代表，在历史学研究为政治服务方面做得非常出色，他在5卷本《19世纪德国史》中，把新帝国的出现描述成从神圣罗马帝国结束以来德国的政治和精神生活发展的结果。

其次，在德意志帝国时期，由于工业化发展带来的工人阶级力量的壮大，反映工人生活的工人阶级文化开始出现。德国社会民主党著名政治家、历史学家和作家弗兰茨·梅林就在柏林通过他的“新自由人民舞台”（Neue Freie Volksbühne）与资产阶级文化相抗衡。同时，如前所述，在自然主义思潮的涌动下，在文艺领域出现了豪普特曼的《织工》之类的反映下层工人阶级生活的作品。对于这一现象，梅林认为这实际上是对封建浪漫主义的一种修正^①。工人阶级文化的出现，打破了封建统治阶级和资产阶级对文化的垄断，是工业化带来的社会进步的一种表现，也是德国工人阶级强大力量的体现。它表明，作为社会主体的工人阶级已经进入文化消费领域，成了文化消费群体中的一员。

德意志帝国时期思想文化界的另一个极其重要的特点是思想意识的多元化。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同样可以追溯到这一时期的工业化。首先，在工业化社会之下，社会较之往日出现了更多的利益群体，每一个群体都希图向社会表明他们的立场和看法。其次，工业的进步带来了更好、更快的邮政和铁路联系，带来了富裕的生活，人们因此而有了更好的手段和更充裕的时间来对各种问题进行深入的思考，而便捷的旅行游览等则加强了国际间的文化和思想交流。再次，工业化造成的大规模的都市化也为新思想、新流派和新风格的传播提供了中心场所，它们甚至在文化生活方面发展成自己的特色，其中，柏林成了戏剧之都，慕尼黑则成了艺术之都。

^① 参见 Wolfgang J. Mommsen, *Imperial Germany 1867—1918: politics, culture, and society in an authoritarian state*, p.123.

我们在介绍德意志帝国时期的文化状况时，已经对它的思想意识的多元化有了一个简单的了解。例如，在涉及文学领域时提到了现实主义、自然主义、象征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等流派；在绘画艺术领域中则有现实主义、印象主义、表现主义等流派。其实，在哲学领域中也有多种思潮，除了前文提到的以尼采为代表的非理性主义哲学外，仅仅由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倡导的唯物主义哲学中就演化出两个派别。一个就是以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代表的历史唯物主义，另一个派别则受到自然科学特别是达尔文的进化论的影响，其中以动物学家恩斯特·黑克尔为代表。黑克尔在1899年出版的《世界之谜》一书中以一元论的观点最具代表性地阐述了后一个派别的思想。根据一元论，生命都是自然发生的，人也是自然的属物，因此，黑克尔反对人格化的上帝、灵魂不灭和自由意志。《世界之谜》一书出版后深受读者欢迎，不仅重版多次，而且被译成多种欧洲文字，在几十年中发行了几十万册。在很多家庭中，《世界之谜》成了“像圣经一样的必不可少的读物”^①。1906年，黑克尔等成立了“一元论者协会”，专门宣传这种以达尔文主义为基础的唯物主义人生哲学。

作为德意志帝国时期多元意识思潮的一个侧面，19世纪末20世纪初出现的青年运动同样值得我们注意。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也是工业化带来的社会发展的产物，是青年们面对成年人的灌输式教育而进行的自我教育的形式。1898年，柏林—施太格里茨文科中学的学生成立了所谓的“徒步旅行之鸟”（Wandervogel）。这一青年联盟主要是反对19世纪下半期经济全盛时期那种日益发展的唯物主义的、非宗教的世界观之下的市民文化，同时，它也是为了各种非纯理性的文化财富而进行的一种

^① [德] 恩斯特·约翰·耶尔格·容克尔：《德意志近百年文化史》，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4页。

斗争。在这场运动中，人们试图通过经历集体生活、未开发的自然、漫无目标的旅行，还有体验娱乐和歌舞中的优美民风等，来发展一种新的朴实的生活方式^①。

当然，在德意志帝国时期还存在许多政治性思潮，如民族主义、社会主义、反犹太主义等等，所有这些，我们在有关的内容中实际上已经予以了阐述，在此不再加以重复。总之，国家的迅速工业化带来的巨大社会和经济变化，使得德意志帝国时期在思想文化领域中表现出一种纷繁复杂的特点。要对这些多元的思想和文化进行全面的阐述显然是有困难的，故而在此只能以点带面，以斑见豹。

^① 参见 Robert-Herman Tenbrock, *Geschichte Deutschlands*, S.225.

五 工业化冲击下德意志帝国内外政策的调整

国家的迅速工业化不仅使德意志帝国在经济上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而且使德国的社会关系发生巨大变化。就政治上论之，一方面，如前所述的那样，经济基础的改变对上层建筑提出了新的要求，推动着帝国在政治结构上从专制主义向议会政治和民主制转变，使帝国各派政治力量出现了令人瞩目的调整；另一方面，国家的迅速工业化也促使德意志帝国政府不断调整其具体的对内对外政策，以适应政治、经济和社会形势变化的需要。这种调整表现为：在经济上，由自由贸易政策转向贸易保护主义，继而又采取适度的关税政策，以促进出口、进军国外市场的新方针；在国内统治策略上，由对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镇压政策转变为和解政策；在对外政策方面，由“大陆政策”走向“世界政策”，开始角逐世界霸权。

（一）务实求真——德国政府对外贸易政策的变化

工业化的深入以及由此带来的经济结构逐渐从农业主导型向工业主导型的转变，使得德意志帝国政府不得不于19世纪70年代末开始在经济政策方面作出一些新的调整。

我们曾经提到，普鲁士在统一德国的过程中，一直将自由贸易作为吸引各中小邦国的筹码。在德意志帝国建立初期，帝国政

府在经济方面还依然奉行着以经济自由主义为特征的“贸易上的自由放任”政策，遵守着普鲁士和关税同盟所习惯的自由贸易。当时的德国学术界流行的也是英国曼彻斯特学派的自由放任主义经济理论。而且直到19世纪70年代初，德国的谷物输出仍然超过输入，以保守党为代表的德国农业界因此也都赞成自由贸易，以便向世界市场上输出谷物。而在当时的德国政府中，以帝国宰相办公厅主任德尔布吕克为代表的一帮人也把自由贸易奉为无需证明的公理。直到1873年，德国政府还在有步骤地废除对生铁、铁制品、机车和其他机器的关税，此举的目的无非在于增加德国农产品等的出口，同时进口一些诸如钢铁、机器等德国尚未充分发展起来的工业产品，以补不足。然而，从19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由于国际国内经济形势的变化，德国政府被迫改变了它一惯所奉行的自由贸易政策，转向贸易保护主义。

从国际因素来看，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即德国政府对外贸易政策的转变显然受到开始于1873年—1874年的持续性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

在19世纪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中，起始于1873年—1874年的危机算是范围最广、程度最深、破坏性最大的一次经济危机。这次经济危机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它主要肆虐于德国、奥匈帝国和美国等几个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与此同时，英、法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也受到了冲击。以往的任何一次经济危机都没有像这次危机一样呈现出如此显著的国际性。

德、奥、美等几个后起资本主义国家之所以出现剧烈的经济危机，主要是由于创办公司的热潮所引起的。因为这种创办公司的热潮的结果是，一方面投机之风猛烈，另一方面造成生产的迅猛扩张，引发生产过剩危机。以普鲁士为例，仅1872年其新创设的企业就达494家，资本总额近5.08亿塔勒尔。甚至到危机爆发前夕的1873年上半年，普鲁士仍新创办公司195家，资本

总额近 4.98 亿马克^①。而这些新创办的企业有两大特点：一是有许多公司属投机性质，实际上并未从事经营，有些公司则用过去 10 万或 20 万马克买来的工厂担负 100 万马克以上的股本；二是用于生产资料的投入比例过大，从而造成生产资料产量的过度高涨。

表 5-1 1870 年—1873 年德国煤、铁和钢的生产情况^②

年份	煤炭(百万吨)	生铁(千吨)	钢(千吨)
1870	26.4	1 390	170
1871	29.4	1 564	251
1872	33.3	1 988	312
1873	36.4	2 241	303

疯狂的投机对资本市场提出了极高的要求。普鲁士银行的贴现率在 1873 年时提高到 6%，私人贴现率更是提高到 7%—8%。与此同时，生产方面却在 1872 年秋天以后已经出现了商品堆积而无法销售的现象，其结果是，金融形势日益困难。终于，交易所危机于 1873 年 5 月 9 日首先在维也纳爆发，维也纳交易所因股市暴跌而被迫停止交易。9 月 20 日，纽约朱伊—库克银行公司崩溃，银行危机在美国爆发。一个月以后，危机跳到德国。10 月 10 日，柏林的奎士托普银行团首先崩溃。接着，由它所创立的公司也自然一起倒闭。这种崩溃从股市上一目了然，1873 年 1 月 4 日，奎士托普银行联合会的 900 万马克股本卖价高达 1 719 万马克，到 10 月 10 日时猛跌至 227.1 万马克。

与以上危机相对应，德国的工农业生产出现了巨大滑坡，企

① 厄斯纳：《经济危机》，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第 226—227 页。

② 厄斯纳：《经济危机》，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第 229 页。

业纷纷倒闭，生产锐减。以铁的生产为例，1873年时，德国铁产量为224.1万吨，1874年下降为190.6万吨，到1876年时更下降到184.6万吨。与此同时，产品的价格也大幅度下跌，1870年—1875年，一吨生铁的价格平均为94.83金马克，1881年—1885年则降到了56.51金马克^①。

面对世界性经济危机，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纷纷将目光转向国外，寻求外部市场，以推销其过剩产品。结果，当德国无数的企业在经济危机的冲击下破产倒闭，产品滞压时，英国的大量工业品和来自美国、东欧等地的大批农产品却由于交通运输状况的改善而长驱直入，以其低廉的价格横扫德国市场，威胁着德国工业和农业的生存。按照帝国宰相俾斯麦的话说，当时的德国“已经成了外国所有的过剩产品的堆放场”^②。在这种形势下，德意志帝国政府当然有理由采取相应的对策和措施来保护本国的工农业生产。

不过，除了以上外部的压力因素外，有一点我们同样应该注意到，即德国政府的对外贸易政策从自由贸易转向贸易保护主义显然有它的国内背景因素。首先，从当时德国工业界的角度来看，在19世纪70年代初以前，德国的工业发展尚处于较低的水平之上，许多工业品尚需要进口，因此一时还谈不上保护关税，更谈不上与“世界工厂”的英国一争高下。然而，在帝国建立之后出现的经济高速发展以及创办企业的热潮，使整个德国尤其是德国西部地区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许多新的工业企业。在这种新的形势下，德国工业界开始出现了要求对外国工业制成品的输入

① 厄斯纳：《经济危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246页。

② Diether Raff, *Deutsche Geschichte vom alten Reich zur Zweiten Republik*, S.157.

课以重税，以保护年轻的德国民族工业的呼声。而 1873 年以后的经济危机又使德国工业品的销售出现了极大的困难。德国经济发展出现了“长期慢性萧条”。于是，德国工业界就想通过保持国内工业品市场的高昂价位来牟取暴利，以便向国外市场上低价倾销过剩工业品，通过价格战来排挤国外的竞争者^①。为此，德国工业界人士在经济危机之后成立了一系列的协会，如 1874 年成立的“德国钢铁工业家联合会”（Verein deutscher Eisen- und Stahlindustrieller）等都大力鼓吹贸易保护主义，“它们把实施和维护保护关税当作最重要的任务”。1876 年成立的“德国工业家中央联合会”（Zentralverband deutscher Industrieller）则是工业界各种联合会的最高组织。在这一组织中，重工业巨头们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而“德国工业家中央联合会”对保护关税又是最感兴趣的，德国工业家们就是通过这样一些组织来向政府施加舆论压力。1877 年 7 月 12 日，德国工业家中央联合会直接致函德皇威廉一世，阐述德国经济危机的原因，要求实行保护关税^②。工业界的这种态度必然会对德国政府制订相关政策产生巨大影响。

在农业领域，也出现了保护关税的呼声。自 19 世纪中期开始，由于工业化的发展和工业人口的迅速增加，德国社会对粮食等农产品的需求也相应增强，德国因此成了整个世界看好的农产品销售市场。在这种情况下，以美国为代表的国外廉价农产品大

① [德] 弗兰茨·梅林：《中世纪末期以来的德国史》，三联书店 1980 年，第 216 页；Norman Stone, *Europe Transformed 1878—1919*, p.163.

② Christoph von Tiedemann, *Aus sieben Jahrzehnten, Zweiter Band: Sechs Jahre Chef der Reichskanzlei unter dem Fürsten Bismarck*, Leipzig 1909, S.178—184. Christoph von Tiedemann (1836—1907)，曾任帝国宰相办公厅主任、布罗姆贝格政府首脑、普鲁士众议院和帝国议会议员，是东马尔克联盟的创建者之一。

量涌向德国^①。到70年代末，原本一直出超的德国农业在世界市场的竞争中第一次败北。例如，到1879年为止，德国已经几乎完全丧失了英国的谷物市场，因为那里68%的需求已从美国和加拿大进口^②。德国粮食的输入开始超过输出。在外国廉价农产品的冲击下，德国谷物价格大幅下跌。1872年—1878年间，德国的小麦价格从每吨238马克降到了194马克，黑麦则由每吨163马克下降到了132马克^③。于是，原先一直主张自由贸易的德国农业界也发出了抵制外国农产品进入德国的呼声，以保护德国农业。

现在，德国的工业界和农业界开始有了共同的经济要求。他们一致提出了保护关税的问题，而宰相俾斯麦也因为自己有工农业产业而成为不受关税阻挡的经济危机和市场萧条的受害者。在这种情况下，这位宰相自然对德尔布吕克等人鼓吹的自由贸易观点失去了耐心，相反，对大地主和德国工业家中央联合会等组织提出的保护关税政策却兴趣日浓，他也由一名自由贸易的拥护者变成了贸易保护主义的倡导者。俾斯麦称，德国和他自己都成了“一个忠实的信仰（自由贸易）的被愚弄者”^④。

有人说，俾斯麦的整个政策体系就像一篇缜密的论文。这话

① 有关研究表明，这一时期德国农业的生产力远远低于美国。当时德国农业方面所雇佣的劳动力跟美国相当，但德国每个劳力生产的粮食为5吨，而美国每个劳力生产的粮食为15吨。参见 Henry de Bellgens Gibbins, *Economic and Industrial Progress of the Century*, Toronto, p. 380.

② W.O.Henderson, *The Rise of German Industrial Power 1834—1914*, p.217.

③ Helmut Böhme, *Deutschlands Weg zur Grossmacht: Studium zum Verhältniss von Wirtschaft und Staat während der Reichsgründungszeit 1848—1881*, Köln, Berlin 1966, S.399.

④ C. Grant Robertson, *Bismarck*, p.376.

一点不假，他的国内政策以及对外政策几乎都是有联系的。他在对外贸易政策上转向保护主义，除了经济危机的原因外，还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

从政治上看，他深知保护农业界容克地主的利益对维护帝国政治制度以及社会秩序的重要性，故而推行有利于容克地主的保护关税政策，以保护德意志帝国的这一政治支柱。

俾斯麦推行保护关税政策还出于财政上的考虑。他发现关税对于囊中羞涩的帝国政府而言是一个新的财政来源。根据帝国宪法的规定，关税和消费品税的征收权属于帝国，这不仅可以使他摆脱对各邦提供经费的依赖，而且可以使各邦从帝国预算分摊额的沉重财政负担下解放出来。基于以上想法，早在1875年，他就已经想用保护关税来代替一直实行的低税率的财政关税。从这一意义上，实行保护关税只是他财政改革的一种手段^①。

同样，俾斯麦在对外贸易政策态度上的转变也与当时的社会政策、文化斗争以及他和民族自由党的关系有关。他认为，在实行保护关税带来帝国政府财政状况改善的情况下，可以逐步地取消直接税，从而减轻作为国家的社会基础的那些下层劳动阶层的负担^②。而保护国内市场，抵制那些条件优越的外国竞争对手，减少企业的破产和工人失业等，同样也是对“生产的国民阶级”的支持。此外，由于他已经开始与主张自由贸易的民族自由党决裂，因此他要争取赞成贸易保护主义的中央党的支持。因此，保护关税政策也可以被视为俾斯麦反对民族自由党的一项战斗措施。

^① Gerhard A. Ritter, *Das Deutsche Kaiserreich 1871—1914: Ein historisches Lesebuch*, S. 211.

^② Karl Erich Born, *Wirtschafts- und Sozialgeschichte des Deutschen Kaiserreichs (1867/71—1914)*, S. 120—121.

另外，我们还应当看到，俾斯麦也看到了关税可以用来作为外交政策的重要武器。如前文所涉及的那样，他在对俄政策问题上就采取了提高粮食进口税的措施，借以向俄国施压，迫使其在外交政策上采取与德国合作的态度。

最后，公共舆论也开始背离自由主义的经济理论，转向鼓吹保护主义。早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反对大卫·李嘉图等曼彻斯特学派经济理论、提倡贸易保护制度的美国人亨利·C·凯里的著作就已经在德国得到传播。自1877年以后，曼彻斯特学派的经济理论和社会理论很快在德国失去了影响，而主张建立民族主义经济、实行保护贸易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理论在他去世30年后开始受到人们的重视。根据李斯特的理论，在德国内部废除关税壁垒的同时，德国应当建立一种“基于报复之上的针对外国的关税体系，直到他们承认欧洲自由贸易的原则为止”^①。据说，在俾斯麦的身边时常带有这位国民经济学家的著作。

正是在以上诸种因素的作用下，德国政府开始在对外贸易政策上转向。1876年，以德尔布吕克为首的一些拥护自由贸易的官员失去了宰相的信任，德尔布吕克“因健康关系”辞去了宰相办公厅主任的职务，与他持相同立场的官员也纷纷挂冠离去。俾斯麦于是将正在航行中的德国经济大船驶上了贸易保护主义的航道。这位帝国宰相宣称，他不能让自由贸易的梦想把置身于三大强国——俄国、奥地利、法国——之间的德国引入迷途，这些国家已经放弃、或正在准备放弃自由贸易。总之，德意志帝国不应该从曼彻斯特取得自己的政策^②。1878年春，俾斯麦进一步采取

^① Friedrich List, *Schriften/Reden/Briefe. Band 1. Der Kampf um die politische und ökonomische Reform 1815—1825*, Aalen 1971, S. 495.

^② J.H. Clapham,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France and Germany 1815—1914*, pp.316—317.

行动，将反对其新方针的大臣欧伦堡、康普豪森和阿亨巴赫排挤出了政府。

当然，政府对外贸易政策的转变还必须得到帝国议会的认可。而从当时帝国议会的整个力量的变化趋势看，是有利于主张贸易保护主义派的。如前所述，在1878年的帝国议会选举中，主张自由贸易的资产阶级自由派政党——民族自由党和进步党等纷纷败北，以中央党和保守党为主体的保护贸易主义支持者却占了多数，这就为俾斯麦在帝国议会中寻求对新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支持提供了便利条件。帝国议会中赞成实行保护关税的议员们在以威廉·冯·卡尔道夫为首的德国工业家中央联合会的游说和影响下，于1878年成立了以促进保护关税为宗旨的“帝国议会国民经济联合”(Volkswirtschaftliche Vereinigung des Reichstags)，这一联合中包括397名帝国议会议员中的204名议员，即87名中央党议员，36名保守党议员，39名自由保守党议员和27名民族自由党议员。这年10月17日，这一联盟就德国的关税改革发表了一项声明^①，表明了它对保护关税政策的支持态度。从这里人们已经可以看出，俾斯麦政府的保护关税政策在议会通过显然不会有什么大碍了。

1878年12月15日，德国政府发布了实行保护关税的第一个正式声明。次年2月24日—25日举行的德国农场主第10次会议上，德国工业界和农业界之间的联盟得到公开确认^②。1879年7月12日，帝国议会以217票对117票的预料中的压倒性多数通过了关税法，并于1880年开始实施。有关数据表明，保护

^① Gerhard A. Ritter, *Das Deutsche Kaiserreich 1871—1914: Ein historisches Lesebuch*, S.209.

^② Gerhard A. Ritter, *Das Deutsche Kaiserreich 1871—1914: Ein historisches Lesebuch*, S.210.

关税的实行对德国的进出口贸易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872年，德国对外贸易的进口额为32.23亿马克，出口额为23.21亿马克，呈现入超局面；到1880年时，进口为28.3亿马克，出口为29.23亿马克，呈现出超趋势^①。

不过，在这里要说明的是，德国政府此时规定关税的目的并不是像李斯特所期望的那样，通过保护关税来支持民族工业的发展。它更多的意图在于，通过保护关税，提高国内市场的价格，迫使国内的消费者以高于国际市场的价格来购买绝大多数的德国自己制造的重要工业品，为德国商品低价位出口创造条件，从而提高德国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正是在这一目的下，德国的卡特尔发展特别迅速。这种组织既消除了国内竞争，又便利于在国外的竞争。结果，德国的消费者却不得不为此而付出代价。

虽然如此，保护关税政策对德国经济的发展还是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它保护了本国的产品 and 市场，从而间接地为人们维持和创造了较多的劳动就业机会。因此，“以后几十年中生产发展，国家收入和财产增加，就业人数、国民个人的实际收入和生活水平、存款和投资等均有所提高，人们喜欢把这一切（只涉及工业而不涉及农业）归诸于一再增高并经过改造和扩大的保护关税壁垒的作用”^②。

需要强调的是，对于俾斯麦时期德国政府的保护关税政策要有一个正确的理解。虽然实行的是贸易保护主义，但在这一时期的关税中，工业制成品的关税税率并不算高。至于这种做法的原因，我们在前文已经提到，即实行保护关税的一个重要动机就是

^① 樊亢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简史》，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366页。

^② [德] 卡尔·艾利希·博恩：《德意志史：从法国革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下册，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670—671页。

增加帝国的财政收入。如果对进口物品课税过高，势必阻断外国工业品的流入，那么增加收入这一目的也就难以实现了。因此，纵观 80 年代，大工业中的关税增加幅度都微不足道，主要的原料仍免税进口，只有油类、脂肪和木材等产品在农业界的强烈要求下才维持较高的进口关税。以铁税为例，虽然主张加重关税的呼声很高，但其税率一直很平稳。生铁的税率一直维持在 1868 年—1870 年的每 100 公斤 1 马克的水平上。

与工业品的关税率相比，农产品的关税率则相对较高。在 80 年代，德国对农产品的关税提高了很多。起初，小麦、裸麦和燕麦等每吨课税为 10 马克，大麦和玉米等每吨课税为 5 马克。此后，在农业界的要求下，这类关税不断提高。到 1890 年，小麦和裸麦等所缴的关税已经达到每吨 50 马克，燕麦为每吨 40 马克，大麦为每吨 22.5 马克，玉米为 20 马克。木材和牲畜等的课税都有所提高。为何农产品方面的关税会如此之高呢？从根本上说，因为帝国最高领导层在农业上有着特别大的利益，例如，作为德意志帝国皇帝所在的霍亨索伦家族当时拥有 24 500 公顷的土地，而身为帝国宰相的俾斯麦也拥有 9 000 公顷的土地^①。在这种情况下，对农业界进行特别关照也就不足为奇了。

保护关税政策和以前的自由贸易政策一样，是德国政府在具体客观形势下的一种适应性的选择。因此，到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当德国的经济形势进一步发生变化，尤其是工业经济显得生机勃勃，竞争力日益增强，并成为国家的主导经济的时候，德国政府在对外经济贸易政策上又作出了新的调整。

1890 年以后，继俾斯麦上台的卡普里威政府在保护关税政策的态度上有所松动。究其原因，主要受以下几方面因素的影响。

^① W.M.Chwostow, *Zur Geschichte der Neuzeit 1870—1918*, Berlin 1956, S.61.

响：其一，由于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推动作用，德国经过一段时间的跳跃性经济发展，到19世纪90年代，已经转变为一个工业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其工业产品也已经具备了相当的竞争能力，不用再过分担心外国工业品的强大竞争力。在这种情况下，工业家们转而要求降低关税。因为征收高关税，特别是谷物进口方面的高关税会间接地增加工业生产的成本。换句话说，工人们在购买食物方面的高支出意味着资本家要为此支付更多的工资。其二，在保护关税和卡特尔体制下，德国的消费者被迫以高于国际市场的价格来购买大多数的工业品和农产品。以农产品为例，在1879年—1883年，每公吨小麦的平均价格在但泽（不征关税）为198.85马克，在伦敦为200马克，在柏林却为205.8马克。1886年—1890年，每公吨小麦的价格相应为：但泽139.63马克，伦敦142.73马克，柏林174.21马克。通过比较可以看出，处于保护关税下的柏林的农产品的价格最高。这实际上是为了少数的容克地主和农场主的利益而损害大多数德国人的利益，这种状况自然引起广大消费者的极大不满。其三，高关税可能招致他国的报复性打击，危及德国的出口。这一点对于工业飞速发展，出口强劲的德国来说是极其危险的。其四，随着工业的进步和实力的增强，德国工业界内部在保护关税问题上也出现了分歧。例如，与重工业不同，德国的消费品工业和化学工业等部门对低价进口外国的原料就很感兴趣。由于这种利益上的矛盾，一部分化学工业、纺织工业和制成品工业就退出了德国工业家中央联合会，于1895年成立了自己的组织——工业家联盟（Bund der Industriellen）。其五，就当时德国的农业状况看，高关税已经失去了保护本国农产品市场的意义，因为进入19世纪90年代后，德国的主要农产品产量已经不能满足本国的需要。例如，在1895年—1900年间，德国农业只能供应所需裸麦的92.6%和小

麦的 73.7%^①。进口粮食势在必需。第六，德国的钢铁、机械制造业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技术支持下得到极大发展，与国内需求相比，这些德国产品的主要市场在那些仍在建筑铁路和工厂的国家。因此，从德国工业的特点看，以出口为主的对外贸易已经具有了“更大的意义”^②。

基于以上原因，卡普里威政府决定调整旧的保护主义关税政策以适应新的形势。于是，从 19 世纪 90 年代开始，德国开始在关税问题上采取温和的态度，实行“新方针”。卡普里威想借此来缓和人们的不满情绪，同时在帝国议会中争取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支持。

卡普里威政府在对外贸易方面的战略是，通过减低谷物等农产品的进口关税为代价，来换取向周边农业国家出口工业品，当时的口号是，“德国必须输出”。卡普里威在帝国议会演说中宣称：“我们必须出口，要么出口货物，要么出口人。面对增长的人口，没有一个稳定增长的工业，我们就无法继续生存。”^③

在减低农产品和一些工业品进口关税的基础上，卡普里威政府与有关国家签订了一系列的贸易条约，目的是尽可能地为德国的工业品寻找国外市场。在 1891 年—1894 年间，德国先后与意大利、奥匈帝国以及其他许多国家签订了有关条约。所有这些条约都是以同一个原则为基础的，即根据彼此协商，缔结协定关税。德国降低农产品进口税，以此换取对方减低对德国输出的工

① J.H.Clapham,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France and Germany 1815—1914*, p.212.

② David Calleo, *The German Problem Reconsidered: Germany and the World Order, 1870 to the Present*, Cambridge 1978, p.16.

③ Gustav Schmidt, *Der europäische Imperialismus*, München 1985, S.91.

业品征收的关税^①，这当然是一种舍微利而赚大钱的买卖。在这种政策的指导下，甚至对德国农业构成主要威胁的俄国的谷物也于1894年得到了“最惠国待遇”。在卡普里威的这种贸易政策下，德国在对外贸易上实行一种复合的关税制度：一类关税适用于有条约保证，有一定年限，而且根据条约可扩大到所有享受“最惠国待遇”的国家；另一类关税则针对没有条约关系的国家。

必须指出，卡普里威政府调整关税政策和签订各项贸易条约的主要目的在于为德国工业品谋取销售市场，但这并非惟一的动机，它还含有其国内政治和外交目的，即一石三鸟。就国内政治而言，降低谷物进口税和获取国外工业品市场意味着降低面包价格和创造更多的工作机会，从而缓和工人阶级的斗争情绪^②。从外交角度看，德国与奥匈、意大利相关贸易条约的签订则进一步巩固了三国之间的同盟关系。

卡普里威时期的关税政策因偏袒工业界而在一定程度上激化了工业界和农业界的矛盾。1893年，农业界开始组织强大的“农场主同盟”来维护自己的利益。1897年，帝国议会中出现了要求更新贸易条约的呼声，要求提高谷物进口税，更多地顾及农业界的利益。德国农业界还提出了对农产品实行“双重关税”的主张。据此，对凡未与德国签订贸易条约的国家一律实行自动关税，即最高进口税率，对缔结有贸易条约的国家也实行最低关税限制。当时农场主同盟提出的谷物进口最低关税为：所有谷物种类一概每公担7.5马克（到此时为止，小麦和黑麦的进口关税为每公担3.5马克，燕麦2.8马克），至于牲畜和肉类进口税则提

① [苏] 赫沃斯托夫：《外交史》，第2卷（下），三联书店1979年，第344页。

② Karl Erich Born, *Staat und Sozialpolitik seit Bismarcks Sturz*, Wiesbaden 1957, S.94.

高 300%^①。工业界则担心这种最低关税的规定会限制对外贸易谈判的灵活性，因而表示异议。

为缓和工业界和农业界之间在对外贸易政策上的对立，1900年新上台的比洛夫政府进一步调整外贸政策，在关税方面实行起一种更为科学、严密、详细的税则制度，在折中主义关税政策的招牌下，既促进工业出口，又要给农业更多的帮助，以便使其能在外来竞争中立脚^②。根据 1902 年 12 月帝国议会通过的新关税法案，针对签订贸易条约国家的最低关税为：小麦为每公担 6 马克，黑麦和燕麦每公担 5.5 马克。最高关税相应为：小麦每公担 7 马克，黑麦和燕麦每公担 6.5 马克。其他农产品的进口税率提升幅度更大^③。与此同时，在工业方面则采取科学、灵活的税则：涉及到工业生产原料的进口物品给予免税待遇，初级产品给予低税待遇，但制成品的关税大幅度提高，有的升幅高达 50%。例如，棉花进口免税，棉纱进口实行低税，而棉布税率则提高 50% 以上。工业生产中所需的羊毛也免税，其他诸如矿砂、煤炭等工业用的原材料进口皆免税。从这里可以看出，比洛夫政府时期的关税政策特点是依物而征，等级分明^④，既要安慰农业界，又要保护工业界利益。这种关税税则的实行，对于保护德国的工农业生产和促进其经济的健康发展，显然具有重要意义。

① Volker Hentschel, *Wirtschaft und Wirtschaftspolitik im wilhelminischen Deutschland: Organisierter Kapitalismus und Interventionsstaat?* S.189.

② A.Sartorius von Waltershausen, *Deutsche Wirtschaftsgeschichte 1815—1914*, Jena 1923, S.416.

③ Karl Erich Born, *Wirtschafts-und Sozialgeschichte des Deutschen Kaiserreichs (1867/71—1914)*, S.137.

④ W.O.Henderson, *The Rise of German Industrial Power 1834—1914*, p.223.

综上所述可见，德意志帝国时期的经济政策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帝国政府的经济政策一直处于不断的调整之中。这种调整表现在对外贸易政策上，就经历了一个从自由放任主义到贸易保护主义，再到适度、合理的关税政策的过程。

（二）勇开先河——国家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和其他社会政策的进步

上文所述之俾斯麦从自由贸易转向贸易保护主义，只是俾斯麦抛弃自由放任主义经济学说的一个方面^①，他在这方面的进一步做法，就是通过建立国家社会保障制度而使国家介入资本和劳务事务中^②。由于这一做法，德国成了近代西方国家中率先实行全面的国家社会保障制度的开拓者。从1883年起，德意志帝国议会相继通过了一系列社会保险法案。而这些法案的成功实行则使德国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标准的福利国家和社会立法的楷模，西方各国竞相仿效。

从根本上说，德意志帝国时期国家社会保障制度的实行同样是国家迅速工业化的结果。因为国家社会保障制度的出台，在很大程度上是用来解决工业化带来的种种社会问题的，从政治上说，也是俾斯麦政府为了拉拢作为工业化产物的工人阶级的“蜜糕”政策的一部分。说到这里，人们或许会提出这样的疑问：到19世纪80年代，无论在工业化的规模上还是在社会对现代化的

① 一些德国学者习惯于将德意志帝国时期国家介入经济和社会生活领域的行为称作“有组织的资本主义”（organisierter Kapitalismus）或“干预国家”（Interventionsstaat）。其实这只是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为解决因工业文明带来的经济和社会问题而出现的一个共同政策特征，即由自由放任政策转向“国家干预”，而非德国所独有，只不过德国的“国家干预”政策出台相对较早。

② F. Lee Bennis, *European History since 1870*, New York 1946, p. 63.

保险需求方面，德国尚无法与工业先驱的英国相比，为什么能率先推出一系列社会保险立法，实行国家社会保障政策呢？我们认为，这是在工业化的大前提下，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它植根于德国的社会阶级状况、历史传统和当时的现实政治状况之中。在此，我们不妨进行一些较深层次的分析 and 探索。

德国社会内部特定的阶级构成是俾斯麦政府之所以能在西方国家中率先推出国家社会保障政策的一个重要原因。19世纪下半期的德国，阶级关系复杂，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和社会主义的诸种因素并存。在各阶级中，人数最少但势力最强大者，是普鲁士的容克地主阶级。他们由于其代表人物俾斯麦顺应历史潮流，用“铁血”政策完成了德国的统一大业而声威大震，并从普鲁士邦的统治阶级一跃而成为整个德国的政治统治者。而此时的容克地主阶级由于其阶级特性决定了他们在政治上的两面性态度：一方面，绝大部分容克地主由于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普鲁士式道路”以及投资于工商业和矿山开采等，在经济上已经日益资产阶级化，因而与资产阶级的利益日趋一致。这就决定了容克地主和资产阶级一样，在本质上对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运动抱一种仇视的态度，俾斯麦政府在对待社会主义工人运动上的镇压态度就是一个最好的说明。另一方面，我们在前文已经提到，容克地主阶级与资产阶级毕竟不完全一样，他们一直是各种封建政治特权的享有者和国家政权的把持者。从这一角度来说，容克地主阶级在政治上有压制资产阶级的参政要求，保持自己垄断统治地位的欲望。而这种欲望驱使他们采取各种可能的措施，其中包括利用国家政权等资源，来推行有利于扩大自己政治声望的政策，以削弱和打击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要求。出于这种政治需要，在德国产生了所谓的封建社会主义。

我们知道，在英、法等国，由于资产阶级革命的原因，封建贵族们已经失去了他们的政治特权。在德国则不然，特定的历史条件

使容克地主仍处在国家统治阶级的宝座上。因此，当英、法等国的封建贵族在为他们永远失去的特权而悲叹时，德国的容克地主们却可以以救世主的身份出现在政治舞台上。他们为确保自己的统治，总是千方百计地美化自己主宰的政权，把它描绘成超阶级的国家，以期博得力量日益强大的工人阶级的好感，并麻痹他们的革命思想。于是，就出现了马克思所说的那种情况：容克地主们把“无产阶级的乞食袋当做旗帜来挥舞”，以“拉拢人民”^①。

德国资产阶级的历史特点和现实状况也有利于容克地主阶级推行封建社会主义的政策。我们在前文中已经提到，德国资产阶级自产生之日起，就以小市民的姿态出现在历史舞台上，表现出软弱、狭隘和目光短浅的特点，而不像英、法等国的资产阶级那样富有革命性。再者，德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较之英、法等国迟缓，当资产阶级在德国与封建势力展开斗争时，西欧已经出现了大规模的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政治和经济斗争，德国的无产阶级也已成长起来。面对这一现状，软弱自私的德国资产阶级宁愿忍受容克地主阶级在政治上的统治和摆布，以换取容克地主阶级帮助对付站在自己背后的无产阶级。

德国工人阶级的思想状况同样有利于封建社会主义在德国生存和滋长。德国工业化的步伐是非常迅速的，但是直到19世纪中叶时，手工业仍在德国工业中占据主导地位，手工业工人仍占德国工人阶级的大多数，“这种普遍缺乏现代生活条件、缺乏现代工业生产方法的情况，自然要伴随着差不多同样地普遍缺乏现代思想的现象”^②。德国统一后，尽管出现了大工业的迅猛发展，

① [德]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274页。

② [德]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506页。

但短期内这种非现代思想显然难以在工人中完全消除。马克思在谈到德国工人的思想状况时曾指出：“这里的工人从小就受到官僚主义的训诫，相信权威，相信上级机关……”^① 史实也证明了马克思这一分析的正确性。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曾在一份报告中谈到封建社会主义对工人运动腐蚀的事例：“汉堡的一个工人沙里迈耶夫在一次有四千人参加的群众大会上，赞扬君主制度，说什么同共和国的缺点比较，它是一种幸福……这个工人的讲话受到震耳欲聋的长时间的欢呼：‘讲得好！’在施塔斯夫特，王国盐矿的工人，全德联合会的会员当着我们的鼓动员（那霍尔斯特）的面竟然声明：‘你想要革命而我们相信俾斯麦公爵、我们的国王威廉。他们为了我们的利益会做出一切……’”^② 后来，恩格斯在分析德国工人阶级的这种思想状况时指出：“溺水者抓稻草，他等不及打救他的船离岸。船就是社会主义革命，稻草就是保护关税和国家社会主义。”^③

以上特有的阶级构成和思想状况，成为德国封建社会主义繁衍的良好载体。容克地主和资产阶级之间为对付共同的危险——社会主义工人运动，争夺对国家政治的控制权，既互相勾结，又互相斗争。一方面，他们都需要麻痹人民的斗争意志，另一方面，他们又将对方看作是逃避人民打击的避雷针，力图将人民拉到自己的一边。结果，容克地主阶级利用操纵国家政权的政治优势，首先展示出对人民的“关心”。就容克地主的这种意图而言，

① [德]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655页。

② 转引自 张文焕：《拉萨尔和俾斯麦》，三联书店1981年，第106页。

③ [德]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229页。

普鲁士驻维也纳使者拉多维茨早在1848年3月写的一份意见书中表达得非常明确：“任何形式的政府，只要能明智地、果断地关心无产阶级的利益，……就能把普通老百姓争取到自己一边来，从而能获得巨大的力量源泉。”^①而德国工人阶级自身的思想状况则正好为容克阶级的这种策略提供了合适的精神氛围。

德意志帝国时期之所以能够自上而下地顺利推行国家社会保障制度，还受益于普鲁士家长制的君主社会主义传统和与社会保险有关的发达的历史基础。熟悉普鲁士历史的人都知道，这一邦国有着君主社会主义的传统。弗里德里希二世就是这方面的一个楷模。他曾亲自解放了王室领地波美拉尼亚的农奴，并在西里西亚和东普鲁士取消了农奴制，禁止容克地主驱逐领地上的农奴。所有这些作为，使这位普鲁士国王获得了“乞丐之王”的美誉。19世纪初的施泰因—哈登贝格改革，自上而下地用颁布敕令的方式解放农奴，则更加深了普鲁士国家思想中的“父爱政治”的色彩^②，它给人们造成了这样一种印象，“作为‘乞丐之王’的一国之父要对他的区区臣民的幸福负责”^③。

应该说，以上君主社会主义的思想对威廉一世和俾斯麦多多少少是有一些影响的。威廉一世在1881年3月8日“事故保险法案”的“理由书”中就流露出这种意向：“国家应当比从前更关心那些急需帮助的人们。这不仅是一种举国涵濡的人道主义和基督教义务……必须通过立法措施而获得的明显和直接好处中，使这些阶级重新认识国家：它不是专门设计用来保护上层阶级社

① [美] 科佩尔·S. 平森：《德国近现代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131页。

② 沙比罗：《欧洲近现代史》，世界书局1933年，第427页。

③ [德] 恩·约翰和耶·容克尔：《德意志近百年文化史》，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42页。

会的机构，而是为他们自己的需要和利益服务的机构。”^①俾斯麦在1882年1月的一次讲话中也表明了这样的立场：“在经济斗争中站在弱者一边是我效忠的这一王朝的传统。……我当今的主人受激于保护我们同胞中贫苦阶级的崇高志向……并相信他们会期待着其所属国家的未来。”^②

从历史的角度看，社会保险并非俾斯麦的创举，作为一种互助形式，它在德国有着久远的传统。从很早时候起，德国就存在一些慈善组织，如北方的共济会、南方的对农场工人的教区疾病救济制度等。在普鲁士，比较著名的矿工协会疾病保险机构等，早在17世纪就已存在于采矿业中。这种组织起初是自愿的，但后来国家进行干预，使之带有半强迫性质。从社会功能上看，这种组织既促进会员之间的友好交往，同时组织开展与雇主的斗争，争取会员在生病期间能够得到免费医疗和领取一两个月的工资。当雇主逃避此类责任时，普鲁士政府通常会出面干涉，要求雇主遵守这些义务^③。1854年，普鲁士政府进一步以法令形式使这种疾病保险方式法律化和正规化。根据法令，矿山、高炉、采盐等行业都必须建立雇工和雇主联合委员会管理下的地区性疾病保险组织，支付疾病和丧葬抚恤费用基金由雇主和雇工同等比例分摊。这实际上是普鲁士国家强迫保险原则的初次运用。到19世纪六七十年代，这类疾病保险组织已经普及到德意志其他邦国。关于工伤事故，普鲁士政府也曾于1838年颁布法令，规定了铁路事故中雇主须承担责任的原则。1871年，这一原则进一

^① Charles Downer Hazen, *Europe since 1815*, New York 1924, pp.291—292.

^② Charles Downer Hazen, *Europe since 1815*, p.293.

^③ Arthur Birnie, *An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1760—1930*, London 1933, p.241.

步被推广到工场、矿山和采石行业，规定雇主有义务支付并非由于工人过失而造成的一切工伤事故费用^①。

从中世纪遗留下来的行会在德国社会保险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直到1848年前夕，德国境内的行会组织仍普遍存在。行会有自己的疾病和丧葬组织，因而有利于社会保险活动的开展。有鉴于此，普鲁士政府曾于1845年颁布法令，规定了行会制度的强迫性质，授权地方政府强迫雇主、雇工和工厂技工加入行会，以便通过行会来推行社会保障制度。1849年，新法令强迫雇主缴纳款项须达到其属下全体工人所付金额的一半，并承担收集后者分担款项的责任。这些法令的实行，使普鲁士境内建立起大批强迫性社团。五六十年代，德意志境内其他各邦也通过了类似的法律。到德意志帝国建立时，这种强迫性社团已经多达1万个，会员200万人^②。

以上情况说明，德国在社会保险方面有着深厚的社会传统和历史基础，这不仅使大众对社会保险问题有着较强的心理承受能力，而且为德国政府推行社会保障政策提供了可以借鉴的丰富经验。

促成俾斯麦政府推行国家社会保障制度的另一个重要动力是，社会各界为解决工业化带来的社会问题而进行的各种努力。

国家的迅速工业化虽然给德国带来了经济的飞速发展，同时也给德国带来了诸如健康、就业、住房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在急剧上升的城市人口中，这些问题尤其突出。工业化一方面给上层社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和享受，另一方面却给雇佣劳动者带来了各种频繁的工伤事故和没有保障的、动荡不定的工作和

① J.H. Clapham,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France and Germany 1815—1914*, p.336.

② Arthur Birnie, *An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1760—1930*, p.242.

生活条件。所有这些都无不引起德国社会各界的关注。就工人自身而言，如前所述，他们试图通过工会和政治上的团结来改变其绝望的处境，并因此而出现了欧洲最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人运动。除此以外，社会其他各界也为解决这些社会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讨和实践。

天主教社会福利运动为解决工业化带来的社会问题作出了巨大努力，“正如僧侣总是同封建主携手同行一样，僧侣的社会主义也总是同封建的社会主义携手同行”^①。与德国的封建社会主义传统相对应，基督教社会主义在19世纪的德国也有很大的市场。出于对前资本主义社会中教会优越地位的怀念以及在宗教伦理方面对放任主义工业的反感，一些天主教社会理论家和社会团体对工业化等现代文明带来的各种弊端抱以批评态度，并提出了解决有关问题的方案。我们在前文中已经提到，德国天主教社会福利运动创始人美因茨主教冯·克特勒就曾在他的著作《工人问题和基督教》中阐述了天主教对社会问题的态度。他从基督是“工人阶级的救世主”出发，要求关心工人的社会和经济状况，并提出了包括为失去劳动能力者设立慈善机构、组织基督教工会、成立生产合作社等主张在内的一系列方案。后来他又提出了通过国家社会立法，对工人提供保护或经济保障的设想^②。这些思想后来对中央党的影响非常大，1877年，该党就根据以上思想提出了成立劳资协会、实行工厂立法、成立工人参加的仲裁法庭等社会方案。而这些思想和方案对80年代社会立法的出台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曾经担任天主教企业家协会秘书长的弗朗茨·

^① [德]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275页。

^② [美] 科佩尔·S. 平森：《德国近现代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253页。

希策等人就是德意志帝国社会立法的重要策划者。

在解决社会问题方面进行理论探讨的另一股重要力量，是以著名经济学家和大学教授为骨干的所谓“讲坛社会主义者”，其中以保守派经济学家阿道夫·瓦格纳和古斯塔夫·施莫勒为代表的国家社会主义学派占主导地位。他们反对曼彻斯特学派的放任主义经济学说，主张国家干预经济，要求政府采取积极关心和改善工人状况的政策。施莫勒等人明确提出了“贯彻工厂立法”、“使越来越多的人分享高水平文化财富、教育和福利”等主张，并将推动国家提供社会福利援助、促进社会立法等作为自己的理想^①。

除了理论上的探讨外，一些具有远见卓识的企业家和政治活动家还进行了实践尝试。哈尔科特、克虜伯等人早在19世纪40年代初就已开始设立工厂储蓄所，以便在工人偶尔有病残时能互相帮助。以舒尔策—德利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自由派也在工人中发起了以自助为特征的工人合作社运动。早在1849年时，他就已经通过设立储蓄信贷所以及让工人参加消费合作社等，试图实现工人自助^②。

以上探讨和实践，为俾斯麦政府实施国家社会立法提供了强大的舆论动力、理论基础和经验教训。

当然，俾斯麦之所以不遗余力地推行国家社会保障，有其更重要的现实政治动因。

其一，推行国家社会保障政策是俾斯麦政府经济保护主义和维护国家安全及统一的“国家政策的属物”^③。

① [美] 科佩尔·S. 平森：《德国近现代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332页。

② 参见：Diether Raff, *Deutsche Geschichte vom alten Reich zur Zweiten Republik*, S.106—107.

③ Walter Bußmann, *Das Zeitalter Bismarcks*, S.209.

如前所述，德意志帝国建立后，俾斯麦政府的经济政策经历了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1878年以前，俾斯麦在帝国议会中仰赖最大议会党团民族自由党的支持，经济上推行自由主义为特色的自由贸易政策。然而，1878年以后，由于国内外经济和政治形势的变化，俾斯麦政府转向贸易保护主义，这就意味着俾斯麦与主张经济自由主义的民族自由党分道扬镳，并需要在帝国议会中寻找新的合作伙伴。于是，主张经济保护主义，也主张解决社会问题，并在帝国议会中拥有强大实力的中央党和同样主张保护关税的保守党自然成为俾斯麦新政策的选择对象。正是在国家整个经济政策转向保守主义的形势下，俾斯麦在1877年8月10日给普鲁士商业大臣阿亨巴赫的一份书面材料中首先提出了社会保障问题的设想：实现对劳工、疾病、事故和伤残等方面的关照^①。这与天主教中央党主张解决社会问题的态度是一致的。

对德国的国家统一和安全的考虑是推动俾斯麦政府果断实行社会保障政策的又一重要因素。要维护国家的统一和安全，必须有一支高素质的军队，且普鲁士素有军国主义传统，对军队奉之至尊。然而，现代化大工业带来的过长工作时间和不合乎卫生的居住条件等，使得“无产者”在体质上常常不具备服兵役的条件，这种状况使政府为军队士兵的素质担忧^②。因此，当军界和农业界代言人指出德国工业人口中应征的士兵不适合服役时，俾斯麦更坚定了实施社会保障的态度^③。按照俾斯麦的话说，“国家社会保险制度，可以通过安慰数百万德国劳工精神和身体上遭

^① Walter Bußmann, *Das Zeitalter Bismarcks*, S.209.

^② [德]恩·约翰和耶·容克尔：《德意志近百年文化史》，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43页。

^③ [美]科佩尔·S·平森：《德国近现代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330页。

受的痛苦，加强帝国的力量”^①。

其二，打击社会民主党，摧垮社会主义运动，是俾斯麦政府实行社会保障政策的一个公认的最重要的政治动因。如前所述，1875年哥达大会上拉萨尔派和爱森纳赫派合并以后，德国社会民主党势力迅速壮大。俾斯麦为了阻止这种危及现存政治制度的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采取了“蜜糕加鞭子”的所谓两手策略：一方面就是颁布“非常法”，严厉镇压社会主义运动，企图从组织上摧垮社会民主党；另一方面就是通过实行社会保障制度等温和的手段，麻痹工人阶级的斗志，力图从思想上“挖掉社会民主党的根”^②。

还在1871年时，俾斯麦就已经指出：“只有现存国家统治政权采取行动，由她去实现社会主义要求中合理的、并与国家及社会制度相一致的东西，才能制止社会主义运动的混乱局面。”^③正是出于这种考虑，在颁布“非常法”的同时，他提出了所谓的“积极的国家政策计划”：通过建设性的国家措施改善全体工人的社会地位，这样既可以赢得国家的巩固，同时又可以削弱社会民主党的政治组织^④。威廉一世在1879年帝国议会开幕式上也提出了相同的看法：“不能仅仅从对社会主义运动的镇压中寻找治疗措施，同时必须积极改善工人阶级的福利。而且那些没有能力维持自己生计的劳动者的状况也极其重要。”^⑤后来，俾斯麦在帝国议会为自己的社会政策辩护时说得更直接：只要“给健康工

① Charles Downer Hazen, *Europe since 1815*, p.293.

② Diether Raff, *Deutsche Geschichte vom alten Reich zur Zweiten Republik*, S.160.

③ Walter Bußmann, *Das Zeitalter Bismarcks*, S.79.

④ Helmut M. Müller, *Schlaglichter der deutschen Geschichte*, S.191.

⑤ Charles Downer Hazen, *Europe since 1815*, p.291.

人以劳动权，保证他病有所医，老有所养”，“那些先生们（社会主义者）就会成为鸟的空鸣”^①。

正是在以上历史条件和背景之下，俾斯麦政府从19世纪80年代起开始了国家社会保障立法进程。1881年11月17日，俾斯麦向帝国议会宣读了皇帝的诏书，宣布国家准备实行社会保障制度。在以后的数年中，此类立法在帝国议会一一获得通过并付诸实施。

从内容上看，俾斯麦执政时期的德国国家社会保险立法主要有三大项，即《疾病保险法》、《意外事故保险法》和《老年和残废保险法》。这三项法案在以后的实施过程中不断加以修正和补充。到1910年，德国政府将当时所实行的各保险法汇成帝国保险法典，并于1911年7月19日由帝国议会通过。此法典除总则104款外，分类条目共1805款，其博大精密可以想象。

1883年6月，帝国议会通过了第一个社会保险法案——《疾病保险法》。此法起初仅适用于矿山、采石、工场以及每年收入在2000马克以下的几类工厂的工人，后经修改，覆盖面进一步扩大。根据规定：凡年薪在2000马克以下的农业工人、仆役、小学和家庭教师、剧场雇工、船员以及从事家庭工业者都必须进行强制保险。法典规定了6种独立的疾病保险基金，每种基金专门为一类保险人设立。例如，“地方基金”就是专门为本地全体工人而设置的。保险费由雇主和雇工共同筹措，一般雇主负担1/3，工人负担2/3。工人所缴纳的保险费很少，通常仅占每天工资的1.5%。各种基金由雇主和工人两方代表组成的董事会管理，凡缴纳保险费者都有权参加代表的选举。保险内容包括免

^① Charles Downer Hazen, *Europe since 1815*, p.292; Lucius Hudson Holt & Alexander Wheeler Chilton, *The History of Europe from 1862—1914*, New York 1918, pp.267—268.

费诊治、医疗护理、死亡丧葬费和病中养病费。养病费约为被保险人平时工资的一半，从生病的第三天起开始支付，如果疾病延续半年，其后的养病费就转由意外事故保险基金支出。

1884年7月，帝国议会又通过了《意外事故保险法》。起初该法案只适用于少数特别危险的职业，后经修改，邮政、电报业务、铁路业务、海陆军工场、政府雇员等都列入了此法适用的范围。实际上，凡年薪在5000马克以下的所有工人都在保险之内。维护意外保险的费用由雇主单独承担。经营同类业务的雇主组成一个保险会社，以便管理基金。任何人开设或取得一种属于该法范围内的业务时，同时也成为本地同行业雇主组成的保险会社的会员，并按照其开付的工资账单以及他的雇工所担危险的程度向会社缴纳保险金。这一类会社都由雇主选代表管理，会社对支付的赔偿费完全负责。赔偿费的多少由法律规定。凡在受雇期间并非因玩忽职守或越轨妄动而受到意外伤害，失去工作能力3天以上或死亡者，都应得到赔偿。赔偿包括免费的医疗调护和现金抚恤。现金抚恤的支付为：(1)从受伤第4天起至第4个星期结束，由疾病保险基金中付给本地同类工人月工资的50%，但每天不超过3马克。(2)从第5个星期起至第13个星期结束为止，除前项现款外，由雇主保险会社加付日工资的1/6。(3)第13个星期之后，按受伤人平均每年收入的2/3计算，全部由雇主保险会社支付。终身残废者的抚恤金额为其平均年收入的2/3。死亡丧葬费为死者年收入的1/15，另加总额不超过死者年收入60%的赡养费。

《老年和残废保险法》于1889年6月通过，经几次修改，凡年龄在16岁以上以工资为生者都必须参加保险以防残废和衰老。根据这一法案，凡缴纳保险金且以工资为生者享有以下利益：成为永久残废并丧失工作能力达2/3以上者，每年给予残废赡养费；年满70岁者每年给予老年赡养费，支付款项以受益人所在

级别平均工资的 $\frac{2}{3}$ 为原则，在每笔赡养费上再加 50 马克。但是，一个人不能同时兼领残废和老年赡养费。

1911 年的法典还加上了适用于寡妇孤儿的《遗族保险法》。根据此法，不能自食其力的被保险人的遗孀，在未改嫁期间享受寡妇赡养费，其金额为丈夫生前应领残废赡养费的 $\frac{3}{10}$ ，另外政府每年加 50 马克。孤儿赡养费不得超出死者的残废赡养费。寡妇赡养费和孤儿赡养费的总和不得超出死者的残废赡养费的 1.5 倍。

1911 年 12 月，德国政府又实行了《雇员保险法》。凡年薪在 5 000 马克以下的书记、经理等一切雇员都适用于此法。雇员保险费由雇主和被雇者各负担一半，政府不负担任何费用。这一保险法案使雇员也可以领取退休金和遗族赡养费。

以上各保险法案均被收入帝国法典，通行全国。

德意志帝国政府本想直接筹办失业保险，后因财政困难而最终作罢，由各城市自己筹办。1894 年，科隆首办失业保险。科隆市议会和慈善家捐出一笔基金，设立失业保险局，由市长、劳动交易所所长、被保险人选举的 12 名代表和捐助基金者推举出的 12 名名誉会员专门保管基金和办理失业保险事宜。愿意享受这种保险的工人必须每周缴纳一定的保险金并缴足 34 个星期。但是，因罢工、过错被革职或拒绝工作的工人，都不得享受失业保险。由于科隆的失业保险办得很成功，经验迅速推广到各大城市。结果，失业保险虽未列入德国保险法典，但全国各大城市都有这一险种。

除了以上各项保险立法外，帝国政府还颁布了有关的劳工保护立法，作为对保险法的补充。1878 年有关工商条例的补充条文就规定了加强工厂视察、监督劳动合同和徒工的使用、禁止妇女和儿童从事有害健康的劳动等。1890 年 3 月，德皇威廉二世专门在柏林邀请发起了第一届国际劳工保护会议。此后，帝国议

会又相继通过了“关于工商管理条例修正案”和“劳资纠纷法庭法”等一系列劳工保护立法，规定了禁止星期日做工、禁止雇用3岁以下的童工，未满16岁工人每天劳动时间不超过10小时，女工不超过11小时等内容。

综上所述，德意志帝国时期的社会保障制度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其社会保险立法已经系统化，工人们在现代工业带来的社会问题面前得到一定的保护。第二，其社会保险立法适用范围广，覆盖全国所有工业人口。1907年，德国疾病保险会社共23 233所，被保险人数为1 214万，约占全国人口的19%。1910年，被保险人数超过1 300万，占总人口的21%。意外事故保险人数也由1885年的325万增至1907年的2 117万。老年和残废保险人数在1907年近1 500万。1897年—1909年，德国公立疗养院调护的肺病工人数达27万，开支近1亿马克^①。第三，其社会保险具有强迫性质。这种强迫性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各种保险由国家直接筹备和管理，甚至分担部分保险费的开支；另一方面，国家把维持社会的责任比较公平地强行分摊给应负责任者。俾斯麦在谈到这种强迫保险的意义时指出：“我们绝不能听凭小百姓辛苦储蓄的金钱受私家保险公司破产的危险……我们不能靠这样的机关实行强迫保险制度。”^② 不管俾斯麦是否真的为民着想，由政府作担保的保险能力显然要优于私人保险公司，因此也就更为可靠。第四，德意志帝国政府专门设立了完备的社会保险管理和监督机构。1911年的帝国保险法典规定设立地方保险局、高等保险局、帝国保险局等三级监督机构，监督各类社会保险组织履行义务和责任。各级保险局的成员分别由国家官员、

^① 阿格：《近世欧洲经济发达史》，商务印书馆1932年，第664—670页。

^② 阿格：《近世欧洲经济发达史》，商务印书馆1932年，第655页。

雇主代表、被保险人代表组成，以保持其公平性，其所需经费由政府负担。这种完备的社会保险管理和监督机构的设立为迅速而顺利地推行国家社会保障制度提供了可靠的组织保证。

应该指出的是，德意志帝国时期建立起来的社会保障制度无论对德国本身的发展还是对其他资本主义国家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从国内来看，社会保障制度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工业化带来的各种社会矛盾，使社会相对稳定，从而加速了工业的发展步伐。以人口流动为例，如前所述的那样，德国在19世纪90年代以前曾有大量人口移居国外。但是，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于社会保障制度的推行和工业化带来的更多就业机会，向外移民骤然降温，到1912年，向外移民人数已经减少到相当低的水平。外流人口的减少给处于跳跃发展中的德国工业经济提供了劳动力资源保证。此外，由于工业化带来的疾病、意外事故、失业等一系列社会问题而引起的社会的不稳定也在社会保障制度的抚慰下有所缓和。据统计，1885年时还只有429万人参加了疾病保险，到1914年时随着这一保险向各领域的扩张，被保险人增加到了1561万人。参加意外事故保险者也由起初的300万人增加到了1913年的2800万人。参加老年和残废保险者则由1891年的1149万人增加到了1914年的1655万人^①。结果，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德国已成为经济繁荣、社会安宁的典范，当时德国各阶层似乎都表现出普遍的满足感^②。

德国在社会保障制度方面的大胆尝试也引起全世界的关注。

^① Karl Erich Born, *Quellensammlung zur Geschichte der Sozialpolitik 1867—1914*, Wiesbaden 1966, S.147—153.

^② [美] 科佩尔·S. 平森：《德国近现代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340页。

最初这些改革在一些西方工业国家被指责为“社会主义”，怕因此而摧残工业界。但德国社会保险立法的成功实施，最终使英、法等国摒弃成见，紧随德国之后，借鉴德国的做法，出台自己的社会保险立法。英国1906年的“工人赔偿条例”在保护劳工方面就与德国强迫意外保险的法律如出一辙，法国的“老年赡养法”所采用的制度也与德国极其类似。此后，奥地利、匈牙利、卢森堡、挪威、俄国、罗马尼亚、荷兰、葡萄牙等国都实行了国家强迫疾病保险制度和强迫老年保险制度。

虽然德意志帝国政府实行社会保障制度的根本目的在于维护和稳定容克资产阶级的统治，但是从客观上看，各项社会保险立法的实施确实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群众的生活。

除了国家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外，德意志帝国时期的其他社会政策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首先，镇压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非常法”在1890年被取消，从而使得对工人运动和社会民主党的压制得到缓和。其次，在俾斯麦下台以后，卡普里威新政府以及后来的帝国内政部国务秘书波萨多夫斯基等人用“和解政策”取代了俾斯麦的“暴力政策”，继续大力推进改善中下层社会福利的政策。工人生活和劳动条件的改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德意志帝国时期社会政策的进步。为解决工人的住房问题，德国政府从19世纪90年代起开始大力促进工人住房的建设。据统计，1901年以后，德国政府每年投入建造工人住房的资金达400万—500万马克。19世纪90年代到1914年为止，用于工人住宅建设而通过官方渠道和公共住宅建筑合作社投入的资金达5亿马克左右^①。工人住房条件因此而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以工人集中的柏林为例，1875年时，只有一间可供暖房间的住房仍占

^① Karl Erich Born, *Wirtschafts-und Sozialgeschichte des Deutschen Kaiserreichs (1867/71—1914)*, S.87.

53%，到1911年时，这一比例已经下降到44%^①。

工人的劳动条件也得到了一定的改善。首先，工人劳动时间缩短。根据统计，在19世纪70年代，德国工人的平均工作日长达12小时，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则已缩短到了9.5小时^②。尽管德意志帝国时期并没有普通工作日的法律条文，但对某些工种还是作了保健性的最高工作时间规定。1878年的工商业法规补充条文明文规定，14岁—16岁的青少年工作最长时间不得超过10小时。1891年又规定妇女每天工作时间不得超过11小时，并禁止青少年和妇女从事夜工。1908年则将妇女的工作时间缩短为10小时。对男性工人而言，从1905年开始，矿山等部门开始实行工作最高气温限制，即在超过28℃的情况下，每班最长工作时间不得超过6小时^③。工人的劳动安全日益得到重视。19世纪90年代后，德国政府专门设立工商业监察员巡视工厂设备，到1912年时，这种巡视员已达到555名。

为了保障工人的权利，德国政府还积极鼓励由工会出面与各企业间达成劳资协议。1873年，印刷业中出现第一份劳资协议，1900年以后，劳资协议日益普遍。据统计，1907年德国工会与企业间达成的劳资协议有5324份，涉及企业111050个，工人97万多人；到1912年，劳资协议数达到12437个，涉及企业

① Thomas Nipperdey, *Deutsche Geschichte 1866—1918. Band 1. Arbeitswelt und Buergergeist*, S.142.

② Gerd Hohorst, Jürgen Kocka und Gerhard A. Ritter, *Sozialgeschichtliches Arbeitsbuch, Band 2, Materialien zur Statistik des Kaiserreichs 1870—1914*, S.60.

③ Karl Erich Born, *Staat und Sozialpolitik seit Bismarcks Sturz*, S.129; Thomas Nipperdey, *Deutsche Geschichte 1866—1918. Band 1. Arbeitswelt und Buergergeist*, S.360.

208 307 个，近 200 万工人^①。为鼓励劳资协议体系的推广，帝国法院于 1910 年明确裁定劳资协议具有法律效力，对缔约者具有法律约束力。此外，德国政府还通过制定企业法、结社法等一系列法规来确定工人和企业主之间的关系，以求最大限度地达到社会的稳定。

以上一系列政策和措施，使得德国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成功地走上了社会福利国家的发展道路，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现代社会福利国家。

（三）“暴发户”心态——以夺取世界霸权为目标的“世界政策”

由于国家的迅速工业化所带来的经济实力的增长和经济结构的变化，德意志帝国的对外政策也发生了重大转变。

在德意志帝国建立之初，德国虽然已经基本上完成了第一次工业革命，但从整体上看还是一个以农业经济为主体的国家；虽然通过几次所向披靡的战争显示出强大的军事实力，但其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尚不具备越出欧洲大陆而与英国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在全球范围内一争高下的能力。所以，在俾斯麦时期，德意志帝国政府在对外政策上奉行的是以谋求在欧洲大陆的霸权地位为中心的大陆政策。这一政策的核心就是通过建立庞大的联盟体系，孤立法国，在保持欧洲和平中确保德国的利益。正是从这一意义上，一些史学家称德意志帝国在 1871 年以后的外交和军事政策都采取一种以维持中欧的“现状”^②为特征的保守性的策略。可见，大陆政策的目标只是满足于德国作为一个大陆强国。19 世纪 80 年

^① Arno Klönne, *Die deutsche Arbeiterbewegung, Geschichte—Ziele—Wirkungen*, S.102.

^② L.L.Farrar, *Arrogance and Anxiety*, Iowa 1981, p.14.

代，随着德国工业化的深入，俾斯麦虽然在殖民地问题上有所动作，却极为审慎。1884年—1885年他创立德国殖民帝国后，却又迅速将已伸向海外的手缩回欧洲，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德意志帝国经济及军事力量的增强，进入19世纪90年代后，俾斯麦仅仅保持德意志帝国作为一个欧洲大陆强国的政策，已经不能满足德国统治阶级以及资产阶级的贪婪欲望。因而，在俾斯麦于1890年下台以后，德意志帝国在外交政策上改弦易辙，出现了从大陆强国政策向世界强国政策的转变。

我们必须承认，德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角逐世界霸权的政策受到当时资本主义列强以殖民扩张为特点的帝国主义潮流的影响。但与此同时，我们又应当认识到，德国在这时走上争夺世界霸权的道路，根本的原因和动力存在于其自身内部。

迅速工业化带来的经济高速增长以及国家综合实力的增强，是德意志帝国走上帝国主义扩张道路的根本动因。如前所述，经过20年的飞速发展，德国已经成为一个以重工业为主导的工业强国，钢铁工业产量跃居欧洲首位，化学、电气、光学等新兴工业迅速崛起。然而，工业的迅速发展使德国本身越来越无法容纳日益强劲的经济增长所释放出的巨大能量。它的生产能力越大，它本身所拥有的原料供给能力和产品销售市场就越显现出不足。在这种情况下，德国资产阶级就迫切需要走出国门，到世界上去寻找他们所需要的原料产地和商品销售市场。从以上意义上说，德意志帝国从欧洲大陆政策走向世界政策，是工业化带来的德国对国外市场依赖性加强的必然结果。法国经济学家夏尔·贝特兰在对这一时期的德国经济研究之后，也得出了几乎相同的结论^①。

^① [法] 夏尔·贝特兰：《纳粹德国经济史》，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7页。

具体说来，从进口角度看，由于工业化带来的急剧都市化、人口的猛增、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生产的发展等，德国对粮食和工业原材料等的需求大幅度增长。以农业为例，德国本身的农业已经无法满足本国市场对农产品的需要。据统计，在1895年—1900年的5年间，德国农业所生产的小麦仅能供应全国小麦需求量的73.7%。而1900年以后德国在小麦等农产品方面对国外的依赖程度可以从以下数据中看出：1900年—1904年，德国小麦的年平均产量为390万吨，进口量却达到203万吨；1905年—1908年的相应数据为372万吨和232万吨；1911年—1912年的相应数据为421万吨和208万吨^①。由此可见，尽管德国本身的农业产量在不断增长，但它无法满足国内消费需求的更快增长。工业原料方面对外依赖也极其严重。1872年时，德国的原料进口额仅570万马克，到1910年时增至16130万马克^②，增长近30倍。

与此同时，从出口角度看，呈现跳跃性发展的德国工业迫切需要寻找国外市场来释放它的巨大能量。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德国全部工业品的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是在国外市场上销售的。由于德国在电气、化学等新兴工业中居于绝对领先地位，它的商品充斥于欧洲市场。一位作者曾经这样描写他在巴黎对德国商品的感受：“在我巴黎的家中，电梯是德国的，室内电气装置是德国的，厨房灶具是德国的，最好的照明灯是德国的。……刀具是德国的，餐厅中的椅子是德国的，浴室中的镜子是德国

^① J.H.Clapham,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France and Germany 1815—1914*, p.213.

^② [德] 弗里茨·费舍尔：《争雄世界：德意志帝国1914—1918年战争目标政策》，上册，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16页。

的……而且实际上所有授予专利的药物和一些盥洗室用品都是德国的。……所有这些用品都购自巴黎各市场……”^①德国商品甚至敢于和老牌工业国英国分庭抗礼并大举进军英国市场^②。正是在这种情形之下，德国政府从19世纪90年代开始，调整其关税政策，以求得工业品的出口。

对国外市场的严重依赖，使德国对外贸易额飞速增长。德国对外贸易在世界上所占的比重也由1870年的9.7%上升到1913年的12.6%，从世界第三位跃居世界第二位，并使其与第一外贸大国英国的差距大大缩短。

表 5-2 英、德、法、美四国对外贸易增长情况 (单位: 亿马克)^③

国家 \ 年份	1873 年	1913 年	增加百分比
英国	126.25	241.25	91.125
德国	60.6	208.6	244
法国	60	122.5	104
美国	47.5	176.25	270

从表 5-2 中我们可以看出，从 1873 年到 1913 年的 40 年间，德国的对外贸易额增长速度要比英国高得多。德国对国际市场的依赖性也日益增强。对此德国政府自然清楚，比洛夫在谈到有关对外贸易对德国的重要性时明确强调，尽管有关对外贸易额的数据是单调的，但它们对德国人的福利却有着重要的意义，因为

① Charles Seymour, *The Diplomatic Background of the War 1870—1914*, p. 75.

② Gibbins, *Economic and Industrial Progress of the Century*, Toronto, p. 441.

③ [德] 阿伯特·诺尔登:《德国历史的教训》，三联书店 1958 年，第 33 页。

“数以千百万计的……公民的工作和直接的生存都仰赖于它们”^①。

此外，这一时期的德国作为高度发达的工业国家，在扩大输出商品的同时，也开始向外输出资本。到1914年时，德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三大资本输出国^②。德国资本因此而不间断挤入毗邻国家，在诺曼底铁矿区、波希米亚、罗马尼亚、土耳其、乌克兰等地都有德国资本的踪影^③。根据有关统计，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德国资本输出的流向为：拉丁美洲38亿马克，北美洲37亿马克，奥匈帝国30亿马克，俄国18亿马克，土耳其18亿马克，西班牙和葡萄牙17亿马克，巴尔干17亿马克，英国和法国13亿马克，欧洲其余地区12亿马克，亚洲其余地区10亿马克，非洲20亿马克，其他5亿马克^④。

由上述可知，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德国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外向型经济国家。工业发展的结果使得德国像英国等帝国主义国家一样，迫不及待地到境外去寻找新的原料产地、产品销售市场和资本投放的途径，泛德意志协会主席克拉斯在《假如我是皇帝》一书中以一种急切的心情写道：“如果说某一个国家有理由关心如何扩大它的势力范围，这个国家就是德意志帝国……我们需要工业品的销售地区和工业原料产地。”^⑤

① Charles Seymour, *The Diplomatic Background of the War 1870—1914*, p. 76.

② 具体数据参见“工业化之下的德国社会转型”部分。

③ 参见 [德] 弗兰茨·费舍尔：《争雄世界：德意志帝国1914—1918年战争目标政策》，上册，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25—26页。

④ Herbert Feis: *Europe, the World's Banker 1870—1914: An Account of European Foreign Investment and the Connection of World Finance with Diplomacy before the War*, Clifton, 1974, p. 74.

⑤ 转引自孙炳辉、郑滨达《德国史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205页。

这一时期德国的综合国力也大大加强了。关于经济方面的实力自然无须赘述。从人口方面来看，到1913年时，德国的人口已经达到6700万左右，在欧洲仅次于俄国。而且由于德国人口在受教育水平、社会供应和人均收入等方面都相对较高，它的人口资源占有明显的质量优势。这些条件为德国的对外扩张打下了物质的基础。对此，美国著名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写道：“有关德国扩张主义的重要之点，要么这个国家已拥有改变现状的实力手段，要么它已拥有创造这种手段的物质资源。”^①

极端民族主义思想是德意志帝国向外扩张的精神动力。近代德意志由于长期分裂和遭受拿破仑入侵等缘故，形成了一种强烈的民族主义思想。如果说在统一德国的过程中三次所向披靡的战争已经表明了德国人在军事上的强大实力，使德国人信心大增的话，那么，现在由于在经济、科学技术等领域所取得的一系列举世瞩目的成就，德国人就更加有理由相信，他们确实像黑格尔在其历史哲学中所说的那样，是“世界精神”的集大成者^②，负有开化全世界的使命。于是，他们的民族主义情绪开始畸形膨胀，并迅速变形为民族沙文主义。

然而，当时的世界形势却让德国人愤愤不平。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虽然德国在军事和经济方面的成就令世人注目，但是作为一个后起的帝国主义国家，它在国际舞台上，特别是在瓜分世界和争夺世界霸权的斗争中所处的地位，却显得与其实力有些不相称。这当然是久受民族积弱之苦、如今“暴富”起来的德国人所不能容忍的，德国军事将领冯·伯恩哈迪在把德国与英国、

① [美] 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求实出版社1992年，第257页。

② 陈乐民：《“欧洲观念”的历史哲学》，东方出版社1988年，第112页。

法国以及“小小的比利时”作了一番比较后指出，“在地球的分配中，我们早已犯了严重的错误，吃了大亏”，因为德国目前的政治地位与德意志民族的文化价值及经济上的重要性相比，是极不相称的。伯恩哈迪的这种想法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当时许多德国人的心声。

于是，积压已久的德意志民族主义能量开始向外喷射，德国人急急忙忙地踏上了征服、“开化”世界的道路。首先是各种扩张主义的喧嚣充斥整个德国。德国民族主义历史学家特莱奇克在总结了有关的历史经验后得出结论：没有殖民地的德国“注定只能当二等强国”。另一位民族主义史学家阿达尔伯特·瓦尔更是夸张性地表示，“德国需要殖民地就像需要每天吃的面包一样”。“为了给充满进取精神和活力的德国人民提供一个活动场所，帮助创造一种新的不那么平庸的德国人”，必须开拓殖民地。否则，这个成长中的、精力充沛的民族就会被扼杀，因为“对于一个成长中的民族，没有扩张就没有生机”^①。德国工商业集团利益的代表们也急切呼吁向外扩张。通用电气公司董事会领导人瓦尔特·拉特瑙埋怨道：“我们时代的最大不公平在于，这个地球上最有经济才能的民族，具有最坚强的思想和最强大的组织能力的民族却不能对世界起支配作用，承担责任。”

随之而来的是各种民族沙文主义团体的建立。我们在前文已经提到，早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就出现了商业地理及促进德国海外利益中央协会、克虏伯等支持下的西德意志殖民及出口协会、民族自由党政治家约翰内斯·米克尔等人的策划下成立的德国殖民联合会（Deutscher Kolonialverein）等团体。1887年，在德国殖民联合会的基础上又建立了德国殖民协会（Deutscher

^① [美] 科佩尔·S. 平森：《德国近现代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405页。

Kolonialgesellschaft)。1891年，克虏伯康采恩经理阿尔弗莱德·胡根贝格等又发起成立“日耳曼总同盟”，并在3年后改组为臭名昭著的“泛德意志协会”(Alldeutscher Verband)。这是一个由垄断资本家、政府官员、教授、军官等参加的狂热的民族沙文主义组织，其宗旨是复苏民族意识，支持政府的对外扩张政策，该组织所发表的成立宣言就是以“德国醒来”作为结束语^①。这一组织的成员虽然不多(最多时不超过4万人)，但对政府以及德皇的顾问们都有巨大的影响力^②。此外德国海军联合会(Deutscher Flottenverein, 1898年成立)等民族沙文主义团体的建立及其活动对当时德国政府的对外政策也产生了重大影响。

公众舆论对威廉二世时期德国政府的对外政策也有巨大的影响。在俾斯麦时期，他的对外政策是一篇经过深思熟虑的论文，很少受到他人的干扰。威廉二世则不同，他好大喜功，对德国“公众舆论中，尤其是上层中等阶级和学术界的新时尚总是极为敏感”，因而成为首先意识到帝国主义政策会对公众具有巨大号召力的人之一^③。于是，俾斯麦下台之后，德意志帝国政府的对外政策出现了新的动向，即通过鼓吹向外扩张来博取民众的支持。

既然工业化以后的德国社会需要国外市场，既然德国已经拥有了角逐世界霸权的实力，而且德国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分子也发出了向外扩张的呼声，代表容克资产阶级利益的德国政府自然

① 参见[德]阿伯特·诺尔登：《德国历史的教训》，三联书店1958年，第14页。

② Helmut M. Müller, *Schlaglichter der deutschen Geschichte*, S.203; Imanuel Geiss, *German Foreign Policy 1871—1914*, London, Boston 1976, p.61.

③ Wolfgang J. Mommsen, *Imperial Germany 1867—1918: politics, culture, and society in an authoritarian state*, p.192.

也就顺乎这些要求，提出了重新瓜分世界的要求。

1890年，新上台的卡普里威政府在威廉二世的授意下，打出了“新路线”的旗帜，在对外关系方面开始滑离俾斯麦所制定的欧洲安全政策的轨道。

从本质上说，卡普里威政府的对外政策的着眼点仍然是巩固帝国在欧洲大陆的地位，然而，他觉得俾斯麦留下的同盟体系过于复杂，必须予以“清理”^①。因此，卡普里威在海外扩张问题上并没有大动手脚，而是首先在对英和对俄关系上重新作了调整，由俾斯麦时期的联俄政策转而实行亲英疏俄政策。

当然，德国政府此时改变对俄国的政策是有其原因的。一是基于经济方面的原因。俄国曾经是德国的主要出口对象。1868年—1872年，俄国进口商品中德国的份额占到44%，1877年为46%，然而，从1877年起，俄国开始实行关税保护政策，使得德国对俄国的出口一落千丈。到80年代末时，由于俄国继续提高进口关税，德国的工业品在俄国工业品进口额中已经下降到27%^②。这种状况使德俄经济矛盾日益突出。于是，从1887年起，作为俄国主要债权国的德国开始拒绝给俄国贷款，德国银行也拒绝接纳俄国的有价证券作为抵押。俄国政府不得不转向法国方面寻求经济支持。

二是出于外交方面的考虑。俄国是俾斯麦以孤立法国为基点的大陆联盟体系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环节。因此，即使在德奥建立起针对俄国的同盟体系的情况下，俾斯麦也没有放弃俄国，而是与俄国签订了再保险条约。这种看来似乎矛盾的同盟体系，在俾

^① Wolfgang J. Mommsen, *Imperial Germany 1867—1918: politics, culture, and society in an authoritarian state*, p. 191.

^② Heinz Walter, *Bismarcks Außenpolitik 1871—1881*, Berlin 1983, S. 226; 萨那：《第一次世界大战史》，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5—26页。

斯麦眼里并非不可行。他认为，在三个友好国家之间，“如果每个国家向三者中的两位签约者作出针对第三者的承诺，即倘若与第三者破裂，将互相支援，那么第三者只会获得更坚定的担保”^①。而事实上，在这位圆滑的外交家执政时期，德俄之间一直保持着较平稳的关系。对此，甚至与这位老宰相矛盾重重的威廉二世也不得不承认：“无论人们对俾斯麦的俄国政策抱何种态度，有一点必须承认，侯爵能够避免严重不和。”^②然而，后继者卡普里威却没有俾斯麦的这样一种能耐。这位新宰相向驻俄大使承认，在与俄国续签再保险条约问题上他感到力不从心，“因为他不能俾斯麦侯爵那样如杂技演员般地玩五个玻璃球，他只能同时抓住两个玻璃球”^③。其言下之意是，他无法保持俾斯麦那种矛盾的联盟体系。于是，这位新任宰相决定放弃俄国的友谊，标志就是拒绝续签再保险条约。

卡普里威政府拒绝与俄国续签再保险条约，主要出于两方面考虑：第一，卡普里威认为，德俄再保险条约有悖于德奥同盟条约的精神，隐藏着削弱德奥同盟的危险。因为它迫使德国在俄国和奥匈之间采取一种摇摆不定的政策，而俄国却可以通过透露这样一个文件而破坏德国同奥匈、意大利、英国以及土耳其等与俄国有矛盾的国家之间的关系^④。第二，德俄再保险条约的存在会妨碍德国与英国接近，而追求德英友好是德国新一任政府的重要努力目标。卡普里威受外交部参事弗里德里希·冯·荷尔斯泰因等

① Heinz Walter, *Bismarcks Außenpolitik 1871—1881*, S.298.

② Wilhelm II, *The Kaiser's Memoirs*, New York, London 1922, p.19.

③ Diether Raff, *Deutsche Geschichte vom alten Reich zur Zweiten Republik*, S.203.

④ [德] 卡尔·艾利希·博恩：《德意志史：从法国革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上册，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427—428页。

人的影响，认为俾斯麦通过与俄国保持关系而达到阻止法俄接近的目的是不现实的，相信德俄对立不可避免，因此采取优先与英国联系的政策，以巩固三国同盟。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建立一个力量绝对超过法俄的大国集团。

正是在以上思想的指导下，1890年3月，当俾斯麦离任后，新上任的卡普里威政府拒绝了俄国驻柏林大使保尔·舒瓦洛夫奉本国政府之命提出的将再保险条约再延长6年的建议。答复是：德国愿意一如既往地同俄国保持最好的关系，但由于人事变动，目前必须保持冷静，所以不能缔结广泛的协定，不能延长该条约。甚至当俄国外交大臣吉斯作出各种让步后，德国政府仍我行我素。德国政府这种坚定的态度使俄国方面意识到，德国的对外政策已经改变，这从而成为“促使俄法之间早已成熟的亲近关系正式成立的新推动力”^①。

德国在明确拒绝与俄国续签再保险条约的同时，却对英国人表现出极大的热情。1890年7月1日，德英两国签订了《赫尔果兰—桑给巴尔条约》。这一条约是英德之间为解决在殖民地问题上的争端而进行谈判的结果。早在1889年，俾斯麦曾就德英两国间在殖民地问题上的争端向英国首相索尔斯伯里提出了进行谈判的建议，但他不急于达成协议，以便从英国人手中得到更好的价钱。现在，新一任德国政府由于对外政策方向的转变，一反俾斯麦时的态度，迫切要求与英国达成协议。威廉二世甚至表示，在东非殖民地问题上，德国政府准备向英国的任何要求作出让步。德国政府的这种态度主要出于以下考虑：第一，基于与俄国对抗不可避免，应当通过德英和解来争取英国对三国同盟的支持，从而弥补由于拒绝续签再保险条约给德国带来的损失；第

^① [苏]涅奇金娜：《苏联史》，第2卷第2分册，三联书店1959年，第460页。

二，卡普里威政府将北海海岸附近的赫尔果兰岛视为易北河口和正在开凿的北海—波罗的海运河西口前面一个不可缺少的堡垒，具有很高的战略价值。

根据德英《赫尔果兰—桑给巴尔条约》，德国在东非把苏丹领地维图和索马里海岸的德属部分让给英国，并把对桑给巴尔岛及其附属岛屿的保护权交给英国。作为交换，英国把赫尔果兰让给德国，并为德属西南非提供一条通往赞比西河的通道“卡普里威角”。此外，条约还调整了多哥和英属黄金海岸之间的边界，保证英国人免税通过史蒂文森路穿越德属东非。《赫尔果兰—桑给巴尔条约》对英国人让步太多。照英国新闻记者史坦莱的说法，英国“获得了一件簇新的燕尾服，而付出的代价只是裤子上的一个纽扣”^①。这一条约因此在德国国内受到激烈的批评，并且引起了“超党派的、民族主义的泛德意志运动”的出现，其具体表现就是前文提及的“泛德意志协会”的成立。

德国拒绝续订再保险条约已经给俄国人留下了德国政府在对外政策上正在改变的印象，现在德英之间《赫尔果兰—桑给巴尔条约》的签订实际上是“向俄国展示明证，即与俄国的友谊相比，德国新政府更偏爱英国的友谊”^②。由于当时俄国与英国在近东和东亚地区关系紧张，在巴尔干地区与奥匈有隙，德国的转变使俄国欧洲处于一种孤立的境地。为了摆脱这种不利的局面，俄国加快了与同病相怜的法国接近的步伐。

1891年7月，法国舰队访问俄国军港喀琅施塔得。同月，俄国外交大臣吉尔斯与法国大使拉布拉伊会谈，商讨接近的步骤。8月，俄国外交大臣吉尔斯和法国外长里博互换信件，达成

① 外交学院编译室：《近代国际关系史参考资料》（苏联外交辞典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第169页。

② Helmut M. Müller, *Schlaglichter der deutschen Geschichte*, S. 202.

了相互磋商的协议。1892年8月，俄法两国签署军事协定，1893年12月，协定获得俄国批准，次年1月，法国批准协定生效。根据协定，如果法国遭到来自德国或受德国支持的意大利的进攻，俄国将以全部军队进攻德国；如果俄国遭到德国或受德国支持的奥地利的进攻，法国将以全部军队进攻德国；在与德国作战时，法国应提供130万人的兵力，俄国提供70万—80万兵力。这些军队将以最快的速度投入作战，以便使德国不得不立即在东西两线交战^①。德国终于出现了两线作战的危险。沙皇亚历山大三世很明确地指出：“一旦法、德两国开战，我们必须立刻以全力打击德国，不让他们从容地把法国打倒然后马上转过来对付我们。我们必须纠正过去的错误，一有机会就要把德国摧毁。”^②有关史著在论及法俄协定时指出：是“威廉自己的不智造成”了法俄同盟^③。

既然与俄国的关系已经僵化，德国方面希图通过建立一种良好的德英关系来取得补偿。1891年7月，威廉二世在访问其外祖母维多利亚女王时，明显表示了与英国交好的愿望。同时，德国外交国务秘书马沙尔在与英国首相索尔斯伯里会晤时，也提出英德联手对付俄法的要求。1893年7月，英、法两国为争夺印度支那的湄公河发生冲突，德国对英国有关合作的建议欣然应允。

然而，由《赫尔果兰—桑给巴尔条约》建立起来的德英良好

① [苏] 罗斯图诺夫：《第一次世界大战史》，上册，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第59页。

② [美] 巴巴拉·杰拉维奇：《俄国外交政策的一世纪1814—1914》，商务印书馆1978年，第189页。

③ [美] 巴巴拉·W. 塔奇曼：《八月炮火》，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第15页。

关系不久因德国政府在殖民地问题和世界强权方面咄咄逼人的姿态而很快出现了裂痕。德国政府对英友好的一个重要目的，是要通过与这位世界上最强大的殖民和海上霸主搞好关系，谋求在海外有所发展，这一点当然为既得利益者的英国所不容。由于德国的一举一动都威胁到英国在殖民地事务和世界霸权（特别是海上霸权）方面的地位，最后，英国甚至被迫站到了德国的对立面。

在卡普里威当政时期，德国政府虽然在对外政策方面有所改变，但仍没有从根本上摆脱固守欧洲大陆的政策。1894年10月霍亨劳厄继任宰相后，虽然再次出现了亲俄反英的迹象，也仍未能在对外殖民扩张等方面做出“令人振奋”之举。于是，急于要使德国成为世界强国的德皇威廉二世再也沉不住气了，他决定起用得力人物来贯彻自己的意志。1897年，主张向海外扩张的海军少将阿尔弗雷德·冯·梯尔皮茨和比洛夫分别出任帝国海军部国务秘书和外交部国务秘书。

从此，德意志帝国急不可待地踏上了争雄世界的舞台。威廉二世宣称：“巨浪在有力地冲击着我们的国门，并且催促着我们作为一个大国维持我们在世界上的地位，换言之，遵循一个世界政策。”^① 1897年12月6日，外交国务秘书比洛夫在帝国议会一次涉及对华政策的演说中对“世界政策”作了一次明确的解释：“德国人让他们的一个邻国占有陆地，另一个邻国得到海洋，而只给自己留下天空，自命清高，这样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总之，我们不想将他人挤到阴影中去，但是我們也需要阳光下的地盘。”^②

^① 转引自王鹏飞等《近代国际关系史》，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0年，第413页。

^② Gerhard A. Ritter, *Das Deutsche Kaiserreich 1871—1914: Ein historisches Lesebuch*, S.301.

威廉二世时期的“世界政策”主要有两大内容，即大力扩建海军和抢占海外殖民地。

无论要成为世界强权还是要抢占海外殖民地，首先必须拥有一支强大的海军，这是德意志帝国政府热衷于所谓的“舰队政策”的主要动机。梯尔皮茨在1896年2月给原海军部领导人阿尔布莱希特·冯·施托施的信中明确指出，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对于保护德国的世界政治和经济利益都是必需的^①。皇帝威廉二世对建立一支强大的德国舰队更是情有独钟。他在多次演说中大力鼓吹海军建设，他的“一支强大的舰队对于我们来说极端需要”、“帝国的力量意味着海上力量”等诸如此类的话在德国到处传播，他甚至宣称：“我们的命运将在海上决定！”^② 1898年成立的“德国海军联合会”则是支持建立强大德国海军舰队的宣传中心。

扩建海军计划也得到与之有关的德国重工业以及航运公司等的大力促进和支持。1898年建立起来的德国海军联合会就是这样一个组织。而德国重工业界之所以对扩建海军如此热心，不仅因为强大的海军舰队意味着会为德国带来海上和殖民霸权，而且因为建造战舰会给与之相关的工业企业带来巨额的利润。据称，单是舰队装甲一项，克虏伯和萨尔钢铁巨头施图姆男爵每年就各有500万马克的利润，而这仅仅是全部收益的一小部分^③。正因为如此，德国海军联合会主席奥托·萨尔姆—霍斯特马尔侯爵在

① Alfred von Tirpitz, *Erinnerungen*, Leipzig 1920, S.55.

② [美]科佩尔·S.平森：《德国近现代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406页；[德]阿伯特·诺尔登：《德国历史的教训》，三联书店1958年，第8页。

③ [德]阿伯特·诺尔登：《德国历史的教训》，三联书店1958年，第9页。

1901年12月致梯尔皮茨的信中直接地指出了扩建海军与经济的关系：“通过新战舰的定货以及由此而带来的商业和工业的活跃，会使与之有关的交易所行情上涨，挽救许多财富并稳定市场。”^①

正是在以上政治与经济动力的驱使下，德意志帝国议会于1898年通过了第一个扩建海军法案。根据该法案，德国将在1898年—1903年的6年中建造11艘舰队装甲舰、5艘装甲巡洋舰、17艘有装甲板的巡洋舰和63艘驱逐舰。这对德国海军的发展来说，确实是一个飞跃。因为在此以前，德国海军是相当弱小的。1888年，德国海军的年度经费只有6500万马克，官兵15000人；即使到1898年，它也只有年度经费1亿马克，官兵23000人，装甲战舰9艘^②。然而，德国政府仍嫌1898年法案速度太慢，于是在以后的十几年中使德国的造舰计划一扩再扩。1900年，德国通过第二个海军法案，规定到1915年，德国将拥有7艘战列舰、11艘重型巡洋舰、34艘轻型巡洋舰和100艘驱逐舰，使德国海军力量达到英国的水平。1906年，根据英国建成新式的无畏舰这一新情况，德国赶忙通过第三个海军扩建法案，规定今后建造的一切新式战列舰都必须是无畏舰级军舰。此后，德国在1908年和1912年又通过新的扩建海军法案。根据1912年的法令，德国海军预计要增加到41艘战列舰、20艘装甲巡洋舰、40艘轻巡洋舰、144艘驱逐舰和72艘潜艇^③。

德国大力扩建海军的举动首先引起海上霸主英国的关注。根

① Eckart Kehr, *Der Primat der Innenpolitik*, Berlin 1965, S.146.

② Charles Seymour, *The Diplomatic Background of the War 1870—1914*, p.79.

③ [苏]罗斯图诺夫：《第一次世界大战史》，上册，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第144—145页。有关德国海军扩建方案的数据，许多著述统计略有别，但这不影响德国迅速扩建海军的根本性事实。

据梯尔皮茨的计划，第一个海军法案只是满足德国对北海和波罗的海的形势需要，第二个海军法案则已经包含着要使德国成为海上强权的“思想”^①。英国害怕由此而动摇自己的海上优势，于是和德国展开了激烈的海军军备竞赛。尽管英国声称要保持对德国的海军优势，然而，这个正在走下坡路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在这场角逐中有些力不从心。财大气粗的德国则咄咄逼人，声称要建立一支足够强大的舰队，以致最强大的海军强国在发动进攻时也要冒严重的风险。到1908年，英国有8艘无畏舰，德国有7艘，旧式装甲舰的对比为51:24^②，德国海军已经从1897年时仅位居世界第七的“婴儿舰队”一跃成为几乎可以向英国的海上霸权挑战的世界第二大舰队。贝特曼—霍尔维格接任比洛夫的宰相之职后，曾试图与英国方面协议限制海军军备问题，然而，威廉二世从根本上反对就“他的舰队”进行谈判^③，英德在海军方面的对峙已成定局。而与德国扩建海军的政策相伴而来的必然是英国和德国的对抗，诚如英国外交部一位负责官员所说的那样，“德国在海上的领先地位是同不列颠帝国的生存不相容的”^④。

德国在大力扩建海军的同时，殖民扩张的步伐也骤然加快，其触角伸至远东、南太平洋、中近东和非洲。

在非洲，德国企图在俾斯麦创立的殖民帝国的基础上建立一个西起西南非和西非，东至坦噶尼喀的斜断非洲殖民大帝国。这一计划与非洲大陆上最大的殖民者英国的利益发生了冲突，因为

① Wilhelm Schüssler, *Weltmachtstreben und Flottenbau*, Witten-Ruhr 1956, S.159.

② [苏] 罗斯图诺夫：《第一次世界大战史》，上册，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第145页。

③ Helmut M. Müller, *Schlaglichter der deutschen Geschichte*, S.205.

④ 转引自王鹏飞等《近代国际关系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432页。

当时英国正计划建立一个从开普敦至开罗的纵贯非洲大陆的“二C计划”^①。结果，19世纪90年代初这两个国家曾在殖民地问题上出现过的那种默契很快被激烈的争吵所取代，并且双方在开普以北、德属东非和德属西南非之间的南非地区展开了争夺，其中对德兰士瓦和奥兰治两个布尔人共和国的争夺最为激烈。

早在俾斯麦时期，德国资本家就主张在布尔人共和国土地上建立殖民地。19世纪80年代，德国资本已经与德兰士瓦发生了密切的联系。1886年，在德兰士瓦发现世界上最丰富的金矿后，德英两国殖民者都急于夺取对这一布尔人共和国的控制权。结果，经营南非钻石矿公司的英国殖民者罗得斯捷足先登，于1887年建立了南非统一金矿公司。与此同时，德国资本在德兰士瓦的渗透也极为迅速。柏林的威廉·克纳佩银行实际上已经操纵了德兰士瓦国家银行，以A. 韦尔曼为首的汉堡各大商行与德兰士瓦也进行了大规模的贸易。在南非重要工业中心约翰内斯堡就有将近15 000名德国移民，而联络德国移民的俱乐部更是布满了整个德兰士瓦^②。1895年以后，德国已经几乎控制了德兰士瓦的全部对外出口贸易。

英国早就将从两个布尔人共和国到北罗得西亚和尼亚萨兰湖的广大地区视为自己要占领的土地，并将其视为实现“二C计划”的一部分。到90年代初，它已经从西、北、南三面包围了布尔共和国。对于英国的举动，在德兰士瓦拥有巨大经济利益的德国自然不会坐视不理。为打破英国的包围，德国政府曾于1893年—1894年支持德兰士瓦抢修了一条从首府比勒陀利亚到莫桑比克的洛伦索—马贵斯的铁路，作为出海口。在逼迫无效的

① 因开普敦和开罗开头的字母而得名。

② [苏] 赫沃斯托夫：《外交史》，第2卷（上），三联书店1958年，第370—371页。

情况下，英国决定以武力吞并德兰士瓦。1895年12月，英国指使它的南非公司经理率领一支警察部队进入德兰士瓦，进攻约翰内斯堡。德国政府在得到这一消息后，立即作出强烈反应，表示决不允许改变德兰士瓦的现状。威廉二世甚至准备宣布德兰士瓦为保护国，并不惜与英国一战。当英国人的冒险行动失败后，激动不已的威廉二世立即给德兰士瓦总统克吕格尔发去贺电，祝贺他“不求助于友邦”，仅用自己的力量就“捍卫了国家的独立”。

其实德国人在德兰士瓦问题上态度如此坚硬，除了经济利益外，还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德国人将这一布尔人共和国看成是与英国方面讨价还价的一个筹码。德国外交当局曾多次向英国表示，英国获得布尔人共和国必须以德国在其他地区获得殖民地补偿为交换条件；二是德国想以此迫使英国加入三国同盟一边^①。

德国的态度在英国引起强烈反响，英国派出海军到英吉利海峡和北海示威。结果，德国因自己海军力量薄弱，不得不放弃了夺取南非的计划。而英国由于正处在与布尔人战争的前夕，为防止德国从中作梗，也准备给德国一些好处。1898年8月，双方签订了两项瓜分葡属非洲的秘密协定。据此，英国将南部莫桑比克和南部安哥拉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德国则将北部莫桑比克、安哥拉中部和北部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作为瓜分葡属殖民地的交换条件，德国政府答应不再给予布尔人共和国以任何支持。

除了与英国的争夺外，德国还在北非地区与法国展开了争夺摩洛哥斗争，并引发了两次危机。由于德国在扩建海军和殖民扩张方面咄咄逼人，英国决定与争夺殖民地的老对手法国和解，以便共同对付德国。1904年4月，英法两国就有关在北非的权益达成协议，英国控制埃及，法国操纵摩洛哥。次年2月，法国在英国的支持下试图将摩洛哥“突尼斯化”，使其变成完全从属于

^① [苏]赫沃斯托夫：《外交史》，第2卷（上），三联书店1958年，第371—372页。

法国的殖民地。此时，德国政府为了争夺这块扼守大西洋和地中海的战略要地，同时也是为了打击日益紧密的英法关系，决定对法国施加压力。1905年3月，德皇威廉二世突然访问摩洛哥的丹吉尔港，并发表演说，声称摩洛哥应对世界各国的和平竞争开放，不得由任何人独占。德国甚至发出威胁：“如果法军越过摩洛哥边界，德军也就立即越过法国边境。”这就是所谓的第一次摩洛哥危机。正当法国准备对德国的压力让步之际，英国的出面支持和俄国对日战争的结束使德国的武力讹诈没有奏效。最后，德国不得不同意通过国际会议来解决争端。然而，如前所述，1906年召开的阿尔赫西拉斯会议上，几乎成了孤家寡人的德国一无所获。尽管如此，德国并未就此罢休。1909年，德法签订协定，德国承认法国在摩洛哥的军事和政治特权，在经济上则两国利益均沾。1911年7月1日，德国又利用法国出兵镇压摩洛哥起义之际，派“豹”号炮舰驶入摩洛哥的阿加迪尔，3天以后，重型巡洋舰“柏林”号和炮舰“野猪”号相继而至，再次进行武力讹诈，并迫使法国与之签订协定：德国承认法国在摩洛哥的特权，法国则将法属刚果的一小部分割让给德国。德国因此打通了它的殖民地喀麦隆与刚果河之间的联系。

太平洋地区也是德国推行世界政策的重要方向。德国对于和英国达成瓜分葡属殖民地的协定并不满足，它希望利用英国急于发动对布尔人的战争的机会，捞取更多的好处，因而在1898年8月又提出了瓜分萨摩亚群岛的问题。

德国殖民者侵入南太平洋地区很早。19世纪60年代，德国的高德弗罗伊商行已经垄断了萨摩亚一带的商业贸易。俾斯麦时期，虽然与英国发生了一些纠纷，但德国已经在新几内亚一带站稳了脚跟^①。1889年，德、英、美三国在争夺萨摩亚群岛的过程

^① 详情见那来顺：《论德国殖民帝国的创立》，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3期。

中暂时达成协议，规定该群岛由三国共管。对于这一现状，德国政府感到不满，因为它想独占该群岛，或至少是该群岛的一部分，以便为德国海军建立一个军事基地。正是出于这一动机，它趁英布战争即将爆发之际提出了瓜分萨摩亚群岛的要求，并利用萨摩亚国王去世的机会搅乱了萨摩亚的局势，以此说明只有瓜分该群岛才有利于问题的解决。英国原本是反对瓜分计划的，因为索尔斯伯里认为，英国在这场瓜分中不会得到任何好处，英国殖民大臣张伯伦在1899年给索尔斯伯里的信中明确表示，“德意志帝国的政策……是公开进行讹诈”^①。只是考虑到英布开战后的处境，英国政府才决定对德国作出让步。1899年11月14日，即英布战争爆发后的第四天，德英两国签订了一项协定。根据该协定，德国取得萨摩亚群岛中的两个最大的岛屿，群岛中的其他两个岛屿归美国；英国又放弃萨摩亚群岛的一切要求，为此，它取得了汤加群岛以及德属所罗门群岛的一部分；同时，英国将非洲英属殖民地黄金海岸与德属殖民地多哥之间的一小块有争议的土地分给德国。

在得到英国的几次让步后，德国人立即背弃了曾经许下的支持布尔人的诺言，甚至在英布战争爆发后将前来求援的布尔人共和国的代表拒于国境之外。

德意志帝国时期对远东地区的政策呈现阶段性特点。在俾斯麦时期，德国政府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欧洲，对远东地区兴趣不大。当时俾斯麦政府的策略是，怂恿法国等国在中国等地进行争夺，以便转移它们在欧洲的视线，使其忘记莱茵河疆界^②。例如，

① [苏]赫沃斯托夫：《外交史》，第2卷（下），三联书店1958年，第623页。

② Charles Seymour, *The Diplomatic Background of the War 1870—1914*, p.35.

在 1883 年中法战争中，德国驻巴黎大使霍亨洛厄在谈到俾斯麦的态度时就曾经指出：“俾斯麦说，我应该公开表示，我们将忠诚于法国，我们将不因任何情况而动摇，而放弃我们的中立。……侯爵的意见，是法国应该积极行动并且占领一些岛屿。”^① 到威廉二世时期，与对外政策整体上转向世界政策相一致，德国政府在中国问题上也开始转而采取一种积极拓展的政策。

虽然俾斯麦政府时期在对华政策上还没有实施具体的侵略行动，但这并不排除德国对中国蓄谋已久的侵略企图。早在 19 世纪 60 年代，欧伦堡伯爵等就向当时的普鲁士政府提到过占领台湾一事；1869 年—1870 年，德国著名地理学家、中国通李希特霍芬也在给俾斯麦的报告中提出了夺取中国舟山的建议^②。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德国政府再次萌生了在中国攫取侵略基地的想法。1894 年 11 月，外交国务秘书马沙尔在与宰相霍亨洛厄相互交换的电文中曾多次提及割占台湾的问题。1895 年 2 月，马沙尔在给德国驻伦敦大使的机密信件中又提到为德国的“东亚海军及商业取得一个永久的基地”的问题，并首次提到“位于山东西南的胶州湾”。马沙尔在谈到要选择胶州湾作为侵略基地的理由时指出，“占据该处”“也就是占据中国之大陆”^③。正是出于以上动机，德国政府在中日战争后积极发动并参加了三国干涉迫日还辽事件，以便博得中国政府的感激，捞取一些好处。当然，德

① [德] 施丢克尔：《十九世纪的德国与中国》，三联书店 1963 年，第 186 页。

② 《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 1 卷，商务印书馆 1960 年，第 9 页。

③ 《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 1 卷，商务印书馆 1960 年，第 5—9 页。

国政府积极策划迫日还辽还有另外的目的，这就是要赢得早就覬觎着辽东半岛的俄国的友谊，把俄国的注意力从欧洲转移到远东，以减轻德国东部边境的压力^①。

不出所料，三国迫日还辽后，德国政府开始向清政府索取报酬。1895年10月，德国获得了在天津和汉口的两处租界。1896年3月，德国又获得了对华贷款。然而，德国人的一个重要愿望没能实现，这就是取得在中国的立足点的问题。1895年10月，德国外交部致函中国政府和中国驻德公使许景澄，提到在中国取得一块基地之事，中国政府以“史无前例”为由给予了直截了当的拒绝。（1896年春天，当时身为德国东亚舰队司令官的梯尔皮茨专程来到远东，为德国在华选择立足点，并倾向于胶州湾^②。）6月，李鸿章访问柏林，德国政府再次试探在中国取得基地之事，结果李鸿章只答应在北京支持德国的要求，并没有作出任何承诺^③。对此，德国人自然心有不甘。

1897年11月1日，山东曹州巨野县张庄发生两名德国传教士被杀案，这给了德国人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时任外交国务秘书的比洛夫直言不讳地指出，山东省内德国教士的被杀“为德国提供了充分的理由立刻进行外交与海军行动”来强占胶州湾^④。威廉二世在得到这一消息后更是喜不自胜，认为“为德国工业获

① [英] 菲利普·约瑟夫：《列强对华外交》，商务印书馆1962年，第127页。

② 约翰·E. 施瑞克：《德国远东殖民地的选择》，见刘善章、周荃主编《中德关系史译文集》，青岛出版社1992年，第82—83页。

③ [英] 菲利普·约瑟夫：《列强对华外交》，商务印书馆1962年，第180页。

④ 《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1卷，商务印书馆1960年，第204页。

取新的销售市场”^①的机会到来了。他在给比洛夫的信中写道：“中国人终于给我们提供了渴望已久的理由和事件。我决定马上进攻。在意识到德意志帝国终于在亚洲站稳了脚的时候，千百个德国商人将会欢呼。当千百万中国人的脖子感觉到德意志帝国的铁拳时，他们就会发抖，而全体德国人民将会高兴。”^②于是，德国政府没等中国政府表态，就急急忙忙地于11月13日命令它的远东舰队驶进了胶州湾。次日，德军登陆夺取了青岛。11月15日，威廉二世在宰相官邸主持了军政要员参加的会议，确定了“永久占领”胶州湾的原则。1898年3月6日，在德国的外交和军事压力下，腐败无能的清政府被迫与德国签订了《胶澳租界条约》。根据该条约，中国把胶州湾周围半径50公里内的领土及青岛港租让给德国，租期99年。此外，德国还获得了在山东修筑铁路并在两旁采矿的权利。德国人终于在中国“站住了脚跟”。

中近东地区是连接欧、亚、非三大洲，沟通地中海和印度洋的战略要地，也是德国“世界政策”的重点目标。在德国对中近东的扩张中，巴格达铁路成为最主要的工具。巴格达铁路指的是从博斯普鲁斯海峡到波斯湾的土耳其小亚细亚铁路，是德国“三B铁路”^③计划的组成部分。根据“三B铁路”计划，德国将修建一条从柏林，经布拉格、维也纳、布达佩斯、贝尔格莱德、索非亚、君士坦丁堡、摩苏尔、巴格达，直到波斯湾的巴士拉的铁路^④。通过建造这一铁路，德国将“使土耳其及其邻国屈从于他

① Tyler Whittle, *Kaiser Wilhelm II*, München 1979, S.200.

② [德] 保罗·汪戴尔：《德国帝国主义与战争》，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年，第12—13页。

③ 三B是指柏林（Berlin）、拜占廷（Byzanz）、巴格达（Bagdad）的第一个字母。

④ W.M.Chwostow, *Zur Geschichte der Neuzeit 1870—1918*, Berlin 1956, S.75.

的势力之下，在波斯湾建立德国的阵地，并在通往印度的最近的道路上牢牢地站住脚跟”^①。

最早驱使德国向中近东扩张的动力是经济方面的因素。在“世界政策”时期，中近东地区成了“德国经济扩张的一个主要突击方向”^②。在1880年时，德国和土耳其的经济关系还微乎其微，德国对土耳其的出口只有600万马克，到1893年时则已经增加了7倍。贸易的迅速增长使德国人认识到，“在中近东地区，德国可望发展能吸收大批德国制造业商品的市场，并取得那些可以为德国的工业提供必需的原料的地区”^③。因此，19世纪80年代末，德国几家大银行开始向土耳其铁路投资，并由此提出了修筑巴格达铁路的计划。1888年，德国资本家艾尔弗雷德·考拉受德意志银行和符滕堡银行的委托，从土耳其手中取得了一条从博斯普鲁斯海峡到伊斯密尔的铁路租借权，并取得了在伊斯密尔到安卡拉之间修建新铁路的租借权。为了实现这一租借权，考拉专门成立了小亚细亚铁路公司。1893年，小亚细亚铁路公司又获得了将铁路从安卡拉延长到科尼亚的建筑权，并在1896年建成了这条铁路。德国银行界在土耳其的铁路计划引起德国重工业界的兴趣并得到其支持，因为由此而引发的对铁轨、机车、车辆等的需求会带来很大的利润。所以，德国重工业界与德国银行界一道继续推动巴格达铁路计划，准备继续修筑从科尼亚到波斯湾的

① 外交学院编译室：《近代国际关系史参考资料》（苏联外交辞典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第164页。

② Willibald Gutsche, *Monopole, Staat und Expansion vor 1914: zum Funktionsmechanismus zwischen Industriemonopolen, Grossbanken und Staatsorganen in der Aussenpolitik des Deutschen Reiches 1897 bis Sommer 1914*, Berlin 1986, S.148.

③ Charles Seymour, *The Diplomatic Background of the War 1870—1914*, p.86.

铁路。为了修建这条铁路，德意志银行、德累斯顿银行和德国其他银行于同年共同创办了“安纳托利亚铁路公司”。

起初，德国政府考虑到巴格达铁路的修建侵入了英、俄的势力范围，在立场上有所顾忌。为了防止与英俄发生冲突，它在这一问题上采取听任德国工业侵人的政策，在政治上也不明确表示支持巴格达铁路的建筑，而不像多数著述中所说的那样，从一开始就积极实行向中近东扩张的政策^①。到19世纪末，由于重工界的压力以及德国政府加强推行“世界政策”，中近东的地位对其显得重要起来，它就再也顾不得得罪英、俄等列强了。根据有关学者的分析，德国之所以热衷于进军美索不达米亚，从战略上讲，是为了在美索不达米亚建立一个像英国在埃及和印度一样的殖民地。而且通过控制美索不达米亚，德国最终可以进入印度，与英国展开竞争^②。

出于以上考虑，德国政府开始在政治上对巴格达铁路倾注极大热情。1898年，威廉二世为了加强对土耳其的影响和争取巴格达铁路的修筑权，在比洛夫和德意志银行行长格奥尔格·冯·西门子的陪同下，专门访问了土耳其，亲自充当推销员。在君士坦丁堡，威廉二世向苏丹提出了科尼亚—巴格达—波斯湾铁路的建筑权问题，并得到了苏丹的同意。随后，威廉二世又在大马士革发表演讲，声称自己是土耳其苏丹和3亿穆斯林至死不渝的朋友。土耳其苏丹对威廉二世的讲话深为满意，更加卖力地帮助德

① 有关德国官方在开始时对巴格达铁路的修建几乎不予支持的看法，参见[德]卡尔·艾利希·博恩《德意志史：从法国革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上册，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454页；Helmut M. Müller, *Schlaglichter der deutschen Geschichte*, S.205.

② Charles Seymour, *The Diplomatic Background of the War 1870—1914*, pp.86—87.

国人。对于威廉二世充当推销员取得的成功，外交国务秘书比洛夫曾写道：“应该指出，在德皇旅行时所取得的经济成就是：修建海达尔帕夏港口的租让权，敷设德国从康斯坦萨至君士坦丁堡电缆的租让权，加强土耳其政府和德国大商行之间现存的业务关系。”^①至于新的铁路建筑权，也很快有了下文。1899年12月23日，德意志银行力排英、法、俄等国的竞争，与土耳其政府签订了科尼亚—巴格达—波斯湾的铁路租借权的“初步协议”。

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政府的“世界政策”从表面上看是有一些成就的。从抢占殖民地角度看，到1914年时，德国拥有的殖民地面积已经达到100多万平方英里，人口1500万^②。这一成就使世人惊讶不已。一位史学家在研究了德国殖民政策的成就后得出这样的结论：“它表明，一个富庶而高效率的国家，即使没有丝毫殖民经验，也能在一代人之内掌握复杂的热带殖民问题。”^③

然而，有关研究也表明，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德国在海外殖民扩张方面并没有捞到很大的实惠^④。更重要的是，威廉二世这种锋芒毕露的对外政策大大加剧了德国与其他帝国主义强国之间的矛盾，迫使它的对手们联合起来。从这一角度讲，它是

① [苏]赫沃斯托夫：《外交史》，第2卷·(下)，三联书店1958年，第591页。

② 有关德国殖民地的统计数据，见D. K. Fieldhouse, *The Colonial Empires: A comparative Survey from the Eighteenth Century*, London 1982, p.365.

③ D.K.Fieldhouse, *The Colonial Empires: A comparative Survey from the Eighteenth Century*, p.364.

④ 据统计，1893年，德国的进口总额中只有0.1%来自德国的殖民地，1912年时也只有0.4%。在出口方面，1893年德国输出总额中有0.2%是输往自己的殖民地的，到1912年时相应数额也只增加到了0.5%。见Karl Erich Born, *Wirtschafts-und Sozialgeschichte des Deutschen Kaiserreichs (1867/71—1914)*, S.149.

得不偿失的。其大力扩建海军和抢占殖民地的政策，严重威胁到英国的海上霸权和殖民帝国的地位，英德矛盾遂逐步发展为帝国主义国家间的主要矛盾。德国与法国在非洲的争夺，使得这两个国家旧怨未了又添新仇。尤其是德国在中近东地区的势力扩张，引起英、法、俄三国的密切关注。巴格达铁路一旦建成，不仅使德国势力深入土耳其和西亚，而且将成为威胁英国在伊朗、阿富汗利益的工具，变为“架在英属印度上面的一把剑”。俄国从黑海海峡的控制权考虑，法国作为土耳其最大的债权国，都不愿意德国在土耳其势力的扩大。因此，修筑巴格达铁路大大加剧了英、法、俄三国与德国的矛盾。为了对付德国咄咄逼人的攻势，这三个国家终于捐弃前嫌，走到了一起。在1904年和1907年，英国分别与法国和俄国签订了划分各自利益范围的协约。欧洲终于形成了以德、奥、意为一方和以英、法、俄为另一方的两大帝国主义军事集团。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世界政策”也随着德意志帝国一道在战火中化为历史。更令人痛心的是，德国人民经过几十年奋斗发展起来的强大工业文明也因德国统治阶级和德意志民族政治上的不成熟而被战火毁灭，成了牺牲品。

结 语

服务于现实社会，服务于人类社会的发展和福祉，通过汲取前人的经验教训，尽量使后来者少走弯路，这是历史研究的基本社会功能和发展方向，否则，历史研究就失去了它的社会和现实意义。从这一角度出发，历史学承担着指引人类社会如何面对继承和发展问题的重大责任。如本书前言中所指出的那样，探讨和研究德国工业化与政治发展问题，出发点主要在于用历史的眼光去审视和观察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经济转型与政治发展两大主题之间的相互影响，从而为中国当前的经济和政治服务。

对德意志帝国工业化和政治发展状况的研究再次证明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有反作用的原理的正确性。19世纪上半期开始的工业化进程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一时期德国政治的发展走向。正是工业化塑造出了普鲁士这样一个经济强权，使它有实力去结束德意志数百年来难以解决的分裂割据状态，从而表明了“发展才是硬道理”。同样，国家的高速工业化不仅使德国经济上在短期内由农业国转变成了工业国，而且也使德国的社会阶级结构和政治力量发生了巨大变化，并进而使德意志帝国的行政结构、政治体制和政府的内外政策等各个领域都随着国家进入工业社会而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然而，有关德意志帝国时期工业化与政治发展的研究也表明，经济与政治之间的协调发展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来说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在德意志帝国时期，虽然德国在经济方面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辉煌成就，而且经济的发展也确实推进了德意志帝国在政治上向议会制和民主化方面迈进，综合国力迅速上升，使德国发展成强权国家，然而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具有浓厚封建残余色彩的普鲁士容克政治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德意志帝国经济和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一方面，德国有着当时世界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工业经济，有着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另一方面，它在政治上却显得相对落后陈旧。德国资产阶级虽然手中掌握着强大的工业力量，在政治上却受到压制，仅仅通过议会政治形式象征性地参政。与资产阶级相比，从封建农业社会脱胎而来的容克地主阶级却继续在这一资本主义国度中行使着决策权。对此，有人形象地称德国是一个穿着工业国服装的农业国。从这一角度出发，德国只是一个政治和经济发展没能同步的跛足巨人。这种政治与经济发展不同步的结果是，封建专制主义、普鲁士军国主义、民族扩张主义等因素最终将德意志民族推上了非理性的以争夺世界霸权为目标的战车，并最终将德意志民族多年努力所取得的经济硕果毁于一旦。这实在是一个令人难忘的历史教训！

主要引用书目

一 德文部分：

- 1 Thomas Nipperdey, *Deutsche Geschichte 1800—1866: Bürger Welt und starker Staat*, München, 1983.
- 2 Robert-Hermann Tenbrock, *Geschichte Deutschlands*, München, 1977.
- 3 Dieter Raff, *Deutsche Geschichte vom alten Reich zur Zweiten Republik*, München, 1985.
- 4 Deutscher Bundestag, *Fragen an die deutsche Geschichte: Ideen, Kräfte, Entscheidungen von 1800 bis zur Gegenwart*, Bonn, 1993.
- 5 Friedrich List, *Schriften/Reden/Briefe*, Berlin, 1932.
- 6 Helmut M. Müller, *Schlaglichter der deutschen Geschichte*, Mannheim, Wien, Zürich, 1986.
- 7 Erich Zöllner, *Geschichte Österreichs*, München, 1979.
- 8 Hellmut Diwald,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Berlin, 1978.
- 9 Andreas Hillgruber, *Bismarcks Außenpolitik*, Freiburg, 1972.
- 10 Lothar Gall, *Bismarck. Der weiße Revolutionär*, Frankfurt am Main, Berlin, 1990.
- 11 Theodor Schieder, *Handbuch der Europäischen Geschichte. Band 6*. Stuttgart, 1973.
- 12 Helmut Böhme, *Probleme der Reichsgründungszeit 1848—1879*, Köln, 1968.
- 13 Hildebrandt, *Opposition in der Pauls Kirche*, Berlin, 1981.
- 14 Gerhard A. Ritter, *Das Deutsche Kaiserreich 1871—1914: Ein historisches Lesebuch*, Göttingen, 1977.

- 15 E. Schmidt-Volkmar, *Der Kulturkampf in Deutschland*, Göttingen, 1962.
- 16 Walter Bußmann, *Das Zeitalter Bismarcks*, Frankfurt am Main, 1968.
- 17 Heinz Walter, *Bismarcks Außenpolitik 1871—1881*, Berlin, 1983.
- 18 Gordon A. Craig, *Deutsche Geschichte 1866—1945*, München, 1980.
- 19 Hans-Ulrich Welher, *Das Deutsche Kaiserreich 1871—1918*, Göttingen, 1973.
- 20 Klaus Schulz, *Deutsche Geschichte und Kultur: 500 Bilder aus 2000 Jahren*, Königstein im Taunus, 1987.
- 21 Volker Hentschel, *Wirtschaft und Wirtschaftspolitik im wilhelminischen Deutschland: Organisierter Kapitalismus und Interventionsstaat?* Stuttgart, 1978.
- 22 Manfred Rauh, *Föderalismus und Parlamentarismus im Wilhelminischen Reich*, Düsseldorf, 1972.
- 23 Dieter Krüger, *Nationalökonomien im wilhelminischen Deutschland*, Göttingen, 1983.
- 24 Manfred Rauh, *Die Parlamentarisierung des Deutschen Reiches*, Düsseldorf, 1977.
- 25 Christoph von Tiedemann, *Aus sieben Jahrzehnten, Zweiter Band: Sechs Jahre Chef der Reichskanzlei unter dem Fürsten Bismarck*, Leipzig, 1909.
- 26 W. M. Chwostow, *Zur Geschichte der Neuzeit 1870—1918*, Berlin, 1956.
- 27 Alfred von Tirpitz, *Erinnerungen*, Leipzig, 1920.
- 28 Eckart Kehr, *Der Primat der Innenpolitik*, Berlin, 1965.

- 29 Michael Stürmer, *Das Kaiserliche Deutschland: Politik und Gesellschaft 1870—1918*, Darmstadt, 1976.
- 30 Rudolf Huber, *Dokumente zur Deutschen Verfassungsgeschichte, Band 1, Deutsche Verfassungsdokumente 1803—1850*, Stuttgart, Berlin, Köln, Mainz, 1978.
- 31 Dieter Grimm, *Deutsche Verfassungsgeschichte 1776—1866*, Frankfurt am Main, 1988.
- 32 Schoeps, *Preussen: Geschichte eines Staates*, Berlin, 1967.
- 33 Reinhard Spree, *Die Wachstumszyklender deutschen Wirtschaft von 1840 bis 1880*, Berlin, 1977.
- 34 Gustav Seeber und Karl-Heinz Noack, *Preussen in der deutschen Geschichte nach 1789*, Berlin, 1981.
- 35 Bernt Engelman, *Preussen: Land der unbegrenzten Möglichkeiten*, München, 1979.
- 36 Ernst Engelberg, *Bismarck: Urpreusse und Reichsgründer*, Berlin, 1985.
- 37 Ernst Rudolf Huber, *Dokumente zur Deutschen Verfassungsgeschichte. Band 2. Deutsche Verfassungsdokumente 1851—1900*, Stuttgart, 1986.
- 38 Mottek/Blumberg/Wutzmer/Becker, *Studien zur Geschichte der industriellen Revolution in Deutschland*, Berlin, 1960.
- 39 Bernhard Pollmann, *Lesebuch zur deutschen Geschichte*, Dortmund, 1989.
- 40 Gerd Hohorst, Jürgen Kocka und Gerhard A. Ritter, *Sozialgeschichtliches Arbeitsbuch. Band 2. Materialien zur Statistik des Kaiserreichs 1870—1914*, München, 1978.
- 41 Karl Erich Born, *Wirtschafts- und Sozialgeschichte des Deutschen Kaiserreichs (1867/71—1914)*, Stuttgart, 1985.

- 42 Wilfried Feldenkirchen, *Die Eisen- und Stahlindustrie des Ruhrgebiets 1879—1914*, Wiesbaden, 1982.
- 43 Hans-Ulrich Wehler, *Deutsche Gesellschaftsgeschichte. Band 3. Von der "Deutschen Doppelrevolution" bis zum Beginn des Ersten Weltkrieges 1849—1914*, München, 1995.
- 44 Franz F. Wurm, *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 In Deutschland 1848—1948*, Opladen, 1969.
- 45 Werner Sombart, *Die deutsche Volkswirtschaft im neunzehnten Jahrhundert und im Anfang des 20. Jahrhunderts*, Berlin, 1923.
- 46 Walther G. Hoffmann, *Das Wachstum der deutschen Wirtschaft seit der Mitte des 19. Jahrhunderts*, Berlin, Heidelberg, New York, 1965.
- 47 Hubert Kiesewetter, *Industrielle Revolution in Deutschland 1815—1914*, Frankfurt am Main, 1989.
- 48 Hans Pohl, *Die chemische Industrie in den Rheinlanden während der industriellen Revolution. Band 1. Die Farbenindustrie*, Wiesbaden, 1983.
- 49 Thomas Nipperdey, *Deutsche Geschichte 1866—1918. Band 1. Arbeitswelt und Bürgergeist*, München, 1990.
- 50 Heinz Reif, *Adel im 19. Und 20. Jahrhundert*, München, 1999.
- 51 Wolfgang J. Mommsen, *Der moderne Imperialismus*, Stuttgart, Berlin, Köln, Mainz, 1971.
- 52 Rainer Fremdling, *Eisenbahnen und deutsches Wirtschaftswachstum 1840—1879*, Dortmund, 1975.
- 53 Richard H. Tilly, *Vom Zollverein zum Industriestaat: Die wirtschaftlich-soziale Entwicklung Deutschlands 1834 bis*

1914, München, 1990.

- 54 Hans-Ulrich Wehler, *Deutsche Gesellschaftsgeschichte. Band 2. Von der Reformära bis zur industriellen und politischen "Deutschen Doppelrevolution" 1815—1845/49*, München, 1987.
- 55 Hahns-Werner Hahn, *Geschichte des Deutschen Zollvereins*, Göttingen, 1984.
- 56 Gustav Stolper, *Deutsche Wirtschaft seit 1870*, Tübingen, 1966.
- 57 Manfred Schlenke (Hg), *Beiträge zu einer politischen Kultur*, Berlin, 1981.
- 58 Hans-Pohl und Wilhelm Treue, *Die Konzentration im der deutschen Wirtschaft seit dem 19. Jahrhundert*, Wiesbaden, 1978.
- 59 Volker Wellhöner, *Grossbanken und Grossindustrie im Kaiserreich*, Göttingen, 1989.
- 60 Johannes Müller, *Deutsche Bevölkerungsstatistik: ein Grundriss für studium und Praxis*, Jena, 1926.
- 61 Wolfgang Köllmann und Peter Marschalck, *Bevölkerungsgeschichte*, Köln, 1972.
- 62 Ulla Knapp, *Frauenarbeit in Deutschland, Band 2. Hausarbeit und Geschlechtsspezifischer Arbeitsmarkt im deutschen Industrialisierungsprozess*, München, 1984.
- 63 Barbara Greven-Aschoff, *Die Bürgerliche Frauenbewegung in Deutschland 1894—1933*, Göttingen, 1981.
- 64 Helmut Rumpler (Hg), *Innere Staatsbildung und gesellschaftliche Modernisierung in Österreich und Deutschland 1867/71 bis 1914*, Wien, München, 1991.

- 65 Thamas Nipperdey, *Deutsche Geschichte 1866—1918. Band 2. Machtstaat vor der Demokratie*, München, 1992.
- 66 Arno Klönne, *Die deutsche Arbeiterbewegung: Geschichte—Ziele—Wirkungen*, Düsseldorf, 1980.
- 67 A. Sartorius von Waltershausen, *Deutsche Wirtschaftsgeschichte 1815—1914*, Jena, 1923.
- 68 Heinz Josef Varain (Hg), *Interessenverbände in Deutschland*, Köln, 1973.
- 69 Wolfgang Hardtwig und Harm-Hinrich Brandt, *Deutschlands Weg in die Moderne: Politik, Gesellschaft und Kultur im 19. Jahrhundert*, München, 1993.
- 70 Helmut Böhme, *Deutschlands Weg zur Grossmacht: Studium zum Verhältniß von Wirtschaft und Staat während der Reichsgründungszeit 1848—1881*, Köln, Berlin, 1966.
- 71 Friedrich List, *Schriften/Reden/Briefe. Band 1. Der Kampf um die politische und ökonomische Reform 1815—1825*, Aalen, 1971.
- 72 Gustav Schmidt, *Der europäische Imperialismus*, München, 1985.
- 73 Karl Erich Born, *Staat und Sozialpolitik seit Bismarcks Sturz*, Wiesbaden, 1957.
- 74 Wilhelm Schüssler, *Weltmachtstreben und Flottenbau*, Witten-Ruhr, 1956.
- 75 Tyler Whittle, *Kaiser Wilhelm II*, München, 1979.
- 76 Willibald Gutsche, *Monopole, Staat und Expansion vor 1914: zum Funktionsmechanismus zwischen Industriemonopolen, Grossbanken und Staatsorganen in der Aussenpolitik des Deutschen Reiches 1897 bis Sommer 1914*,

Berlin, 1986.

- 77 Hans-Peter Ullmann, *Politik im Deutschen Kaiserreich 1871—1918*, München 1999.

二 英文部分：

- 1 A. G. Kenwood & A. L. Lougheed, *Technological Diffusion and Industrialisation before 1914*, New York, 1982.
- 2 J. H. Clapham,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France and Germany 1815—1914*, Cambridge, 1936.
- 3 Martin Kitchen, *Cambridge Illustrated History: Germany*, Cambridge, 1996.
- 4 Golo Mann, *The History of Germany since 1789*, Chatto & Windus, 1987.
- 5 J. M. Keynes,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Peace*, London, 1919.
- 6 Peter Flora, *State, Economy, and Society in Western Europe 1815—1975: A Data Handbook, Volume 1: The Growth of Mass Democracies and Welfare States*, Frankfurt, Chicago, London, 1983.
- 7 René Albrecht-Carrie, *A Diplomatic History of Europe since the Congress of Vienna*, New York, 1973.
- 8 J. A. S. Grenville, *Europe Reshaped 1848—1878*, London, 1986.
- 9 Wolfgang J. Mommsen, *Imperial Germany 1867—1918: politics, culture, and society in an authoritarian state*, London, 1995.
- 10 Chris Cook & John Poxton, *European Political Facts 1848—1918*, New York, 1978.

- 11 Erich Eyck, *Bismarck and the German Empire*, New York, 1968.
- 12 Paul Kennedy, *The Realities Behind Diplomacy: Background Influences on British External Policy, 1865—1980*, London, 1985.
- 13 *Bismarcks Table Talk: Being the Story of the Life in His Own Words*, London, 1898.
- 14 Robert Herndon Fife, Jr., *The German Empire between Two Wars: A Study of the Political and Social Development of the Nation between 1871—1914*, New York, 1916.
- 15 Charles Downer Hazen, *Europe since 1815*, New York, 1924.
- 16 C. Grant Robertson, *Bismarck*, London, 1947.
- 17 Charles Seymour, *The Diplomatic Background of the War 1870—1914*,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18.
- 18 Count Julius Andrassy, *Bismarck, Andrassy and Their Successors*, Boston and New York, 1927.
- 19 G. P. Gooch, *Germany*, New York, 1927.
- 20 Emil Ludwig, *Bismarck*, Boston, 1928.
- 21 William Harbutt Dawson, *The German Empire 1867—1914, and the Unity Movement. Volume 2*. New York, 1919.
- 22 Nicholas Der Bagdasarian, *The Austro-German Rapprochement 1870—1879: From the Battle of Sedan to the Dual Alliance*, London, 1976.
- 23 A. J. P. Taylor, *The Struggle for Mastery of Europe 1848—1918*, Oxford, 1977.
- 24 W. N. Medlicott & Dorothy K. Coveney, *Bismarck and Europe*, New York, 1972.
- 25 Richard Shannon, *The Crisis of Imperialism 1865—1915*,

- London, 1986.
- 26 Marvin Swartz, *The Politics of British Foreign Policy in the Era of Disraeli and Gladstone*, London, 1985.
 - 27 Mary Evelyn Townsend, *The Rise and Fall of Germany's Colonial Empire 1884—1918*, New York, 1930.
 - 28 John Wroughton, *Documents and Debates: Nineteenth Century Europe*, London, 1983.
 - 29 Norman Stone, *Europe Transformed 1878—1919*, London, 1983.
 - 30 Geoff Layton, *From Bismarck to Hitler: Germany 1890—1933*, London, 1995.
 - 31 Frank B. Tipton and Robert Aldrich, *An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Europe 1890—1939*, London, 1987.
 - 32 David Blackbourn and Geoff Eley, *The Peculiarities of German History*, Oxford, 1984.
 - 33 John Wroughton, *Nineteenth Century Europe*, London, 1983.
 - 34 Henry de Bellgens Gibbins, *Economic and Industrial Progress of the Century*, Toronto.
 - 35 David Calleo, *The German Problem Reconsidered: Germany and the World Order, 1870 to the Present*, Cambridge, 1978.
 - 36 F. Lee Bennis, *European History since 1870*, New York, 1946.
 - 37 Arthur Birnie, *An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1760—1930*, London, 1933.
 - 38 Lucius Hudson Holt & Alexander Wheeler Chilton, *The History of Europe from 1862—1914*, New York, 1918.
 - 39 L. L. Farrar, *Arrogance and Anxiety*, Iowa, 1981.

- 40 Wilhelm II, *The Kaiser's Memoirs*, New York & London, 1922.
- 41 D. K. Fieldhouse, *The Colonial Empires: A comparative Survey from the Eighteenth Century*, London, 1982.
- 42 H. J. Habakkuk,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Vol. 4.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s and After: Incomes, Population and Technological Change (1)*, Cambridge, 1966.
- 43 W. O. Henderson, *The Rise of German Industrial Power 1834—1914*,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1975.
- 44 P. M. Kennedy, *The Rise of the Anglo-German Antagonism 1860—1914*, London, 1980.
- 45 Herbert Feis: *Europe, the World's Banker 1870—1914: An Account of European Foreign Investment and the Connection of World Finance with Diplomacy before the War*, Clifton, 1974.
- 46 Imanuel Geiss, *German Foreign Policy 1871—1914*, London, Boston, 1976.
- 47 W. R. Lee and Eve Rosenhaft, *State, Social Policy and Social Change in Germany 1880—1994*, Oxford, New York, 1997.

三 中文部分:

- 1 [德]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3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2.
- 2 [德]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4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2.
- 3 [德]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1卷. 北京:

- 人民出版社，1965。
- 4 [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 5 [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 6 [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 7 [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 8 [苏]列宁．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 9 [苏]列宁．列宁全集．第1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
 - 10 [苏]列宁．列宁全集．第2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
 - 11 [联邦德国]卡尔·艾利希·博恩．德意志史：从法国革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 12 [苏]波梁斯基．外国经济史（资本主义时代）．北京：三联书店，1963。
 - 13 樊亢，宋则行．外国经济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 14 [德]弗·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
 - 15 [德]梅林．德国社会民主党史．北京：三联书店，1966。
 - 16 [奥]埃·普里斯特尔．奥地利简史．北京：三联书店，1972。
 - 17 中国德国史研究会．德国史论文集．北京：三联书店，1981。
 - 18 [德]弗兰茨·梅林．中世纪末期以来的德国史．北京：三联书店，1980。
 - 19 [美]帕尔默，科尔顿．近现代世界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

- 20 北京大学历史系. 沙皇俄国侵略扩张史. 上册.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9.
- 21 [美]科佩尔·S. 平森. 德国近现代史.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7.
- 22 [苏]波将金. 外交史. 第1卷. 北京: 三联书店, 1979.
- 23 沈汉, 刘新成. 英国议会政治史.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1.
- 24 R. B. Mowat. 近代欧洲外交史.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36.
- 25 [丹]帕利·劳林. 丹麦王国史. 武汉: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73.
- 26 樊亢, 宋则行等. 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简史.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5.
- 27 [德]奥托·冯·俾斯麦. 思考与回忆. 北京: 东方出版社, 1985.
- 28 [美]巴巴拉·杰拉维奇. 俄国外交政策的一个世纪.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78.
- 29 王绳祖. 国际关系史. 上册.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1983.
- 30 [英]艾伦·帕麦尔. 俾斯麦传.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2.
- 31 [英]温斯顿·丘吉尔. 英语国家史略. 北京: 新华出版社, 1985.
- 32 钱端升. 德国的政府.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35.
- 33 丁建弘, 陆世澄主编. 德国通史简编.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 34 [法]皮埃尔·米盖尔. 法国史.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5.
- 35 [德]维纳·洛赫. 德国史. 北京: 三联书店, 1959.
- 36 [德]梅林. 德国社会民主党史. 北京: 三联书店, 1966.
- 37 孙炳辉, 郑寅达编著. 德国史纲.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

社, 1995.

- 38 张文焕·拉萨尔评传·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3.
- 39 [德]赫伯特·瓦恩克·德国工会运动简史·北京: 三联书店, 1958.
- 40 [苏]赫沃斯托夫·外交史·第2卷·北京: 三联书店, 1979.
- 41 [苏]弗·鲍爵姆金主编·世界外交史·第3分册·北京: 五十年代出版社.
- 42 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1982.
- 43 国际条约集(1872—1916)·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86.
- 44 亨利·赫坦巴哈等·俄罗斯帝国主义·北京: 三联书店, 1978.
- 45 [法]米歇尔·博德·资本主义史1500—1980·北京: 东方出版社, 1986.
- 46 [法]夏尔·贝特兰·纳粹德国经济史·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0.
- 47 [德]恩斯特·约翰, 耶尔格·容克尔·德意志近百年文化史·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6.
- 48 [德]弗·鲍尔生·德国教育史·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6.
- 49 [奥]迈克尔·米特罗尔·欧洲家庭史·北京: 华夏出版社, 1987.
- 50 [美]阿瑟·刘易斯·增长与波动·北京: 华夏出版社, 1987.
- 51 王鹏飞等编著·近代国际关系史·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0.

- 52 [德]伯恩斯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北京：三联书店，1958。
- 53 [苏]布·恰根·反对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哲学修正主义斗争史·北京：三联书店，1964。
- 54 中共中央马列著作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编·卢森堡文选·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 55 厄斯纳·经济危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 56 张文焕·拉萨尔和俾斯麦·北京：三联书店，1981。
- 57 沙比罗·欧洲近现代史·上海：世界书局，1933。
- 58 阿格·近世欧洲经济发达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32。
- 59 [德]弗里茨·费舍尔·争雄世界：德意志帝国1914—1918年战争目标政策·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
- 60 [德]阿柏特·诺尔登·德国历史的教训·北京：三联书店，1958。
- 61 [美]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求实出版社，1992。
- 62 陈乐民·“欧洲观念”的历史哲学·北京：东方出版社，1988。
- 63 萨那·第一次世界大战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 64 [苏]涅奇金娜·苏联史·第2卷·北京：三联书店，1959。
- 65 外交学院编译室·近代国际关系史参考资料（苏联外交辞典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
- 66 [苏]罗斯图诺夫·第一次世界大战史·上册·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
- 67 [德]施丢克尔·十九世纪的德国与中国·北京：三联书店，1963。
- 68 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1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60。
- 69 [英]菲利浦·约瑟夫·列强对华外交·北京：商务印书馆，

1962.

- 70 刘善章, 周荃主编. 中德关系史译文集. 青岛: 青岛出版社, 1992.
- 71 [德]保罗·汪戴尔. 德国帝国主义与战争.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59.
- 72 德国史论文集. 青岛: 青岛出版社, 1992.
- 73 上海师范大学教育系外国教育发展史资料(近现代部分)编译组. 外国教育发展史料(近现代部分).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6.
- 74 郭圣铭. 西方史学史概要.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6.
- 75 [德]马克斯·韦伯.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北京: 三联书店, 1992.
- 76 [德]桑德福斯. 尼采—希特勒——本世纪人类历史悲剧的反思.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8.
- 77 [德]德斯佩泽尔与福斯卡. 欧洲绘画史. 北京: 人民美术出版社, 1984.
- 78 欧阳英等. 欧美雕塑名作欣赏.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7.
- 79 [德]爱克曼辑录. 歌德谈话录.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7.
- 80 [德]维尔纳·冯·西门子. 西门子回忆录. 北京: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2.
- 81 邢来顺. 德国精神. 武汉: 长江文艺出版社, 1998.

后 记

本书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九五”规划项目的最终研究成果。

1985年，我考入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在著名的世界近代史和德国史专家姜德昌教授的指导下开始学习和研究德国史。1988年，我被分配到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在肖汉森教授和黄正柏教授等的关怀下继续从事德国史的研究和教学工作。1999年，我有幸考入武汉大学历史系攻读博士学位，师从吴友法教授，继续研究德国史。作为后辈，我还有幸多次聆听丁建弘教授、朱懋铎教授等前辈专家学者的指教，获益匪浅。正是在以上诸位老师的关爱下，我才相继发表了一些有关德国史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成果为本书的成稿奠定了基础。我在此要向以上诸位老师表示衷心的感谢。

学术著作出版难是人所共知的。因此，我在此要感谢推荐本书的校学术委员会诸位领导、专家和提供出版基金的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我还要对马敏教授、范军总编辑、严定友副总编辑、王玉德教授、胡年珍书记等为本书出版所给予的关怀和支持表示诚挚的谢意。此外，周柏青同志和责任编辑黄利红同志为本书的出版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为此特别表示感谢。最后，我要感谢我的爱人韦红，正是她的支持使我能潜心于本书的撰写。

由于学识水平有限，加上资料等客观原因的限制，本书中定会存在一些疏漏和不足之处，在此诚恳地希望诸位专家、读者批评指正。

邢来顺

2002年2月于武昌桂子山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迈向强权国家：1830年-1914年德国工业化与政治
发展研究

作者=邢来顺著

页数=340

SS号=11434903

出版日期=2002年06月第1版

目录

引言

一 建立于“煤和铁”之上的帝国

(一) 姗姗来迟者——德国第一次工业革命

(二)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德意志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启动

(三) 发展是硬道理——普鲁士经济强权的崛起

(四) 识时务者为俊杰——普鲁士成为统一德国的先锋

锋

(五) 强权即公理——俾斯麦“铁血”浇铸统一的德国

国

二 德意志帝国前期的政治状况

(一) 畸形怪胎——1871年德意志帝国宪法

(二) 斑驳陆离——德意志帝国初期的政党状况

(三) 宗教世俗化——“文化斗争”掩盖下的教俗势力交锋

(四)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社会主义工人运动和非常法

(五) 量力而行——谋求欧洲大陆霸主地位的大陆政策

策

三 第二次工业革命与德意志帝国成为工业先锋国家

(一) 新的机遇——世界第二次工业革命

(二) 后来居上——德国工业的跳跃性发展

(三) 从农业国到工业国——德国经济结构的根本性转变

(四) 走向现代社会——德国社会结构的变化

四 工业化进程中的德意志帝国政治状况

(一) 现实的即是合理的——行政结构上的中央集权主义发展趋势

(二) 春潮带雨晚来急——政治体制上向议会政治和

民主化的迈进

(三)暗涛汹涌——各种利益集团的出现和主要政党力量的消长

(四)兄弟阋墙——工人运动的继续发展和社会民主党内部的思想裂变

(五)抱残守缺——贵族占据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国家

(六)继承与发展——工业化背景下的文化繁荣和思想意识多元化

五 工业化冲击下德意志帝国内外政策的调整

(一)务实求真——德国政府对外贸易政策的变化

(二)勇开先河——国家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和其他社会政策的进步

(三)“暴发户”心态——以夺取世界霸权为目标的“世界政策”

结语

参考文献

后记

责任编辑 黄利红
封面设计 新视点
责任校对 王炜

定价：16.00元

ISBN 7-5622-2565-6



9 787562 225652 >